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中短篇小说

中



L512.44/117

64047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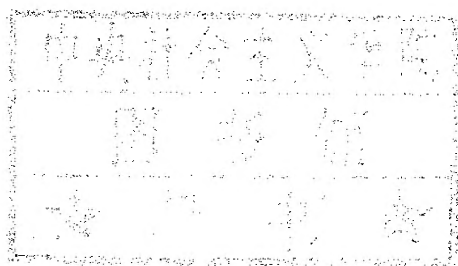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

1857—1863



20019835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Л. Н. ТОЛСТОЙ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据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
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 译出。

责任编辑: 磊 然
装帧设计: 柳成荫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三卷)
Liefu Tuorsitai Wen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0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5}{8}$ 插页 7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400

书号 10019·3866 定价 2.95 元

目 次

卢塞恩

——德·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记摘录	芳 信译 (1)
阿尔贝特	芳 信译 (30)
三死	芳 信译 (63)
家庭幸福	芳 信译 (80)
哥萨克	刘辽逸译 (175)
波利库什卡	芳 信译 (359)
题解	(429)

卢 塞 恩*

——德·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记摘录

7月8日

昨天晚上我到了卢塞恩，下榻在此地最好的旅馆瑞士旅馆。

“卢塞恩，这座瑞士州的古城，在四州湖畔，”默里说，“是瑞士的一个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这儿有三条主要的公路交叉着；搭汽船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到达里吉山，从山上可以看见世界上最壮丽的风景之一。”

不管这话是不是正确，可是其他旅行指南上也是这样说的，因此，各国的旅行家们，尤其是英国人，到卢塞恩来的非常多。

这座宏伟的五层楼的瑞士旅馆是不久以前建成的，在湖边的堤岸上，在那个老地方，原来有一座有顶的、弯曲的木桥，桥角上有小教堂，桥梁上有圣像。现在，由于英国人源源而来，由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趣味和他们的金钱，那座旧桥已被拆毁了，在那儿造了一条象棍子似的笔直的、以花岗岩为基座的堤岸，堤岸上，盖了几幢方方正正的五层楼房；在楼房前面，种了两行小菩提树，都用支柱撑着；在菩提树中间，照例摆着绿色的长椅。这是个散步休憩的地方；那戴着瑞士草帽的英国女人和穿着结实而舒适的衣服的英国绅士在这儿来来往往，欣赏着自己的作品。这样的堤岸、房屋、菩提树和英国人，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许是非

* 旧译琉森。

常好的，就是不该在这儿，不该在这极其庄严而又说不出的和谐与柔和的大自然中。

当我上楼走进我的房里，打开临湖的窗子时，这种湖光，这种山色和这种天宇的美丽，在最初的一刹那间，真是使我目眩眼花和心荡神移。我感到了一种内心的不安，需要用一种什么方法把突然在我心里洋溢着的感情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想抱抱谁，使劲抱抱他，胳膊胳膊他，拧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晚上六点多钟了。整天都下着雨，现在天放晴了。象燃烧着的硫磺似的淡蓝色的湖上，有几点轻舟，后面拖着一道道正在消逝的波痕；湖水静止地、光滑地、象要溢出来似地在窗前的芳草纷披的绿岸间展开，蜿蜒地向前伸去，直到被紧夹在两座巨大的陡坡之间，于是显得黑了，接着便停滞和消逝在此起彼伏的重峦叠嶂、雾霭和冰河之间。近处是伸展开去的濡湿、鲜绿的湖岸，岸上有芦苇、草地、花园和别墅；再远一点是深绿的、树木繁茂的、有着古堡废墟的陡坡；最远处是一片耸立着离奇的峭壁峰岩和暗灰色雪峰的山群绵亘的紫白色的远景；万物都沉浸在柔和的、晶莹的、蔚蓝色的大气中，都被从云缝里射出的落日的炎热的光辉照耀着。湖上也好，山上也好，天空中也好，没有一丝完整的线条，没有一片完整的色彩，没有一个同样的瞬间；到处都在动，都是不均衡，是离奇变幻，是光怪陆离的阴影和线条的无穷的混合和错综，而万物之中却蕴藏着宁静、柔和、统一和美的必然性。而这儿，就在我的窗前，在这种模糊的、错杂的、无拘无束的美之中，却横着一条人工筑造的、愚蠢的、白棍子似的堤岸，用支柱撑着的菩提树和绿色的长椅——这些寒伦的、庸俗的、人造的东西，不但不象遥远的别墅和废墟那样，融合在美的

统一的谐和当中，反而粗暴地破坏了它。我的视线老是不由自主地和那条直得可怕的堤岸线发生冲突，而且我心里直想推开它，毁掉它，就象要把眼睛下面鼻子上的那颗黑点擦掉一样；可是英国人散步的那条堤岸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所以我只好尽量设法找寻一个看不见它的视角。终于，我找到了一个办法，于是我就独自坐在那儿玩味着一个人在孤寂中凝视着大自然的美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虽不完全、但却甜得令人难受的感情，直到吃晚饭时为止。

七点半时，来叫我吃晚饭了。在底层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摆着两张至少可以容纳一百人的长餐桌。客人们陆续来到大厅里，肃静的动作持续了三分钟左右：女士们的衣服的绰绰声、很轻的脚步声以及和殷勤文雅的侍者们悄悄的商谈声；终于所有的坐位都给绅士太太们坐满了，他们一个个穿得都很漂亮，甚至很阔绰，一般都非常整洁。在瑞士，通常大部分客人是英国人，因此公共餐桌上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家保持一种公认的严格的礼节、沉默寡言（不是由于骄傲，而是因为没有必要接近），以及因自己的需要得到了适当和愉快的满足而自我陶醉的神情。雪白的花边、雪白的硬领、雪白的真牙和假牙、洁白的脸和手，从各方面闪闪发光。而那些脸孔，其中有许多很漂亮，只是现出一种感到个人幸福而对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的表情；那些戴着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白手，只是为了整理领子、切牛肉、斟酒才动动而已。那些手的动作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内心的活动。家属们偶尔用低微的声音交谈几句哪道菜或是哪种酒味美，或是里吉山上美丽的风景。单身的男女游客们默不作声地并排坐着，甚至谁也不看谁一眼。要是这一百人里面间或有哪两个人彼此谈起话来，那他们准是谈天气和登里吉山。

几乎听不见刀叉在盘子里动的声音，菜肴每次只吃一点儿，豌豆和青菜一定得用叉子叉着吃；侍者们不自主地被全体的肃静压倒，低声问你要什么酒。每逢吃这顿饭时，我总是感到压抑，不痛快，结果便变得忧郁起来。我老觉得好象犯了什么过错受到惩罚似的，就象小时候淘了气，他们把我放在椅子上，用讽刺的口吻对我说：“我的小乖乖，你就歇会儿吧！”——可是年轻的血液却在我血管里沸腾，而且我听见我的弟兄在隔壁屋里的欢闹声。以前我总想反抗在这样的会餐时所感受到的这种压抑的感情，可是徒然；所有这些死气沉沉的脸给了我一种无法抵抗的影响，所以我也只好变得死气沉沉。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看。起初我试过和邻座的人谈谈；可是，除了在那同一个地方以及那同一个人重复显然是千篇一律的词句以外，我是得不到别的回答的。其实，所有这些人并不傻，也不是麻木不仁，不过，大概这些僵化的人之中，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有一种内心的生活，而且其中有许多人的生活，比我更复杂和更有趣得多。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使自己失去人生中一种最大的享受——人跟人互相交谈的快乐呢？

我们巴黎的公寓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啊！在那儿，我们，二十个国籍、职业和性格都极不相同的人，在法兰西的社交风尚的影响下，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就象在一块儿游戏一样。在那儿，从桌子这一头到另一头，我们交谈；在谈话中夹杂着诙谐和俏皮的双关语，哪怕时常用一些似通非通的语言也没什么，谈话很快就融成了一片。在那儿，谁也不必担心结果怎么样，心里想到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在那儿，我们有我们的哲学家，有我们的辩论家，有我们的bel esprit^①，有我们的被嘲笑的对象，一切都是共

① 法语：有才智的人。

同的。在那儿，一吃完晚饭，我们就把桌子移开，不管合不合节拍，便开始在沾满尘埃的地毯上跳起 la polka^① 来，直到深夜为止。在那儿，我们尽管有些轻浮，不大聪明，而且是不值得尊敬的人，可是我们却是人。那富有风流韵事的西班牙伯爵夫人，那饭后朗诵《神曲》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那得到进杜伊勒利宫^② 的许可证的美国医生，那留着长发的青年戏剧家，那自称创作了世界上最好的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那每个手指上都戴着三颗宝石戒指、美丽而薄命的寡妇，——我们大家都象人似地，虽然很表面、却很友好地彼此相待，而且互相留下了印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很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却很真诚深刻。但是在这种英国式的 table d'hôte^③ 上，我老是一面瞧着所有这些花边、缎带、宝石戒指、搽着发油的头发和绸衣服，一面想：用这些装饰可以使多少活生生的女人得到幸福，同时也可以使得别人幸福。想起来都奇怪，有多少知心的朋友和情人们——非常幸福的朋友和情人们——并排地坐在那儿，也许不知道这个。而且天晓得为什么，他们从来也不想知道这个，从来也不把他们非常向往的和非常容易给人的这种幸福互相给予对方。

象平常吃过这种晚饭那样，我变得忧郁起来；没有吃完最后那道点心，我就没精打采地去溜弯儿。又窄又脏又没亮光的街道，上了门的店铺，喝得醉醺醺的工人，以及和去打水的女人的相遇，或是和戴着帽子、在胡同里一面贴着墙走来走去、一面东张西望的女人的相遇，不但没有排除我的忧郁的心情，反而使它越发强烈。街上已经完全黑了；这时，我没有朝我的周围张望，

① 法语：波尔卡舞。

② 杜伊勒利宫，旧时法国王宫，今已废，改建成花园。

③ 法语：公共餐桌。

心里什么也不想，径直向旅馆走去，希望以睡眠来摆脱这种阴沉的心境。我心里感到可怕的冷淡、孤独和沉重，就象一个人刚来到一个新地方，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不禁悲从中来一样。

当我只看着我脚下的地面，沿着堤岸向瑞士旅馆走去时，一种奇妙而非常悦耳甜蜜的音乐声突然使我吃了一惊。这种音响在一刹那间对我起了振奋的作用，好象一道明亮快乐的光辉射进了我的心里。我感到舒服和愉快。我那昏昏欲睡的注意力又集中在我的周围的一切事物上。于是夜景和湖山的美丽——我起先曾对它感到冷淡——好象一个新奇的东西突然使我感到又惊又喜。在这一刹那间，我不知不觉地注意到了被升起的月亮照着的阴暗天空中那片深蓝天幕上的灰色云块，映着几点灯光的、象镜子般的墨绿的湖水，远处雾沉沉的群山，从弗廖申堡传来的蛙声和对岸的鹈鹕清脆嘹亮的啼叫。就在我的正前面，在我的注意力最集中的、乐声传来的那个地方，我看见了一个围成半圆形的人群在街心的薄暗中，而在人群前面没有几步路的地方，有个穿黑衣服的矮小的人。在人群和那人后面，在浮飘着断云的深灰色的天空中，花园中的几棵黑魑魑的杨树美妙地浮现了出来，两个森严的塔顶在古寺两边庄严地耸立着。

我走得更近了，乐声变得更清晰了。我清楚地辨出在那远方、在夜空中美妙地颤动着的吉他的完美的和音，以及轮唱的歌声，此起彼落，各声部虽然唱的不是主旋律，但它们某些唱得最精彩的地方却烘托出了主旋律。主旋律有点类似优美动人的玛祖卡舞曲。歌声好象时近时远，听起来时而象男高音，时而象男低音，时而又象蒂罗尔^①人的絮絮低语、悠扬婉转的假嗓音。

① 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区，在阿尔卑斯山中。

这不是歌曲，而是对歌曲的轻妙而杰出的素描。我无法明白这是什么；可是这是美丽的东西。那吉他的令人心荡神移的幽微的和音，那优美轻快的旋律，那衬托在黑沉沉的湖水、清澈的月色、悄然矗立着的两个高大的塔顶和花园中的黑魑魑的杨树构成的奇妙背景上的黑衣人的孤寂的影子——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都有说不出的美丽，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生活中一切紊乱的、无意中得来的印象，突然对我有了意义和魅力。好象有一朵鲜妍芬芳的花在我心里开放了一样。代替刚才我所经受到的对世上的一切的厌倦、漠然和冷淡，我突然感到了爱的需要、满怀希望和无以名状的生活乐趣。“你要什么呢？你想什么呢？”我不禁这样问自己。“就是它，就是从四面八方环绕着你的美和诗。用你的全部力量大口地把它都吸进去吧，享受它吧，你还要什么呢！一切都是你的，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走得更近了。那个矮小的人好象是个流浪的蒂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一只脚向前伸出，头朝后仰着，一面弹着吉他，一面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唱着他那优美的歌曲。我马上就对这个人发生了好感，感谢他在我心里引起的这种变化。我能看得清楚的是：这位歌手穿着一件很旧的黑色常礼服，短短的黑发，戴着一顶非常俗气的旧便帽。他的服装没有一点儿艺术家的风度，可是他那随便的、天真愉快的姿态和动作，衬着他那小小的身材，却现出一副令人感动而又滑稽可笑的样子。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台阶上、窗子里和阳台上，站着打扮得花枝招展、长裙曳地的贵妇人们，硬领雪白的绅士们，穿着金边制服的看门人和侍者们；在街上，在围成半圆形的人群中，在较远的林荫路上的菩提树之间，打扮得很漂亮的侍者们，戴着白帽子、穿着白罩衫的厨师们，互相搂着腰的姑娘们和散步的人们，都聚集在一块

儿了，站住了。他们都好象体会到了我所体会到的同样的感觉。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站在那歌手的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四周是静悄悄的，只有在歌唱的间隔中，从远处掠过水面飘来的有节奏的锤声，以及从弗廖申堡岸边传来的断断续续、带着颤音的蛙声，混合着鹤鹑的清脆单调的啼声。

在黑暗的街上，那矮小的人象夜莺似地，一段又一段地、一曲接一曲地放声唱着。虽然我走到了他的身边，但是他的歌声还是不断地给我很大的快感。他那轻微的声音是非常悦耳的，他用来控制着这种声音的柔和、韵味和圆润感是非凡的，而且显出了他那极大的天赋的才能。他重唱每一段时，每次唱法都不相同，而且显然，所有这些美妙的变化都是他信口唱来，即兴想起的。

在上面瑞士旅馆的人群中和在下面林荫路上的人群中，常常听得见唧唧啾啾的赞词，周围充满了一片表示敬意的沉默。在阳台上 and 窗子里，盛装艳服的男女越来越多，在屋里的灯光映照下，他们凭栏而立，就象画中的人儿一样。散步的人都站住了，而且，在堤岸上的阴影中，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男女站在菩提树旁。在我旁边，离开人群不远，站着一个抽着雪茄的贵族派头的侍者和一个厨子。那厨子强烈地感到了音乐的美妙，而且在听见每个高度的假声的音调时，就兴高采烈地、莫名其妙地对那侍者挤挤眼，点点头，用胳膊肘捅捅他，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说：“喂，他唱得怎么样？”那侍者（凭他满脸的笑容，我已看出歌唱给他的愉快），为了回答厨子，便耸耸肩膀表示说：这很难使他感到惊奇，比这好得多的他都听过。

在歌唱的间隔中，当那歌手咳嗽两声清清嗓子时，我就问侍者，他是什么人，是不是常上这儿来。

“是的，夏天里总要来两三次，”侍者答道，“他是从阿尔戈维亚来的。不过是个要饭的罢了。”

“怎么，有很多象他这样的人来吗？”我问道。

“是的，是的，”侍者一下子没明白我问的话，就回答说。可是后来他懂了，又补充说：“哦，不！我在这儿就看见他一个。再没别人了。”

在这个时候，那矮小的人唱完了第一支歌，敏捷地把吉他往怀里一抱，接着就用德国 patois^① 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什么；这话我不懂，可是引得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什么？”我问道。

“他说他的嗓子太干了，要喝点酒，”那站在我旁边的侍者翻译给我听。

“嗯，他大概爱喝酒吧？”

“这种人都这样，”侍者答道，笑着对他挥了挥手。

那歌手摘下帽子，抡着吉他，走近了旅馆。他仰着头，面对站在窗子里和阳台上的绅士淑女们：“Messieurs et mesdames，”他用半带意大利、半带德国的口音和魔术家对观众讲话时所用的语气说：“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e, vous vous trompez; je ne suis qu'un pauvre diable.”^②他停顿了，沉默了片刻，可是因为谁也没有给他什么，他又扬了扬吉他说：“A présent, messieurs et mesdames, je vous chanterai l'air du Rigbi.”^③上面的听众默不作声，可是仍旧站在那儿等听下一支歌曲；下面的人群都笑了，也许因为他的说法非常奇怪，而

① 法语：方言。

② 法语：先生们太太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那你们就错了；我是个穷人。

③ 法语：现在，先生们太太们，我要给你们唱一首里吉民歌。

且因为谁也没把任何东西给他。我给了他几个生丁，他灵活地把它们从这只手里扔到那只手里，然后藏进坎肩的口袋里，接着，便戴上了帽子，又开始唱起那支他管它叫 *l'air du Righi* 的、优美动人的蒂罗尔歌来。他留着最后唱的这支歌，比所有先头唱的歌都更出色，因此，在逐渐增多的人群中从四面八方传出了赞叹声。他唱完了这支歌，又抡着吉他，摘下帽子，把它向前伸去，然后，向着窗子迈了两步，接着又说了那句费解的话：“*Messieurs et mesdames, 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e,*”^① 显然，他认为这句话非常巧妙和俏皮，可是在他的声音和动作中，我现在看出了某种由于他那矮小的身材而特别显著的踌躇的心情和孩子般的胆怯。那些文雅的听众还是在辉煌的灯光中，美丽如画地站在阳台上和窗子里，他们的盛装艳服闪闪发光；其中有几个人用相当低沉的声音显然在互相谈论那伸着手站在他们面前的歌手，还有几个人用好奇的眼光俯视着那小小的黑影子，从一个阳台上传出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嘹亮欢愉的笑声。在下面的人群中，话声和笑声越来越大了。歌手第三次重复了他那句话，可是他的声音却更微弱了，甚至没有把话说完，就又把拿着帽子的手伸出去，可是马上就缩回来了。就是在第二次，从那几百个穿着漂亮、来听他歌唱的人们中，甚至也没一个人扔给他一个戈比。人群冷酷无情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那小小的歌手显得更小了；他用一只手拿着吉他，另一只手拿着帽子在头上扬了扬，说：“*Messieurs et mesdames, je vous remerci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uit.*”^② 然后又戴上帽子。人群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彼此悠

① 法语：先生们太太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

② 法语：先生们太太们，谢谢你们，我祝你们晚安。

闲地交谈着的漂亮绅士和太太们，从阳台上渐渐地消逝了。人们又重新开始在林荫路上散步。在歌唱时一度寂静过的街道又热闹起来，只有几个人没有走过来，从远远的地方瞧着歌者在笑。我听见那矮小的人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什么，转了转身，好象显得更小了，便迈着急步向市内走去。那些快乐逍遥地散步的人还是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瞧着他笑……

我完全惘然若失了，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因此，我站在那个地方，茫然地凝视着那迈着大步飞也似地向市内走去、逐渐在黑暗中消逝的小小的人儿，凝视着那些跟在他后面嘻嘻哈哈地散步的人。我感到痛苦、忧郁，尤其是替那小小的人、替人群、替我自己感到可耻，好象是我自己向人家讨钱，他们什么也没给我，还要嘲笑我一样。我也没有回头张望，带着揪心的痛苦，迈着急步向瑞士旅馆的门口走去。我还捉摸不透自己的感情，可是，我只知道有某种沉重的、无法摆脱的东西充塞在我的心头，使我感到压抑。

在富丽堂皇、灯火通明的大门口，我遇见了那彬彬有礼地让路的看门人和一家子英国人。一位健壮、漂亮、高个子的绅士，留着英国式的浓黑的络腮胡子，戴着一顶黑呢帽，胳膊上搭着一条格子花呢披巾，手里拿着一根很值钱的手杖，和一位身穿色彩离奇的绸连衣裙、戴一顶镶有发亮的缎带和好看的花边的女帽的太太，手挽着手，懒洋洋地、傲岸地走着。在他们旁边走着的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戴着一顶精美的瑞士女帽，上面斜插着一支羽毛，à la mousquetaire，^① 帽子下面她那白皙的脸蛋的周围，纷垂着一绺绺柔软的、纤细的、淡褐色的髻发。在他们

^① 法语：象火枪手那样。

前面，一个近十岁、脸色绯红的小姑娘一蹦一跳地走着，从精致的花边下露出那双白胖的小膝盖。

“夜色可美哪，”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位太太用甜蜜幸福的声调说。

“嗯！”那英国人懒洋洋地嗯了一声，显然，他在世上活着真是好得连话都懒得说。甚至所有他们这种人都觉得在世上活着是非常宁静、舒服、整洁和容易的；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现出了对任何别人的生活的冷淡；他们绝对相信看门人会给他们让路和鞠躬，散步回来，他们会找到整洁舒适的床铺和房间，他们相信这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有充分的权利享用这一切，——因此，我就突然不禁把他们和那刚才羞惭地逃避嘲笑的人群的、疲惫或许饥饿的流浪歌手作了一个对比，我明白了刚才象石头似地压在我心头的是什麼，同时，对这些人感到了说不出的义愤。我在这个英国人身边来回地走了两次，每次我都没有给他让路，而是用胳膊肘推开他，因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然后，我就走下了门口的台阶，穿过黑暗，朝市内的方向——那个矮小的人消失的地方跑去。

赶上了三个在一块儿走路的人，我问他们歌手上哪儿去了；他们笑了，指给我看他在前面。他独自快步走着，没有人走近他；我觉得他还在气愤地嘟哝着什麼。我赶上了他，提议同他上什么地方去喝瓶酒。他还是那样快地走着，而且不满意地回头瞧瞧我；可是，在他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时，他就站住了。

“好吧，如果您有这种好意，我并不拒绝，”他说，“那儿有家小咖啡店，我们可以上那儿去——是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他补充这句话时，指着那家门还开着的小酒馆。

他这个“普普通通的”词儿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不要上那家普

普通通的咖啡店去，而到那些曾听过他歌唱的人们住的瑞士旅馆去。虽然他怀着胆怯的激动几次谢绝到瑞士旅馆去，说那儿太讲究了，但是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同意了；于是他装出一副毫无窘态的样子，兴高采烈地抡动着吉他，和我沿着堤岸往回走。几个悠闲地散步的人，在我刚一走到歌手跟前时，就走近前来倾听我说话，现在，他们彼此之间一面唧唧啾啾，一面跟着我们走到了旅馆门口，大概是盼望那蒂罗尔人还有什么演奏。

我在过道里遇见一个侍者，便向他要一瓶葡萄酒。他笑眯眯地瞧瞧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就跑过去了。我向侍者头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一本正经地听完了我的话，又把那胆怯的、矮小的歌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便严厉地叫看门人把我们领到左边的大厅里去。这个左边的大厅是个接待普通人的酒吧间。在这个屋子的角落里，一个驼背的女用人正在洗碗碟；全部家具只有几张没漆过的木头桌子和几条长板凳。招待我们的侍者露出和颜悦色、但却含有嘲笑意味的微笑瞧着我们，而且他把两手插在两边口袋里，和那洗碗碟的驼背女人交谈着什么。他显然想让我们知道，他觉得自己凭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比歌手高得多，他对侍候我们不但不感到耻辱，甚至觉得非常有趣。

“您要普通葡萄酒吗？”他现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说时一面对我的伙伴挤挤眼，一面把一块食巾从这只胳膊上搭到另一只胳膊上。

“来香槟，要最好的，”我尽量装出一副最傲慢和最威严的样子说。可是香槟也好，我那虚有其表的傲慢和威严也好，都没有在这侍者身上起到任何作用；他冷笑了笑，瞧着我们站了一会儿，便从容不迫地看看自己的金表，然后迈着悠闲的步子走出了屋子，好象他是出去散步似的。他很快就拿着酒和另外两个侍

者一块儿回来了。那两个侍者在洗碗碟的女用人旁边坐下了，脸上现出愉快的关心和温存的微笑欣赏着我们，就象父母在孩子们玩得很热闹的时候，欣赏自己那些可爱的孩子一样。只有那驼背的洗碗碟的女用人好象是带着同情，而不是带着嘲笑瞧着我们。虽然在这些侍者的炯炯的目光下，和歌手谈话以及款待他使我感到很不痛快而且很窘，但我还是竭力尽我的本分做到尽可能的无拘无束。在灯光下，我看他看得更清楚了。他是个很瘦小的、体格匀称的人，几乎可以说是个矮子，黑头发硬得象鬃毛一样，那双黑色的大眼睛老是泪汪汪的，没有睫毛，那张天生很可爱的小嘴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他的络腮胡子很短，头发也并不长，衣服简单寒伧。他邋里邋遢，衣服褴褛，晒得很黑，总之，他有一副劳动者的外表。与其说他是个艺术家，不如说他是个贫穷的小贩。只有在他那双老是润湿的、亮晶晶的眼睛里和他那抿着的小嘴上，有某种独特的和令人感动的地方。看起来，他的年龄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其实，他三十八岁。

他带着温厚的本意和明显的真诚叙述了他的生平。他是阿尔戈维亚人。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而且他也没有别的亲戚。他从来也不曾有过任何财产。他学过细木工手艺，可是在二十二年前，他的手害了骨疽病，使得他不能干活。他从小爱唱歌，所以他就开始唱歌了。外国人有时候给他点钱，他就以此为生，买了一把吉他，十八年来，他跑遍了瑞士和意大利，在各地旅馆门前卖唱。他的全部行装是一把吉他和一个钱袋，而他的钱袋里现在只有一个半法郎，这就是他今天晚上的宿费和饭钱。他每年，这是第十八次，都要跑一趟瑞士所有最好的、游客最多的地方：苏黎世、卢塞恩、因特拉肯、沙穆尼等等；经过圣·贝尔纳德到意大利，然后经过圣·哥达或是萨瓦又走

回来。现在他渐渐感到走路吃力了，因为他受了风寒，他自己称它为关节炎的脚疼，一年比一年厉害，而且他的视力和歌喉也越来越衰退。尽管这样，但他现在还是要到因特拉肯、埃克斯累班去，然后，经过小圣·贝尔纳德到意大利，这是他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一般说，他好象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家去，是不是有亲戚在那儿，还是有房产和田地的时候，他的嘴就象打褶似地抿成了一个愉快的微笑，接着他就回答我说：

“Oui, le sucre est bon, il est doux pour les enfants!”^①他一说完这句话，就对侍者们挤挤眼。

我不明白这话的意义，可是那几个侍者却笑了。

“我什么也没有，要不然，我会这样东奔西跑吗？”他对我解释着，“我所以要回故乡，就因为那儿总还有点什么吸引着我。”

于是他带着巧妙自满的微笑又重复了这句话：“Oui, le sucre est bon,”说完，他温和地笑了笑。侍者们都非常满意，也哈哈大笑起来，只有那洗碗碟的驼背女用人用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严肃地瞧着那矮小的人，给他拾起在我们谈话时从长凳上掉下去的那顶帽子。我知道那些流浪的歌手、卖艺的、甚至变戏法的，都爱称自己为艺术家，所以我好几次对我的伴侣暗示说他是艺术家，可是他根本不承认他有这种资格，而认为他的职业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我问他唱的歌是不是他自己作的，他对这种奇怪的问题感到惊异，便回答说，他怎么能呢，这都是古老的蒂罗尔歌。

“里吉歌呢？我看，这不是一支古老的歌吧？”我说。

“是的，这是十五年前作的。在巴塞尔有一个德国人，是个

^① 法语：是的，糖是好东西，对孩子们来说是甜的！

很聪明的人；这是他作的。这支歌真美！您瞧，他是为旅游家们作的。”

于是他就开始把里吉歌的歌词译成法文念给我听。显然，他非常喜欢这支歌。

如果你要去里吉，
到维吉斯这段不用穿鞋，
（因为你可以坐汽艇去），
从维吉斯可得拿粗手杖，
还得挽着一位少女，
动身时要去喝杯老酒，
只是别喝得太醉。
因为谁想喝酒，
谁就该先立下功绩……

“哦，这支歌真美！”他结束时说。

侍者们大概也认为这支歌非常好，所以他们都走到我们跟前来。

“那么，是谁作的曲呢？”我问道。

“不是谁，就是这样的，您知道，要想唱给外国人听，就得有点什么新鲜玩意儿。”

当侍者们把冰给我们送来，我替我的伴侣倒了一杯香槟时，他似乎很不好意思，便回头瞧瞧那些侍者，在板凳上感到坐立不安。我们碰杯，祝艺术家们健康；他喝了半杯酒，觉得应该沉思一下，就深沉地扬扬眉毛。

“我很久没喝过这样的酒了，je ne vous dis que Ça^①。在

① 法语：这话我只跟您说。

意大利, d'Asti^① 酒虽然好, 可是这个却更好。哦, 意大利! 在意大利可好哪!”他补充说。

“是的, 那里的人们懂得欣赏音乐和艺术家,”我说, 想引他回到当晚他在瑞士旅馆前面失败的话题上来。

“不,”他答道,“在那儿, 关于音乐, 我不能给任何人愉快。意大利人自己就是音乐家, 这样的音乐家全世界上也很少见; 不过, 我唱的只是蒂罗尔歌。这对他们还是新鲜玩意儿。”

“那么, 那儿的绅士老爷们比较慷慨吧?”我继续说, 想使他分担我对瑞士旅馆的客人们所表示的愤懑。“那儿总不至于象这儿一样吧, 在一家住着阔人的大旅馆里, 上百的人听一位歌唱家唱歌, 什么也不给他……”

我的问题完全没有产生我预期的效果。他甚至没有想到生他们的气; 相反, 他把我的意见看成是对他那没有赢得任何报酬的才能的责难, 所以他就拚命向我解释。

“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很多报酬的,”他答道,“有时候嗓子不好, 累了。您知道, 我今天就跑了九个钟头, 差不多唱了一整天。够吃力的。而那些高傲的贵族老爷们呢, 他们有时候甚至不高兴听蒂罗尔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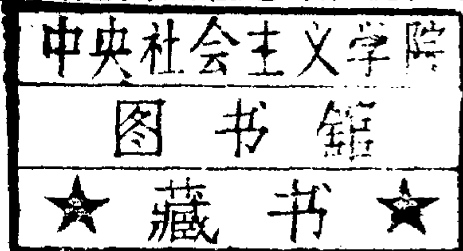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 他们怎么能什么也不给呢?”我重复说。

他没明白我的意思。

“这倒没什么,”他说,“在这儿, 主要是, on est très serré pour la police,^② 这是个问题。在这儿, 根据这个共和国的法律, 他们不让您唱, 但在意大利, 您可以到处随便唱, 谁也不会对您说什么。在这儿, 他们要是高兴让您唱, 就让您唱, 要是不高

① 法语: 阿斯提。

② 法语: 警察太麻烦了。



兴，就会送您进监狱。”

“怎么，真的吗？”

“是的。假如他们警告过您一次，而您还要唱呢，他们就会送您进监狱。我已经蹲过三个月了，”他笑眯眯地说，好象这是他一个最愉快的回忆似的。

“哦，这真可怕！”我说，“为什么呢？”

“根据共和国的新法律就是这样，”他继续说，变得振奋起来了。“他们不肯想想穷人也得设法生活。如果我不是个残废，那我就该干活。我唱歌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的歌会害人吗？这是什么意思？阔人可以随便怎么生活，而象我这样的 *a un bavu re tiaple*，^①甚至不能活着。这算什么共和国的法律？假如这样，那我们就不要共和国了，先生，不是这样吗？我们不要共和国，我们要……我们只要……我们要……”他踌躇了片刻，“我们要自然的法律。”

我又给他斟满了一杯。

“您没喝，”我对他说。

他端起杯子，对我一鞠躬。

“我知道您要干什么，”他说，眯缝着一只眼睛，用手指指我，“您要灌醉我，瞧我的好看；可是不，您不会成功的。”

“我干吗要灌醉您呢？”我说，“我不过是想让您高兴高兴罢了。”

大概他懊悔因误解了我的意思而得罪了我，所以他感到很窘，便欠起身子，捏捏我的胳膊肘。

“不，不，”他那双润湿的眼睛现出央求的表情瞧着我说，“我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① 法语：一个穷人。

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紊乱、巧妙、复杂的话，意思是说我毕竟还是个好人。

“Je ne vous dis que ça!”^① 他最后说。

这样，我跟歌手继续喝酒聊天，而侍者们也仍旧毫不客气地瞧着我们，而且似乎有点取笑我们。虽然我对我们的谈话很感兴趣，可是我不能不注意他们，而且，我承认，我越来越冒火。其中一个侍者站起身来，走到那矮小的人跟前，瞧着他的头顶，开始笑了。我对瑞士旅馆的住客已经积下了满肚子的气愤，还没来得及在谁身上发泄，而现在，我承认，这群侍者真把我惹火了。这时，那看门人没有摘帽子便走进了屋里，然后，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在我旁边坐下了。这个最后的举动触犯了我的自尊心或者虚荣心，终于，使那在我心里憋了一整晚的、压抑着的愤怒爆发了。为什么当我一个人在大门口的时候，他会对我卑躬屈节地鞠躬，而现在，因为我和一个流浪歌手坐在一块儿，他就粗暴无礼地紧靠着我坐下呢？我心里充满了那种沸腾着的、深恶痛绝的愤懑，可是我暗自喜欢它，因为当它在我身上发作的时候，甚至刺激我，对我有镇静的作用，而且至少在短促的时间内，给我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能力增加了一种非常的韧性、精力和力量。

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你笑什么？”我对那侍者大声喝道，感到我的脸都白了，嘴唇禁不住直哆嗦。

“我没有笑，我就这样，”那侍者一边朝后退一边说。

“不，你们在笑这位先生。当这儿有客人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权利上这儿来，而且还坐在这儿呢？不许你坐！”我大声喝道。

^① 法语：我只是对您说。

看门人嘴里嘟囔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这位先生是客人，而你们都是侍者，你们有什么权利笑他，并且坐在他旁边呢？为什么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你们不笑我，不在我旁边坐着呢？是因为他穿的寒伧而且在街头卖唱吗？因为这个；而又因为我穿着漂亮的衣服。他人虽然穷，可是我相信他比你们要好一千倍。因为他不侮辱人，而你们却侮辱他。”

“我什么也没说，您何必这样呢，”我的敌人——那侍者胆怯地答道，“我又没有妨碍他坐在这儿。”

那侍者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德国话白说了。那粗暴的看门人想替侍者打抱不平，可是我猛烈地抨击了他，因此，他便装作也不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挥了挥手。那驼背的洗碗碟的女人大概注意到了我的激烈的情绪，怕闹出事来，或者是同意我的看法，拥护我，所以她尽量站在我和看门人之间，一方面劝他别言语，一方面说我对，请我息怒。“Der Herr hat Recht; Sie haben Recht,”^① 她一个劲儿说。那歌手现出了一副极可怜、极害怕的神情，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冒火，我要干什么，便求我赶快走。可是那愤恨的、一吐为快的言辞却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我想起了一切：那嘲笑他的人群，那什么也不给他的听众，以及我那无法平静下来的心情。我想，若是那些侍者和那看门人不表示让步，我就会尽兴地跟他们大干一场，或是用手杖在那无法自卫的英国小姐的脑袋上乱敲一顿。假如这会儿我在塞瓦斯托波尔，我就会快乐地冲进英军的堑壕，把他们斩尽杀绝。

“那么，你们为什么把我和这位先生领到这个房间里，而不到那个厅里去呢？啊？”我抓住看门人的胳膊，不让他走，一面责

① 德语：这位先生对，您也对。

问他，“你们有什么权利凭外表决定这位先生一定得呆在这个房间里，而不呆在那个厅里呢？难道说，所有出钱的人，在旅馆里不是平等的吗？不仅在共和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一样。你们的共和国真是个糟透了的共和国！……这就是你们的平等！你们不敢把英国人领到这个房间里来，而那些英国人正是白听这位先生唱歌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从他身上偷去了他们应该给他的几个生丁。你们怎么敢把这个房间指定给我们呢？”

“那个厅关着哪，”看门人答道。

“不，”我嚷道，“撒谎，没关着。”

“那您知道得更清楚罗。”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撒谎。”

那看门人侧着身子从我身边走开了。

“唉！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嘟囔着说。

“不，别来‘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大声叫道，“马上把我领到那个厅里去。”

尽管那驼背女人一个劲儿劝我，歌手求我还是回去好，可是我却把那侍者头儿叫来了，同时我和我的伴侣走进了另一个厅里。侍者头儿听见我气愤的声调，又看见我激动的神情，没有和我争辩，只是带着蔑视的谦恭说，我高兴上哪儿，就上哪儿。我没来得及揭穿看门人的谎言，因为在我走进这另一个大厅以前，他就溜走了。

这个厅的确是开着，灯火通明，而且在一张桌子上，有个英国人和一位太太正坐在那儿吃晚饭。虽然侍者把我们让到一张特座的桌子上，可是我和这肮脏的歌手却挨着那英国人坐下，并吩咐把没有喝完的那半瓶酒给我们送到这儿来。

那两个英国人先是吃了一惊，后来就恶狠狠地瞧着那呆若

木鸡地坐在我旁边的矮小的人；他们俩嘀咕了几句，那女的把盘子向前一推，绸连衣裙绊绊作响地站起身来，接着他们俩就走掉了。隔着玻璃门，我看见那英国人一面恶狠狠地在跟一个侍者说什么，一面不断地指着我们这边。那侍者把头伸进门来瞧瞧。我欣然等着他们来撵我们出去，这么一来，我就能把我所有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发泄出来。幸好他们没有睬我们，然而当时我却觉得这是个遗憾。

先头不肯喝酒的歌手，现在却匆匆忙忙地把瓶里剩下的酒都喝光了，想尽快离开这儿。可是，我觉得，他是深深地感谢了我的款待。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变得越发泪汪汪的和亮晶晶的了，而且他对我说了一句挺奇怪、挺紊乱的谢词。可是这句谢词还是使我感到了愉快；大意是说，如果人人都象我这样尊重艺术家，那他就好了，同时他还祝我一切幸福。我和他一块儿走进了过道。那些侍者和我的敌人——看门人——都站在那儿；那看门人好象是在跟他们说我的坏话。我觉得他们都把我当作疯子。我要让这矮小的人能够跟所有这群人平等，因此，带着一副尽我所能表现的恭敬态度，我摘下了帽子，紧握着他那只手指干枯、瘦骨嶙嶙的手。侍者们装出一副毫不理睬我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发出了恶意的笑声。

当歌手鞠了个躬，在黑暗中消逝时，我就上楼回到我的房里，想借睡眠摆脱这一切的印象和那突然在我心里生出的愚蠢幼稚的憎恨。可是，我感到自己激动得无法入睡，因此又上街去走走，想让自己平静下来，而且我得承认，除此以外，我还模糊地希望找个机会和那看门人、那侍者或是那英国人干起来，让他们认识认识他们的冷酷，尤其是他们的不公平。可是，除了那一看见我便背过脸去的看门人以外，谁也没遇见，所以我只好独自沿

着堤岸徘徊。

“这就是诗歌的奇怪的命运，”我稍微冷静了些，寻思着，“人人都爱诗歌，都找寻诗歌，人人都在生活中只向往和找寻它，可是谁也不承认诗歌的力量，谁也不珍视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幸福，既不看重也不感谢那些把这幸福给予人类的人。请问问住在瑞士旅馆里的那些客人当中的随便哪一个人：世上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所有的人，或许是百分之九十九，都会现出讥讽的表情对您说，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钱。‘也许这种想法您不喜欢，和您那崇高的理想并不一致，’他会这样对您说，‘不过，既然人类的生活已经这样安排，只要有钱就能给人幸福，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不能不让我的理性去看现实的世界，’他补充说，‘也就是说去看真实。’你的理性够可怜了，你所希望的幸福够可怜了，而且你是个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可怜虫，……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亲人、职业和财物，而聚集在瑞士的这座小城卢塞恩呢？为什么你们大家今天晚上都走上凉台，肃静地倾听那小小的乞丐的歌唱呢？再说，假如他还肯唱下去，那你们就还会默默无言地听下去。难道金钱，即使几百万，就能把你们大家赶出祖国而聚集在卢塞恩这个小角落里吗？金钱能使你们云集在凉台上，沉默地、纹丝不动地站半个钟头吗？不！只有一种东西迫使你们行动，而且永远会比生活中的一切别的动力更强烈地推动你们，这就是对诗歌的需要——你们不承认，可是你们会感到的，而且，只要你们身上还剩下一点儿人味，你们就永远会感到的对诗歌的需要。你们觉得‘诗歌’这个词儿滑稽可笑，你们把这个词儿用作嘲笑的非难，你们准许孩子们和傻姑娘们爱一种类似诗歌的东西，即使这样，你们还是嘲笑他们；对你们来说，你们需要一种普通的东西。可是孩子们却用健康的眼

光来看生活，他们热爱、而且知道人应该爱的东西，以及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东西，但生活却把你们弄得头昏脑胀、堕落腐化，以致你们嘲笑你们所爱的一种东西，并且光去找寻你们所憎恨的、使你们不幸的东西。你们简直头脑糊涂了，因此你们不懂得你们对这个曾把纯粹的享受给了你们的、贫穷的蒂罗尔人所应尽的义务，而同时，你们又认为你们自己必须在一位勋爵面前白白地、既没好处也没乐趣地降低身份，而且为了某种目的为他牺牲自己的安静和便利。真荒唐！真是无法解释的荒谬！可是今天晚上最使我吃惊的并不是这件事。这种对于带来幸福的东西的无知，这种对于诗意的乐趣的麻木不仁，我是差不多了解的，或者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常遇见这种事，已经习惯了；人群的粗暴和无意识的残酷对我来说也并不新奇；不管那群众心理的辩护人怎么说，人群虽然是许多好人的结合体，但这些人只接近兽性的和卑下的方面，所以它只能表现人类天性的弱点和残暴。而你们这些自由、博爱的民族的儿女，你们这些基督教徒，你们这些只不过是人而已的人，怎么能用冷酷和嘲笑来回答一个求乞的不幸者给你们的那种纯洁的快乐呢？可是，不，你们的祖国有乞丐收容所。——没有乞丐，不应该有乞丐，也不应该有乞丐生活所依赖的怜悯心。但他已付出了劳力，他给了你们快乐，他央求你们把你们多余的东西给他一点，作为你们享用过他的劳动的报酬。可是你们却从你们的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中，带着冷漠的微笑，把他当作稀罕事物似的观赏，而且在你们一百来位幸福的阔人中，肯把一点东西扔给他的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蒙受耻辱的人从你们身边走开了，而那没有头脑的人群却跟在他后面取笑他，他们侮辱的不是你们，而是他，——因为你们冷淡，残酷和可耻；因为你们偷去了他给了你们的快乐，就因为·这·个·，

他们才侮辱了他。”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那家头等阔人下榻的瑞士旅馆门前，有一个流浪乞食的歌手，曾唱歌弹琴达半小时之久。约有一百位人士听他演唱。歌手曾三次求大家给他一点东西。没有一个人肯给他任何东西，甚至有许多人还嘲笑他。”

这不是虚构，而是确凿的事实；只要有人肯到瑞士旅馆的常客那儿去调查一下，可以查阅报纸，七月七日哪些外国人曾在瑞士旅馆住过。

这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应该用激情的、不可磨灭的文字记录下来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比报章和史籍所记载的事实更重大、更严肃，并且具有深远的意义。什么英国人又杀死了一千个中国人，^①因为中国人没有用现钱买东西，而他们的国家却要吸收硬币；什么法国人又杀死了一千个卡比耳人^②，因为非洲的庄稼长得好，还因为不断的战争对于训练军队有益；什么土耳其驻那波利公使不可能是犹太人；什么拿破仑皇帝在Plombières^③散步，而且在报刊上使人民确信，他只是秉承全体人民的意志才称皇帝，——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把早已周知的事实掩盖或透露出来的言论；可是七月七日在卢塞恩发生的事件，在我看来，是件十分新鲜、奇怪的事，是一件和人性的永恒的丑恶面无关、而和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有关的事。这个事实不是人类活动史的资料，而是进步和文明史的史料。

① 一八五六年底，中国政府逮捕了英国船上的鸦片贩子。英国人认为大不列颠国旗受到侮辱，从英国军舰上残酷炮轰广州，侵占并掠夺该城，杀死大量市民。

② 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民族。

③ 法语：普隆比埃尔。该地为伏吉萨尔的一个疗养地。此处拿破仑系指拿破仑三世。

为什么在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任何一个乡村里不可能有的这个惨无人道的事实，在这儿，在这个文明、自由和平等达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在这个来自最文明的国家的最文明的旅行者云集的地方，会有可能呢？为什么在一般的情况下能做出种种光明正大、仁义道德的事来的，这些又有教养、又讲仁义道德的衮衮诸公，对于个人的善行会没有人类的恻隐之心呢？为什么这些在他们的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热烈地关心在印度未婚的中国人的情况^①，关心在非洲传播基督教和教育，关心设立改善全人类的协会的衮衮诸公，在自己的心灵中却找不到单纯的、原始的、人对人的感情呢？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感情吗？难道他们这种感情的位置已经被在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支配着他们的虚荣心、名誉心和利欲心给占据了吗？难道被称为文明的人的明理的、自私的结合的传播，把本能的友爱的结合的要求消灭和否定了吗？难道这就是为了它流了这么多无辜的血，犯了这么多罪的平等吗？难道各民族象孩子们似地光凭嚷嚷“平等”这个词儿，就能造成幸福吗？

在法律面前平等吗？难道人的整个一生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容度过的吗？其实，属于法律以内的，只不过是生活中的千分之一的部分，其余部分是在法律以外，在社会的风尚和见解的范围内容度过的。在这个社会里，侍者穿得比歌手漂亮，他就可以公然侮辱歌手。我穿得比侍者漂亮，我就可以公然侮辱侍者。看门人认为我比他高，歌手比他低；而当我与歌手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和我们是平等的了，因此就变得粗暴无礼起来。我对看门人横蛮无礼，看门人便认为自己比我低。侍者对歌手横蛮

① 一八五七年七月，英国国会提出招中国移民中的自由劳工去英殖民地的问题，中国移民不愿携带妻子前往，众议院会员建议对未婚移民课以重税。

无礼，歌手便觉得自己比他低。在一个国家里，甚至连一个公民，既没有加害任何人，也没有妨碍任何人，只是为了免于饿死，才做一件他所能做的事，也要被关进监狱里去，难道这是自由的国家吗？这是象人们所说的绝对自由的国家吗？

一个为了积极解决自己的需要因而被投到善与恶、事实、思考和矛盾这个永远动摇的无限的海洋中的人，真是一个不幸的可怜虫！为了把善推到一边，把恶推到另一边，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一直斗争和努力着。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了，一个具有公平心的人，无论在哪儿把他放在善与恶的天秤上称一称，天秤并不摆动，在它的每一头有多少善，也有多少恶。人只要能学会不评论，不苦苦地积极地思索，不回答为了使问题永远得不到答案而对他提出的问题，那就好了！他只要能了解每种思想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就好了！它所以虚伪，是因为它的片面性，是因为人不可能了解全部真理；它所以真实，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愿望的一个方面。人们在这个永远动摇不定、没有尽头、无限错综的善恶交错之中给自己作出了分类，又在这个海洋上划出了假想的线，然后盼望海洋也照此自行分开，好象根本没有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在另外一个方面作出的其他无数的分类似的。不错，这种新的分类多少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可是许多世纪过去了，无数的世纪也会过去。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束缚是恶。正是这种臆想的知识把人类天性中那种本能的、最幸福的、原始的对于善的需要给消灭了。那么谁能给我下个定义：自由是什么，专制是什么，文明是什么，野蛮是什么？这个和那个之间的界线在哪儿？谁的心里有这样一一个善与恶的绝对标准，使他能衡量所有瞬息即逝和错综复杂的事实呢？谁的头脑有那么伟大，就是在静止的过去中也能洞悉和衡量一

切事实呢？谁又看见过善与恶并不同时存在的这种情况呢？我又怎么能知道我看见这个比那个更多，并不是因为我的看法错了呢？谁又能即使在一瞬间在精神上完全地离开人生而独立自主地超然观看人生呢？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永远不犯错误的指导者——主宰全世界的神明；他渗入到我们大家和每一个人心，给每一个人灌注对一切应有的事物的渴求；正是这个神明叫树木向着太阳生长，叫花卉在秋天里投下种子，并且叫我们本能地互相亲近。

而且，把文明的嘈杂忙乱的发展压倒了的，也正是这个唯一永远不犯错误的、幸福的声音。谁更多是人，谁更多是野蛮人呢：是那个因看见歌手的破烂衣服便恶狠狠地离开了桌子，而且不肯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百万分之一来酬劳他，现在正吃得饱饱的坐在明亮宁静的屋子里，悠闲地大谈其中国的情形，认为在那儿犯屠杀罪是正义的那个英国勋爵呢，还是那个冒着坐牢的危险，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二十年来走遍了高山和低谷，没有危害过任何人，而用自己的歌唱安慰人，并在今天受了侮辱，差不多被人撵走，又累又饿，又蒙受了耻辱，已经跑到什么地方霉烂稻草上去睡觉了的歌手呢？

在这个时候，从街头夜间的死一般的沉寂中，我远远地、远远地听见了那个矮小的人儿的吉他声和他的歌声。

“不，”我不禁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可怜他，也没有权利为那勋爵的富裕生气。谁曾在天秤上称过这些人之中每个人的内在的幸福呢？瞧，他这会儿正坐在什么地方肮脏的门槛上，凝视着月色溶溶的天空，在宁静、芬芳的夜色中快乐地歌唱；他心里没有责备，没有怨恨，没有懊悔。可是谁知道那些在高楼大厦里面的人，心里现在正做什么打算呢？谁知道是不是所有这些

人的心里，正象那个矮小的人儿的心里一样，也有那种毫无牵挂的、柔和的生之喜悦和与世无争的胸襟呢？允许和命令这一切矛盾都存在的神的慈悲和智慧是广大无边的。只有你，渺小的可怜虫，鲁莽而放肆地想要洞悉他的法则和他的意图的可怜虫，只有你，才觉得有矛盾。他从他那光辉超绝的高处，温存地俯视着而且欣赏着你们大家生活于其中的那充满矛盾而又永不止息地前进着的无限和谐。你居然骄傲自满地想摆脱这个普遍的法则。这是不行的！而你竟会对侍者们怀着毫不足道的愤慨，你对无穷无尽的和谐的要求也给予了回答……”

（1857年7月18日）

芳 信 译

阿 尔 贝 特

五个有钱的年轻人在深夜两点多钟来到彼得堡的一个小型舞会作乐。

香槟酒喝了很多，大多数的绅士们都很年轻，少女们都很漂亮，钢琴和小提琴不知疲倦地一支又一支地弹奏着波尔卡舞曲，跳舞和喧闹声一直继续着；可是，总觉得有点沉闷、别扭，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谁都感到（象常常发生的情形那样）这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没必要。

他们曾几次强打起精神，可是装出来的欢乐比沉闷更糟。

五个年轻人中的一个，比起别人来，对自己、对别人以及对整个晚会都更为不满，他怀着厌恶的心情站起身来，找到帽子走出去，打算悄悄地离开。

前厅里没有人，可是他听见在隔壁房间的门后有两个人在争论。这个年轻人便站住了，开始倾听。

“不行，那儿有客，”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请让我进去，不要紧的！”一个男人的微弱的声音央求道。

“没有太太的许可，我不能让您进去，”那个女人说，“您往哪儿？哎呀，您这人真是！……”

门突然大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的身影。女仆

一看见客人，就不再去阻拦他，于是这个怪人便怯生生地鞠了一躬，迈动两条罗圈腿踉踉跄跄地走进了里屋。他中等身材，背部瘦窄而且有点驼，头发又长又乱。他身穿一件短大衣和一条窄小的破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粗糙的没有擦过的皮靴。长长的白脖子上系着一条象拧成麻花的领带。瘦骨嶙峋的双手从肮脏的衬衣的袖口露出来。尽管他的身子非常瘦，他的脸却又白又嫩，甚至在他的面颊上，在他那稀疏的黑胡须和络腮胡子上面，还泛着鲜艳的红晕。没有梳理的头发往上甩，露出了他那不高的、但非常光洁的前额。一双疲倦的黑眼睛温柔地、探索地、同时又傲慢地向前凝视着。那双眼睛的表情，和从稀疏的小胡子下面露出来的、弯弯的鲜艳的双唇的表情，迷人地融合在一起。

他向前走了几步，站住了，转过脸去对那年轻人微微一笑。他笑得似乎很勉强；可是，当他露出粲然的微笑时，那年轻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笑了一笑。

“这是谁？”当那怪人走进舞乐洋溢的房间时，他低声问女仆。

“戏院里的一个疯乐师，”女仆答道，“他有时候来看我们太太。”

“杰列索夫，你到哪儿去了？”这时候，有人在大厅里喊道。

这个名叫杰列索夫的年轻人回到大厅里。

那位乐师站在门旁瞧着跳舞的人们，用微笑、眼神和用脚打着拍子，显示出这个场面给他带来的快乐。

“喂，您也来跳舞吧，”有个客人对他说。

那位乐师鞠了个躬，然后使用询问的目光瞧了瞧女主人。

“去吧，去吧，——既然大家都邀请您，您就跳吧，”女主人接碴说。

那位乐师的瘦弱的四肢突然使劲地动起来，他左顾右盼，微笑着，扭动着，吃力而笨拙地在大厅里跳起舞来。卡德里尔舞跳到一半，一位快活的军官，舞跳得非常漂亮而且舞兴正浓，无意中撞了那位乐师一下。乐师的瘦弱的、疲倦的两腿失去了平衡，他踉踉跄跄地向旁走了几步，就直挺挺地摔倒在地板上。虽然他摔倒时发出了急剧而重浊的响声，可是在最初的一刹那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哄笑起来。

但是乐师没有站起来。客人们都沉寂下来，连钢琴也停止了演奏；杰列索夫和女主人首先跑到摔倒的人跟前。乐师用胳膊肘支着身子，呆呆地瞧着地面。当他们把他扶起来、搀他在椅子上坐下以后，他用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把前额上的头发迅速往后一掠，并不回答大家的问候，开始微微一笑。

“阿尔贝特先生！阿尔贝特先生！”女主人说，“怎么样，您摔着了吗？摔着哪儿了？瞧，我说过，不应该跳舞。他的身体太弱了！”她对客人们继续说道，“连走路都很吃力；怎么能跳舞呢？”

“他是谁？”有人问女主人。

“他是个穷人，是位艺术家。是个非常好的人，只是怪可怜的，您瞧。”

她说这话时，并不避讳乐师的在场。乐师清醒了过来，而且好象害怕什么似地蜷缩起身子，把那些围着他的人推开。

“这都不要紧的，”他忽然说，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而且，为了证明他一点也不疼，他走到房间当中，想纵身一跳，可是他摇晃了一下，要不是有人扶着他，他又会摔倒。

大家都感到很难堪；瞧着他，沉默着。

乐师的目光又黯淡了，而且他，显然忘记了大家，开始用手揉着膝盖，突然，他抬起头来，把发抖的腿向前迈了一步，而且又

象刚才那样，用他那习惯的手势把头发往后一掠，然后，走到小提琴手跟前，把他的小提琴拿了过来。

“这都不要紧的！”他挥动了一下小提琴重复道。“诸位！咱们来拉支曲子消遣消遣吧！”

“这个人的脸真怪！”客人们交头接耳地说。

“也许是巨大的才华葬送在这个不幸的人身上了！”客人中有人说。

“是呀，真可怜，真可怜！”另一个说。

“他的脸多美！……他身上有一种非凡的气质，”杰列索夫说，“让咱们瞧吧……”

二

这时，阿尔贝特旁若无人地把小提琴紧贴在肩膀上，一面沿着钢琴慢慢地走来走去，一面调着琴弦。他的抿着的嘴表情冷淡，看不见他的眼睛；可是他那瘦削的脊背、白皙的长颈脖、弯曲的两腿和那黑发纷披的脑袋却显得很奇怪，但不知为什么，丝毫不令人觉得可笑。他把小提琴的弦调好以后，就敏捷地拉了一个和音，然后，他把头向后一抑，转向准备给他伴奏的钢琴师。

“《Melancholie G-dur》^①！”他做了一个命令式的手势对钢琴师说。

随后，好象为了那命令式的手势请求原谅似的，他温和地笑了笑，而且带着这种微笑环视了一下听众。阿尔贝特用他那只握着弓的手把头发往后一掠之后，就在钢琴角前站住了，用从容

① 德语：《G大调忧郁曲》。

不迫的动作在弦上拉起了弓子。房间里响起了清澈悠扬的声音，室内变得完全寂静了。

在第一音符以后，主题便流畅而优美地倾泻出来，并突然以一种异常明朗的和令人快慰的光辉照亮着每个听者的心。没有一个不正确的或是夸张的音破坏听众们的凝神谛听，所有的音都是明晰的、优美的和有意义的。大家都默不作声地，怀着期待的悸动倾听着乐曲的发展部。这些人从原来所处的无聊的心情、热闹的消遣和心灵的沉睡中，不知不觉地突然被带到了一个他们早已忘却了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心里时而涌起一种对于往事的平静的冥想，时而涌起对于某种幸福的热情的回忆，时而涌起一种对权力和荣华的无限的追求，时而又涌起一种无可奈何、得不到满足的爱情和忧愁之感。那时而亲切忧伤，时而迸发的绝望的音响自由地交织成一片，那么优美、那么强烈、那么不知不觉地逐一倾泻出来，以至听出来的不是音响，而是一种早就熟悉、但现在才首次表现出来的诗意的美妙的洪流，倾注到每个人的心田。阿尔贝特随着每个音符越来越高大了。他根本不丑，也不怪。他把下巴紧贴着小提琴，以热情专注的表情倾听着自己发出的音响，一面激动地挪动着双脚。他有时候挺直身子，有时候把腰弯得很低。那只紧张地弯着的左手，好象一直保持着这种固定的姿势，只有那瘦骨嶙峋的手指在非常激动地拨动着；右手从容地、优美地、几乎看不出地移动着。他的脸容光焕发，现出一种持续的热情洋溢的喜悦；眼睛射出明亮的严厉的光辉，鼻孔鼓起，鲜红的嘴唇快活得张着。

有时候，他的头低俯在小提琴上，眼睛闭着，一半被头发遮着的脸上露出温和的幸福的微笑。有时候，他很快地挺直身子，伸出一脚去；他那开阔的前额和他那环视室内的明亮的眼神，

便闪耀着骄傲、庄严和意识到自己的威力。有一次，钢琴家由于疏忽错弹了一个和音。乐师的全身和脸上便表现出一种肉体上的痛苦。他停了一刹那，带着孩子般的恶狠狠的神情跺着脚叫道：“《Mol, c-mol!》^①！”钢琴家纠正了错误，阿尔贝特便闭上眼睛，微微一笑，于是他又把自己、别人和整个世界都忘了，带着无比欢乐的心情沉醉在自己的天职里。

当阿尔贝特演奏时，室内所有的人都悄然无声，似乎完全陶醉在他的音乐里。

那位快活的军官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无神的目光注视着地板，吃力地呼吸着，很少喘气。少女们都默不作声地靠墙坐着，只是偶尔彼此交换一下赞许的、以至于诧异的眼光。女主人的胖胖的、笑眯眯的脸快活得眉开眼笑。钢琴师的两眼紧盯着阿尔贝特的脸，并且，带着唯恐出错的惶恐的神情（这在他那挺直的全身中都表现出来）在拚命地跟上他。一个酒喝得最多的客人趴在长沙发上，尽量地一动不动，免得显露出自己的激动。杰列索夫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仿佛有一个冰冷的环箍在他的脑袋上，一会儿松，一会儿紧。他连头发根都变得有了感觉，脊梁上自下而上一阵阵发冷，有什么东西越来越往地上涌到他的喉头，仿佛有细针在扎他的鼻子和上颚，于是眼泪不知不觉地弄湿了他的双颊。他猛的晃动一下身子，极力想悄悄地把眼泪吸回去，把它擦净，可是新的眼泪又夺眶而出，顺着两颊流了下来。由于一种奇异的联想，阿尔贝特的小提琴的最初的音响就把杰列索夫带回到了他的少年时代。他——一个已经不年轻、对生活感到疲倦、疲惫不堪的人——突然觉得自己是十

① 德语：小调，c-小调。

七岁，对自己的漂亮感到得意，有些儿傻，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幸福。他想起了对穿玫瑰色连衣裙的表妹的初恋，想起了在菩提树的林荫小道上第一次爱情的表白，想起了那次偶然接吻的热烈和不可理解的魅力，想起了当时在他周围的大自然的神妙和令人莫测的神秘。他回忆往事，她便在模糊的希望、不可理解的欲求、以及对于不可能的幸福的可能实现的确定不移的信念的迷雾之中，放出异彩。所有当时不知珍惜的瞬间，接踵出现在他的面前，但这不是转瞬即逝的、现在的没有意义的瞬间，而是停留下来，不断扩大和带有谴责的过去的形象。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玩味着这些形象，他哭了，——他哭，并不是因为他可以更好地利用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即使时光倒流，他也不会去更好地利用它），他哭，只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逝去，不复返了。种种回忆都自然而然地涌上了他的心头，而阿尔贝特的小提琴却一再说着同样的话。它说：“对你来说，身强力壮、爱情和幸福的时代都永远过去了，决不会再回来了。为它哭泣吧，把眼泪统统哭干吧，在痛哭这个时代的眼泪中死去，——这就是留给你的无上幸福。”

在最后的变奏曲快结束时，阿尔贝特的脸变得通红，目光炯炯，大颗的汗珠顺着他的双颊流了下来。前额上的青筋突起，全身也越来越动得越厉害，他的苍白的嘴唇已经不再闭上，他的整个姿态表现出一种对快乐的狂热的渴望。

他猛烈地摆动一下全身，把头发往后一甩，放下了小提琴，带着骄傲的庄严和幸福的微笑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们。然后，他的腰弯下了，头低下了，嘴闭上了，眼睛失去了光芒，他好象自惭形秽似的，胆怯地瞧了瞧周围，便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三

所有在座的人都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在继阿尔贝特的演奏后的死一般的沉寂中也感觉到某种奇怪的东西。好象谁都想说出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又说不出。那么，这间又亮又热的房间、这些花枝招展的女人、这窗上的曙光、这激动的热血和逝去的音响所留下的清晰的印象——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可是谁也没有打算来说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相反，差不多所有的人，因为感到自己不能完全跨进新的印象给他们展开的新的天地，而对它愤懑。

“您看，他拉得真好，”军官说。

“妙极了！”杰列索夫用袖子偷偷地擦着面颊，答道。

“不过，诸位，咱们该走了，”那个趴在长沙发上已经有些镇定下来的人说道。“诸位，应当给他点什么。咱们来凑点钱给他吧。”

这时候，阿尔贝特独自坐在另一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他的两肘支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两只有汗的、肮脏的手抚摩着自己的脸，把头发都弄乱了，他怡然自得地微笑着。

他们凑了很多钱，并由杰列索夫去交给他。

此外，音乐在杰列索夫心里留下了非常强烈和不寻常的印象，他想为这个人做点好事。他想把他带回自己家里，给他置备些衣服，并给他找个工作——总之，使他脱离这个卑贱的处境。

“怎么样，您累了吧？”杰列索夫走到他身边，问道。

阿尔贝特笑笑。

“您真有才华；您应该认真地钻研音乐，举行公演。”

“我倒想喝点什么，”阿尔贝特好象刚睡醒似的说。

杰列索夫拿来了酒，乐师便贪婪地喝了两杯。

“这酒太好了！”他说。

“《忧郁曲》，真是绝妙佳作！”杰列索夫说。

“哦，是的，是的，”阿尔贝特笑咪咪地答道，“可是，请您原谅；我不知道我有幸在和哪一位交谈；也许您是伯爵或者是公爵吧：您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呢？”他沉吟了片刻。“我什么也没有……我是个穷人。我没法还您。”

杰列索夫的脸红了；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赶紧把凑集起来的钱交给了乐师。

“非常感谢您，”阿尔贝特一把抓过钱，说。“现在咱们来点音乐消遣消遣吧；只要您高兴，我给您拉多少都成。不过我想喝点儿什么，喝点儿什么，”他站起来又加了一句。

杰列索夫又给他拿了酒来，并请他坐在自己身边。

“请原谅我坦白地跟您说，”杰列索夫说，“您的才华使我很感兴趣。我觉得您的境况并不好，是吗？”

阿尔贝特一会儿瞧瞧杰列索夫，一会儿瞧瞧走进屋来的女主人。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请允许我为您竭尽绵力，”杰列索夫继续说道，“要是您愿意暂时住在舍下，我一定竭诚欢迎。我就一个人，也许我对您有点儿用处。”

阿尔贝特笑笑，什么也没有说。

“您怎么不谢谢他？”女主人说；“当然，就您来说，这是个善举。不过，我倒不主张您这么办，”她转身向杰列索夫继续说道，而且不赞成地摇摇头。

“我非常感谢您，”阿尔贝特说时用自己汗湿的手握着杰列索夫的手，“可是现在，还是让我们来拉支曲子消遣消遣吧。”

但是其余的客人都已经准备要走了，尽管阿尔贝特劝他们别走，他们还是走进了前厅。

阿尔贝特告别了女主人，戴上他那顶破旧的宽边礼帽，披上夏季的旧斗篷（这就是他全部的冬装），然后和杰列索夫一起走到台阶上。

当杰列索夫和他这位新交坐上了马车，闻到从乐师身上发出的那股难闻的酒味和肮脏的气味时，他便开始后悔自己的行为，责备自己的幼稚的软心肠和考虑欠慎重。此外，阿尔贝特所说的话都十分愚蠢和庸俗，而且他到了户外突然显出了丑恶的醉态，使杰列索夫感到恶心。“我拿他怎么办呢？”他想道。

马车走了将近一刻钟，阿尔贝特就默不出声了，他的帽子掉在脚下，接着他自己也倒在马车的一个角落里，打起呼来，车轮在上了冻的雪地上单调地轧轧响着；朝霞的微光依稀透过结着冰花的车窗。

杰列索夫回头瞧了瞧自己的伙伴。盖着斗篷的瘦长的身体毫无生气地躺在他旁边。杰列索夫觉得，那个有着黑色大鼻子的长脑袋在这个人身上摇晃着；可是，凑近前去细看，他才看出被他当作鼻子和脸的东西原来是头发，而真正的脸却在下面。他弯下腰去，才看清了阿尔贝特的面貌。于是那额头和平静地抿着的嘴唇的美，又使他感到惊讶。

神经因为到了早上还没睡觉而受了刺激，在神经疲倦以及在他所听到的音乐的影响下，杰列索夫望着这张脸，又回到了他昨夜曾向里面瞥视过一眼的那个欢乐的世界；他又想起了他那幸福的和豪迈的青年时代，因此，他对自己的行为也就不再感到

后悔了。在这一瞬间，他真诚地、热烈地喜爱阿尔贝特，而且下了决心要为他做点好事。

四

第二天早上，当杰列索夫被叫醒去办公的时候，他带着不愉快的诧异的心情看到自己四周的那个旧围屏、他的老仆人和摆在小桌上的钟。“我究竟想看到什么呢？我能看到的无非是这些永远在我周围的东西罢了！”他这样问自己。这时他又想起了那位乐师的黑眼睛和幸福的微笑；《忧郁曲》的旋律和整个奇异的昨夜掠过了他的心头。

不过，他却沒有工夫去考虑他把乐师带回家来的这种做法是好是坏。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在心里计划着这一天：他拿起公文，吩咐了必要的家务事，然后就赶快穿大衣和套鞋。他走过餐室的时候，往门里看了看。阿尔贝特把脸埋在枕头里，穿着又脏又破的衬衫，伸胳膊伸腿地沉睡在昨晚当他人事不省时被安置在那儿的皮沙发上。“总有点不大好，”杰列索夫不由得想道。

“请用我的名义到博留佐夫斯基那儿去一趟，把他的小提琴借来，给他用一两天，”他对自己的仆人说，“等他醒了，伺候他喝咖啡，把我的衬衣和旧衣服拿给他穿。总之，要好好儿招待他。劳你驾。”

杰列索夫很晚回到家里，没有看到阿尔贝特，觉得很吃惊。

“他上哪儿去了？”他问仆人。

“他一吃完午饭就出去了，”仆人答道，“拿起小提琴就走了；他答应一小时后回来，可是您瞧，到这会儿还没回来。”

“唉！唉！真糟糕，”杰列索夫说。“扎哈尔，你怎么能让他

走呢？”

扎哈尔是一名彼得堡听差，已经侍候了杰列索夫八年。杰列索夫则是个孤零零的单身汉，所以不由得常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而且喜欢知道他对于自己的每一件事的意见。

“我怎么敢不放他走呢？”扎哈尔回答时抚弄着自己表上的那颗小印章，“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要是告诉我不叫他走，我就会设法留住他。可是您只说了关于衣服的事。”

“唉！真糟糕！那么，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儿干什么呢？”

扎哈尔笑笑。

“他真可以称得上是个艺术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他一醒就要喝马德拉酒，后来就一直跟女厨子和邻居家的男用人鬼混。这个人真逗……不过，他的脾气很好。我给他茶，端饭给他；可他什么也不肯一个人吃，老是请我吃。后来他拉小提琴，拉得可好啦，就是伊兹列尔^①那儿也很少有这样的艺术家。这样的人咱们可以留着。当他给我们拉《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的时候，真象一个人在哭似的。太好了！甚至楼上楼下的人都跑到咱们过道里来听了。”

“嗯，你拿衣服给他穿了吗？”主人打断了他的话。

“那当然，老爷；我把您的一件睡衣给了他，还把我的一件大衣给他穿上了。象这样的人是可以帮助的，他这个人真是可爱。”扎哈尔微微一笑。“他老问我，您是几品官，您认识不认识什么要人，您有多少农奴？”

“嗯，好吧，可是现在一定得找到他，而且以后决不要给他任

① 伊兹列尔是彼得堡市郊一家专营人工矿泉水的老板。为了招徕顾客，他常常聘请一些吉卜赛人在那里歌舞弹唱。

何酒喝，要不然，这对他会更糟糕。”

“这倒是实话，”扎哈尔打断了主人的话，“看样子，他的身体很弱，从前咱们老爷就有过这样一位管家……”

杰列索夫早就知道那个经常喝得烂醉如泥的管家的事，所以没让扎哈尔说下去，便吩咐他把晚上的一切事情准备好之后就去找阿尔贝特，并且要把他带回来。

他躺在床上，吹熄了蜡烛，可是他很久都睡不着，老是想到阿尔贝特。“虽然我的朋友中有许多人会认为这一切很奇怪，”杰列索夫想道，“可是一个人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实在是太难得了，因此，当这种机会出现的时候，就应该感谢上帝，我决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帮助他。也许他根本不是疯子，只是嗜酒成癖罢了。这又花不了我多少钱：够一个人吃的，也就够两个人吃。先让他在我这儿住着，然后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或是举行一次演奏会，先从泥坑里把他拉出来，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这样考虑之后，他心里充满了一种洋洋自得的快感。

“真的，我并不完全是坏人；甚至根本不是坏人，”他想道。“甚至是个非常好的人，如果把我自己和别人相比的话……”

当他刚要睡着的时候，前厅里的开门声和脚步声把他吵醒了。

“嗯，我要对他严厉一些，”他想道，“这样比较好；而且我必须这样做。”

他按了一下铃。

“怎么样，把他带回来了吗？”扎哈尔进来时，他问道。

“他这个人真可怜，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扎哈尔说时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

“怎么，他喝醉了？”

“他衰弱极了。”

“他的小提琴还在吗？”

“我带回来了，是那位太太交给我的。”

“好，请别让他现在来看我；叫他躺下睡觉吧，明天绝对别让他出去。”

可是，扎哈尔还没来得及出去，阿尔贝特就走进来了。

五

“您要睡了吗？”阿尔贝特笑眯眯地说。“我到安娜·伊万诺夫娜家里去了。这个晚上过得快活极了：音乐弹唱，欢声笑语，高朋满座。请让我喝一杯什么吧，”他一说完这句话，就拿起摆在小桌上的那个长颈瓶，“就是不要喝水。”

阿尔贝特还是象昨天一样：那同样美丽的眼睛和嘴唇的微笑，那同样明朗和充满灵感的前额，那同样软弱的四肢。扎哈尔的大衣他穿着正合身，而且那睡衣的整洁的、长长的、没有浆过的领子在他那细长的白脖子周围美丽如画地敞着，赋予他某种特别的稚气和天真的神情。他坐到杰列索夫的床上，默默地望着他，露出快乐和感谢的微笑。杰列索夫注视着阿尔贝特的眼睛，突然又感到自己被他的微笑所征服。他不再想睡了，他忘记了自己必须对他严厉些，相反，他想纵情欢乐，想听音乐，以至想和阿尔贝特亲密地谈天，哪怕谈到早上。于是杰列索夫吩咐扎哈尔去拿一瓶酒、香烟和小提琴来。

“这简直太好了，”阿尔贝特说，“还早呢，咱们来拉琴消遣吧；您想听多少支曲子，我都可以拉给您听。”

扎哈尔带着明显的高兴拿来一瓶拉斐特酒、两只玻璃杯、阿尔贝特爱抽的温和的香烟和小提琴。可是他并没有照主人吩咐他的那样去睡觉，却点着了一支雪茄，坐到隔壁的房间里。

“咱们还是谈谈吧，”杰列索夫对刚要拿起小提琴的乐师说道。

阿尔贝特顺从地在床上坐下，高兴地微微一笑。

“哦，对啦，”他说时突然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而且露出一副担心和好奇的神情。（他脸上的表情总是把他想要说的话先表现出来。）“请问……”他沉吟了片刻，“昨天晚上和您一块儿的那位先生……您管他叫N的，他是不是那位有名的N的儿子？”

“是他的亲儿子，”杰列索夫答道，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事会使阿尔贝特感到兴趣。

“怪不得呢，”他得意地微笑着说，“我从他的举止上立刻就看出了某种特别的贵族气派。我喜欢贵族：贵族身上有一种美丽优雅的东西。还有那位舞跳得很好的军官，”他问道，“我也非常喜欢他：他很有风趣，很高雅。他似乎是NN副官吧？”

“哪一位？”杰列索夫问道。

“就是我们跳舞的时候把我撞倒的那一位。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不，他是个毫不足道的家伙，”杰列索夫答道。

“哦，不！”阿尔贝特热烈地为他辩护，“他身上有某种非常，非常讨人喜欢的东西。而且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阿尔贝特补充说，“他曾在那儿演奏过歌剧里的一支曲子。我很久没有这样喜欢什么人了。”

“是的，他演奏得很好，但我并不喜欢他的演奏，”杰列索夫

说,想引他的交谈者谈音乐,“他不懂古典音乐;唐尼采蒂^①和贝里尼^②——您知道,这不是音乐。您大概也有同样的看法吧?”

“哦,不,不,对不起,”阿尔贝特带着温和的、袒护的神情说,“旧音乐是音乐,新音乐也是音乐。^③就是新音乐里也有非常优美的东西:试看《梦游女》?!《露契亚》的最后乐章?!肖邦?!《罗勃》^④?!我常常想……”他稍停了停,显然是在集中思想,“要是贝多芬还活着,他听了《梦游女》一定会高兴得哭起来。处处都充满了美。当维亚多^⑤和鲁比尼^⑥在这儿的时候,我头一次听《梦游女》,——当时就象这样,”他说时眼睛闪闪发光,而且用两手做了一个姿势,好象要从自己胸中把什么东西揪出来似的。“只要再加一点,就叫人受不住啦。”

“那么,您觉得现在的歌剧怎么样呢?”杰列索夫问道。

“博西奥^⑦好,非常好,”他答道,“非常优美,就是不能打动这儿,”他说时指指自己凹陷的胸口。“歌唱家要有热情,可是她却没有了。她给人欢乐,却不能使人痛苦。”

“嗯,那么拉布拉什^⑧呢?”

“从前我在巴黎就听过他的《塞维勒的理发师》^⑨;当时他是

① 唐尼采蒂(1797—184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作品有《拉美摩尔的露契娅》等。

② 贝里尼(1801—183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作品有《诺尔玛》《梦游女》和《清教徒》等。

③ 阿尔贝特和杰列索夫关于音乐的争论中,提到的都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特别受欢迎的作曲家和音乐家。

④ 《罗勃》指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的歌剧《恶魔罗勃》。

⑤ 维亚多是法国有名的女中音歌唱家。

⑥ 鲁比尼是意大利男高音歌手。

⑦ 博西奥是意大利的歌唱家。

⑧ 拉布拉什是意大利歌剧的男低音歌手。

⑨ 《塞维勒的理发师》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歌剧。

无敌的，可是现在他老了，——他不能当演员了，他老了。”

“老了有什么关系呢？他在 morceaux d'ensemble^①中还是唱得很好的，”杰列索夫说道，每谈到拉布拉什时他都这么说。

“怎么老了有什么关系？”阿尔贝特严厉地反驳道。“他不应该老。一个艺术家就不应该老。艺术需要很多东西，但主要的是火！”他说时眼睛炯炯发光，两手向上举起。

果然，可怕的内在的火在他的全身燃烧起来了。

“哦，我的上帝！”他突然说道。“您不认识彼得罗夫——那位画家吗？”

“是的，我不认识，”杰列索夫微笑着答道。

“我真希望您能跟他认识！您跟他谈谈一定会感到愉快。他也是多么懂得艺术啊！我从前常常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家里碰见他，可是现在她不知为什么生他的气。我非常希望您能认识他。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怎么，他在画画吗？”杰列索夫问道。

“不知道；好象不画了吧，可是他曾经是一位学院派的画家。他的见解是多么精辟啊！有时候他侃侃而谈，简直妙极了。哦，彼得罗夫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只是他的生活太放荡不羁了。可惜得很，”阿尔贝特笑着加了一句。接着他从床边站起来，拿起小提琴，调起弦来。

“怎么，您早就不在歌剧院了吗？”杰列索夫问他。

阿尔贝特回过头来，叹了口气。

“唉，我再也不能了，”他抱着头说。他又挨着杰列索夫坐下。“我告诉您吧，”他几乎象耳语似地说，“我不能到那儿去了，

① 法语：合唱。

我不能在那儿演奏了；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没有衣服，没有住处，没有小提琴。糟糕透了的生活！这生活糟糕透了！”他重复了几遍。“我上那儿去干吗呢？去干吗呢？没有必要，”他微笑着说。“唉！《唐璜》^①！”

他用手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那么，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儿去吧，”杰列索夫说。

阿尔贝特没有回答，他一跃而起，抓起小提琴，开始奏起《唐璜》第一幕的最后乐章来，他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这个歌剧的内容。

当他奏出那垂死的海盗的声音时，杰列索夫感到毛骨悚然。

“不，我今天不能拉了，”他说时放下了小提琴，“我喝得太多了。”

可是接着他又走到桌子跟前，倒满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又又在杰列索夫的床上坐下。

杰列索夫目不转睛地瞧着阿尔贝特；阿尔贝特有时候笑笑，杰列索夫也笑笑。他们俩都一言不发；可是他们的目光和微笑在他们之间促成了越来越亲密的关系。杰列索夫感到他越来越喜欢这个人，而且体会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快乐。

“您恋爱过吗？”他突然问道。

阿尔贝特沉思了片刻，后来，他脸上露出了凄切的微笑。他俯身向杰列索夫，注意地瞧了瞧他的眼睛。

“您为什么问我这个？”他低声说。“可是，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的，因为我很喜欢您，”在看了他一会儿之后，他又回过头来，继续说。“我不想欺骗您，我会如实地、源源本本地都告诉

^①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著名歌剧。

您。”他停了一停，接着他的眼睛便奇怪地、惊恐地定住了。“您知道我这人是不够理智的，”他突然说。“是的，是的，”他继续说，“安娜·伊万诺夫娜大概告诉过您了。她跟所有的人都说我是个疯子！这是不对的，她这么说不过是开开玩笑，她是个好心肠的女人，不过，从某个时候起，我的确是不十分健康。”

阿尔贝特又不言语了，然后便睁大眼睛直楞楞地瞧着黑魑魑的门。

“您问我是不是恋爱过？是的，我恋爱过，”他扬起眉毛低声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在剧院里工作。我是歌剧院的第二提琴手，而她总是坐在左边的头等包厢里。”

阿尔贝特站起来，俯身凑着杰列索夫的耳朵。

“不，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说出来呢？”他说。“您一定认识她，大家都认识她。我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望着她；我知道我是个穷艺人，而她却是位贵夫人。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只是望着她，不敢存非分之想。”

阿尔贝特在沉思地回忆着往事。

“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不记得了；反正有一次我被叫去拉小提琴给她伴奏。我算得了什么呢，一个穷艺人罢了！”他说时摇了摇头笑了笑。“可是不，我说不上来，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抓住头加了一句。“那时候我多幸福啊！”

“怎么，您过去常常到她家里去吗？”杰列索夫问道。

“去过一次，就一次……可是，这是我自己不对，我简直疯了。我是个穷艺人，而她却是位贵夫人。我不应该把什么话都告诉她的。可是我简直疯了，我干了蠢事。从那时候起，对我来说就一切都完了。彼得罗夫跟我说得对：还是只在剧场里看见她好……”

“您到底干什么了呢？”杰列索夫问道。

“哦，等一等，等一等，这我不能说。”

于是，他用手捂着脸，沉默了一会儿。

“我到乐队去迟到了。那天晚上我和彼得罗夫喝酒来着，而且我心里乱极了。她坐在她那个包厢里，在跟一位将军谈话。我不知道那位将军是谁。她坐在包厢的尽边上，手放在包厢的边上；她身穿白色的连衣裙，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她一面和他说话，一面看我。她看了我两次。她的发式如此美丽；我不演奏了，而是站在男低音歌手的旁边瞧着她。那时我第一次举止失措了。她对将军微微一笑，又看了看我。我感到，她是在说我，于是我突然发现我已经不是在乐队里，而是在包厢里，跟她站在一起，握着她的手，握着这儿。这是怎么回事呢？”沉默了片刻，阿尔贝特问道。

“这是生动的想象，”杰列索夫说。

“不，不……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阿尔贝特皱着眉头答道。“那个时候我已经穷了，没有住处，所以我去剧场的时候，有时就在那儿过夜。”

“什么？在剧场里？在那漆黑的空空的大厅里？”

“哦！我并不怕那些荒诞无稽的说法。哦，等一等。当人们都散了，我就到她坐过的那个包厢里，在那儿睡觉。这是我的一大乐事。我在那儿度过了多少美丽的夜晚啊！不过有一次我又旧病复发了。夜里，我恍恍惚惚，看见许多东西，但是我没法把这许多东西全告诉您。”阿尔贝特垂下眼睛，瞧着杰列索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问道。

“奇怪！”杰列索夫说。

“不，等一等，等一等！”他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我吻着她

的手，站在她身旁哭了，我跟她说了许多话。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儿，听见了她的声音。在一个晚上她跟我说了许多话。后来我就拿起小提琴，轻轻地开始拉起来。我拉得好极了。可是我感到害怕。我并不是怕那些荒诞无稽的说法，而且我也不信；但是我为我的头脑害怕起来，”他说时温和地笑着，用手摸摸前额。“我为我的可怜的理智害怕；我觉得我的脑子出了问题。也许这不要紧吧？您觉得怎么样？”

他们沉默了片刻。

Und wenn die Wolken sie verhüllen,
Die Sonne bleibt doch ewig klar,^①

阿尔贝特温和地微笑着，唱道。“难道不是这样吗？”他又加了一句。

Ich auch habe gelebt und genossen,^②

“哦！若是那位彼得罗夫老头，就会把这一切全跟您说清楚了。”

杰列索夫默默地、惊恐地瞧着自己的交谈者的激动而苍白的脸。

“您知道《尤利斯特圆舞曲》^③吗？”阿尔贝特突然叫道，而且，他没有等待回答，就一跃而起，抓起小提琴，开始拉起这支欢快的圆舞曲来。他完全忘了一切，显然认为整个乐队都在为他伴奏。阿尔贝特微笑着，摇晃着身子，挪动着双脚，拉得好极了。

① 德语：即使云彩遮住太阳，它还是永远明亮。（摘自韦伯的歌剧《魔弹射手》中阿格泰的抒情独唱。）

② 德语：而且我也生活过、快乐过。（摘自舒伯特谱曲的席勒的诗《少女的哀叹》。）

③ 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

“哎，够开心的了！”他拉完这支曲子，挥动了一下小提琴说。

“我要走了，”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说，“您不去吗？”

“去哪儿？”杰列索夫诧异地问道。

“咱们再上安娜·伊万诺夫娜家去；那儿快活：又热闹、人又多，又有音乐。”

杰列索夫最初差点要表示同意，可是仔细一想，还是劝阿尔贝特今晚别去了。

“我就是一会儿。”

“真的，别去了吧。”

阿尔贝特叹了口气，放下了小提琴。

“那么不去了？”

他又瞧了瞧桌子（没有酒），就道了晚安，走了出去。

杰列索夫按了一下铃。

“注意，没有我的许可，别让阿尔贝特先生到任何地方去，”他对扎哈尔说。

六

第二天是假日。杰列索夫醒后，就坐在客厅里喝咖啡，看书。阿尔贝特在隔壁房间里还没有动静。

扎哈尔小心地打开门，往餐室里张望了一下。

“您相信吗，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他就那么睡在光光的长沙发上！身底下什么东西也不要铺，真的。就跟小孩儿似的。真是个卖艺的。”

十一点多钟时，从门里传出了哼哼声和咳嗽声。

扎哈尔又走进了餐室；于是主人便听见扎哈尔的和蔼的声

音和阿尔贝特的微弱的恳求声。

“嗯，怎么样？”当扎哈尔走出来时，主人问他。

“他觉得很无聊，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他不肯洗脸，闷闷不乐。老是要酒喝。”

“不，既然做了，就得坚持到底，”杰列索夫对自己说。

于是，他吩咐了不许把酒拿给阿尔贝特，又重新拿起书来，可是，他不由自主地侧耳倾听着餐室有什么动静。那儿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只是间或传出闷在胸腔里的费劲的咳嗽声和吐痰声。两小时过去了。杰列索夫换好衣服，在出去之前，决定去看看这位同住在一起的人。阿尔贝特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两手托着头。他回过头来看看。他的脸黄黄的，满是皱纹，不仅忧愁，而且露出深深的不幸。他想笑笑以示问候，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却显得更悲哀了。他好象要哭了。他很吃力地站起身来，行了个礼。

“只要能喝一小杯伏特加就好了，”他用恳求的神情说，“我软弱极了……劳您驾！”

“您还是喝点咖啡提提神吧。听我的劝告没错。”

阿尔贝特的脸上突然失去了孩子般的表情；他冷冷地、漠然地望了望窗外，接着便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

“难道您不想吃早饭吗？”

“不想吃，谢谢，我吃不下。”

“您要是想拉小提琴的话，您并不妨碍我，”杰列索夫说，把小提琴放在桌上。

阿尔贝特带着轻蔑的微笑瞧瞧小提琴。

“不，我太软弱了，拉不动，”他说完就把乐器从身边推开。

此后，不管杰列索夫怎么说：向他提议出去走走，晚上去看

戏，他只是顺从地点头，固执地一言不发。杰列索夫坐车出去，拜访了几位朋友，在别人家里吃了午饭，直到去看戏之前，才回家来换衣服，并看看乐师在干什么。阿尔贝特坐在黑黢黢的前厅里，两手支着头，望着生着火的炉子。他穿得很整洁，脸也洗了，头也梳了；可是他的眼睛却是呆滞的、死气沉沉的，而且他的全身现出一种比上午还要软弱和疲惫的样子。

“怎么，阿尔贝特先生，您吃过午饭了吗？”杰列索夫问道。

阿尔贝特点了点头，表示吃了，他抬头瞧了瞧杰列索夫的脸，就害怕地垂下了眼皮。

杰列索夫感到很难堪。

“今天我和剧院的经理谈起您，”他说时也垂下了眼皮，“如果您能让他听听您的演奏的话，他会很高兴聘请您去的。”

“谢谢您，我拉不动，”阿尔贝特嘟嘟囔囔地说，接着就走进自己的房间，随手很轻地把门关上。

过了几分钟，门把手同样轻轻地转动了一下，接着他拿着小提琴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恶狠狠地匆匆瞥了杰列索夫一眼，把小提琴往椅子上一放，又不见了。

杰列索夫耸耸肩膀，微微一笑。

“那我还有什么法子？我到底错在哪儿呢？”他想道。

“喂，那位音乐家怎么样了？”晚上他很晚才回到家里，第一句话就这样问道。

“不好！”扎哈尔简洁明了地答道。“老是唉声叹气、咳嗽，除了四五次要我给他伏特加以外，什么话也不说。结果我给了他一杯。要不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咱们真会要了他的命。就跟那个管家一样……”

“他没拉小提琴吗？”

“连摸也没摸。我把小提琴给他送去了两回，——他都轻轻地拿起，把它送了出来，”扎哈尔笑眯眯地答道。“那么，您是不是吩咐给他酒喝呢？”

“不，再等一天，看情形再说。现在他在干什么？”

“他锁上门待在客厅里呢。”

杰列索夫走进书房，挑了几册法文书和一本德文的《福音书》。

“明天把这个放到他房间里去，注意别让他出去，”他对扎哈尔说。

第二天早上，扎哈尔报告主人说，乐师一夜都没睡，一直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而且走进了餐具室，想打开碗柜和门，可是扎哈尔很仔细，把什么都锁上了。扎哈尔说，他假装睡着了，听见阿尔贝特在黑暗中自言自语，挥动着两手。

阿尔贝特一天比一天变得更阴沉、更沉默寡言了。他好象怕杰列索夫似的，而且，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他的脸上就现出一种病态的恐怖。他既不肯拿书，也不肯拿小提琴，也不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

乐师住在杰列索夫家里的第三天，杰列索夫深夜回到家里，又累，心里又烦。他坐着马车跑了一整天，忙着去办一件看来很简单容易的事，可是，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尽管费了很大的劲，可是事情却毫无进展。除此而外，他还在俱乐部里打惠斯特输了钱。他的情绪很不好。

“得啦，随他去吧！”在扎哈尔把阿尔贝特的闷闷不乐的情况告诉他之后，他答道。“明天我一定要他明确答复：他是不是愿意住在我这儿，并听从我的劝告？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我觉得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这就是与人为善的结果!”他暗自想道。“为了他,我百般迁就,把这个肮脏的家伙留在家里,为此,我上午没法儿接见生客;我为他到处奔走,可是他却把我看成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快乐硬把他关在笼子里的坏蛋。而主要的是,他一点也不肯为他自己着想。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这个‘他们’是指一般人,尤其是指他今天打过交道的那些人)。现在我拿他怎么办呢?他在想什么和为什么事情发愁呢?他是舍不得我把他从里面硬拉出来的放荡生活吗?是为了他受过的屈辱吗?是为了我把他从中挽救出来的极端的贫困吗?看来,他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不敢正视正当的生活了……”

“不,这是幼稚的行为,”杰列索夫暗自想道。“但愿上帝能让我把自己管好就不错了,我又怎么能去改造别人呢?”他本想马上就放他走,可是想了一会以后,决定明天再说。

夜里,杰列索夫被前厅里桌子翻倒的响声、说话声和脚步声惊醒了。他点上蜡烛,惊异地侧耳倾听……

“您等着吧,我要去告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扎哈尔说;阿尔贝特在激昂而不连贯地唠叨什么。杰列索夫跳起来,拿着蜡烛跑进了前厅。扎哈尔穿着睡衣当门站着,阿尔贝特则戴着礼帽,披着斗篷,要把他从门旁推开,并用含泪的声音向他嚷道:

“您不能不让我走!我有身份证,你们家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拿。您可以搜查我!我要去找警察局长!”

“对不起,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扎哈尔仍旧用背挡着门,对主人说。“他夜里起来,在我的大衣里找到钥匙,喝了整整一瓶加糖的伏特加。这难道对吗?现在他又要出去。您吩咐过不让他走,所以我就不能放他。”

阿尔贝特看到杰列索夫,就更加激动地逼近扎哈尔。

“谁也不能扣留我！谁也没有权力！”他叫道，而且声音越来越高。

“走开，扎哈尔，”杰列索夫说。“我不想扣留您，也不能扣留您，不过，我还是劝您留下来，住到明天，”他对阿尔贝特说。

“谁也不能扣留我！我要去找警察局长，”阿尔贝特的嗓门越来越大，他只对扎哈尔说，并不看着杰列索夫。“救命呀！”他突然用发狂的声音嚎叫起来。

“您这么嚷嚷干什么？又没人不让您走，”扎哈尔一边开门一边说道。

阿尔贝特停止了叫喊。“办不到吧？想弄死我。没门！”他一面穿套鞋，一面自言自语地说。他没有告辞，而且不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走出了门。扎哈尔给他照着亮，送他到大门口，便回来了。

“谢谢上帝，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日子长了，说不定会出什么乱子，”他对主人说，“现在得查点一下银餐具。”

杰列索夫只是摇摇头，什么也没有回答。现在他清晰地想起了他和乐师一起度过的头两个晚上，想起了由于他的过错而使阿尔贝特在这儿度过的最近几天的闷闷不乐的日子，主要的是，他想起了从初次见面起这个怪人在他心里唤起的那种惊讶、爱和怜悯甜蜜地交织的感情，他不由得可怜起他来了。“现在他会怎样呢？”他想道。“没有钱，没有御寒的衣服，独自一人，在深更半夜……”他想打发扎哈尔去追他，可是已经迟了。

“外面冷吗？”杰列索夫问道。

“冷得够呛，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扎哈尔答道。“我忘了向您禀报，在春天以前，咱们还得买些木柴。”

“早先你怎么说还有富裕的呢？”

七

外面的确很冷，但阿尔贝特并不觉得冷，因为喝下去的酒和刚才发生的争执使他浑身躁热。

走到街上，他回头望了望，快乐地搓了搓手。街上阒无人迹，可是那一长排路灯还在闪着红光；天空晴朗，繁星密布。“怎么样？”他对着杰列索夫住宅中灯光明亮的窗子说；然后，把两手插进斗篷下面的裤兜里，向前探着身子，迈着沉重、蹒跚的步子向右走去。他感到两腿和胃里都非常沉重，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作响，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两面摇晃，但他还是向着安娜·伊万诺夫娜家的方向前进。他脑子里掠过种种奇怪的、不连贯的念头。一会儿他想起了和扎哈尔刚才的争执，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大海和他乘轮船初次到达俄国的情形，一会儿他又想起了和一位朋友在他路过的一家小铺里度过的幸福的夜晚；一会儿一个熟悉的曲调突然开始在他的想象中歌唱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他热恋的对象和在剧场里的那个可怕的夜晚。尽管这一切回忆是不连贯的，但它们却这样鲜明地浮现在他的心头，以致使他闭上了眼睛，不知道哪个更真实：是他所做的呢还是他所想的？他不记得，也没有感觉到他是怎么举步，怎样踉踉跄跄地撞到墙上，他是怎样茫然四顾，又怎样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的。他只记得和感到在他心里浮现的一切，奇妙地纷至沓来和错综交织。

在走过小莫尔斯卡雅街时，阿尔贝特绊了一跤。他霎时清醒过来，看见自己前面有一座庞大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他就继

续向前走去。天空中看不见星星、曙光和月亮，路灯也没有了，可是所有的物体都清晰地现了出来。那耸立在街头的建筑物的窗内，都是灯火通明，但那些灯光却象倒影似地晃动着。那座建筑物越来越近，在阿尔贝特前面显得越来越清晰了。可是他刚走进那宽阔的大门时，灯光就熄灭了。里面黑魆魆的。拱顶下回响着孤寂的脚步声，当他走近前去，一些影子就很快溜走了。“我上这儿来干吗？”阿尔贝特想道；可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拉向前去，拉向大厅深处……那儿有个高台，周围默默地站着一些矮小的人。“谁要讲话？”阿尔贝特问道。没有人回答他，只有一个人向他指了指台上。这时，有个高个儿的瘦子，头发象鬃毛似的，穿着一件花袍，已经站在台上，阿尔贝特一眼就认出这是自己的朋友彼得罗夫。“真奇怪，他在这儿！”阿尔贝特想道。“不，弟兄们！”彼得罗夫指着一个人说。“你们并不了解这位生活在你们中间的人；你们并不了解他！他不是一个卖艺的，不是一个机械的演奏者，不是疯子，不是一个堕落的人。他是一位天才，是一位在你们中间不被注意和不受重视因而被断送了伟大的音乐天才。”阿尔贝特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朋友说的是谁；可是，他不想使他受拘束，便谦逊地低下了头。

“他就象根稻草似的被我们大家所侍奉的圣火烧成了灰烬，”那个声音继续说，“可是他完成了上帝交给他的全部使命，因此，他应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人。你们可以蔑视他，折磨他，侮辱他，”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地继续说道，“但是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比你们大家崇高得多。他幸福，他善良。他一视同仁，他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地爱或者蔑视，他只为上天赋予他的使命服务。他只爱一样东西——美，这乃是世界上唯一无可怀疑的幸福。是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们都拜倒在他面前吧，跪

下!”他大声喝道。

但是，从大厅对面的角落里另一个声音轻轻地开始说。“我不愿意给他下跪，”那个声音说；阿尔贝特一听就知道这是杰列索夫的声音。“他有哪一点伟大？为什么我们要给他下跪？难道他的行为是诚实正直的吗？难道他给社会带来了什么益处？难道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借钱不还，以及他是怎样从自己同事那儿把小提琴拿去送进当铺吗？……（‘我的上帝，这一切他怎么全都知道！’阿尔贝特想道，把头垂得更低。）难道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巴结最卑微的人，为了几文钱去巴结他们的吗？”杰列索夫继续说。“难道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从剧院里被赶出来，安娜·伊万诺夫娜怎样想把他送进警察局的吗？”（“我的上帝！这都是真的，请为我辩护吧！”阿尔贝特说，“你是唯一知道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的人。”）

“别再说了，你不害臊吗，”彼得罗夫的声音又开始说。“你们有什么权利责备他呢？难道你们过过他的生活吗？感到过他的喜悦吗？（‘对啊，对呀！’阿尔贝特低声说。）艺术是人的威力的最高表现。它只给予极少数佼佼者，并把这些佼佼者举到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处，以至很难保持清醒健全的头脑。在艺术中，就象在一切斗争中一样，也有把一切都贡献给自己的事业，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就遭到灭亡的英雄。”

说到这里，彼得罗夫停了下来，于是，阿尔贝特抬起了头，大声叫道：“对！对！”可是他的声音没有声响。

“这事与您无关，”画家彼得罗夫转身向他厉声说。“是的，侮辱他吧，蔑视他吧，”他继续说道，“然而他却是我们所有人之中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

听了这些话感到心花怒放的阿尔贝特，忍不住走到了这位

朋友面前，想亲吻他。

“滚开，我不认识你，”彼得罗夫说，“走你自己的路吧，要不然，你就走不到了……”

“瞧，你都醉成这样了！你走不到家的，”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岗警叫道。

阿尔贝特站住了，集中全部力量，尽量做到不东摇西晃，拐进了胡同。

再走几步就到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家了。灯光从她家的前厅射到院子里的积雪上，小门外停着雪橇和马车。

他用冻僵了的双手抓着栏杆，跑上了台阶，按了按铃。

睡眠惺忪的女仆从门上的小窗里探出头来，狠狠地瞅了阿尔贝特一眼。“不行！”她大声叫道。“上头吩咐，不让你进来，”说完这句话，就砰地一声把小窗关上了。在台阶上听得见音乐声和女人说话的声音。阿尔贝特便就地坐下，头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霎时间，许多互不相联而亲切的幻影以新的力量包围了他，把他卷进它们的波浪中，并把他带到一个自由美丽的幻想之国。“是的，他是一个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这句话不由得又涌上了他的心头。从门里传出了波尔卡舞曲的乐声。这些乐声也在说他是一个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附近的教堂里传出了钟声，这钟声也在说：“是的，他是一个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可是，我还要到那大厅里去，”阿尔贝特想道。“彼得罗夫还有许多话要跟我说。”这时，大厅里已经阒无一人，不是画家彼得罗夫，而是阿尔贝特自己站在台上，用小提琴奏出那个人刚才说过的话。但这把小提琴的构造很奇特：它整个是用玻璃制成的。而且为了使它发出声音来，必须用两手抱着它，慢慢地把它紧贴在胸前。声音简直柔和悦耳极了，是阿尔贝特从来没听说过的。

他把小提琴在胸前贴得越紧，他就越感到快乐和甜蜜。声音越高亢激越，阴影就消散得越快，大厅的墙壁就被透明的光照得越亮。可是，为了不把小提琴压碎，必须非常小心地用它演奏。阿尔贝特用这个玻璃乐器非常小心而且非常好地演奏着。他奏出了他认为再也不会有人听到的音乐。当另一种遥远幽微的音响使他的注意力分散时，他已经开始感觉累了。这是钟声，可是这音响说话了：“是的，”这钟在一个地方遥远地、高亢地轰响道。“你们觉得他可怜，你们蔑视他，可是，他是一个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再也不会有人来奏这种乐器了。”

阿尔贝特突然觉得这些熟悉的话非常聪明新颖和公正，因此他停止了演奏，而且尽量做到不动，他举起双手，抬眼望天。他觉得自己身心愉快，十分幸福。虽然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但阿尔贝特却挺起胸膛，自豪地昂起头来，站在台上，以便大家都能看到他。突然有人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在薄暗中看见有一个女人。她忧伤地望着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他马上就明白了他所做的事不好，为自己感到惭愧。“到哪儿去？”他问她。她便再一次长久地注意地望了望他，然后伤心地低下了头。她就是他所爱的那个她，完全是她，穿的也是那件衣服，丰满雪白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美丽的双臂裸露到胳膊肘以上。她拉着他的手，带他走出大厅。“出口在那边，”阿尔贝特说；可是她笑笑，没有回答，还是带他往外走。在迈过大厅的门槛时，阿尔贝特看见了月亮和水。但水不象平常那样在下面，月亮也不在上面：象平常那样，一轮皓月固定在一个地方。月亮和水混在一块，到处都是——在上面、在下面、在侧面，在他们俩的周围。阿尔贝特和她一起跳进月亮和水里，而且他明白了，现在他能拥抱他爱的胜过世上一切的那个人儿

了；他拥抱了她，感到了无上的幸福。“这不是在做梦吧？”他问自己；可是不！这是现实，而且比现实更真实：这是现实又是回忆。他感到，他在这一瞬间所享受到的那种无法言传的幸福已经过去，而且决不会回来了。“我在哭什么呢？”他问她。她默不作声地、忧伤地望了望他。阿尔贝特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既然我还活着，那又怎么样呢？”他说。她没有回答，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前方。“这太可怕了！怎么能对她说明我还活着呢？”他恐怖地想道。“我的上帝！我还活着呀，您要了解我！”他低声说。“他是一个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一个声音说道。可是有一样东西越来越沉重地压在阿尔贝特身上。这是月亮和水呢，是她的拥抱呢，还是眼泪呢——他不知道，但他感到，他要说的话说不出来，而且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

从安娜·伊万诺夫娜家里走出来的两位客人，猛然发现直挺挺地躺在门口的阿尔贝特。其中一位回去把女主人叫了出来。

“这简直是造孽！”他说，“您竟能让一个人冻成这样。”

“哎呀，这个阿尔贝特真讨厌，——竟坐到这儿来了，”女主人答道。“安努什卡！快把他抬到屋里去，”她对女用人说。

“我还活着呀，干吗要埋葬我呢？”当阿尔贝特人事不省，被抬进屋里去的时候，他含糊不清地低声说。

（1858年2月28日）

芳 信 译

三 死

一

秋天了。两辆马车在大路上风驰电掣地飞驶着。前面那辆轿式马车里坐着两个女人。一位是太太，消瘦而苍白。另一个是侍女，容光焕发、脸色绯红、胖胖的，她那干涩的短发老从褪了色的帽子底下滑出来，所以那只戴着破手套的红红的手不时要把头发塞进去。那裹着粗毛披巾的高高的胸脯透出健康的气息，那双滴溜溜的黑眼睛，一会儿注视着窗外掠过的田野，一会儿胆怯地看看太太，一会儿不安地打量着马车的角落。太太那顶挂在网架上的帽子在她的鼻子前面摇晃着，一条小狗躺在她的膝上，她的脚翘着，让开放在地上的一堆小匣子，随着弹簧的颤动声和玻璃的震动声，可以微微地听见她的鞋底敲在小匣子上的声音。

太太把两手叠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靠着垫在她背后的靠垫上微微摇晃着，微皱着眉头隐隐地咳嗽着。她头上戴一顶白色睡帽，娇嫩、苍白的脖子上系着一条浅蓝色的围巾。在睡帽下面笔直的头缝把她那淡褐色的、非常平整的、抹了油的头发平分着，那条宽宽的平分线的白皮肤上，现出一种干枯的死色。她的面貌虽然秀丽，可是微微发黄的皮肤却干枯松弛，两腮和颧骨上一片潮红。她的嘴唇是干的、不安的，稀疏的睫毛没有卷，

呢子的旅行外衣在她那凹下去的胸部形成一条条直褶。虽然太太的眼睛闭着，她的脸上却现出疲倦、恼火和惯有的痛苦的表情。

那个听差正在赶马车人的座位上把胳膊肘支在软椅上打瞌睡。那驿站的马车夫精神抖擞地吆喝着，赶着四匹汗淋淋的高头大马前进，他间或回头看看在后面那辆四轮马车上吆喝着的另一名马车夫。轮胎的宽阔的平行痕印在泥泞的石灰路上均匀而迅速地向前延伸。天空是灰色而寒冷的，潮湿的尘雾洒落在田野和道路上。马车里面很闷，而且有一股花露水和尘土的气味。病人把头往后一靠，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她那双大眼睛发亮，黑得好看。

“又来了，”当侍女的大衣下摆微微碰着她的腿时，她使用那美丽的瘦骨嶙峋的手神经质地把它推开，说道：她的嘴痛苦地歪扭着。玛特廖莎用双手提起自己的大衣，用壮实的两腿微微欠身起来，把身子挪开些。她那容光焕发的脸上满是娇艳的红晕。病人那双美丽的黑眼睛贪婪地注视着侍女的动作。太太用两手按着坐位，也想欠起身子，往上坐一坐；可是她力不从心。她的嘴歪扭了，她整个的脸由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恶意的嘲讽的表情而变得难看。“你哪怕帮我一下呢！……哎呀！不用了！我自己会，’劳你驾，请你别把你的麻袋之类的东西放在我背后！……既然你不会，你就别碰我！”太太闭上了眼睛，接着，又很快抬起眼皮，瞧了侍女一眼。玛特廖莎咬着红红的下唇望着她。从病人胸中涌上一声深沉的叹息，可是叹息在中途便变成了咳嗽。她转过脸去，皱起眉头，两手揪着胸口。咳嗽完了，她又闭上了眼睛，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驶进了一座村庄。玛特廖莎从披巾下伸出一只胖乎乎的手来画了个

十字。

“这是什么？”太太问道。

“驿站，太太。”

“我问你为什么画十字？”

“有座教堂，太太。”

病人转身对着车窗，开始缓慢地画十字，睁大那双大眼睛瞧着她那辆轿式马车经过的那座乡村教堂。

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都在驿站前停住了。病人的丈夫和医生下了四轮马车，来到轿式马车跟前。

“您觉得怎么样？”医生把着她的脉问道。

“嗯，你怎么样，亲爱的，你不累吧？”丈夫用法语问道，“你不想下来吗？”

玛特廖莎抱起包袱蜷缩在角落里，免得妨碍他们谈话。

“没什么，还是那样，”病人答道。“我不下去。”

丈夫站了一会儿，就走进驿站里去了。玛特廖莎从轿式马车上跳了下来，踮着脚跑过泥泞，走进了驿站的大门。

“我不舒服，并不能作为您不吃早饭的理由，”病人微笑着对站在车窗旁的医生说。

“他们谁也不管我，”当医生刚轻轻地迈脚离开她，很快地跑上了驿站的台阶时，她自言自语地寻思道。“他们身体好，所以他们不在乎。哦！我的上帝！”

“怎么样，爱德华·伊万诺维奇？”丈夫看到医生时，带着愉快的微笑搓着手说，“我已经吩咐他们把食盒^①拿进来，您对此意下如何？”

① 俄国贵族出门旅行时随身携带的食盒，其中有各种饮料和食品。

“行，”医生答道。

“嗯，她怎么样？”丈夫叹了口气，压低声音，扬起眉毛问道。

“我说过：她不仅到不了意大利，就是到莫斯科也得看天意了。尤其是在这种天气。”

“那怎么办呢？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用手捂着眼睛说。“拿到这儿来，”他对拿着食盒进来的仆人说。

“本来就该待在家里，”医生耸耸肩膀答道。

“请问，我有什么法子呢？”丈夫反问道。“您知道，我曾经想尽一切方法阻拦她，我提到了费用，提到了我们必须撇在家里的孩子，以及我的一应事务，可是她什么都不听。她订出在国外的生活计划，好象她是个健康人似的。可是把她的病情如实告诉她——又无异是杀害她。”

“其实她已经被杀死了，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这一点您必须知道。人没有肺是活不成的，而肺是不能再长出来的。这的确很悲哀、很难过，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你我所能做到的，只是让她尽可能平静地死去。现在得请牧师了。”

“哦，我的上帝！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吧，得提醒她立遗嘱。随它去吧，我反正不能跟她提这件事。您知道，她是多么善良啊……”

“不过，您还是得想法子劝她等路冻结实了再走，”医生意味深长地摇着头说，“要不然，在路上也许会出事……”

“阿克休莎，哎，阿克休莎！”驿站长的女儿尖声喊道；她把一件敞胸短上衣顶在头上，在满是泥泞的屋后的台阶上跺着脚。“咱们去瞧瞧希尔金家的太太去。听说她胸口疼，要到外国去。我还没见过害痲病的人是个什么样儿呢。”

阿克休莎从门里跳了出来，她们俩手拉手地跑出了大门。

她们放慢步子从轿式马车旁边走过去，向放下来的车窗里张望了一下。病人向她们转过头来，可是，一发觉她们好奇的神情，就皱着眉头把脸转了过去。

“妈……呀！”驿站长的女儿很快地转过头来，说道。“从前她是个大美人儿，可现在成了什么样儿了？真可怕。阿克休莎，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是呀，可瘦啦！”阿克休莎附和着说。“咱们假装是到井台那边去，再去瞧瞧。瞧，她把脸转过去了，可我还是看见了。多可惜呀，玛莎。”

“瞧这些烂泥！”玛莎答道，接着她俩又跑回大门里去了。

“看来，我的样子很可怕，”病人想道。“但愿我能尽快、尽快到外国去；我在那儿会很快恢复的。”

“怎么，亲爱的，你怎么样？”丈夫走到轿式马车跟前，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说。

“问来问去就这句话，”病人想道，“可他自己还在吃！”

“没什么，”她带答不理地说。

“你要知道，亲爱的，我担心在这样的天气里旅行会加重你的病，爱德华·伊万内奇也这么说。咱们不如回去吧？”

她生气地一言不发。

“说不定天气会好起来，那时路也就好走了，你的病也见好了；我们大家再一块儿去。”

“对不起。如果早先我不听你的话，那我现在已经是在柏林了，而且健康完全恢复了。”

“有什么法子呢，我的天使，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你要是肯再等一个月的话，那你的身体就会大大地好起来；我也可以把事情办完，孩子们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了……”

“孩子们没病，我可有病。”

“不过你要明白，亲爱的，假如因为这种天气你的病在路上加重……那时候咱们至少是在家里。”

“在家里又怎么样？……在家里等死吗？”病人勃然大怒地答道。但是死这个字显然把她吓住了，于是她央求地和疑惑地望了望丈夫。他低下眼睛，沉默了。病人的嘴突然象孩子似地撇了一下，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丈夫用手帕捂着脸，默默地从轿式马车旁走开了。

“不，我要去，”病人说时眼望着天，抱着胳膊，开始低声说些不连贯的话。“我的上帝！这是为什么呢？”她说时眼泪流得更厉害了。她热烈地祈祷了很久，可是她的胸部还是那样疼痛，喘不过气来；天空、田野和道路还是那样阴沉和灰暗，那同样的秋雾，既不密，也不稀，依旧落在泥泞的道路上、屋顶上、轿式马车上和马车夫们的皮袄上。那些用宏亮、愉快的声音交谈着的马车夫正在给车轮涂油和套车……

.....

二

轿式马车套好了；可是车夫在磨蹭。他走进了车夫们待的小木屋。木屋里又热、又闷、又黑，有一股人味、烤面包的味、白菜和羊皮袄的气味。有几个马车夫在正房里坐着，一个女厨子在炉旁忙着，火炕上躺着一个穿羊皮袄的病人。

“赫韦多尔大叔！喂，赫韦多尔大叔！”一个穿着皮袄、腰里掖着鞭子的年轻马车夫，走进屋来对病人说道。

“饭桶，你找费季卡干什么？”有个马车夫答应道，“瞧，你们

的马车在等着你哪。”

“我想借他的靴子；我那双破了，”小伙子回答时把头发往后一甩，并把掖在腰里的无指手套塞好。“他睡着了？喂，赫韦多尔大叔！”他走到火炕跟前，又喊道。

“什么事？”一个微弱的声音答道，接着一张长着红胡子的瘦脸从炕上探出来，向下张望着。接着，一只苍白瘦削的毛茸茸的大手拉过一件粗呢上衣，盖在穿着肮脏的衬衫的瘦肩膀上。“给我点水喝，小伙子；你有什么事？”

小伙子递给了他一杓水。

“是这么回事，费佳^①，”他说时两脚倒替着站着，“现在你大概不需要那双新靴子了；让给我吧，你大概不会再满处跑了。”

病人把疲惫无力的头俯在那光滑的木杓上，下垂的稀稀拉拉的胡子浸在浑浊的水里，他无力而贪婪地喝着。他那蓬乱的胡子很脏，凹下去的、无神的眼睛吃力地抬起来望着小伙子的脸。喝完水，他想抬起手来擦擦濡湿的嘴唇，可是力不从心，只好在粗呢上衣的袖子上蹭了蹭。他默默地、困难地用鼻子呼吸着，强打精神直望着小伙子的眼睛。

“也许你已经答应给别人了吧，”小伙子说，“要是那样的话，那就算了。主要是，外面潮湿，我得出去干活，所以我想：我去把费季卡^②那双靴子借来吧；他大概不用了。要是你自己要用，那你就说……”

病人的胸中有什么涌上来了，咕噜咕噜地直响；他佝偻着身子，连咳带呛地、没命地咳嗽起来。

“他要靴子有什么用！”女厨子突然怒气冲冲地嚷起来，嚷得整个屋子都能听见，“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下炕了。瞧他这个咳

^{①②} 这个老人的名字叫费多尔。费季卡和费佳是他的小名。

劲儿，只要一听见他咳嗽，连我都觉得心口疼。他要靴子有什么用？总不会给他穿着新靴子下葬吧。他早就该走了，请上帝饶恕我的罪过！瞧他这个咳劲儿。应该让他搬到别的屋子里或是什么地方去！听说城里有这种医院；象他占着这一大片地方——哪行？得了吧。弄得你简直没一点空地儿，还讲究什么干净。”

“喂，谢列加！上车去吧，老爷们在等着哪，”驿站长向门里叫道。

谢列加没有等到答复，刚想出去，可是那病人一面咳嗽，一面用目光示意他有话要说。

“你把靴子拿去吧，谢列加，”他忍住咳嗽，歇了一会儿，说。“可是你听我说……等我死后，你给我买块碑石吧，”他声音嘶哑地加了一句。

“谢谢大叔，那我就拿走了，碑石我准给你买。”

“我说，伙计们，听见了没有？”病人还有话要说，可是他又佝偻着身子喘不出气来。

“好，我们听见了，”有一个马车夫说。“走吧，谢列加，上车去吧，要不然，驿站长又要跑来了。你知道，希尔金家的太太正病着哪。”

谢列加赶快脱下自己那双大而无当的破靴子，把它们往长凳下面一扔。费多尔大叔的新靴子正合脚，谢列加打量着那双靴子，走出木屋，向轿式马车走去。

“嗨，多棒的靴子！让我来给它擦点儿油吧，”当谢列加爬上自己的坐位，拿起缰绳的时候，一个手上拿着上油毛刷的马车夫说道。“白送给你了？”

“你眼红吗，”谢列加答道，他微微欠起身来，用粗呢上衣的下摆把腿裹好。“走吧！我的宝贝儿！”他扬起鞭子向马吆喝道；

于是载着乘客和大小皮箱的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便在潮湿的大路上飞快地驶去，在灰濛濛的秋雾中消逝了。

那生病的马车夫留在闷热的木屋里的火炕上，他始终咳不出痰来，于是使劲翻了个身，便安静下来了。

到了傍晚，木屋里人们进进出出，不断有人来吃饭，谁也没理会这个病人。晚上，女厨子爬上炕去，迈过他的腿伸手去取皮袄。

“纳斯塔西娅，你别生我的气，”病人说，“我很快就会把这地方给你腾出来的。”

“得了，得了，那有什么，没有关系，”纳斯塔西娅嘟囔道。“大叔，你哪儿疼呀？你说吧。”

“我的五脏六腑都难受极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儿。”

“也许是咳嗽得嗓子疼吧？”

“哪儿都疼。我快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哎哟，哎哟，哎哟！”病人呻吟起来。

“你把腿盖严实了，就这样，”纳斯塔西娅说；当她还从火炕上爬下来时，顺手拉过粗呢上衣给他盖上。

夜间，木屋里的小灯灯光昏暗。纳斯塔西娅和十来个马车夫睡在地板或是长凳上，大声打着呼噜。只有那个病人在火炕上翻来覆去，微弱地呻吟着，咳嗽着。到了早上，他完全寂然无声了。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第二天早上，纳斯塔西娅在薄暗中伸着懒腰说。“我梦见赫韦多尔大叔从炕上爬下来，出去劈木柴。他说，纳斯佳，让我来帮你的忙；我就对他说，你怎能劈柴呢？可是他抓起斧子就劈，劈得飞快，飞快，木片满处乱飞。哟，我说，你不是有病吗。不。他说，我好了，于是抡起斧子，把

我吓了一跳。我大喊了一声就醒了。他会不会死了？赫韦多尔大叔！喂，大叔！”

费多尔没有回答。

“可不是吗，没准是死了？我去瞧瞧，”一个刚睡醒的马车夫说。

那只从炕上垂下来的、满是红毛的瘦胳膊已经冷了，呈死白色。

“好象是死了，得去告诉驿站长，”马车夫说。

费多尔没有亲人，——他是个外乡人。第二天，人们把他埋在小树林后面的新墓地里，纳斯塔西娅接连好几天逢人便说她做的那个梦，讲她是第一个发现费多尔大叔死了的。

三

春天来了。湍急的溪水潺潺地沿着城市中潮湿的街道，在冻成块的粪肥间流过；穿着色彩鲜明的衣服的人们熙来攘往，热闹地交谈着。在篱笆里面的小花园里，树木都发芽了，隐约可以听见树枝在清风中摆动。到处都有晶莹的水点滴下、流着……麻雀在热闹地唧唧喳喳地叫着，鼓起小小的翅膀飞翔着。在向阳的那边，在篱笆上，在房屋和树木上，一切都在动，都在闪烁着光亮。天空中、大地上和人们心里，都充满了欢乐和青春。

在一条通衢大道上的一家大公馆门前，铺上了新稻草；那位忙着出国垂死的病人，就在这个公馆里。

在那间关着的房门旁，站着病人的丈夫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长沙发上坐着一位教士，他低着头，拿着一包用项巾①包

① 指披在颈上祭服下面的项巾。

着的東西。一位老太太——病人的母親——躺在屋角里的一把高背手圈椅里傷心地哭泣。一個侍女拿着一塊乾淨手絹在她身旁，伺候著老太太要用手絹；另一個侍女在用什么東西給老太太揉太陽穴，並且吹著她帽子底下的白发蒼蒼的頭。

“好，基督保佑您，親愛的，”丈夫對跟他一同站在門旁的那個上了年紀的婦人說，“她非常信任您，您同她很談得來，所以請您去好好地勸勸她，親愛的，去吧。”他剛要給她開門，但是表姐攔住了他，幾次用手絹按在眼睛上，猛地搖了搖頭。

“好，現在我不象是哭過的了，”她說完這話，就自己開門進去了。

丈夫非常激動，而且好象心慌意亂極了。他向老太太身邊走去；可是，沒走几步就回轉身來，穿過房間，走到教士身邊。教士看了看他，抬起眉毛，仰天嘆了口氣。他那濃密的、花白的大胡子也跟著揚了起來，接著又垂了下去。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說。

“有什么办法呢？”教士叹息著說，他的眉毛和大胡子又都向上揚起，接著又垂了下來。

“而且我岳母也在这儿！”做丈夫的差不多絕望地說。“她可受不了這樣的打擊。要知道，她是多么愛她啊，我簡直不知道有谁象她這樣愛……。神父，您最好想個法子去安慰安慰她，勸她離開這兒。”

教士站起身來，走到老太太身邊。

“真的，沒有人能够懂得做母親的心，”他說，“不過，上帝是仁慈的。”

老太太的臉突然整個抽搐起來，她歇斯底里地打起嗝來。

“上帝是仁慈的，”當她稍微平靜下來以後，教士繼續說道。

“我告诉您，在我的教区里，从前有个病人，比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病要重得多，可是有一个普通的做小买卖的用草药很快就把他治好了。而且那个做小买卖的现在就在莫斯科。我跟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说过，——咱们不妨试试。至少对病人是个安慰。对上帝说来，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她已经没救了，”老太太说。“上帝不把我带走，倒要把她带走。”接着，歇斯底里的呃逆陡然加剧，使她失去了知觉。

病人的丈夫两手捂着脸，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他在走廊里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那六岁的男孩；那男孩正在拚命追赶他的妹妹。

“要不要让我把孩子们带到妈妈那儿去？”保姆问道。

“不，她不愿意看见他们。这会使她伤心。”

男孩站了一会儿，凝神瞧了瞧爸爸的脸，突然噘着蹶子，又兴高采烈地嚷嚷着向前跑去了。

“爸爸，她象匹黑马！”男孩指着妹妹叫道。

同时，在另一个房间里，表姐坐在病人身边，正在用技巧的谈话努力使她对死有个思想准备。医生在另一个窗前调合着药水。

病人穿着宽大的白色晨衣坐在床上，用枕头团团围着，默不作声地瞧着表姐。

“哎呀，亲爱的，”她忽然打断她的话说，“别来给我做思想准备了。别把我当孩子。我是个基督徒。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也知道，要是我丈夫早肯听我的话，那我现在早在意大利了，而且也许，——甚至是毫无疑问，——我已经好了。大家都跟他这么说过。可是有什么法子呢，显然，这是上帝的意旨。我们大家的罪孽都很深重，这一点我知道；可是我相信上帝

的仁慈，人人都会得到宽恕，也许，人人都会得到宽恕的。我要尽力了解自己。我的罪孽也很深重，亲爱的。可是我受了多少苦啊。我一直在拚命忍受我的苦痛……”

“那么，我去叫神父来好吗，亲爱的？您领过圣餐后，一定会觉得好些的，”表姐说。

病人低下了头，表示同意。

“上帝啊！请饶恕我这个罪人吧，”她低声说。

表姐走出去对神父使了个眼色。

“她是一位天使！”她噙着眼泪对病人的丈夫说。

做丈夫的哭了，教士走进了门，老太太还是人事不省，在第一间房间里变得非常安静。五分钟后，教士从门里走了出来，他先取下项巾，然后整理了一下头发。

“谢谢上帝，她现在比较安心了，”他说，“她想看看你们。”

表姐和丈夫走进来。病人正望着圣像低声哭泣。

“亲爱的，祝贺你，”丈夫说。

“谢谢！现在我觉得好多了，我感到多么不可思议的甜蜜啊，”病人说，接着她那薄薄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上帝是多么仁慈啊！不是吗，他是仁慈的和万能的？”于是她又满含泪水，用热切祈求的眼光望着圣像。

后来，她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她示意叫丈夫到她身边去。

“我求你的事，你是从来不肯做的，”她用微弱的、不满的声调说道。

丈夫伸着脖子，恭顺地听着她的话。

“什么事，亲爱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些医生什么也不懂；倒是有些很

平常的女郎中，她们治好了不少人……你瞧，神父就说过……有个做小买卖的……把他找来吧。”

“把谁找来呀，亲爱的？”

“我的上帝！他什么也不愿意懂！……”于是病人皱起了眉头，闭上了眼睛。

医生走到了她跟前，拿起她的手来。她的脉搏显然地越来越微弱了。他对她丈夫使了个眼色。病人看见了这个表情，便吃惊地回头看了看。表姐把脸转过去，哭起来了。

“别哭，别折磨你自己，也别折磨我了，”病人说，“这会夺去我最后的宁静。”

“你真是天使！”表姐吻着她的手说。

“不，吻这儿，只有对死人才吻手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当天晚上，这个病人就成了一具尸体，尸体入殓后，灵柩停放在公馆的大厅里。一个诵经士独自坐在这个关着门的大房间里，用有节奏的鼻音念着大卫的诗篇。明晃晃的烛光从高高的银烛台上投射在死者的苍白的前额上，投射在那双沉重的白蜡似的手上，以及投射在膝盖和脚趾处都可怕地凸起的衾衣上的僵硬的皱褶上。诵经士并不懂得自己念的诗句，只是有节奏地念着，在这个寂静的房间里，那些诗句听起来很怪，接着便静了下来。从那远远的房间里间或传来孩子们说话的声音和他们的脚步声。

“你掩面，他们便惊惶。”诗篇说，“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①

^① 见《圣经·旧约·诗篇》第一〇四篇。

死者的脸是严峻、平静和庄严的。她那洁净冰冷的前额，她那紧闭的嘴唇，都一动也不动。她整个的人都在注意倾听。可是即使在现在，她是否理解这些庄严的词句呢？

四

过了一个月，在那位贵妇的坟墓上建立了一座石头小教堂。那个马车夫的坟上还是没有石碑，只有坟头上长出碧绿的青草，算是一个人过去存在过的唯一标志。

“谢列加，你要是不给赫韦多尔买块碑石，”驿站上的女厨子有一次说，“那你可造孽了。你老是说冬天买，冬天买，可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你还是说话不算数？要知道，这话是当着我的面说。他已经来找过你一次了；你要是不买的话，他还会来，会把你掐死的。”

“什么，难道我能说话不算数吗？”谢列加答道，“我会去买一块碑石的，象我说过的那样，我会买的，我会花一个半卢布去买一块。我没忘，总得把它运回来呀。等我有机会进城，我一定买。”

“我说，你哪怕竖一个十字架也行呀，”一个年老的马车夫插嘴说，“要不然，那就真不应该了。你穿着人家的靴子哪。”

“我上哪儿去弄十字架呢？总不能用劈柴削一个吧？”

“你说什么呀？用劈柴削不出来，你拿把斧子，早早的到小树林去，在那儿做一个不就得了。砍一棵小柁树什么的。不就有个小十字架了。要不然的话，你还得请森林巡查员喝酒。为这么一个破玩意儿，你也不值得请他喝酒。瞧，前几天我弄断了一根木头橇棍，我就去砍了一根新的，挺棒，谁也没说什

么。”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破晓，谢列加就拿起斧子，到小树林里去了。

树林里一切都披着一层灰白色的寒露，没有受到阳光照耀的露水还在滴下。东方刚亮，在那被一层薄云罩着的穹苍上映出它那微弱的光辉。下面连一棵小草，枝头连一片树叶，都一动不动。只是有时候听得见的密林中的鼓翅声或是地面上的沙沙声，打破森林的沉寂。突然，一个奇怪的、不是大自然所有的响声在树林边缘上传开了，接着就消逝了。但是又听到响声，而且在一棵一动也不动的树干周围有节奏地重复着。有一棵树的树顶开始异乎寻常地颤动起来，它那苍翠欲滴的叶子开始低声絮语，接着，栖息在树枝上的一只知更鸟啁啾地叫着飞动了两次，然后，它动着尾巴，飞落在另一棵树上。

斧子在树下发出越来越重浊的响声，多汁的白木片飞落在带露的草上，从砍击声中听到一声轻微的折裂声。那棵树身整个颤动了一下，向一侧倾斜，接着很快又竖直了，紧挨根部惊恐地摇摆着。霎时间一切又归于沉寂，可是那棵树又向一侧倾斜，从它的树干上又发出折裂声，于是，它的树杈折断，树枝下垂，树冠轰隆一声倒在潮湿的土地上。斧声和脚步声都沉静了。那只知更鸟叫了一声，就往更高处飞去。它的翅膀掠过的那枝小树枝儿晃了一会儿，然后，就象别的小树枝一样，连同它的全部叶子都静止不动了。群树在新的开阔的空间以自己的纹丝不动的枝柯越发快乐地显出了自己的美丽。

初升的太阳穿过半透明的乌云，在天空中亮了一亮，接着就照遍了大地和天空。朝雾开始象波浪似地在低谷中升腾飘忽。露水在青青的草木上闪烁、嬉戏，透明的白云在碧空中急速地

向四面八方飞驰。鸟儿在树丛中忙乱着，而且，好象十分激动地在叽叽喳喳叙说自己的幸福；苍翠欲滴的树叶在树梢上快乐而平静地低语着，那些活着的树木的树枝也开始在那棵倒下的死树上面慢慢地、庄严地微微晃动起来。

(1858 年)

芳 信 译

家庭幸福

第一部

一

我们为在秋天去世的母亲服丧，所以整个冬天我都是孤零零地跟卡佳和索尼亚在乡下度过的。

卡佳是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是把我们俩带大的家庭教师，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她，爱她。索尼亚是我的妹妹。我们是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我们的老宅里度过那个阴沉、凄凉的冬天的。天气冷，又刮风，所以积雪堆得比窗子还高；窗户上差不多老结着冰花，透不进光来；整个冬天我们几乎哪儿也没去过，也没乘车出去。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就是有人来，也没有给我们家里增添愉快和欢乐。大家都愁容满面，低声说话，好象生怕吵醒谁似的，也不笑，而且，在看到我，尤其是在看到穿着丧服的小索尼亚的时候，他们老是叹气，常常流泪。家里似乎还蒙着死的阴影；空气中充满了死的悲哀和恐怖。妈妈的房间锁着，每当我去睡觉走过那个房间的时候，总感到害怕，可是又情不自禁地想朝这个阴冷的空房间看上一眼。

我那时候十七岁，就在妈妈去世的那年，她原想搬到城里去，带我进社交界。失去母亲对我是个极大的悲哀，可是我得承认，在这种悲哀后面还有另一种情绪：虽然我年轻美貌，象大家

对我说的那样，可是我在乡村孤寂的生活中又在白白地度过这第二个冬天了。在冬天快要结束时，这种孤独的忧郁感和纯粹的寂寞感便越来越强烈，以至使我懒得走出房门，懒得打开钢琴，懒得拿起书本。每逢卡佳劝我弹弹琴或读读书时，我就回答说：不想动，没兴致，可我心里却在说：为什么呢？既然我最好的时光都虚度了，何必还去做什么事呢？为什么呢？而对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没有别的回答，只有眼泪。

人们说，我在这个时期消瘦了，变得憔悴了，但是甚至对于这一点，我也不在乎。为什么要好看呢？为谁呢？我觉得，我的整个一生本来就应该在这种孤独的偏僻荒凉和孤苦无依的忧郁中度过的，我自己一个人既没有力量摆脱它，甚至也不想摆脱它。在残冬的时候，卡佳为我担心起来，她决定无论如何要带我到国外去。可是这需要钱，而我们几乎不知道，母亲死后，我们还剩下什么，因此我们每天都盼望着那位监护人，他一定会来，并且替我们清理家务。

三月里监护人来了。

“好了，谢天谢地！”有一天，当我没有事，没有思想，没有愿望，象影子似的在房间里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角落的时候，卡佳对我说，“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已经来了；他打发人来问候咱们，要来吃午饭。你得振作起精神来，我的玛舍奇卡^①，”她又说，“要不然，他对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他是非常喜欢你们俩的。”

谢尔盖·米哈伊雷奇是我们的近邻，是我故去的父亲的朋友，虽然他比我父亲年轻得多。除了他的到来会改变我们的计划，并使我们有可能离开乡村之外，我从小一向就爱他和尊敬

^① 玛丽亚的爱称。

他，在卡佳劝我振作起来时，她就猜到，在所有的熟人里面，我最怕在谢尔盖·米哈伊雷奇面前露出于我不利的一面。我除了象家里所有的人（从卡佳和他的教女索尼亚起，一直到马车夫止）那样，爱他是出于习惯之外，对我来说他还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母亲生前曾当着我的面说过一句话，她说，她希望我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丈夫。当时我觉得这话很奇怪，听了甚至很不愉快；我心目中的英雄完全不是这样。我心目中的英雄是个清瘦、苍白而忧郁的人。可是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已经不是个年轻人了，个儿又高又结实，而且，在我看来，永远是高高兴兴的；尽管如此，妈妈的那句话还是印进了我的脑海，甚至在六年前，我十一岁那年，他跟我说话还是你我相称，跟我玩儿，管我叫紫罗兰小姑娘的时候，我有时不无害怕地问我自己：要是他忽然要娶我，那我怎么办呢？

午饭前（卡佳给这顿午饭添了奶油点心和菠菜泥），谢尔盖·米哈伊雷奇来了。我从窗口看见他坐着小雪橇向宅前驶来，可是，他刚一拐弯，我就连忙跑进客厅，想装出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的样子。可是，当我听到前厅里他跺脚的声音、他那洪亮的说话声和卡佳的脚步声时，便忍不住亲自走出去迎接他了。他握着卡佳的手，笑咪咪的，大声说着话。他一看见我，就站住了，瞧了我好一会儿，也没有鞠躬。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我感到脸都红了。

“哎呀！这真是您吗？”他用坚定而又随便的态度说，一面张开两手向我走来。“怎么变化这么大！您真长大了！这哪儿是紫罗兰！您已经是盛开的玫瑰了。”

他用他那只大手握住我的手，握得那么紧，又那么诚恳，不过并不痛。我以为他会亲我的手，所以我就向他弯下腰去，可是

他只是再一次握了握我的手，用他那坚定而愉快的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有六年没有看见他了。他变了很多；显得老了，黑了，还留着和他很不相称的连鬓胡子；可是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他那坦率正直的、浓眉大眼的脸庞、他那对聪明发亮的眼睛以及他那象孩子似的亲切的微笑，还是跟从前一样。

五分钟以后，他就不再象是做客了，而成了我们大家的自己人，甚至是仆人们的自己人了，这从仆人们殷勤的态度可以看得出他们特别欢迎他的来临。

他的举止一点也不象母亲死后来我们的邻居那样：他们认为待在我们家就必须保持沉默和流泪；恰恰相反，他有说有笑，快快活活，而且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母亲，以致这种冷漠起初使我觉得奇怪，而且就这么一位亲近的人来说，甚至是不礼貌的。可是后来我明白了，这并不是冷漠，而是真诚，为了这一点我十分感激他。

到了晚上，卡佳坐在客厅里的老地方，象妈妈在世的时候那样给大家斟茶；我和索尼亚坐在她旁边；老仆格里戈里找到一个爸爸生前用过的烟斗，拿来给他，于是他就象从前那样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真想不到，这个家里会有这么多可怕的变化，”他停下脚步说。

“是呀，”卡佳叹了一口气说，接着，盖上了茶炊盖，瞧了瞧他，她真想放声大哭。

“我想，您还记得您父亲吧？”他转身对我说。

“不大记得了，”我答道。

“你们现在要是和他在一起，那该多好啊！”他轻声说，一面

沉思地望着我的前额。“我非常爱您父亲!”他用更低的声音说,我觉得他的眼睛变得更亮了。

“可现在上帝又把她带走了!”卡佳说,她立刻把餐巾放在茶壶上,掏出手绢,哭了起来。

“是的,这个家里起了可怕的变化,”他扭过脸去重复说。“索尼亚,把你的玩具给我瞧瞧,”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说了就走到大厅里去了。他走出去以后,我用噙满泪水的眼睛瞧了瞧卡佳。

“他真是个非常好的朋友!”她说。

真的,这位非亲非故的好人的同情使我感到温暖和安慰。

从客厅里传出索尼亚的尖叫声以及他跟她玩的笑语声。我叫人把茶给他送去;接着,我就听见他在钢琴前坐下,把着索尼亚的小手按起琴键来。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传来了他的声音。“到这儿来弹点什么吧。”

我喜欢他这样随便地、友好而略带命令式地跟我说话;我站起来,走到他那儿去了。

“就弹这个吧,”他打开了贝多芬的乐谱,指着 *quasi una fantasia*^① 奏鸣曲的柔板说。“我们来听听您弹得怎么样,”他又加了一句,就端着茶杯走到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我没法拒绝或是事先声明我弹得不好;我顺从地在钢琴前坐下,接着就尽我所能地弹了起来,虽然,我怕他批评,因为我知道他懂得而又爱好音乐。柔板很适合我们喝茶时谈话所引起的那种回忆的情调,而且我似乎

① 意大利语:恰如一支幻想曲。

弹得不错。可是他不让我弹谐谑曲。“不，这个您弹不好，”他走到我跟前说，“别弹这个，第一乐章弹得不坏。您好象懂得音乐。”这个恰如其分的赞语使我高兴得脸都红了。我感到新鲜而愉快的是：他，我父亲的朋友和平辈，在我们两人单独谈话的时候，不再象从前那样把我当孩子看待，而是很认真地跟我说话。这时，卡佳上楼去安排索尼娅睡觉，客厅里只剩下了我们俩。

他对我谈起我父亲，谈起他怎样跟他成为朋友，当我还在念读本和玩玩具的时候，他们又是怎样在一起愉快地生活的；从他的叙述中，在我脑海里头一次出现了父亲这个人的平易近人的、可爱的形象，这是我在以前所不知道的。他还问我喜欢什么，看什么书，打算做什么，而且还给我出主意。现在，对我来说，他已经不是个爱逗我、帮我做玩具、爱逗乐的人了，而是个又严肃、又平易近人、又多情的人，我不知不觉地对他产生了敬意和好感。跟他说话时，我感到轻松、愉快，同时又觉得有一种不自觉的紧张。我为我说的每一句话担心；我非常希望，仅仅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已经获得的他的爱，现在能凭我自己本人来赢得。

卡佳安排索尼娅睡下以后，就来加入我们的谈话；她对他抱怨说我整天无精打采，而关于这事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

“原来她没有把最主要的事情告诉我，”他笑咪咪地、责备地对我摇摇头说。

“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说，“这是很无聊的，而且就会过去的。”（这会儿我真的觉得不仅我的苦闷会过去，而且它已经过去了，甚至它从来就不曾有过。）

“一个人不会忍受孤独是不好的，”他说，“难道您是位小姐吗？”

“当然我是小姐，”我笑着答道。

“不，一个不好的小姐，只是在有人欣赏她的时候，她才生气勃勃，等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就无精打采了，而且她感到什么都不如意；她活着只是为了让别人欣赏，而对于她自己，什么都无所谓。”

“您对我的看法真不错呀，”为了找话说，我这样说道。

“不！”他沉吟了片刻又说，“难怪您象您父亲，您也是这样，”他那亲切的注视又使我感到得意，并且使我感到愉快的羞涩。

只有在这会儿，我才发现，在他那高高兴兴的脸给人的最初印象后面，只有他一个人所独有的眼神——最初是开朗的，然后越来越深沉，而且有点儿忧伤。

“您不应该也不能烦闷，”他说，“您有您懂得的音乐，有书，还可以学习，您的整个生活都摆在您的面前，只有现在为它做好准备，将来才不至于后悔。一年以后就太晚了。”

他跟我说话就象父亲或叔父似的，而且我感到，为了和我显得象平辈一样，他在不断地约束自己。我感到又气又高兴，气的是他把我看得比他低，高兴的是，就只为我一个人，他认为须要做得和他本人不一样。

晚上其余的时间，他跟卡佳谈家务。

“好，亲爱的朋友们，再见，”他说时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

“咱们什么时候再见呢？”卡佳问道。

“春天，”他答道，继续握住我的手，“现在我要上达尼洛夫卡去（我们家的另一个村子）；到那边去了解一下情况，尽可能地安排一下，然后去莫斯科——办点私事，到夏天，咱们就可以常常见面了。”

“干吗您要去这么久呢？”我非常忧郁地说；说真的，我希望

每天都能看见他，而且我突然觉得既惋惜又害怕，怕我的苦闷会再来。可能这一点在我的目光和声调中都表现出来了。

“是的；您要多找点事情做，别发愁，”他说，他的声调在我听来是过分冷漠而又平淡。“等到春天，我要来考您，”他松开我的手，也不瞧着我，又加了一句。

我们站在前厅里送他，他匆匆地穿上皮大衣，目光还是避开我。“他这又何必呢！”我想。“难道他以为，他瞧着我，我心里就会那么高兴吗？他是个好人，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只此而已。”

可是当天晚上，我和卡佳很久都没睡着，一直在谈话，不是谈他，而是谈我们怎样度过今年的夏天，在哪儿过冬和怎样过冬。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呢？——已经不再在我脑海里出现。我觉得非常简单明了，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而且在我的想象中未来更是充满了幸福。我们这个在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古老阴森的家也好象突然变得生意盎然，充满了光明。

二

转眼之间，春天来了。我原先的苦闷过去了，替代它的是充满幻想的春天的惆怅，勾引起朦胧的希望和期待。虽然我的生活不象初冬那样，而是，教索尼亚读书，自己弹弹琴，看看书，还常常到花园里，独自在小径上久久地徘徊，或是坐在凳子上，天知道在想什么，期待什么和希望什么。有时候整夜整夜，尤其是月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凭窗坐到黎明，有时候我只穿一件短上衣，瞒着卡佳，悄悄地溜到花园里，踏着露水跑到池塘边，有一次我甚至走到田野里，独自在夜里沿着整个花园绕了一圈。

现在我很难回忆和理解当时充满在我想象中的那些梦想。

就是我想起来了，我也难于相信，这就是我的梦想。它们是那么奇怪，又那么远离现实。

五月底，谢尔盖·米哈伊雷奇旅行后如期回来了。

第一次他是傍晚来的，那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来。我们正坐在凉台上准备喝茶。花园里已是一片葱绿，夜莺已经在茂密的花坛中筑了巢，在圣彼得节^①前的整个斋戒期一直住在这儿。一丛丛枝叶纷披的丁香，好象从顶上洒了一层白色和紫色的东西。这是快开花了。林荫道上的白桦树叶在落日的斜晖中全变得透明了。凉台上绿影婆娑。草地上一定落满了浓重的晚露。从花园外面传来白日的余音——赶牲口的嘈杂声；小傻瓜尼康正驾着水车在凉台前的小径上来来去去，从喷水车喷出一股冰冷的水在大丽花茎和支架周围掘松的泥土上溅出了一个个黑圈。在我们的凉台上，擦得锃亮的茶炊在白桌布上闪闪发光、沸腾着，桌上放着鲜奶油、小甜面包和饼干。卡佳用那双胖乎乎的手象主妇那样在洗茶杯。我洗过澡，觉得饿了，等不及喝茶，拿起一块涂了一层厚厚的鲜奶油的面包就吃起来。我穿着阔袖的粗麻布短衫，湿头发上包着手巾。卡佳隔着窗子第一个看见了他。

“啊！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她说，“我们刚才还谈到您哩。”

我站起来，想去换衣服，可是我刚走到门口，他就看见我了。

“在乡下何必那么客气，”他瞧着我头上的手巾笑咪咪地说，“您在格里戈里面前并没有不好意思，而我呢，真的，对您来说，就跟格里戈里一样。”可是就在这会儿，我觉得他看着我的那副神情，一点也不象格里戈里看我时那样，因此我感到很窘。

“我马上就来，”我说着就离开了他。

^① 圣彼得节在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这样有什么不好呢！”他在我后面大声说，“真象个农村的小媳妇。”

“他看着我的那副神情真奇怪，”我在楼上急忙换衣服时这么想道。“不过，谢天谢地，他总算来了，又可以热闹些了！”我照了照镜子，就快活地跑下楼来，而且我毫不掩饰我的着忙，我喘吁吁地跑上了凉台。他正坐在桌旁对卡佳讲我们的家事。他瞧了瞧我，笑了笑，又继续说下去。据他说，我们家的情况还挺好。现在我们只要在乡下住过夏天，然后，为了索尼亚的教育，或者上彼得堡去，或者到国外去。

“您要是能和我们一块儿到国外去就好了，”卡佳说，“要不然，就我们三个人，在那儿什么也不懂。”

“哎！我倒真想和你们一起去周游世界，”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那有什么，”我说，“咱们就一起去周游世界好了。”

他笑笑，摇摇头。

“那么我妈妈怎么办？我的事又怎么办？”他说。“不过重要的不是这个；您说说，您这一向过得怎么样？难道又无精打采的了？”

我告诉他说，他走了以后我很用功，也没烦闷过，加上卡佳又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他就夸奖我，把我当做孩子，用言辞和目光表示赞许，好象他有这样做的权利似的。我觉得有必要详详细细地、非常真诚地把我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告诉他，而且象做忏悔似地承认了他可能不满意的一切。暮色美极了，因此在茶具撤走以后，我们还待在凉台上，同时我觉得谈话非常有趣，我甚至没有觉察，我们周围的人声是怎样逐渐静下来的。从各处飘来了更加浓郁的花香，草上沾满了浓露，有一只夜莺在附近的

丁香丛中歌唱，它听到我们的声音后，便停下了；星空好象要低垂到我们头上来了似的。

有一只蝙蝠突然悄无声息地飞到凉台的帆布篷下，在我的白头巾周围拍着翅膀，这时我才发觉天已经黑了。我紧贴着墙，差点大叫起来，可是那只蝙蝠又悄无声息地、很快地从遮阳下飞走了，消失在花园的苍茫的暮色中。

“我真喜欢你们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他中断了谈话，说道。“我要是能坐在这个凉台上就这样过一辈子该多好。”

“那有什么，您就坐吧，”卡佳说。

“是呀，坐好了，”他说，“可是生活是不会坐着不动的。”

“您为什么不结婚呢？”卡佳说。“您会是个很好的丈夫。”

“就因为我喜欢坐着，”他笑了。“不，卡捷琳娜·卡尔洛夫娜，^①咱们俩都不能结婚了。人们早就不认为我是个能结婚的人了。而我自己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这样很好，真的。”

我觉得他说这些娓娓动听的话有点不自然。

“好嘛！一个三十六岁的人就已经老了，”卡佳说。

“真是老了，”他继续说，“就想坐着。如果要结婚，这样就不行。您不信问问她吧，”他冲我点点头，这么补充说。“象她这样年龄的人才应该结婚。咱们只好看着他们幸福而感到高兴。”

他声调中含有的忧伤和紧张瞒不过我。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和卡佳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瞧，”他在椅子上回过头来，继续说，“假如我因为某种不幸的机会突然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比方说娶了玛莎……娶了玛丽亚·亚历山大罗芙娜。这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很高兴有

^① 卡佳的本名和父名。

这样的结果……而且这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笑了，可是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高兴，这样的结果又是什么……

“好，请您十分坦白地老实说吧，”他象开玩笑似地对我说，“要是让您把自己的一生和一个老人，一个只想坐着的、衰老的人结合在一起，而天知道当时您心里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和需要什么的时候，难道这对您不是不幸吗？”

我感到怪不好意思的，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要知道，我并不是在向您求婚，”他笑着说，“不过，请您说实话，当您傍晚独自在林荫路上散步的时候，您所梦想的恐怕不是这样的丈夫吧；这将是不幸，不是吗？”

“不是不幸……”我开口道。

“嗯，而是不好，”他接着把话说完。

“是的，不过，也许我错了……”

可是，他又把我的话打断。

“您瞧，她说得完全对；我很感谢她的坦率，同时也很高兴我们能这样交谈。不仅这样，对我来说，这也是最大的不幸，”他补充说。

“您真是个怪人。一点也没变，”卡佳说，接着她就离开凉台，去吩咐开晚饭了。

卡佳走后，我们俩都沉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是那只夜莺不再象傍晚时那样时断时续、犹豫不决地歌唱，而是象夜间歌唱时那样，不慌不忙、婉转从容地叫了起来，整个花园都洋溢着它那嘹亮的歌声，于是另一只夜莺便从远处的低谷里今晚头一次与它应和。近处的这只夜莺停止了歌唱，好

象倾听了一会儿，然后就用倾泻而出的银铃般的颤音，更高亢、更嘹亮地歌唱起来。这一唱一和的啼啭，庄严地、从容不迫地掠过了这个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鸟类的夜的世界。园丁到花房里去睡觉了，他那穿着厚皮靴的脚步声在小径上越来越远了。有人在山麓下尖声打了两次唢哨，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只隐约地听见树叶摇曳的飒飒声和凉台上帆布篷啪嗒啪嗒的响声；一阵在空中飘忽的幽香送到凉台上，使凉台上充满了芬芳。在刚才说过那些话以后，我觉得沉默使人难堪，可是该说什么，我又不知道。我瞧了瞧他。他那对炯炯发光的眼睛在半明半暗中回过来打量着我。

“生活在世上真是太好了！”他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叹了口气。

“怎么？”

“生活在世上真是太好了！”我重复他的话说。

于是我们又沉默了，我又开始感到窘迫。我心里老在想，我同意他的说法，说他老了，因而刺伤了他，我想安慰他，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好。

“还是再见吧，”他站起来说，“妈妈等着我吃晚饭。今天我差不多还没见着她呢。”

“我想给您弹一支新的奏鸣曲，”我说。

“下回吧，”他说；我觉得他的声调冷冰冰的。

“再见。”

这时候我更觉得我是刺伤了他，我觉得很遗憾。我和卡佳送他下了台阶，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瞧着他在大路上消失。当他的马蹄声听不见了的时候，我就绕了一圈走上凉台，又开始望着花园，在充满了夜的声息的带露的雾霭中，我又看到和听到了我

想要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他来了第二次,第三次,由于过去我俩之间的奇怪的谈话所引起的窘迫之感完全消失了,而且也没有再发生过。整个夏天,他每星期来看我们两三次;我对他已经非常习惯。要是他有些日子不来,我就觉得一个人待着怪别扭的,而且我会生他的气,认为他扔下我不管,这样做很不好。他对待我象对待一个他所喜欢的年轻朋友似的,向我问长问短,要求我的最真诚的坦率,给我劝告和鼓励,有时候还责备我和制止我。虽然他尽力和我保持平等的地位,可是我却觉得在我所能理解他的那一部分后面,还有一个他认为没有必要让我进去的完全陌生的世界,正是这一点最有力地保持了我对他的尊敬和他对我的吸引力。我从卡佳和邻居们那儿知道他不但要照顾和他住在一起的老母亲,不但要料理自己的产业和代管我们的财务,而且还担负某些给他带来许多麻烦的贵族的事务;可是他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他的信念、计划和希望是什么,我从他嘴里始终没有听说过。只要我把话题转到他所做的事务上,他就会以他自己特有的表情皱紧眉头,好象在说:“请别问了,这与您无关,”——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起先这使我很生气,可是后来,我也就习惯了,我们总是只谈与我有关的事,而且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还有一件事情起初使我不快,可是后来反而使我高兴,那就是他完全漠不关心,甚至好象根本不把我的外貌放在眼里。他从来不用目光或是言辞对我暗示说我长得美,相反,每逢有人在他面前管我叫美人儿的时候,他就皱着眉头发笑,他甚至喜欢找我外貌上的缺点,拿这些缺点来逗我笑。逢到节日,卡佳爱给我穿上漂亮的衣服,梳上流行的发式,这只能引起他的嘲笑,这使善良的卡佳很伤心,起初把我也弄得莫名其妙。卡佳心里认定

他喜欢我，可是她怎么也不明白，怎么能不喜欢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显得漂漂亮亮的呢。我很快就懂得了他的想法。他希望我不要矫揉造作。而当我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在服装上、发式上和举止上，真的连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也没有了；可是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无法掩饰的做作的质朴。其实那时我还不能做到单纯质朴。我知道他爱我，——至于他是把我当作孩子还是当作女人来爱呢，我还没有问过自己；我重视这种爱，并且感到他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因此我就不能不希望，这种错误的看法能够继续留在他的心里。而我也就不由自主地在骗他。不过由于要骗他，我自己反变得更好了。我感到，在他面前显示我的心灵的优点，比显示我的外形的美更好，更有价值。我的头发、手、脸、习惯，无论这一切是好是坏，我觉得他立刻就能给予评价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我除了想欺骗他以外，不能给我的外表增添任何东西。可是我的心灵是他不知道的；因为他爱我的心灵，因为它当时正在成长和发展，所以在这方面，我能骗他，而且果然骗了他。当我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我觉得和他相处是多么轻松啊！我那些毫无理由的羞涩和举止的拘谨就完全消失了。我觉得不管是从正面还是侧面，坐着还是站着，他都能看见我，我的头发朝上梳还是朝下梳，——我的这一切他都知道，而且我感到他对我的模样很满意。要是他违背自己的习惯，突然象别人那样对我说，我的脸长得很美，我想我甚至丝毫也不会觉得高兴。可是，当他在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以后，仔细端详着我，用一种很感动而又竭力装作开玩笑的声调说：“不错，不错，您也是这样。您是个非常好的姑娘，这一点我必须告诉您。”那时候，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多么快活啊！

那么究竟为了什么我会得到这种使我心里充满骄傲和喜悦

的赞许呢？就因为我说，我很能体会老格里戈里对自己小孙女的爱，或者因为我读了首诗或是小说感动得流泪，或是因为我喜欢莫扎特甚于舒尔霍夫^①。使我想起来都觉得诧异的是：当时我以一种非凡的直觉猜出了什么是好的和应该爱什么；尽管我当时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和应该爱什么。我以前的习惯和趣味多半不合他的心意；只要他的眉毛一动或是眼珠一转，表示他不喜欢我想要说的话，而且我觉得，只要他脸上一现出他那特别的、埋怨的、有点儿不屑一顾的神色，我就马上不再喜欢我以前所喜欢的东西了。有时候，他刚要给我什么劝告，我好象就知道了他要说什么。当他瞧着我的眼睛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的目光就能从我的心里引出他所想要的那种思想。当时所有我的思想和感情都不是我的，而是他的思想和感情突然变成了我的，进入到我的生活中，照亮了它。我完全不知不觉地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一切：看卡佳，看我们的仆人们，看索尼亚，看我自己以及我的学业。书籍，以前我只是为了消愁解闷才读的，现在忽然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的快乐；这只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谈论书，在一起看书，而这些书又是他带给我的缘故。以前给索尼亚上课对于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只是由于责任感才把它勉强承担起来；可是，在他听我给索尼亚上了一堂课以后——注意索尼亚的进步对我就变成一种快乐。以前我觉得要把整篇乐曲背下来是件不可能的事；可是现在，当我知道他也许会听，会赞赏，我就会把一个乐句连弹四十次，直到可怜的卡佳用棉花堵上耳朵，而我还是不感到厌烦。从前那些同样的奏鸣曲现在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情趣，弹得完全不同而且好多了。就连我象

① 舒尔霍夫(1825—1898)，捷克钢琴家和作曲家，他曾将莫扎特、贝多芬和海顿的作品改编成钢琴曲，而本人并无任何值得称道的作品传世。

对自己那样了解而喜爱的卡佳，在我眼里也变了样。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她根本没有义务象她一向做的那样做我们的母亲、朋友和奴婢。我懂得了这个慈爱的人儿的全部自我牺牲和忠诚，懂得了我所仰仗于她的一切，而且变得更爱她了。他还教会了我用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仆人、农民、家奴和使女。说来可笑，虽然我在这些人中间生活了十七年，可是我对他们的了解比对我从未见过的外人还要少；我一次也没想到过他们跟我一样，也有爱情、愿望和烦恼。我很久以前就熟悉的我们的花园、我们的小树林、我们的田野，现在忽然在我眼前变成又新鲜又美丽的东西了。难怪他说人生只有一种确凿无疑的幸福——就是为别人而生活。当时我觉得这话很奇怪，我也不理解它的意思；可是，这个信念没有经过思索就进到我的心里。他并没有改变我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除了他自己以外，也没有给我的每种印象增添任何东西，却为我打开了眼前整个欢乐的新生活。从小就在我周围默不作声的一切，只要他一来，同样的这一切就会说起话来，争先恐后地涌进我的心里，使它充满了幸福。

在这个夏天，我常常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床上，萦绕在我心头的已不是从前那种对未来怀着向往与希望的春愁，而是对现在的幸福的不安。我睡不着，就起来坐到卡佳的床上，告诉她我非常幸福，其实，我现在想起来，这些话完全没有必要对她说，因为她自己能看到这一点的。可是她对我说：她什么也不需要，她也很幸福，接着她就亲亲我。我相信她的话——我觉得使人人都幸福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但是卡佳也许想到应该睡觉了，于是便假装生气，有时甚至把我从她床上赶走，然后就入睡了；而我却还要久久地逐一思索着使我如此幸福的一切。有时候，我便起来再次祷告上帝，用自己的话来祈祷，感谢上帝赐

给我的一切幸福。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卡佳在睡梦中的均匀的呼吸声和她床旁的钟的滴答声，我辗转不能入睡，低声祷告，画十字，或是亲吻挂在我脖子上的十字架。门关上了，百叶窗也关上了，一只苍蝇或是蚊子，老在什么地方嗡嗡叫着。我真想永远不走出这个房间，希望黎明不要来临，希望环绕在我周围的这种心情不要消散。我觉得我的梦想、思想和祈祷都是活的东西，它们就在黑暗中和我生活在一起，在我的床旁飞翔，停留在我的上面。而且每个思想都是他的思想，每个感情都是他的感情。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我以为它也许永远就是这样，这种感情得来这么容易。

三

一天，在割麦子的时候，吃过午饭，我和卡佳带着索尼娅到花园里我们喜欢坐的那条长凳那儿去，长凳放在菩提树荫下，下面是峡谷，峡谷后面展开了一片森林和田野的景色。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已经有三天没有看我们了，这一天我们正盼着他来，再加上我们的管家说过，他答应到地里来看看。一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看见他骑着马走过黑麦地。卡佳笑咪咪地看了我一眼，叫人拿来他非常爱吃的桃子和樱桃，然后她就躺在长凳上打盹儿。我折了一枝弯曲扁平的菩提树枝，枝上多汁的树叶和多汁的树皮把我的手都弄湿了，我一面用它给卡佳扇着，一面继续看书，并且不断地抬起头来瞧着他来时必经的那条田间小路。索尼娅在一棵老菩提树的树根旁给布娃娃搭亭子。天气闷热，没有风，热气蒸人，乌云密集，颜色越来越黑，从早上起就象要有雷雨。我很不安，在暴风雨之前我一向这样。可是午后，乌云开始

从边上渐渐散开，太阳浮上了晴朗的天空，只有在一处地方还有隐隐的雷声，地平线上有一片浓密的乌云，与田野上的尘土连成一色，这里还偶尔有苍白的闪电劈开云层，射向地面。显然，今天不会有雷雨，至少我们这儿不会有了。在有些地方看得见的花园对面的路上，时而有一辆辆堆着高高的麦捆的大车慢慢地走着，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时而有几辆空车轧轧响着，迎着它们疾驰而去，车上一双双的脚在晃动，衬衫在飘动。浓密的尘埃既不消散，也不落下，而是滞留在从园中透明似的树叶间可以看见的篱笆外面。从更远的打谷场上，传来同样的说话声和同样的车轮的轧轧声；装在大车上慢慢地经过篱笆旁运去的同样金黄色的麦捆，正在那儿的空中飞扬，接着在我眼前出现一个个椭圆形的麦堆，出现了麦堆的尖顶，以及顶上蠕动着农民。前面，在尘土弥漫的田里，也有大车在移动，也看得见同样的金黄色的麦捆，同样的从远处传来了车声、人声和歌声。从一边望去，是一片越来越开阔的麦茬地和一条条长满了蒿草的田垅。稍右一点的山坡下，在割掉麦子、显得零乱难看的地里，可以看见穿着鲜艳衣服的农妇们正弯着腰、挥动着胳膊在捆麦子，零乱的田地被拾掇干净了，地里密密地摆着美丽的麦捆。在我眼前，夏天好象突然变成了秋天。除了花园中这块我们喜爱的地方以外，到处都是尘土和炎热。在这尘土和炎热中，在似火的骄阳下，劳动的人们谈着，嚷着，忙碌着。

卡佳却在我们的荫凉的长凳上用白麻纱手绢盖着脸，不时发出香甜的鼾声；鲜亮的黑樱桃在盘子里发光，我们的衣服是那么凉爽，那么清洁，水杯里的清水在太阳下闪烁着虹彩，我是多么幸福啊！“怎么办呢？”我这样想道。“我幸福难道有什么不好吗？可是怎样同别人分享这种幸福呢？我把整个我自己和我的

全部幸福献给谁呢，又怎么献法呢？……”

太阳已经西沉到林荫道上的白桦树梢后面去了，尘土渐渐飘落在田野上，远方在斜晖中显得更分明，更明亮了，乌云也全散了，从树丛间可以看见打谷场上的三个新麦垛的尖顶，农民们已经从麦垛上下来了；人们在上面大声吆喝着的大车大概是最后一次疾驰而过；扛着耙、腰上系着草绳的农妇们大声唱着歌回家去了，而谢尔盖·米哈伊雷奇还是没有来，虽然我早就看见他骑着马下山了。突然，在林荫道上，从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会从那儿来的方向，出现了他的身影（他是绕过峡谷来的）。他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摘下了帽子，快步向我走来。看见卡佳睡着了，他就咬着嘴唇、眯着眼睛、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我马上就看出他处于一种特别的、无缘无故的欢乐的心情中。我一直非常喜欢他的这种心情，我们管它叫做“狂喜”。他象个逃学的小学生似的；他整个的人，从头到脚，都流露出一一种满足、幸福和孩子般的淘气的神情。

“嗯，您好，小紫罗兰，您怎么样？好吗？”他一面低声说，一面走到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我好极了，”他回答我的问话说，“我今年十三岁；我想骑木马，想爬树。”

“又在狂喜了？”我说时瞧着他那双含笑的眼睛，我感到这种狂喜也感染了我。

“是的，”他答道，对我挤挤眼，忍着笑。“可是，您干吗要打卡捷琳娜·卡尔洛夫娜的鼻子呢？”

我一面瞧着他，一面继续扇着树枝，不留神把卡佳脸上的手绢扇掉了，于是树叶就拂着了她的脸。我笑了起来。

“她会说她没睡着，”我低声说，好象是为了不要吵醒卡佳；其实完全不是为此，我不过是喜欢跟他低声说话罢了。

他学我的样，动着嘴唇，好象我说话的声音太低，他什么也听不清。一看见那盘樱桃，他就假装偷偷地端起盘子，走到菩提树下索尼娅跟前，在她的布娃娃上坐下。索尼娅起初很生气，可是他很快就跟她和好了，和她比赛吃樱桃，看谁吃得快。

“您要是喜欢，我就叫人再拿点儿来，”我说，“要不然，咱们就自己去。”

他端起盘子，把布娃娃放在盘子里，然后，我们仨便向板棚走去。索尼娅笑着跟在我们后面跑，拉着他的大衣，要他把布娃娃还给她。他把布娃娃还给了她，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喂，您怎么不是紫罗兰呢，”虽然不用担心吵醒任何人，可是他还是低声跟我说，“经过这番尘土、炎热和劳动之后，刚一走近您，就闻到一股紫罗兰的芬芳。不过，这并不是浓香扑鼻的紫罗兰，您知道，这是初放的紫罗兰，还是深色的、发出融雪和春草的香气的紫罗兰。”

“嗯，怎么样，收割进行得顺利吗？”为了掩饰他的话在我心里引起的快乐的激动，我这样问道。

“好极了！这儿的老百姓干什么都好极了。你越了解他们，就越爱他们。”

“是呀，”我说，“今天在您没来以前，我在花园里瞧着他们干活，我突然感到非常惭愧，他们在干活，而我却这么舒服，而且……”

“别矫情了，我的朋友，”他打断了我的话，突然用严肃而亲切的目光瞧了我一眼，“这是个神圣的问题。千万别说这种漂亮话。”

“我只是跟您这么说。”

“嗯，这我知道。嗯，樱桃怎么办？”

板棚的门锁着，一个园丁也没有（他把他们都打发去干活了）。索尼娅跑去取钥匙，可是他不等她回来就从墙角爬上去，撩起网，跳到里面去了。

“想要吗？”从墙那边传来他的声音。“把盘子给我。”

“不，我要自己摘，我去拿钥匙，”我说，“索尼娅找不着……”

可是同时，我又很想瞧瞧在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的时候他在那儿干些什么，他的神情怎么样，他的动作又怎么样。再说，这时我简直不愿意有一分钟不看见他。我踮起脚从荨麻中穿过，跑到板棚的另一边，那儿的墙比较矮，我站在一只空木桶上，墙头刚好齐到我的胸口下面，我探身到板棚里，朝里面张望了一下，看见那几棵长着齿形大叶的弯曲的老树，叶子下挂着一串串沉甸甸的饱满的黑樱桃，然后，我从网底下伸过头去，在一棵老樱桃树的节节疤疤的大树杈下，看见了谢尔盖·米哈伊雷奇。他大概以为我走了，没有人看见他。他摘下帽子，闭着眼睛坐在一棵老樱桃树的树杈上，使劲把一块樱桃树上的树胶团成一个小球。突然他耸耸肩，睁开眼睛，嘴里说了句什么，笑了笑。那句话和那种笑都不象他平时那样，因为我偷看了他，我感到非常害臊。我觉得那句话是：“玛莎！”“这不可能，”我心里想。“亲爱的玛莎！”他用更低更温存的声音重复说。可是我已经清清楚楚听见了这几个字。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而且那样一种令人激动的、好象是违禁的欢乐猛然攫住了我，我用两手紧抓着墙，免得掉下去暴露了自己。他听见了我的动静，吃惊地回头瞧了瞧，突然垂下了眼睛，象孩子似的脸都红了，发紫了。他想跟我说什么，可是说不出来，他的脸又一阵阵地发红。但是他瞧着我微微一笑。我也笑了。他满脸都焕发出快乐的光彩。他已经不是那位又疼我又训我的年长的叔叔了，他是我的平辈，他是个又爱我又怕我

的人，我也又怕他又爱他。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四目对视。可是他突然皱紧了眉头，微笑和眼睛里的光辉消失了，他又象父辈那样冷冷地对待我了，好象我们做了什么错事，而他已醒悟过来，并劝我也要醒悟过来似的。

“您还是下来吧，会摔伤的，”他说。“把头发理理好，瞧您象个什么样子。”

“他为什么要装假呢？他为什么要使我痛苦呢？”我苦恼地想道。而且就在这一瞬间，我起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欲望，想再一次扰乱他的平静，并在他身上试试我的力量。

“不，我要自己摘嘛，”我说完这句话，就双手抓住最近的一个树杈，纵身跳上了墙头。他还没来得及扶住我，我就跳进板棚，到了地上。

“您真是胡来！”他说时脸又红了，并且装出生气的样子，极力掩饰自己的窘态，“要知道，您会摔伤的。您从这儿怎么出去呢？”

他比刚才更窘了，可是现在这种窘态已经不是使我高兴，而是使我感到害怕了。它感染了我，我的脸也红了，为了避开他的眼光，又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就开始摘樱桃，可是摘了又无处放。我责备自己，我后悔，我害怕，而且我觉得，我的这种举动在他眼里永远把自己毁了。我们俩都默不作声，都感到难过。幸亏索尼亚拿着钥匙跑来了，才使我们摆脱了这种窘境。这以后我们彼此有好半天没说话，两人都只跟索尼亚说话。我们回到卡佳跟前时，她告诉我们，她一直没有睡，什么都听见了，我这才平静下来，于是他又极力做出那副慈父般的保护人的态度，可是他已经装不象了，也骗不了我。这时候，我清楚地想起了几天前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

卡佳说，恋爱和表白爱情，男人比女人要容易些。

“男人可以说他爱上了谁，可是女人却不行，”她说。

“可是，我觉得，男人不应该，也不能说他爱上了谁，”他说。

“为什么呢？”我问道。

“因为这从来都是谎言。一个人爱上了谁，这有什么稀奇呢？好象只要他说出爱这个字，就会有有什么啪的一响——他恋爱啦。好象只要他一说出这个字，就一定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一定要出现什么预兆，要万炮齐鸣似的。我觉得，”他接着说道，“凡是郑重其事地说‘我爱您’这句话的人，不是欺骗自己，甚至更糟的是欺骗别人。”

“要是男人不对女人说，她怎么会知道人家爱她呢？”卡佳问道。

“这我就知道了，”他答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表达方法。要是感情，它就会表现出来。我看小说的时候，我老是想象当中尉斯特列利斯基或是阿尔弗雷德说：‘埃列奥诺拉，我爱你！’时，他们脸上的窘相应是什么样的；他以为将会突然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可是她和他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们的眼睛、鼻子和一切还是跟原来一样。”

当时我已经从这个玩笑里感到一种和我自身有关的、严肃的事，可是卡佳不允许随便拿小说中的主人公开玩笑。

“老是发这种谬论，”她说。“您还是说实话吧，难道您自己就从来没有对女人说过您爱她吗？”

“从来没说过，也从来没有屈膝下跪过，”他笑着答道，“而且将来也不会。”

“是的，他用不着对我说他爱我，”这会儿我清清楚楚地记起了那次谈话，心里想道。“我知道他爱我。他那竭力装出来的冷

淡也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那天，整个晚上他都不大跟我说话，可是从他对卡佳和索尼亚所说的每句话，以及他的每个动作和眼神里，我都看到了爱，而且对此深信不疑。不过我既怨他又可怜他，既然一切已经这么明显，这么简单而且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无限幸福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自己的感情，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呢？可是刚才我跳进板棚去找他这件事，就象一桩罪行似的使我感到痛苦。我总觉得，为了这件事他再也不会尊重我了，他会生我的气。

喝过茶，我向钢琴走去，他跟在我后面。

“弹点什么吧，我很久没听您弹琴了，”他在客厅里追上了我，说道。

“我正想弹呢……谢尔盖·米哈伊雷奇！”我说时猛然直视着他的眼睛。“您没有生我的气吧？”

“为什么？”他问道。

“因为今天下午我没有听您的话，”我说时脸都红了。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摇摇头，笑了笑。他的目光似乎在说，本来是应该骂的，但是又不忍心骂我。

“就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咱们还是好朋友，”我一面说，一面在钢琴前坐下。

“可不是吗！”他说。

在高大的花厅里，只有钢琴上点着两支蜡烛，其余的空间都是半明半暗。夏夜的光辉从开着的窗口透进来。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有从黑沉沉的客厅里有时传来卡佳的脚步声，还有他那匹拴在窗下的马在打响鼻和马蹄踩踏牛蒡的声音。他坐在我后面，所以我看不见他；可是在这个房间的幽暗中，在种种声响里，在我自己的心中，我处处都感到他的存在。我虽然看不见他的

每个眼神、每个动作，但它们都在我心里激起反响。我在弹莫扎特的一支幻想曲，乐谱是他给我带来的，我是在他面前而且为了他才把这支曲子学会的。我根本没有想我在弹什么，可是我似乎弹得很好，我觉得他很喜欢。我感到了他所感受到的快乐，也感到了他那从后面对我的凝视，虽然我并没有看他。我的手指机械地继续弹着，我完全不由自主地回头瞧了瞧他。在夜色的明亮的背景上他的头部的轮廓显得更清晰了。他双手托着头坐着，他的炯炯发光的眼睛凝视着我。一看到这种目光，我就笑了，不再弹了。他也笑了，责备地对着乐谱摇摇头，要我继续弹下去。当我弹完了的时候，月亮已经高高地升起，也更明亮了，屋里除了微弱的烛光以外，还有一道银色的清辉从窗口射到地板上。卡佳说我真不象话，因为我弹到最精彩的地方停住了，还说我弹得不好；可是他却说，正相反，我从来没有弹得象今天这样好过；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穿过大厅走到黑沉沉的客厅里，然后又回到大厅里来，每次都回头瞧瞧我，笑笑。我也笑笑，我甚至想无缘无故地放声欢笑；对于今天刚发生的那件事我是多么高兴啊。等他一走出门去，我就抱住卡佳（我和卡佳站在钢琴旁），亲她我最喜欢亲的地方——下巴下面胖乎乎的脖子；等他一回来，我又装出一本正经的面孔，好容易才忍住了笑。

“她今天是怎么回事？”卡佳对他说。

可是他没有回答，只是对我笑笑。他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你们瞧，夜色多美啊！”他在客厅里说；那时他正站在开着的通花园的阳台门口。

我们走到他那边去，真的，这是我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的夜色。一轮皓月高悬在我们的房子后面，因此看不见它；屋顶、柱

子和凉台布篷的半个阴影 en raccourci^① 斜射在砂径和圆形的草坪上。其余的一切都是明亮的，洒满了银色的露水和月光。花径的一边，印着大丽菊和支架的斜影；整个宽宽的花径上都洒满月亮的清辉，高低不平的碎石子也闪着光，这条花径一直伸向雾濛濛的远方。树丛中透出花房的发亮的屋顶，峡谷间升起了越来越大的雾霭。已经有些落叶的丁香树丛，连枝柯都是整个发亮的。带露的花朵一朵朵都清晰可辨，林荫路上的光和影交织成一片，似乎这些林荫路不是由树林和小径组成的，倒象是一座座摇曳颤动着的透明的屋宇。右边，在这幢房子的阴影里，一切都是黑沉沉的，模糊不清而且可怕。可是从这片黑暗里伸出来的白杨树的怪诞地伸展开来的树冠，却显得更明亮了；那株白杨不知为什么奇怪地挺立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上面沐浴着皎洁的月光，而没有飞向那遥远的地方，飞向那蔚蓝色的长空。

“我们出去走走吧，”我说。

卡佳同意了，可是她要我穿上套鞋。

“用不着，卡佳，”我说，“谢尔盖·米哈伊雷奇会搀着我的。”

好象这样就可以不致把我的脚弄湿似的。可是当时在我们三个人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毫不奇怪的。他从来也没有让我挽过他的胳膊，可现在我自动地挽住了它，他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我们三个人走下了凉台。这整个世界，这天宇，这花园，这空气，都和我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了。

当我们沿着林荫路走着，我顺着这条小道向前看的时候，我总觉得不能再往前走了，前边就是有限世界的尽头，这一切一定会永远凝固在它自身的美里。可是我们还往前走，于是那堵美的魔墙便向两边分开，让我们进去，那儿似乎又是我们所熟悉的花

① 法语：缩小地。

园、树木、小径和落叶。我们便真的在小径上漫步，踏着一圈圈的光和阴影，落叶也真的在我脚下簌簌作响，嫩枝也真的拂着我的脸。而那用均匀缓慢的脚步挨着我走而又小心翼翼地挽着我的胳膊的，真的就是他；那在我们旁边、脚步发出沙沙声走着的，也真的是卡佳了。而那透过一动不动的枝桠照着我们的，大概也真是天上的月亮……

可是每走一步，魔墙便把我们前后的路又堵上了，因此，我便不再相信还能向前走去，不再相信那存在过的一切。

“哎呀！一只青蛙！”卡佳说。

“是谁在说这话，为什么说这话？”我想道。可是后来我想起了，这是卡佳，她怕青蛙，于是我也仔细瞧了瞧我的脚下。一只小青蛙跳了跳，便在我前面静静地不动了，小径的发亮的泥地上，现出了它那小小的影子。

“您不怕吧？”他说。

我转过脸瞧了瞧他。在我们走过林荫路上缺了一棵菩提树的地方，我清晰地看见了的脸。它是那样地美和可爱……

他说：“您不怕吗？”而我却似乎听见他在说：“我爱你，可爱的姑娘！”——我爱你！我爱你！——他的目光和他的胳膊都在这么重复说；月光、阴影、空气和一切也在重复着同样的话。

我们绕着花园走了一圈。卡佳迈着小步和我们并排走着，她累得直喘。她说该回去了，我非常可怜她这个怪可怜的人。“为什么她没有我们这样的感觉呢？”我想道。“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年轻，都幸福，就象这个夜，就象我和他这样呢？”

我们回到家里，虽然公鸡已经啼过，家里的人都睡了，他的马在窗下越来越频繁地踩着牛蒡，打着响鼻，可是他还是待了很久才走。卡佳没有提醒我们已经很晚了，我们坐在那儿随便瞎

聊，不觉一直坐到凌晨两点多。在鸡叫过三遍、天快亮的时候^①他才走。他和平时一样说了再见，什么特别的话也没说；可是我知道，从这天起他就是我的了，我再也不会失掉他了。当我一向自己承认说，我爱他，我就把一切全都告诉了卡佳。她听了很高兴，而且很感动，不过这个可怜的人在这样的夜晚居然能呼呼入睡；而我却在凉台上来回地走了很久，很久，后来，我又走进花园，一面追忆他的每句话和每个动作，一面沿着我刚才和他走过的林荫路走去。那天晚上我整夜没睡，而且在一生中是第一次看见日出和黎明。我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夜和这样的黎明了。“可是他为什么不肯干脆对我说他爱我呢？”我想道。“当一切都非常简单而又美好的时候，为什么他要瞎想出种种困难，管自己叫老头儿呢？为什么他要浪费也许一去永不复返的宝贵光阴呢？让他说：‘我爱你，’要用语言表示：‘我爱你’；让他的手握住我的手，对它低下头来说：‘我爱你’；让他羞红了脸在我面前垂下眼睛，那我就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不，我不是告诉他，我要拥抱他，紧紧偎依着他，哭起来。但是，万一我弄错了，万一他并不爱我，那怎么办呢？”我头脑里突然掠过这样一个念头。

我自己的感情使我吓了一跳，——天知道它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想起，在板棚里，我向他跳下去的时候他和我的窘态，我心里觉得非常、非常难过。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我开始祷告。于是我心里便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使我平静下来的思想和希望。我决定从今天起开始斋戒，在我生日那天领圣餐，而且就在这一天做他的未婚妻。

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这将怎样发生？——我一点都不知

^① 在俄国北方，夏夜很短，黄昏以后，几乎紧接着就是黎明。

道，可是从那一瞬间起，我相信而且知道，将来一定会这样。当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里，天已经大亮了，人们也开始起床了。

四

因为是圣母升天节^①的斋期，所以家里谁也不奇怪我想在这个时候斋戒。

在这一个星期里，他一次也没有来看我们；我不但不奇怪，不焦灼，不生他的气，而且，相反，我很高兴他不来，我只盼着他能在我生日那天来。在这一周间，我每天都很早起床，趁仆人替我套马的时候，我就独自到花园里去散步，逐一回想昨天的罪过，考虑今天我应该做什么，以便对今天能感到满意，一点罪也不犯。当时我觉得，要做到一点罪也不犯是非常容易的，只要稍微努点力就行。等马车一来，我就和卡佳或是女仆坐上车，我们便向三俄里外的教堂驶去。我走进教堂，每次都想起为所有“怀着对上帝的敬畏走进去的”人祈祷，而且我正是尽量怀着这种感情走上教堂门前长着青草的那两磴台阶。这时候到教堂里来做斋戒祈祷的只有八、九个农妇和家仆；他们向我鞠躬，我就尽量谦逊地向他们还礼；然后我亲自向蜡烛箱走去，向那从前当过兵的教堂管事^②要了几支蜡烛，把它们插上，我感到自己做了很了不起的事。从圣障的门往里看，可以看到妈妈绣的祭坛的帷幔，圣障的上方站着两个木雕的托着星星的天使，我小时候觉得他们大极了，墙上还有一只放出金光的鸽子，那时候我觉得它很有趣。在唱诗班的席位后面，可以看见那只残破的圣水盘，我曾多少次用它给我们的家奴的孩子们施过洗礼，而我自己也是用它

① 圣母升天节在俄历八月十五日。

② 由教区选举产生或由教堂聘请的主管教堂财务和其他收入的人。

的水受洗的。老司祭穿着那件用我父亲的棺罩做的法衣走出来，用那同样的声音念着祷文——从我记事起，他就是用这种声音在我们家里做法事：索尼亚的洗礼，父亲的追荐和母亲的葬仪。诵经士那同样的颤动的声音从唱诗班里传了出来，还有教堂里每次做法事必到的那个老太婆，正弯着腰站在墙边，眼泪汪汪地望着唱诗班中的那尊圣像，交叉着的手指紧贴在褪了色的头巾，瘪嘴在低声说着什么。这一切已经不是好奇，也不是仅仅由于回忆才使我感到亲切，——现在这一切在我眼里都变得伟大、神圣，而且我觉得它们满含深刻的意义。我仔细听着祷文中的每个字，尽量使自己的感情和它相通，要是有的地方我不理解，我就默默地祷告上帝给我启发，或是编一些祷告词来代替我没听懂的词句。当念到忏悔的祈祷文时，我就回想自己的过去，而这个天真幼稚的过去跟我现在欢快的心情比较起来，我觉得是那么黯淡，因此我哭了，并且对自己感到害怕；可是同时我又感到这一切都是可以饶恕的，即使我有更大的罪过，忏悔对我就会更加，更加甜蜜。当司祭在礼拜结束时说“主降福于你们”时，我在这一刹那似乎感到一种肉体上的幸福。好象有一种光和温暖突然注入我的心头。礼拜结束了，神父出来走到我跟前，问我要不要哪天让他们到我们家来做彻夜祈祷；我很感动地谢谢他想要为我（我是这样想的）做的事，我说，我自己会走路来或是坐车来的。

“那不是要让您受累了吗？”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能不犯傲慢的罪过。

做完礼拜以后，要是不带卡佳，我总是让马车先走，我独自步行回家，对所有碰到的人都谦逊地鞠躬问候，尽量找机会帮助人，劝导人，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扶起大车，给人家摇晃

孩子入睡,为给人让路而弄脏自己的脚。有一天黄昏,我听见管家禀报卡佳说,有个庄稼人西蒙来讨块木板给他女儿做棺材,还要一个卢布办丧事,他都给了他。“难道他们这样穷吗?”我问道。“穷极了,小姐,连盐都吃不上。”管家答道。听到这话,我的心都酸了,同时又好象感到高兴似的。我骗卡佳说我要去散步,我跑上楼,拿出我所有的钱(钱固然很少,可是尽我所有),然后画了个十字,穿过凉台和花园,独自向村子里西蒙的小屋走去。小屋在村头上。我走近窗口时,谁也没有看见我;我把钱放在窗台上,敲了敲窗子。门轧地响了一声,有人从小屋里走出来,叫了我一声;我象犯罪似的吓得浑身发冷,直哆嗦,赶快跑回了家。卡佳问我上哪儿去了?我怎么啦?可是我简直不明白她跟我说的是什麼,也没有回答她。我忽然觉得一切都非常渺小和不足道。我把我的房门锁上,独自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很久,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也不能想,也不清楚自己的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到他们全家的快乐,想到他们会用什麼言词来称道这位施主,同时我又惋惜我没有亲手把钱交给他们。我还想到,要是谢尔盖·米哈伊雷奇知道了这件事,他会说什麼,而且我又很高兴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我觉得所有的人,连我自己在内都很坏,我又常觉得我自己和所有的人都非常可亲,于是关于死的想法就象关于幸福的梦想一样,浮上了我的心头。我微笑,我祈祷,我哭泣,在这一瞬间我是多么强烈地热爱世上所有的人和我自己啊。在两次礼拜之间,我经常读《福音书》,我越来越理解这本书,神的一生的事迹也就更平易、更动人,我在他的教义中找到的感情和思想也就变得更令人敬畏、更深奥了。可是,当我放下这本书,再观察和思考我周围的生活时,我又觉得一切是多么明白、多么简单啊。我觉得,过不好的

生活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而爱所有的人和被人们所爱却是非常简单的。所有的人都对我那么好，那么温存，甚至我一直教她读书的索尼娅也完全不同了，她极力想了解我，讨我喜欢，不惹我心烦。谁待我都象我待他们一样。在我逐一回想在忏悔以前我必须请他们饶恕的那些仇人时，我只想起不在我们家的一位小姐，她是我们的邻居，一年前我曾当着客人的面嘲笑过她，因此她不再和我们来往。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向她认错，并请她原谅。她回信说，她原谅我，并且要我原谅她。我看了这封简单的信，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从信里看到了一种非常深沉动人的感情。当我请我的奶妈原谅我的时候，她大哭起来。“为什么他们都对我这么好呢？我有哪一点值得大家这么爱我呢？”我问自己。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谢尔盖·米哈伊雷奇，而且想了很久。我不能不这样做，甚至不认为这是罪过。不过我现在想他和那天夜晚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爱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想到他，就象想到我自己一样，而且不知不觉地把他和关于自己未来的每个想法结合了起来。在他面前我一向都感到的那种自卑感，已经从我心里完全消失了。现在我感到我和他是平等的，并且从我当时所处的精神境界的高度，完全理解他。以前我觉得他身上有些东西很怪，现在我才明白了。直到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他说为别人活着才是幸福，而且我现在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会有无穷的幸福和安宁。我心里想的不是到国外去旅行，不是社交界，不是豪华的气派，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在乡下的宁静的家庭生活，永远克己待人，永远相亲相爱，在一切事物中永远意识到仁慈的、帮助人们的上帝。

我照预定计划在我生日那天领了圣餐。当我那天从教堂回家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我甚至为生活担心，害怕任何的

印象，害怕可能破坏这种幸福的一切。但是，我们刚下了马车走上台阶，从桥上便传来那熟悉的轻便马车的辚辚声，接着我就看见了谢尔盖·米哈伊雷奇。他祝贺了我，我们就一起走进客厅。自从我认识他以来，和他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象那天早上那么沉着而又独立不羁。我觉得我心中有一个完整的新世界，是他所不能理解，而且还高过他的。我和他在一起毫不感到拘束。他大概明白了这个原因，所以对我特别温存亲切和尊敬。我刚要走近钢琴，他却把它锁上，把钥匙藏进口袋。

“不要破坏您的心情，”他说，“现在，您心里的音乐比世界上任何音乐更为美妙。”

我感谢他说了这句话，可是同时又有点不高兴，因为他是过分容易而又清楚地看透了我心里全部应该说的不让人知道的秘密。吃午饭的时候，他说他是来向我表示祝贺，同时也是来辞行的，因为他明天要去莫斯科。他说这话的时候一面看着卡佳；但是后来他又匆匆地看了我一眼，我看出，他担心会从我脸上看到激动的神情。但是我既没有表示诧异，也没有显得慌张，甚至没有问他是不是要去很久。我知道他一定会把那句话说出来的。我知道他绝不会离开。我是怎么会知道的呢？现在我自己怎么也说不清；可是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觉得过去和未来的一切我都知道。我好象在做一个好梦，将要发生的一切好象都已经发生过，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而且这一切还将发生，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的。

他原想一吃过午饭就走，可是卡佳因为做礼拜回来累了，去躺一会儿，他必须等她醒来才能向她告别。大厅里满是阳光，我们走到凉台上去。我们刚坐下，我就非常平静地说起我的爱情的命运应该决定的话来。我开始说这话既不早，也不晚，而是在

我们刚一坐下来，什么还没说，甚至任何声调和任何性质的谈话也没有，免得妨碍我想说的那话。我自己都不明白，我的这种沉着、坚决和用词的准确是从哪儿来的。好象不是我，而是某种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借着我的嘴说出来的。他凭栏坐在我对面，把一枝丁香拉到面前，揪它的叶子。我开始说话的时候，他把树枝放掉，用手支着头。这是一个非常平静或是十分激动的人才可能有的姿势。

“您为什么要走？”我意味深长地、从容不迫地正眼瞧着他问道。

他没有立刻回答。

“有事！”他垂下了眼睛说。

我明白，他在我面前，而且是回答这样一个诚恳地提出的问题，要说谎是十分困难的。

“您听我说，”我说道，“您知道今天对于我是个什么日子。从许多方面来说，今天都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既然我问您，那就不是为了表示关心（您知道我和您相处惯了，而且爱您），我问您，是因为我须要知道。您为什么要走呢？”

“我很难把真情告诉您，我为什么要走，”他说，“在这个星期里，关于您、关于我自己，我都想了很多，并且决定了我必须走。您懂得这是为什么吗？您要是爱我，就别再问了。”他用手擦擦前额，并且遮住了眼睛。“这使我很难受……可是您会理解的。”

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

“我无法理解，”我说，“简直无法理解，您就对我说吧，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今天的缘故，您就对我说吧，什么话我都会平静地听着，”我说。

他换了一个姿势，瞧了瞧我，又把丁香的枝子拉过来。

“不过，”他沉默片刻以后，使用一种故作坚定的声调说道，“虽然这要用言语来表达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很难受，可是我要尽量给您解释明白，”他又补充了一句，好象因为肉体上的痛苦而皱紧眉头。

“说吧！”我说。

“您不妨设想一下，有一位A先生，假定这么说吧，”他说，“他老了，年纪一大把了，还有一位B女士，年轻，幸福，既没有见过世面，又没有阅历过生活。由于种种家庭间的关系，他象爱女儿似地爱上了她，而且也不怕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她。”

他停住了，但是我并没有打断他。

“可是他忘了B非常年轻，生活对她还是游戏，”他突然很快、很坚决地继续说道，也不瞧着我，“他要爱上她很容易，而且她还会觉得这很有趣。于是他做了件错事，他突然感到他心里涌起了另一种类似忏悔的痛苦的感情，因此他害怕了。他害怕他们以前的友谊关系会遭到破坏，所以他就下决心在这种关系遭到破坏以前走掉。”他说这些话时又象漫不经心地用手揉揉眼睛，把眼睛遮住。

“为什么他要害怕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她呢？”我克制着自己的激动，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我的声调很平静；可是，他一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他用好象受了侮辱似的声调答道。

“您年轻，”他说，“我不年轻了。您想闹着玩儿，而我需要的是另一种东西。您去玩儿去吧，可是别和我闹着玩儿，要不然，我会信以为真，这对我是不好的，您也会感到问心有愧。这是A说的话，”他又加了一句，“不过，这都是胡说，总之，您是了解我是为什么要走的。咱们别再谈这个了。请别谈了吧！”

“不！不！就要谈！”我说；我的声音发抖，都要哭了。“他爱她呢，还是不爱她？”

他没有回答。

“要是他不爱她，那他为什么要把她当小孩似的逗弄她？”我说。

“对，对，这是A的不是，”他连忙打断了我的话，答道，“可是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友好地……分手了。”

“不过，这太可怕了！难道就不能有别的结果吗？”我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并且对自己所说的话感到害怕。

“不错，是有的，”他说，把手拿下，露出他那激动的脸，两眼直视着我。“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只是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别打断我，请您心平气和地了解我。有人说，”说到这儿，他站了起来，现出痛苦的微笑，“有人说：A疯了，疯狂地爱上了B，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她……而她只是笑笑。对她来说，这是个笑话，而对他来说这却是终身大事。”

我哆嗦了一下，想打断他的话，叫他不要替我说话，可是他拦住了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等一等，”他用发抖的声音说，“又有人说：她似乎可怜他；而且她，这个可怜的姑娘，由于不懂得人生，以为她真能够爱他，因此同意了做他的妻子。于是他，这个疯狂的人，便信以为真，相信他的整个生活要重新开始了，而她自己却看出，她是欺骗了他……他也欺骗了她……咱们别再谈这个了吧，”他结束了这段话，显然无法再往下说了，接着他就在我对面一言不发地踱来踱去。

虽然他说“咱们别再谈了”，可是我却看出他整个身心都在等待着我的答复。我想说，可是说不出来，我胸口好象有什么东

西堵着。我瞧了他一眼，他脸色苍白，下嘴唇直颤。我可怜起他来了。我猛地用力挣脱了束缚我的沉默的力量，开始用一种低低的、发自内心的声音说起来，我害怕这声音随时都会中断。

“还有第三种结果，”我说到这里停住了，可是他一言不发，“第三种结果是：他并不爱她，而是使她痛苦，痛苦；他还自以为正确，于是他就走了，还以此自豪。把这件事当儿戏的是您，而不是我；我从第一天起就爱上了您，爱上了您，”我重复了两遍，而且在说“爱上”这个字时，我的声音不由得从轻轻的、发自内心的声音变成了一种使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野性的叫喊。

他站在我面前，脸色苍白，他的下嘴唇哆嗦得越来越厉害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流到他的面颊上。

“这不好！”我差不多大叫起来，感到气愤的、哭不出的眼泪使我憋气。“这是为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便站起身来，想离开他。

可是他不放我走。他的头靠在我的膝盖上，他的嘴唇吻着我那还在发抖的双手，他的眼泪把我的双手都弄湿了。

“我的上帝，我早知道该多好，”他说。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反复地说，而我心里却感到了幸福，一种永远不会再有的幸福。

五分钟后，索尼娅跑到楼上卡佳那儿，对全家嚷嚷说：玛莎要娶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啦。

五

没有理由延缓我们的婚事，不管是我，还是他，都不愿意这样。诚然，卡佳想到莫斯科去给我置办嫁妆，而他母亲则主张他在结婚以前得置备一辆新马车，买一套新家具，用新壁纸把房屋裱糊一新，可是我们俩都坚持：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这一

切也得等以后办，结婚在我生日后过两个星期举行，不张扬，不办嫁妆，不请客人，不要傧相，不办酒席，不要香槟和婚礼的一切繁文缛节。他告诉我说，他母亲对办这件喜事没有乐队，没有堆积如山的箱笼，没有把全家装修一新，不象她结婚时那样花了三万卢布，表示非常不满；他还告诉我，他母亲瞒着他在贮藏室里翻箱倒柜，一面严肃而秘密地同女管家马留什卡商量，为了我们的幸福必须要什么样的地毯、窗帘和托盘。在我这方面，卡佳和我的奶妈库兹明尼什娜也在忙着同样的事。跟她谈这件事的时候开不得玩笑。她坚决相信，我们俩彼此在谈到我们的未来时，只会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正象处在我们这种状况的人所常有的那样；但是我们真正未来的幸福，还得由衬衫的正确的剪裁和缝制，由桌布和餐巾的滚边来决定。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和尼科尔斯斯科耶之间，每天都要交换几次秘密情报，互相说明彼此正在准备什么；虽然卡佳和他母亲之间表面上显得十分和气，可是可以感觉得出，她俩之间已经有了某种敌意，但手腕却十分巧妙。他母亲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现在我已经和她很熟了），是个古板严厉的主妇，是位旧式的太太。他爱她不仅是出于做儿子的责任感，而且还出于做人的感情，他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好、最聪明，最善良和最慈爱的女人。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一向对我们很亲切，尤其是对我，高兴她儿子要结婚，但是当我以未来的媳妇的身份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她希望我明白，要能配得上她的儿子，我还应该变得更好些，而且我也不妨永远记住这一点。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也同意她的意见。

在这最后的两个星期里，我们每天见面。他来吃午饭，一直坐到半夜。但是，虽然他说——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没有我他活不下去，可是他从来也没和我在一起待过一整天，并且尽

量继续做他自己的事。到结婚那天为止，我们的表面关系还是跟从前一样：我们还是互相称您，他甚至不吻我的手；他不但不寻找，甚至还避免和我单独相处的机会。好象他害怕耽溺于他心中的过分的、有害的柔情似的。我不知道是他变了还是我变了，可是现在我感到我和他完全平等了，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出以前那种使我不喜欢的做作的平易近人了，我还常常高兴地看到，在我面前的已不是那个令人敬畏的男子，而是一个温顺的、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孩子。“他也不过如此罢了！”我常常想，“他不过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人罢了。”现在我觉得，他整个的人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完全了解他。我所了解到的他的一切，是那么单纯而又那么和我一致。甚至他关于我们将来在一起生活的计划也跟我的计划一样，只是他说得更清楚，更好罢了。

这几天的天气很坏，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待在室内。钢琴和窗户之间的那个角落是我们最好的谈心的地方。在黑魑魑的窗上映着近处的烛光，雨点偶尔打在发亮的窗玻璃上，往下流。雨打着屋顶，水在水落管下面的水洼里汨汨地流着，潮气从窗口飘进来。而我们这个角落里却好象显得更明亮、更温暖、也更快乐。

“您知道，我早就想对您说一件事，”当我们俩在这个角落里坐到很晚的时候，有一次他说。“当您弹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您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全知道，”我说。

他微微一笑。

“对，真的，不说也罢。”

“不，您说吧，什么事？”我问道。

“是这么回事。您记得我给您讲的A和B的故事吗？”

“这种愚蠢的故事怎么会不记得。好在就那样结束了……”

“是的，我全部的幸福差一点儿被我自己给毁了。您救了我。但主要的是：那时候我老不说真话，因此我觉得惭愧，现在我想把话说完。”

“喂，请您别说了吧。”

“别害怕，”他笑眯眯地说。“我只想为自己表白一下。那天我开始说话的时候，我是想发一通议论的。”

“干吗要发议论！”我说，“毫无必要嘛。”

“是的，我的议论发得不对。在我经历了生活中的一切失望和错误以后，这次来到乡下的时候，我曾坚决地对自己说，爱情对于我已经结束了，我的义务只能是度过晚年，因此我很久都弄不清我对您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会有什么结果。我抱过希望，又不抱希望；有时候我觉得您是在跟我闹着玩，有时候我又信以为真，我简直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可是在那个黄昏以后，——您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花园里散步吗，——我感到吃惊；我觉得我现在太幸福了，简直是不可能的。喂，假如我让自己抱着希望而结果落空的话，那怎么办？可是，当然，我只想到自己；因为我是个卑劣的、自私自利的人。”

他瞧着我，沉默了一会儿。

“不过，我当时说的话也并非完全都是胡说。我的惶恐也决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从您那里得到的很多，可是我能给您的却很少。您还是个孩子，还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蓓蕾；您是初恋，而我……”

“是的，您就对我实说吧，”我说，可是忽然又怕他的回答。“不，甭说了，”我又加了一句。

“是问我从前曾经爱过别人吗？”他马上猜透了我的心思，

说。“这，我可以告诉您。没有，没有爱过别人。象这样的感情从来也不曾有过……”可是，好象有一种痛苦的回忆突然掠过他的心头。“不，为了有权利爱您，就是在这方面我也需要您的信任，”他忧郁地说。“在说我爱您以前，难道不需要郑重考虑吗？我能给您什么呢？爱情——对。”

“难道这还不够吗？”我瞧着他的眼睛说。

“不够，我的朋友，对您来说，还不够，”他继续说。“您有美貌和青春！我现在常常在夜里幸福得睡不着，老是想到我们将来在一起怎么生活。我年纪不小了，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偏僻的乡村里过一种宁静的幽居生活，有可能对人们做些好事，对这些人做好事是容易的，因为平常没有人对他们做好事；然后是劳动，——在我看来是有益的劳动；然后是休息、欣赏大自然、书籍、音乐、爱亲近的人，——这就是我的幸福，此外我没有任何奢望。除了这一切，还有象您这样的伴侣；也许还会有孩子；一个人所能希望的也不过如此了。”

“是呀，”我说。

“对于青春已经过去了的我来说，是这样，对您来说，可不是这样，”他继续说。“您还没有生活过，您也许还想在别的方面寻找幸福，您也许会在别的方面找到它。您现在觉得这是幸福，是因为您爱我。”

“不，我从来就希望并且喜爱这种安静的家庭生活，”我说。
“因此您说的恰好正是我想的东西。”

他笑了笑。

“您不过是这样觉得罢了，我亲爱的。然而这对您是不够的。您有青春和美貌，”他沉思地重复说。

但是我生气了，因为他不相信我，好象要用我的美貌和青春

来责备我似的。

“那您为什么要爱我呢？”我生气地问道，“是为了我年轻呢，还是就为了我本人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爱您，”他一面回答，一面用他那凝视的、富有吸力的目光瞧着我。

我不由自主地望着他的眼睛，什么也没有回答。突然我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起初，我看不见周围的东西，后来他的脸在我面前消失了，只有他那双眼睛在炯炯发光，好象正对着我的眼睛，然后我觉得那双眼睛到了我的心里，于是一切都模糊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只好眯上眼睛，以便摆脱这种目光在我心里引起的喜悦和恐惧的感情……

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近黄昏的时候，天放晴了。入夏以来就一直下着的雨停了以后，第一次看到寒冷、明亮的秋夜。一切都是潮湿、萧索和明亮的，花园里也第一次出现了秋高气爽、绚烂和凋零的景色。天空明朗、寒冷和苍白。想到明天，我们结婚的日子天气这么好，我就快乐地去睡觉了。

这一天，太阳刚刚升起我就醒了，一想到今天已经是……我好象感到又是害怕又是吃惊似的。我走进花园。太阳刚出来，阳光灿烂，零碎地透过林荫路上凋落的发黄的菩提树丛。小径上铺满了沙沙作响的落叶。一串串皱皮的花楸果，挂在带着经霜卷缩的疏叶的枝头，鲜红夺目；大丽菊也凋谢了、变黑了。惨绿的草上和宅旁被折断的牛蒡叶上，初霜闪着银光。晴朗、寒冷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也不可能有云彩。

“难道就是今天吗？”我不相信自己的幸福，这样问我自己。“难道我明天醒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在这儿，而是在那个陌生的、有圆柱的尼科尔斯科耶的宅子里了吗？难道我再也不用等待

他，迎接他，也无须每天晚上和夜间跟卡佳谈起他了吗？我再也不会和他坐在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大厅里的钢琴旁边了吗？再也不必送他走和在黑夜为他担心了吗？”可是我却想起了昨天他说他是最后一次来看我，还有卡佳一定要我试试结婚礼服，还说：“是为明天用的”；于是我刹那间相信这是真的，接着又怀疑起来。“难道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娜杰扎，离开格里戈里老头、离开卡佳，在那边和婆婆生活吗？我再也不能在临睡前亲亲奶妈，然后听她照老习惯给我画了十字后说：‘小姐，祝您晚安’了吗？我再也不能教索尼亚读书，和她一起玩，早上敲墙叫醒她，听她那清脆的笑声了吗？难道从今天起，我就要变成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陌生人，并且还有一个实现了我的希望和愿望的新生活出现在我的面前吗？难道这个新生活会永久存在吗？”我急不可待地等着他，我独自这样想着，感到心头沉重。他一早就来了，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完全相信今天我就要做他的妻子了，这样一想，我就不再感到害怕了。

午饭前，我们到教堂去追荐父亲。

“要是他现在还活着就好了！”我们一路走回家去，我心里这样想到；这时，我默默地靠在我正在思念的那个人生前最要好的朋友的胳膊上。在做祈祷时，我把头不断俯伏在小教堂里的冷冰冰的石头地上，这时，我父亲在我心里栩栩如生地出现了，我深信，他的在天之灵理解我，并且赞同我的选择，所以现在我觉得，他的在天之灵就在这儿，就在我们头上翱翔，而且我感到他在祝福我。于是回忆、希望、幸福和怅惘在我心里融成了一种庄严和愉快的感情，刚好和这种静止的新鲜空气、寂寥、凋零的田野和灰白的天空相协调；那灿烂然而无力的阳光，从这灰白的天空射下来普照大地，也想要晒着我的面颊。我觉得，这个和我并肩

走着的人，是理解我的感情并和我有同感的。他慢慢地、默默地走着，我偶然望望他的脸，在他脸上也同样露出了那种充满在大自然里和我心里的又悲又喜的严肃的心情。

他突然向我转过脸来，我看出他有话要说。“要是他要说的和我想的不一样，那怎么办？”我这样想道。但是他谈起了父亲，甚至没有提他的名字。

“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和我的玛莎结婚吧！’”他说。

“现在他该多高兴啊！”我说时，更紧地靠着他那挽着我的胳膊。

“是呀，那时候您还是个孩子，”他一面继续说，一面瞧着我的眼睛，“那时候我吻过这双眼睛，我所以爱它，只是因为这双眼睛长得象他，我决没想到这双眼睛本身会对我这么宝贵。那时候我管您叫玛莎。”

“对我说‘你’吧，”我说。

“我刚才就想对你说‘你’，”他说，“直到现在我才觉得你是完全属于我的，”接着他就用平静的、幸福的、令人心醉的眼神端详着我。

我们一直是慢慢地穿过那踩平了的、割过庄稼的、在田间还没走成路的小径；我们只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一边，是一片剩下棕黄色麦茬的田地，越过一个小山谷，伸展到那片远远的叶子凋落的树林；在这片田地里，离我们不远有个农民在用木犁没有声息地在一长条越来越宽的黑土上耕作。山脚下有一群散放的马，看上去离我们很近。另一边，往前去，直到我们的花园和从树丛间露出的我们的房屋为止，有的地方现出一垅垅的已经发绿的、凝霜已经化了的冬麦田。并不炎热的阳光照射着万物，万物都沾满了蛛网的细长的游丝。它们在我们周围的空

中飘浮，落在被霜打的、略显干燥的麦茬地上，落到我们的眼睛、头发和衣服上。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便在我们头上静止不动的空气中回响着，停滞着，好象只有我们在这整个世界，只有我们俩独自在这有秋阳照耀着、闪动着和嬉戏着的蔚蓝的苍穹下。

我也想管他叫你，可是我不好意思。

“你干吗走得这么快？”我说得很快，而且几乎是低声地说，不由得脸都红了。

他放慢了步子，并且用更温存、更愉快、更幸福的目光瞧着我。

我们回到家里，他母亲和我们非请不可的客人们都已经在那儿了，因此，我再也没有和他单独在一起，直到我们从教堂里出来坐上马车，到尼科尔斯科耶为止。

教堂里几乎是空的，我只是从眼角看见他母亲笔直地站在唱诗班近旁的小地毯上，卡佳戴着有淡紫色绦带的帽子，脸上挂着泪珠，还有两三个家奴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我没有看他，可是我感到他就在这里，就在我身旁。我倾听着祈祷文，复诵着这些词句，可是我心里却毫无反应。我没法祈祷，只好呆呆地望着圣像、蜡烛、司祭法衣后背上绣着的十字架、圣像壁和教堂的窗子——我什么也看不明白。我只感到，在我身上正在发生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当司祭拿着十字架转身向着我们，祝贺我，告诉我说，他已给我画过十字，现在上帝已经使我们成婚了，卡佳和他母亲也吻了我们，我听到格里戈里叫马车的声音，这时我才感到惊讶和吃惊：一切都已经完了，而在我心里并没有发生什么非同寻常的、和我刚才接受过的圣礼相适应的事。我和他互相接了吻，而这种接吻是非常奇怪的，对我的感情是陌生

的。“就这样吗？”我想。我们走出教堂，车轮在教堂的圆拱下发出重浊的声响，清风拂面，他戴上帽子，扶我上了马车。从车窗里，我看见了一轮带晕的寒月。他在我身旁坐下，随手关上了车门。我的心好象被什么扎了一下似的。我觉得他举止之中那种自信的神气侮辱了我。卡佳大声喊我包上头巾；车轮在石子路上隆隆地滚过，然后走上了土路，于是我们便向前去了。我紧靠在角落里，从窗口眺望着遥远的明亮的田野和在月亮的寒光中飞逝而去的道路。我没有看他，可是我感到他就在我身旁。“怎么，难道我盼望会给我很多东西的这一刻，给我的就是这个吗？”我想道；而且独自和他坐得这么近，总使我感到屈辱。我向他转过脸去，想跟他说些什么。可是一句也说不出，好象我心里以前的柔情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只有一种被侮辱和恐惧的感情。

“在这一刻以前，我一直都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为了回答我的目光，他低声说。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害怕，”我说。

“怕我吗，亲爱的？”他说时握住我的手，向它低下头去。

我的手毫无生气地放在他的手里，我的心冷得作痛。

“是的，”我小声说。

然而，就在这时，我的心骤然跳得更剧烈了，手也哆嗦起来，并且紧握了他的手，我感到热，我的眼睛在薄暗中找寻他的目光，我突然感到我并不怕他，这种恐惧就是爱情——一种比以前还要温柔，还要强烈的新的爱情。我感到我整个儿是他的，我因为属于他而感到幸福。

第 二 部

六

一天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两个月的幽居的乡村生活，不知不觉地（当时我觉得是这样）过去了；这两个月的感情、激动和幸福是抵得上一生的。我们俩对于如何安排我们的村居生活的梦想，完全不象我们预期的那样实现。可是我们的生活并不比我们的梦想差。没有那种刻板的劳动、履行自我牺牲的义务和为别人生活，象我在没有出嫁以前想象的那样；相反，有的只是那种彼此相爱的自私的感情，愿意被爱的热望，无缘无故的、经常的欢愉以及忘却世上的一切。虽然他有时到书房里去工作，有时进城去办事，或者为了农务到处奔忙；可是我看得出，和我分开要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后来他自己承认说，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世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没有意思，他不能明白怎么能去做它。我也完全一样。我虽然看书、弹琴、陪伴婆婆、在学校里教书，可是我做这一切只是因为其中每件事都与他有关并能博得他的赞赏；然而只要想到他和某件事无关，我的手就垂了下来，而且一想到世界上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就觉得太滑稽了。也许这是一种不好的、自私的感情，可是这种感情却给我幸福，并且使我高出于整个世界之上。对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而且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因此，我不能为别的任何事物活着，我活着只能是为了他，为了做一个在他心目中理想的我。他认为我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优秀的女性，具备一切可能有的美德，所以我就要努力在全世

界无与伦比的、最好的人的眼里做这样的女人。

有一天我正在祷告上帝的时候，他走进我的房间。我回头瞧了瞧他，继续做祷告。为了不打扰我，他在桌旁坐下，打开了书。可是我觉得他在瞧着我，所以我又回头瞧了瞧。他微微一笑，我也笑了起来，就没法再做祷告了。

“你已经祷告过了吗？”我问道。

“是的。你接着祷告吧，我这就走。”

“我希望你也祷告，好吗？”

他没有回答，想走开，可是我叫住了他。

“亲爱的，为了我，请跟我一块儿念祈祷文吧。”

他和我并肩站着，笨拙地垂着两手，脸色严肃，结结巴巴地念着。有时候他转身对着我，在我脸上寻找赞许和帮助。

等他念完了，我笑着拥抱了他。

“都是你，都是你！我好象又变得只有十岁了，”他说时脸都红了，并且吻我的手。

我们的房子是乡间一所古老的宅子，几代亲人互相敬爱，在里面生活。它到处显示出一种良好的、正直的家庭传统，我刚走进这座宅子，这种传统仿佛就突然也成了我的传统。家里的陈设和规矩都是由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照古老的规矩安排的。虽然说不上一切都雅致、漂亮；可是从用人到家具以及食物，样样都非常多，一切都非常整洁、坚固、井井有条，令人肃然起敬。客厅里陈设的家具都是对称的，挂着画像，地板上铺着家制的地毯和布条编的地毯。起居室里摆着一架旧钢琴、两个式样不同的小衣柜、几张沙发、几张包着黄铜和镶嵌物的小桌子。我的书房是经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精心布置的；里面摆着全家最好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样式的家具，其中有一架古老的穿衣镜，起

初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照它，可是后来它却成了我十分珍爱的，象老朋友似的。从来听不见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的声音，可是家里的一切就跟上了弦的钟似的进行着，虽然仆人的数量嫌多，可是所有这些穿着没有后跟的软靴的人们（因为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认为鞋底的嚓嚓声和鞋后跟的橐橐声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声音），所有这些仆人似乎都因为自己的职责感到自豪，在老夫人面前战战兢兢，对待我丈夫和我则象长辈那样亲切，而且看来，他们都十分高兴地各尽其职。每星期六家里照例要擦洗地板和拍打地毯，每个月的第一天都要做圣水祭的礼拜，每逢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和她儿子的命名日（这年秋天又头一次加上了我的命名日），都要大宴四邻。而且这一切，从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记事的时候起，就是不可移易的。我丈夫从不过问家务事；他只管理田里的事务和农民，这占去他很多时间。甚至在冬天他也起得很早，所以我醒来的时候总见不到他。他通常在喝茶的时候回来（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喝茶），而且差不多总是在那个时候，在农事操劳和许多烦心的事情之后，他正是处在我们称之为狂喜的那种特别快乐的心境中。我常常要他告诉我，他早上干了些什么，于是他就跟我讲一些荒唐可笑的事，以致我们俩都笑得要死；有时候我一定要他讲些正经事，他就忍着笑讲起来。我瞧着他的眼睛，瞧着他翕动着的嘴，什么也听不明白，只要能看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快活了。

“嗯，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复述一遍吧，”他问道。可是我什么也说不上来。他不跟我谈他自己和我的事，而谈别的什么事，这简直太可笑了。外面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好象和我们都没有关系似的。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开始对他的工作有点了解和感兴趣。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在午饭以前是出不来的，

她独自喝茶，并打发人来问我们好。在我们这个独特的、幸福得发狂的小天地里，听到从她那庄重规矩的另一个角落传来的声音，觉得十分古怪，因此，当女用人交叠着双手，不慌不忙地向我禀告说，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吩咐她来打听，我昨天出去散步以后回来睡得怎样，还吩咐她告诉我，她腰疼了一夜，村子里那条蠢狗吵得她简直没法睡；“太太还吩咐我问一声，您是不是喜欢今天烤的面包，太太还请您注意，今天不是塔拉斯烤的，而是尼可拉沙头一次试做的，太太说，他烤得很不错，特别是8字形的小甜面包，就是面包干烤过头了，”——我听了这些话，忍不住哈哈大笑算是回答。午饭前我们俩很少在一起。我一个人弹弹琴、看看书；他写信，或是再出去；可是在四点钟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在客厅里见面了，妈妈从容不迫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接着，经常住在我们家的三两个穷贵族太太和女香客，也都出来了。每天我丈夫总是按老规矩搀着母亲去吃午饭；可是她一定要叫他用另一只手搀着我，因此我们每天总是你退我让地挤在门口。吃饭的时候，妈妈总是坐主位，谈话有礼貌而又有分寸，还略带点儿庄严。我丈夫和我的随随便便的谈话，常常愉快地破坏了这种午餐会议的庄严气氛。有时候他们娘儿俩还拌嘴，彼此嘲笑；我特别喜欢这种拌嘴和嘲笑，因为这最有力地表现出把母子俩连结在一起的温柔而牢固的爱。午饭后，maman^①到客厅里去坐在那张大圈椅上研鼻烟，或是把新书的页面裁开，我们就读书给妈妈听，或是到起居室去弹琴。我们在这一时期一起读了很多书，但是我们最喜爱和最好的享受则是音乐，它每次都拨动我们心里的新弦，好象使我们相互重又显示自己

① 法语：妈妈。

的心灵。当我弹他所喜欢的曲子的时候，他总是坐到我几乎看不见他的那个远远的沙发上；出于羞涩，他总是竭力遮掩音乐在他心里产生的印象；可是我常常出其不意地从钢琴旁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尽力去找寻他脸上激动的痕迹和他眼睛里的不自然的光辉和泪影，虽然他竭力要瞒我，可是却瞒不住。妈妈常常想到起居室来瞧瞧我们，可是，大概，她怕使我们感到拘束，所以有时候，她假装不看我们，故意摆出一副严肃而又冷淡的模样穿过起居室；不过我知道，她根本没有必要回屋去又这么快回来。晚上，我在大客厅里斟茶，全家人又都聚到桌旁。在明亮如镜的茶炊面前的这种庄严的会议以及把玻璃杯和茶杯分给大家，有很长一个时期使我感到很窘。我总觉得我还不配享有这种荣誉，我还太年轻和不够稳重，不够资格去拧这么大的茶炊的龙头，把玻璃杯放在尼基塔的托盘上，并说：“给彼得·伊万诺维奇，给玛丽亚·米妮奇娜，”还要问：“够甜吗？”还要给奶妈和那些有资格得到的人留出方糖来。“好极了，好极了！”我丈夫常常在一旁说，“象个大人了。”——这就使我更窘了。

喝完茶以后，maman 就打通关或是听玛丽亚·米妮奇娜算命；然后吻我们俩，并给我们俩画十字，我们就回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去。可是我们俩多半要坐到半夜，而且这是我们最美好和最愉快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往事告诉我；我们做计划，有时候还发发议论，不过我们尽量悄悄地说话，免得让楼上的人听见，去禀报一定要我们早睡的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有时候我们饿了，就悄悄地走到放食品的房间里，托尼基塔给我们弄点冷餐，然后在我的书房里点起一枝蜡烛吃夜宵。我和他就象两个外人似的住在这个古老的大房子里，而古老的遗风和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的严谨的精神却统治着这儿的一切。不仅是她，就是

仆人、年老的婢女、家具，以至画幅，都引起我的敬畏，而且使我意识到，我和他在这儿有点不合适，我们住在这里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照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看有许多事情——那种使人拘束的、始终不变的规矩和家里那一大群闲着没事干、爱问长问短的仆人——都是让人不舒服和难受的；不过，当时正是这种拘束使我们的爱情更有生气。不仅是我，就是他也不露出他有什么不满的样子。相反，他甚至对一切坏事好象避而不问。侍候妈妈的听差德米特里·西多罗夫是个烟鬼；他总是在每天午饭后我们在起居室的时候，到我丈夫的书房里从抽屉里拿他的烟丝；这时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就带着又惊又喜的神情蹑手蹑脚地向我身边走来，用手示意叫我不声张，还向我挤挤眼睛，让我看决没想到会被人发觉的德米特里·西多罗夫——看见我丈夫这样做，真是有趣极了。当德米特里·西多罗夫没有发现我们而走出去以后，我丈夫由于高兴地看到一切都顺利结束，就象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一样，说我真可爱，并且亲吻我。有时候他这种泰然自若、姑息容忍以及好象对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的态度，使我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他的弱点，——我没有看到我自己也是一样。“就象个小孩，不敢显示自己意志！”我想。

“哎呀，亲爱的，”有一次我对他说，他的弱点使我感到惊讶，他回答我道，“象我这样幸福的人，怎么能对什么感到不满呢？与其让别人怕你，还不如自己让步，我早就深信这一点；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幸福。而我们又如此快乐！我没法儿生气；对我来说现在没有不好的东西，只有可怜的和有趣的东西。主要的是——*le mieux est l'ennemi du bien*。^① 你相信吗，当我

① 法语：最好是好的仇敌。意即好了还要更好。

听见铃铛声，或是接到信，甚至在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会感到害怕。我怕须要生活下去，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变化；因为再不可能比现在更好了。”

我相信他的话，可是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我固然很快活，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就是这样，不可能有别的样子，而且大家向来都这样，一定有个什么地方，还有另一种虽然不是更大、但却是不同的幸福。

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冬天挟着它的寒冷和暴风雪降临了，而我，虽然有他和我在一起，却开始感到孤独，开始感到生活只是老一套，无论在我身上或是在他身上都没有新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好象又在回到老路上。他开始埋头工作，而且比以前更多地离开我，因此我又觉得，他心里一定有一个他不想让我进去的独特的天地。他那始终不变的平静使我不快。我和从前一样爱他，也和从前一样因他的爱而幸福；可是我的爱情停滞了，不再增加了，而且除了爱情以外，还有一种新的不安的感觉开始偷偷地潜入我的心里。在我经历过热恋他的幸福之后，光爱他对我来说已经不够了。我需要的是活动，而不是平静的生活。我需要的是激动、危险和为了感情而牺牲自己。我身上有的是在我们平静生活中容不下的过剩的精力。我常常感到一阵阵忧郁，我把这当做不好的事，拚命想瞒住他，我又常常感到强烈的柔情和喜悦的冲动，这使他感到害怕。他比我更早就看出了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建议我进城去玩玩；可是我求他别去，别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别破坏我们的幸福。我确实很幸福；可是使我痛苦的是：这种幸福用不着我花费什么气力和牺牲，而我却多么痛苦地希望付出代价和牺牲啊。我爱他，我看到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可是我希望大家都能看见我们的爱情，而来阻挠我爱他，但

我却还是爱他。我的理智以至感情都已无暇他顾，可是还有另一种感情——青春和要求行动的感情，在我们平静的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为什么他要跟我说，只要我愿意，我们就可以到城里去呢？他要是不跟我说这种话，说不定我会懂得，使我烦恼的感情是有害的、荒唐的，是我的罪过，而我所追求的那种牺牲就在这里，就在我面前，就在于必须把这种感情压下去。只要搬到城里去我就能摆脱忧郁的这种想法，不知不觉浮上了我的心头；同时，为了我自己而要使他和他所爱的一切分开，我又觉得问心有愧和于心不忍。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雪越下越大，渐渐埋没房子的墙脚，而我们还是两个人厮守在一起，还是象以前那样单独相对；而在外面的什么地方，在五光十色之中，在喧闹之中，却有许多人激动着、痛苦着和欢乐着，既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对我来说最糟的是：我感到我们的生活习惯一天一天地在把我们的生活紧箍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中，我们的感情渐渐变得不那么自由了，而是越来越屈从于平稳、没有激情的时光的流逝。早上，我们常常是愉快的，午餐时恭恭敬敬，晚上则情意绵绵。“行善吧！……”我对自己说。“行善以及过正直的生活，正如他所说，这固然好；可是这种事我们以后还来得及做，而还有一些事，只有现在我有力量做。”我要的不是行善，我要的是搏斗；我要的是感情在生活中支配我们，而不是让生活来支配感情。我希望和他一起走近万丈深渊，并说：“再走一步，我就掉下去了，只要一动，我就完了，”于是他，站在万丈深渊的边上，脸色发白，用他那强有力的手抱住我，并且抱着我俯临深渊，以致我的心都吓冷了，然后随他高兴把我抱到哪里去。

这种精神状态甚至影响了我的健康，我开始神经衰弱了。有一天早上我的情形比往常更坏；他从警察局回来，情绪不好，这

在他是少有的。我立刻看出了这一点，问他出了什么事。但是他不想告诉我，只说，这不值得一提。后来我才知道，县警察局长因为对我丈夫没有好感，把我们家的农民们叫了去，对他们提出非法的要求，而且还威胁他们。我丈夫对这一切不能忍受，不能把这看做是既可怜而又可笑的事；他很气愤，所以不愿意跟我谈这事。但是我觉得，他不愿意跟我谈这事，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个孩子，不能理解他做的事。我扭过头去不理他，吩咐用人去请在我们家作客的玛丽亚·米妮奇娜来喝茶。我很快喝完了茶，然后，拉着玛丽亚·米妮奇娜到起居室去，和她大声谈些我毫不感兴趣的无谓的废话。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偶尔瞥我们一眼。被他这样一看，在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更使我想说话，甚至想笑；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和玛丽亚·米妮奇娜说的话都很可笑。他什么话也没跟我说，就走进自己的书房，随手把门关上。当我刚一不听见他的声音时，我愉快的心情突然全部消失了，连玛丽亚·米妮奇娜都吃了一惊，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回答她，坐到沙发上，只想哭。“他在想些什么呢？”我想。“一定是些无谓的小事，他却认为了不得了，其实，只要他告诉我，我就会让他看出来，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他一定是以为我不懂，一定是想用他那煞有介事的沉着来贬低我，总以为这样对待我是对的。但是，”我想道，“当我感到寂寞空虚的时候，当我想要生活，想要动，而不是老待在一个地方，感到时光从我身边溜走的时候，我又何尝不对呢。我想往前走，想每天每时都有新的东西，而他却想停止不前，并且拉着我不许前进。他要想让我满意真是容易极了！要做到这一点，他用不着带我进城，只要象我一样，不勉强自己，不克制自己，而是听其自然地生活。他是这样劝告我的，可是他自己并不随便。问题就在这儿！”

我感到我的心要哭，我生他的气。这种恼怒使我吃惊，我便去找他。他坐在书房里在写东西。听见我的脚步声，他冷淡平静地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接着写。这种目光使我很不高兴；我没有走到他身边，就站在他书桌旁边，打开一本书看起来。他又停下工作，望了望我。

“玛莎！你不高兴吗？”他说。

我用冷冷的目光瞧了瞧他，似乎在说：“没有什么可问的！干吗这么客气？”他摇摇头，胆怯而温柔地微微一笑，可是我是头一次没有用微笑来回答他的微笑。

“今天你出了什么事？”我问道，“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没什么！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答道。“不过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有两个农民到城里去……”

但是我没让他说下去。

“喝茶的时候我问你，你为什么告诉我？”

“那时候我在生气，我会对你说出蠢话来。”

“那会儿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以为，在任何事情上我都帮不了你的忙呢？”

“我哪有这种想法？”他说时扔下了笔。“我想的是，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你不仅在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上帮助我，而且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做。你想到哪儿去了！”他笑了。“我就为了你而活着。我觉得一切都好，就因为你在这儿，因为我需要你……”

“是的，这我知道；我是个需要安慰的乖孩子，”我说话的声调使他惊异地瞧了瞧我，好象他是第一次看见我似的。“我不要你的冷静，你的冷静够多的了，够多的了，”我又添了这么几句。

“嗯，你要知道，是这么回事，”他连忙接着说，打断了我的话，显然怕我把话统统说出来，“你究竟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我现在不想听，”我答道。虽然我很想听他说，可是能破坏他的平静，我觉得痛快极了。“我不要装做在生活，”我说，“我要象你一样地生活。”

在他那生动迅速地反映出一切感情的脸上，这时现出了痛苦和紧张的神情。

“我要跟你过一样的生活，跟你……”

可是我没法把话说完；他脸上现出了那样的哀愁，深深的哀愁。他沉默了片刻。

“在哪一点上你跟我过的生活不一样呢？”他说。“是因为是我，而不是你，去和县警察局长和喝醉了的农民打交道吗……”

“不光是这一件事，”我说。

“看在上帝面上，亲爱的，请你理解我，”他继续说，“我知道，忧虑对我们永远是痛苦的；我生活过，这滋味我尝过。我爱你，因此，我不能不希望让你避免忧愁。我生活的目的就是爱你：所以，你不应该来扰乱我的生活。”

“你永远都是对的！”我说这话时没有瞧着他。

当我心里感到懊恼和一种类似后悔的感情时，他的开朗和平静的心情又把我惹火了。

“玛莎！你怎么啦？”他说。“问题不在是我对，还是你对，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不满？别急着说，先考虑一下，再把你心里想的都告诉我。你对我不满意，你大概是对的，不过，你得让我明白我到底错在哪儿。”

可是我怎么能把我心里想的都告诉他呢？他一眼就能知道我的心事，我在他面前又成了孩子了，我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他所

不了解或是他预先没有看出来的，——这使我就更激动了。

“我一点没有对你不满，”我说。“我只是感到无聊，我希望不要感到无聊。可是你却说必须这样，而且又是你对。”

我说完这话，瞧了瞧他。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平静消失了，他脸上现出了惊恐和痛苦的表情。

“玛莎，”他用低沉而激动的声音说。“我们现在做的事，决不是闹着玩的。现在正在决定我们的命运。我请你什么也别回答我，先听我把话说完。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呢？”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又是你对。你还是别说了吧，反正你对，”我冷冷地说，好象说话的不是我，而是我心里有一个恶魔在说话。

“假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就好了！”他说的时候声音发抖。

我哭了，开始感到好受了些。他坐在我身旁，什么也没说。我又是可怜他，自己又觉得惭愧，又气我所做的事。我没有看他。我觉得，这一刻他一定或是严厉地、或是困惑不解地瞧着我。我转脸一看：原来他正用一种好象请求原谅似的温存、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便握住他的手说：

“请原谅我吧！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对；可是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而且你说的是实话。”

“什么？”我说。

“我们一定得去彼得堡，”他说。“目前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可干的。”

“随你便，”我说。

他拥抱我，并且亲了亲我。

“请你原谅我，”他说。“我对不起你。”

那天晚上我为他弹了很久的琴，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

低声说着什么。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因此我常常问他嘟囔些什么，他总是想一想，然后把他的自言自语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我：多半是诗，有时候是毫无意思的废话，不过从这些废话里，我可以知道他的心情。

“你刚才在嘟囔什么呀？”我问道。

他站住，想了想，然后微微一笑，背了两行莱蒙托夫的诗：

……他象疯狂似的祈求暴风雨的来临，
好象暴风雨会给他带来宁静！

“不，他不是个普通人；他什么都知道！”我想道，“怎么能不爱他呢！”

我站起来，拉着他的手，开始和他一起走来走去，尽量使我们的步调一致。

“好吗？”他笑眯眯地瞧着我问道。

“好，”我低声说；一种愉快的心情笼罩了我们俩，我们的眼睛都笑了；我们的步子越迈越大，脚尖越踮越高。而且我们就这样迈着使格里戈里大为愤慨、使在客厅里打通关的妈妈惊奇的步子，穿过所有的房间，向饭厅走去；我们在那儿站住了，彼此对视，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两个星期，在圣诞节前，我们已经在彼得堡了。

七

我们去彼得堡的旅行，在莫斯科的一星期，拜访两家的亲戚，新居的安置，旅途的见闻，新的城市和新的人物——这一切都象梦似的过去了。这一切叫人眼花缭乱，新奇和愉快；他和他的爱把这一切照得那么温暖和明亮，使我觉得那静寂的乡村生

活似乎是一种遥远和微不足道的东西。令我大为诧异的是：我遇到的不是上流社会的骄傲和冷淡（我原来预料那里的人们都是那样），相反，他们都很真诚、亲切和高兴地欢迎我（不仅是亲戚们，而且还有不相识的人们），似乎他们一直都在想念我，盼望着我，我去了他们才高兴。还有一件出我意料之外的事：在一个我认为是最好的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我发现我丈夫有许多熟人，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的；我觉得这些人都非常善良；可是我丈夫却严厉地批评其中的某些人，听到这些话，我常常感到奇怪和不愉快。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那样冷淡地对待他们，而且竭力避开许多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称赞的熟人。我觉得，好人应该认识得越多越好，而这儿所有的人又都是好人。

“你看，我们应该这样来安排一下，”在我们离开乡村之前他说：“我们在这儿是个小财主，可是到那儿我们就成了穷光蛋，所以我们只能在城里住到复活节，不能出入交际场，否则我们就麻烦了；而且为了你，我也不愿意……”

“为什么要到交际场中去？”我答道，“我们只要去看看戏，看看亲戚，听听歌剧和好的音乐，不到复活节我们就可以回到乡下来了。”

可是我们一到彼得堡，这些计划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我忽然置身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新世界，在我周围充满了无穷的欢乐，在我面前出现了这样新奇有趣的事物，因此我就立刻（尽管是无意识地）把我的整个过去和过去所有的计划都抛弃了。“过去的一切简直是开玩笑；生活还没开始呢；而现在，才是真正的生活！将来还不定怎样呢？”我这样想。在乡村中使我烦恼的不安和烦闷，突然象变魔术似地完全消失了。我对丈夫的爱变得比较平静了，而且在这儿我再也没有想过，他对我的爱是不是比以前少

了？何况，我也不能怀疑他的爱情：我的任何思想他能立刻理解；对我的感情他都有同感；我的愿望他都满足。可是他的平静的神情在这儿却消灭了，或者是不再激怒我了。同时我感到：在这里，他不仅象以前那样爱我，甚至还在欣赏我。常常在拜访了客人，结识了新交，或是在我们家里举行晚会，我因为怕自己失礼而惶恐地尽了主妇的责任以后，他就会说：“真不错，小姑娘！妙极了！别害怕。真的，好极了！”于是我就十分高兴。在我们到彼得堡后不久，他写了封信给妈妈，并且叫我附上几笔，可是他不肯让我看信，正因为这样，当然罗，我就一定要看，结果我还是看了。他写道：“您一定不认识玛莎了，连我自己都不认识她了。她这种可爱而优美的自信、娴雅、交际的才能和殷勤周到是从哪儿来的呢？而且一切又自然、又妩媚、又贤淑。谁见了她都赞不绝口，连我自己也对她赞叹不已；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比以前更加爱她。”

“啊，原来我是这样的呀！”我想道。于是我高兴极了，舒服极了，甚至觉得比以前更爱他了。我在我们所有的朋友之中取得的成功，简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从各方面都听说，那儿有位叔叔特别喜欢我，这儿有位姑妈爱我爱得都发狂了；那个男人告诉我，我是彼得堡无与伦比的女人；另一个女人又使我相信，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成为社交界最风雅的女人。尤其是我丈夫的表姐，公爵夫人，上流社会中一位并不年轻的女人；她一见我就迷上了我，对我说的那些使我飘飘然的恭维话比谁都多。当这位表姐第一次请我去赴舞会，并请我丈夫答应的时候，他就对着我，带着勉强看得出的狡猾的微笑问我是不是想去？我点点头表示同意，同时感到自己的脸都红了。

“她象犯罪似地承认她想去，”他和蔼地笑着说道。

“你不是说过我们不到交际场中去的吗，而且你也不喜欢。”我答道，微笑着，用央求的眼光瞧着他。

“你要是非常想去的话，我们就去，”他说。

“真的，还是别去的好。”

“你想去吗？很想去吗？”他又问道。

我没有回答。

“社交界本身的害处倒不大，”他继续说，“可是社交界的填不满的欲望——却是不好的和丑恶的。一定要去，我们就去，”他最后坚定地说。

“说实话，”我说，“世界上我没有希望过任何东西，象我希望去参加这次舞会这样。”

我们去了，我所感到的愉快超出了我的意料。我觉得在这个舞会上，比以前更显得我是中心，一切都环绕着我旋转，只是为了我，这个大厅才灯烛辉煌，乐声悠扬，这一群赞美我的人才聚集到这里。所有的人，从理发师和侍女起，一直到穿越大厅的舞伴和老人止，似乎都在对我说或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是爱我的。在这个舞会上形成的对我的一致评论，我表姐把它告诉了我，那就是：我完全不同于别的女人，在我身上有一种独特的、乡村的、纯朴和迷人的东西。我的成功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因此我坦白地对我丈夫说，我很想今年再去参加两三次舞会，而且我还昧着良心加了这么一句：“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好好地过瘾了。”

我丈夫欣然同意了，最初他是带着明显的满意和我一起去的，为我的成功感到高兴，好象完全忘记了他以前说过的话，或是改变了他的初衷。

后来，他显然对我们所过的生活感到厌倦和苦恼。可是我

没工夫去管这个；即使有时我注意到他用关切严肃的眼光询问地注视着我，我也不懂得它的含意。我觉得，所有不相干的人都这么爱我，这种令人兴奋的爱，以及我初次在这儿呼吸到的那种优雅、愉快和新奇的气氛，使我如醉如痴，连他那约束着我的道德影响也突然在这儿消失了，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这个环境里，不但和他平等，而且还能高出于他，因而我对他的爱也比从前更深、更独立了，所以我不能理解，他在社交生活中究竟看到什么对我不愉快的事。每逢我走进舞会，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就会感到一种新的骄傲和自负，而他呢，就好象羞于当众承认他是我的占有者似的，赶紧离开我，消失在穿黑燕尾服的人群中。“等一等！”当我用眼睛搜寻着他那隐没在大厅尽头的、有时是寂寞的身影时，我常常这样想道。“等一等！”我想，“等我们回到家里，你就会明白，你就会看到：我尽量打扮得这么美和光艳照人究竟是为了谁，在今晚围绕着我的一切之中我到底爱的是什么。”我真心诚意地以为，我的成功所以使我高兴只是为了他，只是为了能够为他而放弃这种成功。我认为，社交生活对我只能有一个危害，我也许会迷恋上一个在交际场中结识的人而引起我丈夫的嫉妒；可是他非常信任我，他显得很平静、毫不在乎，我觉得所有这些青年人和他相比都微不足道，因此，在我看来，社交场中的这唯一的危险也就不足畏了。但是，尽管如此，交际场中许多人的注意却给了我愉快，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使我想到在我对丈夫的爱情中我多少有些功劳，因而使我对他的态度变得更自信，似乎也更随便了。

“我看见你跟 H·H 夫人在谈一件什么事，谈得可热闹哪，”有一次从舞会上回家时我说，一面用手指指着她，指名道姓地提到在当天晚上的确和他谈过话的那位彼得堡的知名女士。我说

这话是为了让他打起精神；他显得特别沉默，太抑郁寡欢。

“哎，说这种话干什么呢？连你也说这话，玛莎！”他好象由于肉体上的痛苦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道。“这和你我都不相称！让别人去说这种话吧；这种虚假的关系会破坏我们真正的关系，可是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真正的关系能够恢复。”

我感到惭愧，所以我没有做声。

“会恢复吗，玛莎？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它从来没有被破坏过，也不会被破坏，”我说，而且当时我也的确是这样想的。

“但愿如此，”他说，“其实，咱们也该回到乡下去了。”

可是这种话他只对我说过一次，我觉得，其余的时候他好象和我一样满意，而我是高兴极了，愉快极了。“即使他有时候感到寂寞，”我安慰自己说，“可是为了他，我在乡村里不是也寂寞过吗；要是我们的关系稍稍有些变化，那么只要我们夏天跟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一起住在我们的尼科尔斯科耶村的家里，这一切就都恢复。”

对我来说，冬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而我们违反我们的计划，甚至在彼得堡过了复活节。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已经准备起程，行李也都收拾好了；我丈夫已经买好送人的礼物、日用品和为装点乡村生活的花木，他正处在一种特别温柔愉快的心情中。就在这时候，表姐突然来看我们，请求我们过了星期六再走，以便去参加P伯爵夫人的隆重的招待晚会。她说P伯爵夫人很希望我去，因为有位M亲王那时正好在彼得堡，他在上一次舞会上就很想和我认识，他是为了这个才专程来出席这次招待晚会的，他还说我是俄国最漂亮的女人。全城的名流都会到那儿去，总之，要是我不去，那就太令人扫兴了。

我丈夫正在客厅里的另一头跟人说话。

“那么，玛丽，你去吗？”表姐说。

“我们打算后天回乡下去，”我瞧了瞧我丈夫，犹豫不决地回答。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急忙把脸转了过去。

“我会劝他留下的，”表姐说，“那咱们星期六就可以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好吗？”

“这会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们都已经收拾好了，”我开始有些让步。

“她最好今天晚上就去给亲王请安，”我丈夫从房间的另一头用抑制着愤懑的声调说，这种声调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

“哟！他吃醋了，这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呐，”表姐笑了起来。“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我劝她去并不是为了亲王，而是为了我们大家。P伯爵夫人是多么殷切地请她去啊！”

“这让她自己决定吧，”我丈夫冷冷地说完了这句话，就走了出去。

我看出他比平常更激动；这使我很难过，我什么也没答应表姐。她一走，我就到我丈夫那儿去。他在沉思地来回走着，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他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

“他在想象中已经看见他那可爱的尼科尔斯科耶的家了，”我瞧着他这样想道，“看见在明亮的客厅里的早上的咖啡、他的田地、农民、起居室的黄昏和午夜偷吃夜宵。不！”我自己在心里决定说，“为了他的快乐的腼腆，为了他的温存的抚爱，我情愿放弃世界上的一切舞会和世界上所有亲王们的奉承。”我刚要告诉他我不去参加招待晚会而且我也不愿去的时候，他突然回过头来，他一看见我，就皱起眉头，脸上温存沉思的表情也变了。他的目光中又现出了那种锐利、智慧、以保护者自居的平静的光

芒。他不愿让我看见他是个普通人；他永远要象一个宝座上的半人半神站在我面前。

“亲爱的，你怎么样？”他带着一副随便和若无其事的样子向我转过身来，问道。

我没有回答。我非常恼火他在我面前掩饰自己，不肯保持我所爱他的那个样子。

“星期六你想去参加那个招待晚会吗？”他问道。

“我是想去的，”我答道，“可是你不赞成。再说，一切都收拾好了，”我又加了一句。

他从来也没有用这样冷冰冰的眼光瞧过我，从来也没有用这样冷冰冰的声调跟我说过话。

“下星期二以前我不走，我去叫人把行李打开，”他说，“你要是想去的话可以去。请去吧。我不走了。”

他开始在房间里烦躁地走来走去，也不看我，他激动的时候一向都那样。

“我简直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我说时站在原地，用眼睛盯着他，“你说你永远都会保持冷静（他从来也没说过这话）。你干吗要跟我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为了你我情愿牺牲这种乐趣，你反倒用你从来也没跟我用过的这种讽刺口吻硬要我去。”

“那又怎么样！你牺牲（他特别着重地说这两个字），我也牺牲，这再好也没有了！这是在比赛宽宏大量。还有比这更好的家庭幸福吗？”

他的这种冷酷的嘲讽的话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可是他的嘲笑并没有使我感到羞愧，只是使我觉得受了侮辱；他的冷酷没有吓住我，反而引得我也冷酷起来。这是他，这个一向害怕我们彼此说话不真诚、永远都是真诚纯朴的人，说的话吗？而且是为了

什么？就因为我真心想为他牺牲我看不出有什么害处的乐趣，就因为在一分钟以前我还非常理解他和爱他。可是我们的态度却颠倒过来了，他不想直率简单地说话，我却设法这样做。

“你变得太厉害了，”我叹了口气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不是招待晚会，而是你心里对我另有积怨。干吗要这样不说实话呢？你自己一向不是最怕不真诚吗？直截了当地说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怨恨我？”“看他说什么，”我想道，同时我洋洋自得地回想起，这整个冬天我做的事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指责的。

我走到房间当中，这样他就得挨着我身边走过去，我望着他。“他走过来，抱抱我，一切也就完了，”我心里这样想道，我甚至惋惜没能向他证明他的不对。可是他却在屋子的尽头站住了，望了望我。

“你还是不明白吗？”他问道。

“不明白。”

“那我就告诉你吧。我感到的和我不能不感到的这一点使我厌恶，使我第一次这样厌恶。”他停住不说了，显然是因自己的粗暴的声音而感到吃惊。

“那又怎么样？”我问道，我的眼睛里噙着愤怒的眼泪。

“我厌恶，因为亲王认为你很漂亮就使你把丈夫，把自己和做女人的尊严统统忘了，而跑去逢迎他，而且你还不明白，如果你自己没有自尊心，你丈夫应该替你感到难过；你反而来对你丈夫说，你在作出牺牲，这意思就是说：‘博得殿下下的青睐是我莫大的幸福，可是我牺牲了它’。”

他越往下说，越被自己的声音激动；这种声音听来又狠辣，又冷酷、又粗暴。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料到过他会这样；血

涌上了我的心，我害怕了，可是同时，一种委屈的羞耻感和遭受侮辱的自尊心使我激动，我想对他报复。

“我早就料到这一点了，”我说，“你说吧，说吧。”

“我不知道你料到了什么，”他继续说，“眼看着你天天陷在这个愚蠢社会的污浊、怠惰和奢侈里，我早就预料到最坏的结果了；而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过羞耻和痛苦；当你的朋友把她那双肮脏的手伸进我的心里，说我嫉妒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痛心；她说我嫉妒，那我嫉妒谁呢？嫉妒一个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的人。而你却故意不肯理解我的心情，要为我牺牲——牺牲什么呢？……我真替你害臊，替你的低三下四害臊！……牺牲！”他又重复道。

“啊！原来这就是丈夫的权力！”我想道。“侮辱和欺凌一个完全无辜的女人。这就是做丈夫的权利，可是我不会对它屈服。”

“不，我什么也没有为你牺牲，”我说这话时，感到我的鼻翼不自然地扩张起来，脸上失去了血色。“我星期六要去参加招待会，而且非去不可。”

“但愿你能去尽情地享乐，不过你我之间的一切都完了！”他叫喊道，他的无法遏制的狂怒突发了。“你以后再也别折磨我了。我以前是个傻瓜，因为……”他又开始说道，可是他的嘴唇抖起来，显然是在拚命克制自己，以免把这句开了头的话说完。

在这一瞬间我既怕他又恨他。我要对他大大发作一通，想为了所受的一切侮辱对他报复；可是如果我一开口，我就会哭出来，在他面前失去尊严。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可是等我一听不见他的脚步声时，我就突然对我们所做的事感到害怕。我怕构成我的全部幸福的这个关系真的会永远破裂，所以我想

回去。“但是，当我默默地伸出手去给他，瞧着他的时候，他能够平静下来，理解我吗？”我这样想道。“他能明白我的大度能容吗？万一他说我的悲伤是装出来的，那怎么办？或者他自以为有理，露出一副傲慢的泰然自若的态度来接受我的忏悔和原谅我？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个我所挚爱的人，会这样冷酷无情地侮辱我呢？……”

我没去找他，而是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独自在那里坐了很久，流着眼泪，恐惧地想起我们俩谈话里的每句话，并且把这些话换成了别的话，还加上了其他温柔的话，然后我又怀着恐惧和一种被侮辱的心情想起了刚才的一幕。黄昏时我出去喝茶，当着来我们家做客的C面前遇见了我丈夫；我感到从今天起我们俩之间有了一条鸿沟。C问我哪一天走。我没来得及回答他。

“下星期二，”我丈夫答道，“我们还要去参加P伯爵夫人的招待晚会。”他转身问我：“你不是要去吗？”

他那种随便的声调使我害怕，我胆怯地回头看了看他。他的眼睛直视着我，眼光中含着恶意和嘲笑，他的声音平稳，冷冰冰的。

“是的，”我答道。

晚上，就剩下我们俩的时候，他走到我跟前，伸出手来。

“我今天跟你说的话，请你把它忘了吧，”他说。

我握住他的手，我脸上现出战栗的微笑，眼睛里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可是他把手又缩了回去，好象害怕这种多情的场面似的，他在一张离我相当远的手圈椅上坐下来。“难道他还以为自己是对吗？”我想道；我本来准备好的解释，并且要求不去参加招待晚会，可是我把话咽下去了。

“得写封信告诉妈妈，我们还得晚几天动身，”他说，“不然她

会着急的。”

“你想哪天走？”我问道。

“下星期二，招待晚会以后，”他答道。

“我希望这不是因为我，”我说时瞧着他的眼睛，可是那双眼睛只是瞧着我，没有任何表情，好象有一片雾障把它们和我隔开似的。我突然觉得他的脸变得又老又丑。

我们去参加了招待晚会，我们之间似乎又恢复了良好的、亲密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在招待晚会上，我正和几位贵夫人坐在一起时，亲王走到我跟前，为了和他说话，我得站起来。在站起来时，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在搜寻我的丈夫；我看见他正从大厅的另一头瞧着我，接着就把脸扭了过去。我突然觉得那么羞愧和痛苦，以致使我局促万分，在亲王的一瞥之下，我连脸和脖子都红了。但是我必须站着，听他和我说话，让他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我。我们谈了不久，在我旁边没有他坐的地方，而且，他大概感到，和他在一起我很不自在。我们谈到上一次的舞会，谈到我上哪儿去消夏，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离开我的时候，表示希望和我丈夫认识，后来我看见他们在大厅的另一头结识了，在谈话。亲王准是说到了我，因为在他们谈话的中间，他微笑着回过头来，朝我这面看了看。

我丈夫突然涨红了脸，深深地鞠了个躬，先离开了亲王。我的脸也红了，因想到亲王一定会对我，尤其是对我丈夫有一种看法，我就感到害臊。我觉得当我跟亲王说话的时候，谁都看出了我那难堪的羞涩和我丈夫的奇怪举动；天知道他们会怎样解释这件事；说不定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和丈夫的龃龉了？表姐用车送我回家，在路上我和她谈到我丈夫。我忍不住把由于这个不

幸的招待晚会在我俩之间引起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她。她安慰我说，这没什么大不了，这是个很平常的口角，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而且她还根据自己的看法对我说明了我丈夫的性格，她发现他变得又孤僻又傲气；我同意她的看法，我还觉得，我自己现在能更平静和更好的理解他了。

可是后来就剩下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时候，对于这样议论他的做法，就象犯了罪似地压在我的良心上，我感到现在把我们彼此分开的鸿沟变得更深了。

八

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关系都完全变了。每逢我们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象从前那样快乐了。有些问题我们避而不谈，有第三者在场，我们谈话反倒比两人单独相对时更容易。只要一谈到乡村生活或者舞会，我们就好象怪别扭似的，彼此都不好意思瞧着对方。我们俩好象都知道，把我们分开的鸿沟在哪儿，可是又都怕接近它。我确信他又骄傲，性子又急躁，所以必须小心谨慎不去碰他的弱点。他也确信，我没有社交生活就活不下去，我不喜欢乡村，因此必须迁就这个不幸的趣味。我们俩都避免直接谈到这些话题，而且互相误解对方。我们早就谁也不把谁当作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了，而且总拿对方和别人作比较，在心里互相批评对方。在离开彼得堡以前我身体不好，我们非但没有到乡下去，反而搬进了一所别墅，我丈夫便从那儿独自回去看母亲。他动身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可以和他一起走，可是他硬劝我留下来，好象是担心我的健康似的。我感到他并不是担心我的健康，而是担心我们在乡下会不快活；我没十分坚持，便留了下来。他不在，我感到空虚和

寂寞，可是当他回来以后，我又感到，他已经不能在我的生活中增加从前增加过的东西。从前我要是不把任何一种思想和感受告诉他，我就会象犯了罪似的感到痛苦，他的一言一行对于我都似乎是完美无缺的典范，只要彼此看着对方，我们就会不知道为什么高兴得想笑，——现在，我们的这种关系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一种，我们甚至没有发现，它已经不见了。我们俩都出现了各自的兴趣和须要操心的事，可是我们已经不再想把它们变成共同的了。我们俩各自有了自己的彼此无关的天地，这也不再使我们感到烦恼了。我们对这种想法已经习惯了，一年以后，当我们彼此对看的时候，也不再感到别扭了。他那和我在一起那种突发的孩子般的欢乐，也完全消失了，以前使我愤慨的他那原谅一切、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也消失了；以前使我又难为情又高兴的那种深沉的眼光再也没有了，以前一同祷告一同欢乐的情景也没有了。我们甚至不大见面，他经常出门，不怕也不惜把我一个人留下；我也经常出入社交界，在那里我不需要他。

我们俩之间再也不发生口角和争执了，我尽量依着他，他也极力满足我的一切愿望，我们似乎很相爱。

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不大有的事），我和他在一起既不感到快乐，也不感到激动，也不感到慌乱，好象旁边没有人似的。我非常清楚，他是我的丈夫，不是个什么不认识的生人，而是个好人，他是我的丈夫，我熟悉他，就象熟悉我自己一样。我深信：他要做什么，他要说什么，他有什么看法，——我都知道；万一他的做法和看法不象我所预料的那样，我就会认为他做错了。我对他没有任何期望。一句话，他是我的丈夫，如此而已。我觉得这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俩之间没有别的关系，甚至从来也不曾有过别的关系。他出门的时候，尤其是在一开头，我

感到孤独和害怕，他不在，我就更加强烈地感到他的支持对我的意义；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快乐得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然而两个钟头以后，我就会把这种快乐忘得一干二净，我会感到跟他无话可说。只有在我们俩之间有时发生的那种平静温和的柔情脉脉的瞬间，我才觉得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有点痛苦，而且，我觉得，我从他的眼睛里也看到了同样的心情。我感觉到这种柔情有个界限，他现在好象不想越过它，而我又不能越过。这有时候使我悲伤，可是我没有工夫来思虑这一切，因此我就尽量把我模糊地感到的这种变化的悲伤，忘却在我经常能得到的消遣里。社交生活，最初以它的五光十色和虚荣心的满足使我眼花缭乱，而且很快就完全支配了我的癖好，变成了习惯，把它的枷锁套在我身上，占据了我心里用于容纳感情的全部地方。我从不独自一个人待着，我怕考虑自己的处境。我所有的时间，从晌午起到深夜，都没有空，即使我不出去，我的时间也不是属于我的。这对于我，已经既不是快乐，也不是无聊，似乎一向是这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这样过了三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关系始终都是那样，它好象是停止了，冻结了，既不可能变坏，也不可能变好。在这三年里，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可是这两件事也没有改变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和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的去世。起初，做母亲的感情用这样的力量充满了我的心，而且在我心里引起了这样一种意外的欢悦，因此，我想，我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可是过了两个月，我又开始出去了，这种感情就越来越淡，终于变成了一种习惯和一种毫无生气的履行义务。我的丈夫，恰恰相反，从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起，又变成从前那样，又温存，又平静，不喜欢出门了，而且把他原有的

温柔和喜悦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常常，当我穿着赴舞会的衣服走进育儿室去给孩子在临睡前画十字，在育儿室遇见我丈夫的时候，我似乎总感到他用责备的、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我，使我感到惭愧。我对孩子的冷漠突然使我自己吃惊，我问自己：“难道我比别的女人坏吗？可是我有什么法子呢？”我想道。“我爱我的儿子，可是总不能整天跟他坐在一起，这会使我感到无聊的；可是我也决不会装假。”他母亲的死对他是巨大的悲哀；他说在她去世以后还住在尼科尔斯科耶会使他痛苦，至于我，虽然也悼念她，虽然也同情我丈夫的悲痛，可是我却觉得现在住在乡下更愉快、更清静。这三年我们多半是在城里度过的，我只有一次在乡下待了两个月，第三年我们就出国了。

我们在温泉度过了一个夏天。

那时候我二十一岁，我们的经济状况，我想，是最好的时候；家庭生活所给予我的东西使我不再有任何需求；我觉得，所有我认识的人都爱我；我的健康情况良好，我的服装在温泉是最考究的；我知道我长得很美；天气又好；我周围充满了美和优雅的气氛，我真是快活极了。这种快乐和在尼科尔斯科耶时并不一样，那时候我感到我本身就是幸福的；我幸福是因为我应该得到这种幸福；我固然非常幸福，可是还应该更幸福，总想越来越幸福。那时候是另一回事；可是在这个夏天，我也很快活。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希望，什么都不害怕；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心里也很平静。在这个季节里，在所有的年轻人里，没有一个人能使我另眼相看，甚至不比对我大献殷勤的我们的老公使K公爵强些。有的年轻，有的年老；有的是淡黄色头发的英国人，有的是留胡子的法国人，对我来说他们都一样，可是他们都是我必不可少的。这些全都毫无区别的人，在我周围形成了一种快乐

生活的气氛。其中只有一个人，意大利的 D 侯爵，以他那对我表示的大胆的赞美，引起了 I 比对别人更多的注意。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和我在一起的机会，和我跳舞、骑马、去娱乐场等等，还说我美。有几次我从窗口看见他在我们家的周围徘徊，他那双发亮的眼睛的怪讨厌的凝视，常常使我脸红，扭过头去。他年轻、漂亮、文雅，尤其是他的微笑和额头的神情很象我丈夫，虽然他比我丈夫漂亮得多。他和我丈夫的这种相似使我感到惊讶，虽然总的来说，他的嘴唇、目光和长下巴上，没有我丈夫那种善良和富有理想的宁静的美，有的只是一种粗鄙的、兽性的东西。那时候我以为他热烈地爱上了我，而且我有时候也怀着高傲的怜悯想到他。有时候我又想让他冷静，使他的态度转变成一种半是友谊的、平静的信赖，可是他断然拒绝了我的尝试，继续用他那按捺不住的、随时都会爆发的热情使我心烦。虽然我没有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可是我怕这个人，而又常常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想他。我丈夫认识他，跟他比跟我们的别的朋友更熟（在那些人眼里，我丈夫不过是自己妻子的丈夫而已）；对他冷淡而傲慢。在这个季末，我病了，两个礼拜没有出门。当我病后头一次在晚上出去听音乐的时候，我知道了在我生病期间，有位被人们盼望已久的、以自己的美貌闻名的 C 夫人来了。一群人簇拥着我，兴高采烈地欢迎我，可是却有一群更体面的人簇拥着那位新来的交际花。我周围的人也一个劲地在谈她和她的美丽。人家把她指给我看，她的确很迷人，不过她脸上那洋洋得意的神情却使我很不舒服，我把这个意见说了出来。以前我觉得是那么快活的一切，这天在我看来都索然无味。第二天，C 夫人安排去游一座古堡，我谢绝了这一邀请。和我一起留下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因此，在我眼睛里一切都完全变了。我觉得一切事和一切人都

是愚蠢和无聊的，我想哭，想赶快结束我的疗程回俄国去。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感情，可是我还不肯对自己承认它。我借口身体不适，再也不在盛大的集会上露面了，只是有时候早上独自去喝点矿泉水，或是和一位俄国女友 JIM 坐车去郊外。这时我丈夫不在；他要在海得尔堡待几天，等我的疗程结束一同回俄国去，只是偶尔来看看我。

有一天，C 夫人带着大伙去打猎，我和 JIM 在午饭后坐车去逛古堡。我们的马车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缓缓前进，两旁净是百年的栗树，透过古树，展开一片迎着落日余晖的巴登郊外的美丽恬静的景色。一路上我们严肃地交谈着，以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这么交谈过。虽然我早就认识 JIM，可是我今天头一次觉得她是个又好又聪明的女人，跟她可以无话不谈，跟她做朋友是很愉快的。我们谈到家庭，谈到孩子，谈到这里生活的空虚，我们真想回到俄国，回到乡村去，不知怎么我们变得又忧愁又愉快起来了。在这种严肃心情的影响下我们走进了古堡。里面绿荫蔽日，凉气袭人，阳光在废墟的上方嬉戏，可以听到什么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从门口望去，象镶在画框里似的，现出了一幅美妙的、而在我们俄国人看来却是冰冷冷的巴登的风景。我们坐下来休息，默默地望着落日。说话声听得更清楚了，我觉得好象有人在提我的名字。于是我侧耳倾听，无意之中听清楚了每句话。说话的声音很熟悉：原来是 D 侯爵和我也认识的他的那个法国朋友。他们在谈论我和 C 夫人。法国人在拿我跟她比较，分析我们俩的美。他并没说什么侮辱人的话，可是当我听清楚了他的话时，我的血便涌上了我的心头。他详详细细地说明，我有什么优点，C 夫人有什么优点。我已经有了孩子，而 C 夫人只有十九岁；我的头发固然好看些，可是她的体态却更轻盈婀娜；

C 夫人是位贵妇人,而“您的那位呢,”他说,“不过尔尔,不过是一位小小的俄国公爵夫人罢了,现在这类人这儿有的是。”他的结论是:我的做法很好,不打算同 C 夫人竞争;说我在巴登已被彻底埋葬了。

“我很可怜她。”

“只要她不是想和您在一起得到安慰,”他愉快而又冷酷地哈哈一笑,补充道。

“如果她离开这里,我就跟她走,”另一个带意大利的口音粗鲁地说。

“幸运的人! 他倒还能恋爱!”法国人笑了起来。

“恋爱!”另一个人说,接着又沉默了片刻。“我没法不恋爱! 没有爱情,我就活不下去。人生在世,恋爱乃是唯一的乐事。我的风流韵事从不半途而废,这一次我也要干到底。”

“Bonne chance, mon ami,”^① 法国人说。

因为他们拐过了墙角,下面的话我们就听不清了;接着我们从另一个方向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他们在下楼梯,过了几分钟,他们就从旁门出来了,看到我们,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当侯爵走近我的时候,我的脸都红了,走出古堡的时候,他向我伸出手来让我挽着,我觉得很害怕。我没法拒绝,于是我们便跟在和他的朋友走在一起的 JIM 后面向马车走去。我觉得那法国人对我的议论侮辱了我,虽然我心里承认,他只是把我自己所感到的说了出来;可是侯爵的话太粗鲁,使我吃惊和愤慨。一想到虽然我听见了他的话,而他却不怕我,我就感到痛苦。他离我这么近,使我感到厌恶,因此,我匆匆地跟在 JIM 和那个法国人后

① 法语:我的朋友,祝你成功。

面,不看他,也不理他,尽量松松地挽着他的胳膊,好不去听他说话。侯爵谈到美丽的风景,谈到能遇见我是意外的幸福,还有别的什么话,可是我没有去听他。这时候我想到我的丈夫、孩子和俄罗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惭愧,有点悲伤和烦闷,我想赶快回去,回到 Hôtel de Bade^① 我那孤零零的房间去,以便无拘无束地考虑一下刚才在我心里涌起的种种纷乱的情绪。可是 JIM 走得很慢,离马车还很远,而我的伴侣呢,我觉得他在尽量放慢脚步,好象打算让我停下。“不能这样!”我这样想时,便坚决地加快脚步。可是他真的拽住了我,甚至还挟紧了我的胳膊。JIM 拐了弯,就剩下我们两人了。我感到害怕。

“对不起,”我冷冷地说,想把我的手抽出来,可是我袖口的花边挂在他的钮扣上了。他弯下腰,开始来解开花边,他那没戴手套的手指碰了一下我的手。一种不知是害怕还是愉快的新奇的感觉,使我的脊梁骨一阵发冷。我瞧了瞧他,想用冷淡的目光来表示我对他的无限轻蔑;可是我的目光没有把这一点表达出来,它只表现出惊慌和激动。他那双燃烧着的、润湿的眼睛正紧靠着我的脸,狂热地瞧着我,瞧着我的脖子和我的胸部;他的两手抚弄着我的手臂,他那张开的嘴唇在说着什么,说他爱我,说我是他的一切,于是他的嘴唇越来越靠近我了,他的手把我的手也越抓越紧,灼痛了我。一团火通过我的血管,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浑身哆嗦,我想说的阻止他的话也在我的喉头哽住了。我突然感到他在亲吻我的脸颊,于是我浑身哆嗦,发冷,我停下脚步望着他。我既说不出话来,也不能动弹,只是感到害怕,有所期待和盼望。这一切只持续了一刹那。不过这一刹那是可怕

① 法语:巴德旅馆。

的！在这一刹那间我看清了他的一切。我把他的面貌看得清清楚楚：草帽下那低低的、凸出的前额很象我丈夫的前额，那鼓着鼻孔的美丽的、笔直的鼻子、那抹了刺鼻的香膏的长长的小胡子和络腮胡子、那刮得光光的面颊和晒得黑黑的脖子。我又恨他又怕他，我觉得他是那么陌生；可是在这一刹那间，这个可恨的陌生人的激动和狂热却在我心里引起了那样强烈的反响！我感到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想让那粗野而又美丽的嘴尽情地吻我，听凭那露出纤细的青筋、手指上戴着宝石戒指的胳膊来拥抱我。我一心只想不顾死活地投进那个突然在我面前张开的、富有诱惑力的、充满被禁止的欢悦的深渊……

“我太不幸了，”我想道，“让更多，更多的不幸落到我头上来吧。”

他用一只手搂住我，接着便俯身对着我的脸。“好吧，就让羞耻和罪恶越来越多地落到我头上来吧。”

“Je vous aime,”^①他低声说，他的声音很象我丈夫的声音。我想起了我的丈夫和孩子，好象这是老早以前为我所宝贵、现在完全与我无关的人一样。可是就在这时候，突然从拐角那边传来了JIM叫我的声音。我清醒过来，把手挣脱出来，然后，没有看他，差不多奔跑着去追JIM。我们坐上了马车，这时我才瞧了瞧他。他摘下帽子，笑眯眯地问了一句什么话。他不懂得在这一刻我对他是感到多么难以形容的厌恶。

我觉得我的生活是那么不幸，未来是那么渺茫，过去是那么黑暗！JIM跟我说话，可是我听不懂她的话。我觉得她跟我说话只是出于怜悯，为了掩饰我在她心里激起的轻蔑。在她的每

① 法语：我爱你。

句话和每个眼神里，我似乎都感到这种轻蔑和侮辱人的怜悯。那一吻的耻辱灼烧着我的面颊，一想到丈夫和孩子简直使我受不了。我独自待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的时候，我希望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处境，可是我又怕独自待着。我没喝完给我端来的茶，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心急如焚地准备立刻乘晚车到海得尔堡去找我丈夫。

当我和使女坐上空空的车厢、火车开动、凉风从窗口吹拂着我的时候，我才开始清醒过来，也比较清晰地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从我们初到彼得堡那天起的我的整个婚后生活，我现在忽然用新的眼光来看它，它象一种谴责，压在我的良心上。我第一次清晰地回想起我们在乡村的最初情景和我们的计划，而且我心里第一次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所有这段时间内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快乐？于是我感到自己对不起他。“可是他为什么不制止我呢，为什么要对我口是心非呢，他为什么要逃避解释呢，为什么要侮辱我呢？”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他不对我行使他对我的爱情的权力呢？难道他不爱我吗？”可是不管他有多大过错，我还是感到那个讨厌的人的吻留在我的面颊上。我越是接近海得尔堡，我丈夫的模样在我想象中就越清晰，我也就越怕我们即将到来的会面。“我要把一切，一切都告诉他，我要用悔恨的眼泪在他面前求得宽恕，”我想道，“他会原谅我的。”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告诉他的“一切”是什么，而且我自己也不相信他会原谅我。

可是我刚走进我丈夫的房间，看见他那平静的，虽然是诧异的面庞时，我就感到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他的，没有什么可承认的，也没有什么需要请求他的原谅。那没有倾吐出来的悲哀和悔恨必须埋藏在我的心底。

“你怎么会想到这儿来的呢？”他说，“我本来想明天去看你的。”然后，他走近前来细看我的脸，好象很吃惊似的。“你怎么啦？你出了什么事吗？”他说。

“没什么，”我好容易忍住眼泪答道。“我来了就不走了。咱们就是明天回俄国也行。”

他相当久地、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

“你说吧，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他说。

我不由得脸红了，把头低了下去。他眼睛里闪着受了侮辱和愤怒的光芒。我害怕他可能会产生的想法，便用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的装假的本领说道：

“没出什么事，只是一个人待着怪寂寞、怪难受的，我想了很多关于我们的生活和你的事。我早就感到对不起你！为什么你要把我带到你不愿意来的地方来呢？我早就感到对不起你了，”我重复这句话，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们回乡下去吧，永远住在那里。”

“唉！亲爱的，别来这种多愁善感的场面吧，”他冷冷地说，“你想回乡下去，这很好，因为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至于说永远在那儿住下去，那是幻想。我知道你是待不住的。还是喝点儿茶吧，还是这样好些，”他说完这句话，就站起身来按铃叫侍者。

我想象到他可能对我的种种想法，而且，在我一接触到他那注视着我的怀疑而又令人羞愧的眼光时，我就认为他心里一定产生了可怕的想法，为此，我感到受了侮辱。不！他不愿意也不会理解我的！我说我要去看孩子，就离开了他。我想一个人待着，我想哭，哭，哭……

九

好久没有生火的尼科尔斯科耶的空房子，又有了生气，不过这儿存在过的事物，有的却不能复返了。妈妈已经不在，只有我们俩朝夕相对。可是现在，我们不但需要这种单独相处，它甚至使我们拘束。对我来说，那个冬天过得更糟，因为我一直在生病，直到生了第二个儿子以后才恢复。我和丈夫还是保持那种冷漠的友好关系，就象我们在城市生活时期一样，可是在乡村，每块地板、每堵墙、每张沙发都使我回想起他从前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回想起我失去的东西。好象有一种未被饶恕的宿怨横在我们中间，好象他为什么事情在惩罚我，但又装作自己没有觉察似的。我没有事情要请求原谅，也无需请求赦免；他惩罚我的方法只是：他不象从前那样把他的整个身心都交给我了；然而他也不把它交给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好象他已经没有心了似的。有时候我想，他只是装成这样来折磨我，从前的感情还活在他心里，所以我就极力想唤醒它。但是他每次都好象不愿意以诚相见，好象怀疑我在装假，而且害怕任何情意绵绵的场面，好象怕显得可笑似的。他的目光和声调似乎在说：我全知道，我全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你想要说的话，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你说的是一回事，干的是另一回事。起初我对他这种害怕以诚相见的态度感到受侮辱，可是后来也就习惯了，我想：他并不是不肯以诚相见，而是没有以诚相见的要求。现在要我突然对他说我爱他，或是求他和我一起念祈祷文，或是叫他来听我弹琴，——这些话，我现在实在难以启齿。我们俩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相敬如宾的默契。我们各过各的生活。他有他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不需要我管，现在我也不想去管，我有我自己的闲

散的生活，这种生活再也不象从前那样使他生气或是使他伤心了。孩子们还太小，还不能把我们俩结合起来。

但是春天来了，卡佳和索尼亚到乡村来消夏；因为我们在尼科尔斯科耶的房子开始翻修，我们便搬到波克罗夫斯科耶去住。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那座老宅还是和从前一样：凉台、折叠桌、摆在明亮的客厅中的钢琴、我那挂着白窗帘的旧时的卧室，以及似乎被忘却在那儿的我的少女时代的梦想。这个小房间里有两张小床——一张是我从前睡的，现在在这张床上睡着伸手伸脚的胖乎乎的可可沙，每天晚上我都给他画十字；另一张小床上，从襁褓中露出万尼亚的小脸。给他们画完十字，我常常站在这静悄悄的房间中间，这时从各个角落里，从墙壁上和窗帘上便突然浮现出旧时的、被忘却的青年时代的幻影。旧时的声音唱起了我少女时代的歌。这些幻影到哪儿去了？这些可爱的、甜蜜的歌到哪儿去了？我过去几乎不敢希望的一切都实现了。那些不清楚的模糊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现实却变成了一种沉重的、难堪的和毫无乐趣的生活。可是这里却一切如旧：从窗口看见的还是那同样的花园，同样的草坪，同样的花径，同样的长凳放在那边的峡谷之上，从池塘边传来同样的夜莺的歌唱，同样的盛开的丁香，同样的月亮高悬在房屋上面；然而人事的变迁真是太大了，也太难以置信了！本来应该是那么宝贵亲近的一切却成了这么冷冰冰的！象过去一样，我和卡佳两个人坐在客厅里悄悄地谈话，谈论着他。可是卡佳已是满脸皱纹，脸色也变黄了；她的眼睛也不再闪烁着快乐和希望，只是现出同情的哀愁和惋惜。我们不再象从前那样赞赏他了，我们议论他，我们并不惊奇为什么和何以我们会这么幸福，也不愿意象从前那样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全世界了；我们象阴谋家似的彼此窃窃私语，而且我们

第一百次地互相讯问，为什么一切会变得这么凄凉？而他还是从前的那个他，只是他眉心的皱纹加深了，两鬓的白发增多了，可是他那深沉专注的目光却常常被乌云笼罩住，和我隔开。我也还是从前的我，可是我心中既没有爱情，也不希望爱情。我没有工作的要求，也不满意自己。以前的宗教的欢悦、以前的对他的爱、以前的充实的生活，现在似乎都是遥远的、不可能的了。为别人活着就是幸福——以前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明白合理的；可是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明白它的意义了。当一个人甚至不想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为别人活着呢？

自从我们搬到彼得堡以来，我就把音乐完全抛弃了；可是现在，这架旧钢琴和这些旧乐谱又使我动心。

有一天，我不大舒服，独自待在家里；卡佳和索尼娅跟他一起到尼科尔斯科耶去看新房子去了。茶桌已经摆好，我下了楼，坐在钢琴前等他们。我打开 *quasi una fantasia* 奏鸣曲，开始弹奏。看不到什么人，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朝花园的窗子开着；熟悉的、忧伤庄严的琴音便在房间里鸣响着。我弹完第一乐章，便完全无意识地照老习惯回头瞧了瞧那个角落，以前他总爱坐在那儿听我弹琴。可是他并不在那儿；那张好久不曾搬动过的椅子还摆在原来的角落里；从窗口可以看见那丛浴着落日余晖的丁香，傍晚的凉风从开着的窗口飘进来。我两肘支在钢琴上，用手捂着脸，沉思起来。我这样坐了很久，痛苦地回想起无法挽回的过去，胆怯地想着未来。但是我的前面似乎什么都没有，我好象既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希望。“难道我的生命已经过去了吗？”我想道；我恐怖地抬起头来，为了忘却和不再思索，我又弹起了琴，还是弹那个 *andante*①。“我的上帝！”我想，“我要是犯

① 意大利语：行板。

了罪，就请你饶恕我吧，或者把以前曾在我心里如此美好的一切赐还给我，或者请你指点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该怎样生活？”传来了车轮驶过草地的声音，接着声音就到了台阶跟前；然后就听见凉台上有那小心翼翼的、熟悉的脚步声，接着就沉寂了。可是我的心对这种熟悉的脚步声再也不象从前那样有什么反应了。当我弹完这个乐章的时候，我听见背后有脚步声，接着便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真聪明，竟想到弹这支奏鸣曲，”他说。

我没有作声。

“你还没喝茶吗？”

我摇摇头，也没有回头瞧他，免得让他看见我脸上留下的激动的痕迹。

“她们马上就来；马捣乱，她们干脆离开大路走回来，”他说。

“等等她们吧，”我说完这话，就走上了凉台，希望他也跟过来；可是他问了问孩子的情况，就去看他们了。他的出现和他那亲切随便的声音又使我怀疑我是不是失去了什么。我还能希求什么呢？他又善良，又温柔；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缺少什么。我走到凉台上，在帆布篷下的长凳上坐下；在我们定情的那一天，我就是坐的这条长凳。太阳已经西沉，天开始黑了，一小片春天的乌云悬挂在房屋和花园的上空，只有在树林后面才看得见一片晴朗的天空，染着即将消逝的晚霞，一颗刚升起的黄昏的星星正在天边闪烁。薄云的阴影笼罩着一切，而一切正在等待着一场静静的春雨。风息了，连一片叶子，一棵小草都不动了；丁香和稠李的香味十分浓郁，似乎整个空气都象开了花似的，花园里，凉台上都是花香，一阵阵，忽浓忽淡，使人真想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一个劲儿闻着这种甜甜

的芳香。大丽菊和一丛丛玫瑰还没开花，一动不动地挺立在被掘松的黑色狭长的花畦里，好象它们顺着刨光的白色支架在慢慢地往上长；在峡谷下面，青蛙好象要趁下雨之前（雨一下就会把它们赶下水去）拚命鼓噪，齐声而响亮地阁阁叫着。只有一种潺潺不断的流水声盖过了这片蛙鸣。夜莺在互相唱和，可以听到它们在惊慌地从这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这个春天又有一只夜莺想在窗下的灌木丛中筑巢，我走出去的时候，听见它飞到林荫路的对面去了，由那儿啼叫了一次，就不再叫了，它也在等着下雨。

我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在等待什么，又在惋惜什么。

他从楼上回来，在我身旁坐下。

“看来，她们要被雨淋了，”他说。

“是的，”我说，然后我们俩沉默了很久。

没有风，乌云越压越低；一切变得更寂静了，花香也更浓了，树木更是纹丝不动，突然掉下一滴雨点，好象还在凉台的帆布遮阳上跳了一下，接着另一滴雨点打在小径的砾石上；接着便噼噼啪啪地打在牛蒡叶上，于是便开始下起一阵雨点很大的、凉爽的骤雨来。夜莺和青蛙都沉寂了，只有那潺潺的水声，虽然在雨声中似乎显得更远，却还在空气中回荡；有一只小鸟，大概是躲进了靠近凉台的干叶子里，在不紧不慢地唱着它那两个单调的音符。他站起来想走。

“你上哪儿？”我喊住他，问道。“这儿多好啊。”

“得叫人把雨伞和套鞋送去，”他答道。

“用不着，雨马上就会过去的。”

他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便一起留在凉台的栏杆边。我把一只手支在滑腻潮湿的栏杆上，把头伸出去。清新的雨纷纷落下，

把我的头发和脖子打湿了几处。乌云逐渐变亮变薄，在我们头上掠过；从天空和从树叶上掉下来的稀疏的雨点代替了均匀的雨声。青蛙在下面又阁阁地叫起来，夜莺又抖擞起精神，开始一会儿从这边，一会从那边，从湿漉漉的灌木丛中鸣叫起来。在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明亮起来了。

“多好啊！”他说着便坐在栏杆上，一面用手抚摩着我的濡湿的头发。

这种简单的爱抚在我身上起了责备似的作用，我真想哭。

“一个人还需要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心满意足了，什么都不需要，我简直幸福极了！”

“当初你谈到自己的幸福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我想。“你说，不管你多么幸福，你总是希望越幸福越好。而现在当你觉得平静和满足的时候，我心里却好象充满了说不出的后悔和流不出来的眼泪。”

“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说，“不过，我忧郁，正因为在我面前的一切都这么美好。我心里很乱，很空，老在憧憬着什么；而这儿却是这么美好和平静。在你欣赏大自然的时候，难道你就毫不孱杂一点哀愁，会对什么不可能的事物没有追求，对过去没有惋惜吗？”

他把手从我的头上拿开，沉默了片刻。

“是的，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春天，”他好象在追忆往事似地说。“我在夜里也老是满怀着憧憬和希望，一直坐到天明，那是些多么美丽的夜啊！……不过那时候，一切都还在前面，而现在呢，一切都在后面了；现在我对现有的一切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觉得幸福极了，”他非常自信而又漫不经心地总结道。我听了这些话不管内心多么痛苦，我还是相信他说的是

实话。

“难道你什么也不想要了吗？”我问道。

“不想要任何不可能的东西，”他猜中我的心思，答道。“瞧，你把头发都淋湿了，”他接着说时，象爱抚孩子似地爱抚着我，再一次用手抚摩我的头发，“你羡慕被雨淋湿的叶子和草，因此你就想也变成草，变成叶子，变成雨。而我呢，只是在欣赏它们，就象欣赏世界上的一切美好、年轻和幸福的事物一样。”

“难道你对过去的一点都不惋惜？”我继续问道，我感到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沉重了。

他沉思起来，又一言不发。我看出，他想要完全真诚地回答我。

“是的！”他简短地答道。

“不是真话！不是真话！”我说时转过身对着他，瞧着他的眼睛。“你不惋惜过去吗？”

“是的！”他再一次重复说，“我感谢过去，可是我不惋惜过去。”

“难道你不想让它回来吗？”我问道。

他转过身去看着花园。

“不想，就象我不想长上翅膀一样，”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你也不想改正一下过去吗？不责备自己或者我吗？”

“决不！一切都已经好转了。”

“听我说！”我说时碰碰他的胳膊，叫他回过头来瞧着我。“我说，为什么你从来不对我说，你希望我象你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呢？为什么你要把我不会享用的自由给我呢？为什么你要停止开导我呢？你要是肯这样做的话，你要是肯引导我走另一条路

的话，那就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我说话的声调里不含着从前的爱，而是越来越强烈地表示出冷冷的愤懑和责备。

“不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转身对着我诧异地问。“本来就没有什么事。一切都很好。很好嘛，”他笑眯眯地加了一句。

“难道他不懂吗，或者更糟的是，他不想懂吗？”我想道，眼泪夺眶而出。

“就不会发生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却受到你的冷淡甚至是轻蔑的惩罚了，”我突然说道。“就不会发生我毫无过错你却突然夺去了我所珍贵的一切。”

“亲爱的，你怎么啦！”他说道，好象他不明白我所说的话似的。

“不，让我把话说完……你已经从我这里把你的信赖、爱情、甚至尊敬都夺去了；因为在发生了过去的种种以后，我不相信你现在还爱我。不，我要一下子把早就使我痛苦的一切都说出来，”我又打断了他。“我以往对生活无知，而你却让我独自去寻找……，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现在，当我自己已经懂得我需要什么，而且已经快一年了，我极力设法回到你身边来的时候，你却把我推开，装作不明白我想要什么似的，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而且你老是做得你毫无可以责备的地方，而我却是有罪的，不幸的，是的，你是想再把我扔到那种可能会造成我们俩都不幸的生活中去。”

“我怎么会使你有这样的想法呢？”他带着真正的惊讶和诧异问道。

“你昨天不是还说，而且你还不断地说，我在这儿住不惯，我们又得上我所憎恨的彼得堡去过冬吗？”我继续说。“你躲避对我

坦率，一句亲热的真心话也不对我说，你还拿什么来支持我呀。可是，等到我完全堕落了的时候，你就会来责备我，对我的堕落称快了。”

“等一等，等一等，”他严厉地、冷冰冰地说，“你刚才这么说不好。这只能证明你对我心怀恶感，你并不……”

“我并不爱你吗？你说呀！说呀！”我一说完这句话，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在长凳上坐下，用手帕捂着脸。

“原来他是这样理解我的！”我心里想，拚命忍住使我窒息的呜咽。“完了，我们从前的爱情完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这样说道。他没有走到我身边来，也没有安慰我。我的话使他感到受辱。他的声音平静而冷淡。

“我不知道你责备我什么，”他开口道，“如果你是说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爱你……”

“从前爱过！”我用手帕捂着脸说，痛苦的眼泪流得更多了，湿透了手帕。

“要是这样的话，时间和我们自己都有过错。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爱情……”他沉默了片刻。“你要是希望开诚布公，要我把全部真情都告诉你吗？在我刚认识你的那一年，我老是整夜不眠地想你，自己制造着爱情，于是这种爱情便在我心里逐渐增长，在彼得堡和在国外也是一样，又有许多可怕的夜晚，我彻夜不眠，我想把这使我痛苦的爱情打碎和毁掉。我并没有毁掉爱情，我只是把使我痛苦的那一部分毁掉了，我平静了下来，我仍旧是爱你的，不过这是另一种不同的爱。”

“不错，你叫这是爱情，但这是痛苦，”我说。“既然你认为社交界那样有害，你还为了这个不再爱我，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出入社交界呢？”

“亲爱的，问题不是社交界，”他说。

“你为什么不行使你的权力呢？”我继续说。“你为什么不把我捆起来，不杀了我呢？这样，比失去构成我的幸福的一切，我现在会好受得多。那我就会很快活，不致感到羞愧了。”

我又捂着脸痛哭起来。

就在这时候，被雨淋湿的卡佳和索尼亚，高高兴兴地大声说笑着走上了凉台；可是，一看见我们，她们就不作声了，马上走了出去。

她们走后，我们又沉默了很久；我尽情哭了一阵，心里轻松了点。我瞧了瞧他。他坐在那儿用手支着头，他本想说点什么话来回答我的目光，可是他只深深地叹了口气，仍然用手支着头。

我走到他跟前，拿开他的手。他的目光转过来沉思地瞧着我。

“是的，”他好象在继续自己的思索似地开口说道。“我们大家，尤其是你们女人，为了要回到真正的生活中来，一定得亲身去经历一下那荒唐无聊的生活；别人的话你们是不信的。那时候你还远没有尝够那种迷人而可爱的无聊生活，我看着你觉得怪有意思，所以我就让你去体验它，我觉得我没有权力束缚你，虽然对我来说这样的时期早就过去了。”

“你要是爱我，你为什么要和我一块儿去过而且允许我去过那种荒唐的生活呢？”我说。

“因为，当时即使你愿意，你也决不会相信我的话的；你必须去亲身体验，而且你也体验到了。”

“你的考虑，你的考虑不少，”我说。“你的爱却不多。”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

“你刚才说的话固然很厉害，不过这倒是实话，”他说时突然站起来，开始在凉台上走来走去，“是的，这是实话。我错了！”他在我对面站住，接着说道。“要么我根本不应该让自己来爱你，要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爱你，对。”

“咱们把一切都忘了吧，”我胆怯地说。

“不，过去了的事再也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回来了，”当他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

“一切都已经回来了，”我说时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他拿下我的手，紧握着它。

“不，我说我不惋惜过去，那是假话；不，我惋惜，我为那已经没有了、而且不可能再有的过去的爱情而哭泣。这是谁的过错呢？我不知道。爱情还存在，但已不是旧时的爱情；它的位置还存在，但它已经历尽沧桑，再也没有力量和光泽了，只剩下了回忆和感激，但是……”

“别这么说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让一切再恢复原状吧……要知道这是可能的，对吗？”我瞧着他的眼睛问道。他的眼睛是明亮平静的，然而却并没有深深地望进我的眼睛。

我虽然这么说，可是我已经感到，我所希望和我向他请求的事是办不到的。他平静而温存地微微一笑，我觉得这是老年人的微笑。

“你还多么年轻啊，可我已经老了，”他说。“在我身上已经没有你所寻求的东西，何必欺骗自己呢？”他又补了这几句，仍在同样地微笑着。

我默不作声地站在他身旁，我心里觉得平静了些。

“我们不要极力去让生活重复，”他继续说，“我们也不要对自己说谎了。谢天谢地，以前的焦虑和激动都没有了！我们用

不着再去寻找和激动了。我们已经找着了，而且我们已经够幸福的了。现在我们必须引退，给他让路，”他说时指着抱着万尼亚出来、在凉台门边站住的奶妈。“正是这样，亲爱的，”他说完这话，就弯下腰来亲吻我的头。不是一个恋人，而是一位老朋友在吻着我。

一阵夜的清香从花园里逐渐更浓烈、更甜蜜地飘起，声息和寂静变得更庄严了，星星开始越来越密地在天空闪烁。我望了望他，我心中突然轻快起来，好象使我痛苦的那根无形的、有病的神经被摘除了似的。我突然清楚而又平静地明白了：那时候的感情，就象时间本身一样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它回来不仅不可能，而且是痛苦和令人难堪的。算了吧，我觉得非常幸福的那个时代真就那么好吗？而且，这一切早就成了过眼云烟了！

“可是，该喝茶了！”他说，于是我们便一起向客厅走去。在门口我又遇上抱着万尼亚的奶妈。我接过孩子，盖上了他那裸露的红红的小腿，把他紧贴在我胸前，然后用嘴唇轻轻地、轻轻地吻了吻他。他好象在睡梦中动着他那有皱纹的手指张开的小手，睁开了睡意惺忪的小眼睛，好象在寻找或是在回想什么；突然那双小眼睛看着我身上，眼睛里闪出思想的火花；胖乎乎地撅着的小嘴开始闭拢来，又张开笑了。“我的，我的，我的孩子！”我想，我把他紧贴在胸前，四肢都感到一种幸福的紧张，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不把他弄疼。我开始吻他的凉丝丝的小腿、肚子、手和那刚长出头发来的小脑袋。我丈夫走到我身边，我连忙盖上孩子的脸，接着又让他的脸露出来。

“伊万·谢尔盖伊奇^①！”我丈夫一面说，一面用手指去碰碰

① 这是她丈夫对孩子的戏称。孩子叫万尼亚，这是小名。他的本名和父名应是伊万·谢尔盖伊奇，这样的称呼，只能用于大人，并含有尊敬之意。

他的小下巴颏。可是我又赶快把伊万·谢尔盖伊奇盖上。除了我以外，谁也不许多瞧我的孩子。我瞟了我丈夫一眼，他的眼睛望着我的眼睛，在笑，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我也头一次轻松而且快乐地望着他的眼睛。

从那天起，我和我丈夫的恋爱关系结束了；旧的感情变成了一种宝贵的、不能复返的回忆，而爱孩子们和爱我孩子们的父亲的一种新的感情，却给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基础，而且这种幸福生活一直继续到现在……

(1859 年)

芳 信 译

哥 萨 克

高加索的故事

一八五二年

一

莫斯科的一切都寂静了。偶尔可以听见车轮压过冬天的街道发出尖叫的声音。窗户里已经看不见灯火，路灯也熄了。教堂里响起的钟声在沉睡的城市上空荡漾着，报知早晨的来临。街上空旷无人。偶尔有夜间拉座的雪橇用它狭窄的橇板搅和着泥沙和雪，当它驰到另一个街角等待顾客的时候，车夫睡着了。一个老太太向教堂走去，教堂里稀稀落落、不匀称地插着几枝蜡烛，红艳艳地燃烧着，把圣像的黄金衣饰照得发光。干活的人度过漫长的冬夜，已经起身做工去了。

可是对于老爷们，仍然是晚上。

骑士饭店有扇窗户违反常规地从关住的百叶窗板缝里透出亮光。大门口停着轿车、雪橇和马车，背对背地挤在一起。驿站三套马车也停在那里。管院子的仆人裹紧了衣裳缩作一团，就仿佛要钻进屋角里似的。

“为什么净拿些废话说来道去的？”一个面孔干瘪的仆人在前厅里坐着，想道。“怎么我一值班就碰到这种事！”从隔壁明亮的房间里传出三个正吃晚饭的年轻人的声音。他们在桌旁坐

着，桌子上狼藉着吃剩的晚餐和酒瓶。其中有一位又瘦又小、面貌丑陋、衣着整洁的青年，用一对和善而疲倦的眼睛望着出行的人。另外一个人身材高大，在摆满空酒瓶的桌子旁边的沙发上躺着，用手摆弄着怀表钥匙。第三个穿着簇新的短皮大衣，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停下来，用相当粗壮有力、指甲洁净的手指捏碎扁桃仁；不知为什么，他总是含着笑容；眼睛和脸膛泛着红光。他说起话来情绪热烈，做着手势；但是可以看出，他总也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所有到他嘴边的词句都仿佛不足以表达他内心的一切。他不住地微笑着。

“现在什么都可以说了！”出行的人说。“我并不是替自己辩护，我是希望你至少象我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我，不要象那班庸夫俗子那样看待这件事。你说我对不起她，”他对那个用和善的目光望着他的人说。

“是的，对不起她，”那个丑陋的小个子回答说，他的眼神似乎流露着更多的善良和倦意。

“我知道你为什么说这话，”出行的人接着说。“依你看，被人爱和爱别人是同样的幸福，而且一旦得到它，就是够受用一辈子的。”

“是的，足够足够了，亲爱的！比需要的还要多，”那个丑陋的小个子眨巴着眼睛，肯定地说。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恋爱呢！”出行的人说，他沉思着，仿佛带着怜悯的神情望着他的朋友。“为什么不去恋爱？不想去恋爱吗……不，被人爱并不幸福，不幸福，因为你没付出同样的爱情，而且也不可能付出，所以你就觉得对不起人，啊，我的天呀！”他挥了挥手。“如果一切都按照理智进行就好了，可是相反，好象一切都不由我们，而是由着它自己在进行着。就仿佛我

偷窃了人家的爱情，你就是这样想的；不要否认，你准是这样想的。你信不信吧，我一生做了不少蠢事和丑事，但是其中只有这一件我不后悔，而且也不可能后悔。不论是当初或者后来，我既没有欺骗自己，也没有欺骗她。我仿佛觉得，我终于爱上了她，但是后来看到，这是一场不自觉的骗局，这样恋爱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不能再爱下去；于是她离开了我。难道因为我办不到就是我的错吗？我当时应当怎么办呢？”

“这一切都成过去了！”一个朋友说，他为了赶走睡意，点起一支雪茄。“不过有一点：你还没恋爱过，而且也不懂得恋爱。”

那个穿短皮大衣的人又想说什么，他抓住自己的头发。但是没有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没恋爱过！是的，真的没恋爱过。可是我内心有一种恋爱的欲望，再没有比它更强烈的欲望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实际上有这种爱情吗？好象事情总是有始无终似的。算啦，不谈这个了！我一生净干些糊涂事。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你说的对。我也觉得新的生活正在开始。”

“在新的生活里你又会干些糊涂事，”躺在沙发上玩弄怀表钥匙的人说；但是出行的人没有听见他的话。

“这次远行，我又感伤，又快乐，”他接着说下去。“为什么感伤？我不知道。”

于是出行的人只讲他自己的事，不去理会别人对这并不象他那样感觉兴趣。人再没有比在欢欣若狂的时刻更自私自利的了。他觉得，这个时刻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他本人更美好更有趣的了。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车夫不肯再等了！”一个穿皮袄、围围巾的年轻仆人走进来说。“马车从十一点就来了，现在

已经是四点。”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看了看自己的仆人瓦纽沙。从他的围巾、他的毡靴、他刚睡醒的脸，他听见另一种生活的声音——一种充满了劳动、贫困、活动的生活的声音在向他呼唤。

“对了，告别吧！”他一面说，一面扣风纪扣。

虽然朋友们提议再给车夫添些酒钱，但是他仍然戴起帽子，站在屋子中间。他们吻了一次，两次，停一下，吻了第三次。那个穿短皮大衣的走到桌旁，把桌上一杯酒一饮而尽，握住那个丑陋的小个子的手，红了红脸。

“不，我还是要说……对你应该而且可以坦白，因为我是爱你的……你爱她，我一直是这样想……是不是？”

“是的，”朋友回答说，他的笑容显得更温和了。

“也许……”

“上面有吩咐，请把蜡烛吹灭，”一个睡眼惺忪的茶房说，他听到他们最后谈的话，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老谈那一套。“请问帐单给谁？给您吗？”他向那个高个问了一句，他预先就已经知道他应该问谁。

“给我，”高个说。“多少钱？”

“二十六卢布。”

高个沉吟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把帐单装到口袋里。

这时，另外两个人继续在谈话。

“再见，你这个出色的小伙子！”那个又小又丑而目光和善的先生说。

两个人的眼里都涌出了泪花。他们走到台阶上。

“啊，对了！”出行的人红着脸对高个说。“骑士饭店的帐你

来付，过后写信告诉我。”

“好的，好的，”高个一面戴手套一面说。“我是多么羡慕你啊！”当他们走到台阶上，他完全出乎意外地说了这一句。

出行的人坐上雪橇，裹紧了皮大衣，说：“那么好啦！咱们就一块走吧。”他甚至在雪橇上给那个说羡慕他的人腾出地方；他的声音颤抖了。

送行的人说：“再见，米佳^①，上帝保佑你……”他除了希望他快点动身，再没有别的希望，所以他不能把他想说的讲完。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有人又说了一次：“再见。”又有个人说：“走了！”车夫开始赶车。

“叶利扎尔，把车赶过来！”一个送行的喊道。

车夫们动作起来，吧嗒着嘴赶马，拉了拉缰绳。冰冻的轿车在雪地上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

“这个奥列宁真是出色的小伙子，”一个送行的说。“他怎么想起去高加索，而且是以士官生的身份去的？要是我，贵贱都不去。明天你去俱乐部吃午饭吗？”

“去。”

送行的各自坐车走了。

出行的人觉得暖和起来，穿着皮大衣有点热了。他坐在雪橇底部，敞开了怀，那辆马毛蓬松的驿站三套马车驶过一条条黑暗的、两旁排列着他看不见的房屋的街道。奥列宁觉得，只有出行的人才走这样的街道。周围漆黑、寂静、凄凉，而他心里却充满了回忆、爱情、悔恨和愉快的压抑的眼泪……

① 德米特里的小名。

二

“我爱！非常爱！真可爱！真好啊！”他反复地说，并且想哭一场。但是他为什么想哭？谁可爱？他非常爱谁？他不十分清楚。有时他细细地看了看某所房子，这所房子为什么盖得这么古怪，这使他感到惊奇；有时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跟他这么疏远的车夫和仆人瓦纽沙离他却这么近，由于拉边梢的马一阵阵地使劲拉冻僵的套索，他们和他都一起颤动着和摇晃着，于是他又说：“真可爱，我爱，”有一次甚至说：“多么令人感动！太好了！”他为什么说这些话，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他问自己：“难道我喝醉了吗？”不错，他喝了两瓶酒，但是，在奥列宁身上发生这种作用的不仅是酒。他想起了临行前人们对他说的那些情长谊深的话，那些话，他觉得都是推心置腹的，仿佛是出于无意又羞于说出口的。他回忆起那些握手、目光、沉默、以及当他已经坐在雪橇里有人说“米佳，再见！”的声音。他回忆起自己毅然决然的坦白谈话。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动。临行前，不仅亲戚朋友，不仅漠不关心的人，甚至令人反感的和不怀好意的人，都好像忽然商量好了似的，都更加爱他，仿佛在忏悔前或者临死时那样原谅他。“也许我从高加索回不来了吧，”他心里想道。他觉得，他爱自己的朋友们，此外还爱着一个人。他可怜自己。但不是对朋友的爱使得他心肠柔软和精神振奋，使得他情不自禁地说些自动来到唇边的没有意义的话，也不是对女人的爱（他从来没有恋爱过）使他陷于这种精神状态。使得他哭泣和语无伦次的，是对自己的爱，是对那些只要是他内心的美好的一切的爱（而他现在觉得，他内心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满怀希望的、热

烈的、青春的爱。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是一个没有在任何学校修完一门学科，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服过务的青年（他只是在某机关挂个名），他把自己的产业挥霍掉一半，已经是二十四岁的人还没有选择任何职业，从来也没做过任何事。他就是当时莫斯科社交界称之为“青年朋友”的那类人物。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从十八岁就是这样自由，那是只有从青年时代就失去双亲的四十年代俄罗斯富家子弟才有的自由。对于他，没有任何的约束——不论是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能把他束缚住。他既没有家庭，也没有祖国，也没有信仰，也没有需要。他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承认。可是，虽说他不承认一切，他不仅不是一个沉闷、乏味、古板的青年，而且相反，他是一个极容易动心的人。他认为爱情是没有的，但每逢年轻美丽的女人在场的时候，总使他神魂颠倒。他早就知道荣誉和称号都是扯淡，但是每当在舞会上谢尔盖公爵向他走过来说些亲热的话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一种情不自禁的满足。他有时醉心某种事情，但是只有当那件事情还没有束缚他的时候。他在专心致志实现一个意图的时候，一旦感到有点费劲和需要斗争，即使是需要同生活进行琐碎的斗争，他就本能地赶快从这种感情或者事情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自己的自由。他就是这样开始社交生活、服务、经营产业、学习音乐（有个时期他想献身于音乐）、甚至他所不相信的恋爱的。他拿不定主意把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力量全部放到哪里，放到艺术上还是科学上，放到对女人的爱情上还是实际的活动上。这种青春的力量不是智慧、心灵或者教育的力量，而是一种不可再现的精神奋发，是人的一生只能得到

一次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把一个人塑造得象自己所想的那样，奥列宁甚至觉得，可以把全世界塑造得象他所希望的那样。是的，有些人失去了这种精神振奋的状态，刚一走上人生的道路，就给自己戴上第一个遇见的枷锁，勤勤恳恳地戴着它工作一辈子。但是奥列宁却十分强烈地意识到在他身上有这种青春的万能上帝，有这种变为一个愿望、一个思想的能力，敢想敢做的能力，不问为了什么目的和为了什么缘故一头扎进无底深渊的能力。他怀着这个意识，并为这个意识而自豪，因为有了这个意识而不自觉地感到幸福。直到现在，他只爱自己，而且不能不爱，因为他只往好的方面期待自己，并且对自己还没有失望过。他怀着年轻人的幸福心情离开莫斯科，因为一个年轻人觉悟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忽然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过去的一切都是偶然的和无关紧要的，他以前没有想好好地生活，但是现在他离开莫斯科，新的生活就会开始，在新的生活中再不会有那些错误，也不会有什么悔恨，一定只有幸福。

出远门往往是这样，在开头的两一站，想象还停留在出发的地点，可是从第二天早晨起，想象就转移到旅行的目的地，已经在那里建筑未来的楼阁了。奥列宁也是这样。

出了城，他往四外望了望白雪覆盖的原野，很高兴原野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裹紧了皮衣，坐到雪橇的底兜里，感到心境平静，打起盹来。同朋友们告别使他感动，他想起他这一年在莫斯科度过的整个冬天；过去一年的种种形象，在他的想象中不招自来，有时又被那些模糊的思绪和内疚所打断。

他回忆起给他送行的朋友，回忆起他们对他们提到的那个姑娘的态度。那个姑娘很有钱。“既然她爱我，他怎么能爱她呢？”他想道，于是他心里起了不好的猜疑。“人们身上有很多不老实

的东西，使你想不到。为什么我还没有真正恋爱过？”他想到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我没恋爱过。难道我在精神上是一个怪物吗？”于是他想起自己的迷恋。他想起他的初次社交生活和一个朋友的妹妹，他和她在桌子旁灯光下消磨一个晚上，灯光照着她那做着活计的纤细的手指和秀丽的面庞的下部，他又想起那些象“火，火，你别灭”的游戏^①那样没完没了的谈话，又想起两个人的不自然、拘束以及对这种紧张的空气老有一种气愤的感觉。仿佛有一种声音老是说：不对头，不对头，结果果然不对头。然后他又想起舞会，想起跟美丽的马小姐跳玛祖卡舞。“那一夜我是多么钟情，多么幸福！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感觉我又是自由的，我是多么痛苦而懊丧！为什么爱情不来，不把我的手脚捆住？”他想道。“不，爱情是没有的！一位邻居的太太对我、对杜布罗温、对贵族长都同样地说她爱星星，其实她也是不对头的。”他忽然又想起他乡下的产业，在这些回忆中还是没有什么可令人喜悦的。他忽然又想起：“他们会长久地谈论我的这次远行吗？”但是他们是谁？他不知道，接着，那个使他皱眉头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的思绪又涌上心头：这就是关于法国人卡佩尔先生和他欠这个裁缝的六百七十八卢布的回忆，他想起他在恳求裁缝再等一年时说的那些话，想起裁缝脸上那种困惑和无可奈何的表情。“唉，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重复着说，眯缝着眼睛，努力赶走这令人难堪的思绪。“虽然如此，她还是爱我的，”他想到临别时所谈论的那个姑娘。“是的，如果我和她结婚，我就不会负债了，而现在我还欠瓦西里耶夫的钱。”于是他想起那天晚上他从她那里出来就直接到俱乐部，和瓦西里耶夫先生进

① 一种古老的俄罗斯游戏：传递燃烧着的松明，传递者唱着或者合唱着“火，火，你别灭”，传到谁手里如果松明灭了，谁就得从人群中站出来受罚。

行了最后一次赌博，又想起他低声下气地恳求再赌下去和对方冷淡的拒绝。“节省一年，这些债务就还清了，去他们的吧……”虽然有了这种自信，他还是重新计算他负的债务、它们的期限和可能偿还的时间。“除了欠骑士饭店的，我还欠莫列里的钱，”他回忆着；于是他欠这个人这么多钱的那天晚上的全部情景又呈现在他的眼前。那是和茨冈们狂饮的一夜，这场狂饮是从彼得堡来的萨什卡·B，侍从武官、A公爵、还有那个神气十足的老头子……出的主意。“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这么自鸣得意，”他想道，“他们凭着什么结成一个特殊的小圈子，他们认为别人能参加这个小圈子就会引以为荣。难道就因为他们都是侍从武官吗？这简直可怕，他们把别人看得多么愚蠢而且下流啊！我要让他们知道，相反地，我丝毫不愿接近他们。不过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管家安德烈要是知道我和萨什卡·B，一个侍从武官上校这种人称兄道弟，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那天晚上谁也没有我喝得多；我教会了一个茨冈一支新歌，大家都听我们唱。虽然我做了不少蠢事，但是我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青年，”他想道。

次日早晨，奥列宁已经是在第三站了。他喝足了茶，亲自帮助瓦纽沙把包袱和箱子重新放好，神清气爽、端端正正、规规矩矩地坐在行李中间，他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钱在哪里，有多少钱，护照、驿马使用证、路费单据放在哪里；他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得很合理，他的心情开朗了，以后的途程就象做一次远足旅行一样了。

整个早晨和中午，他整个身心都浸沉在计算中：他已经走了几里，到下一站、到下一个城市还有多远，还要多少时间吃中饭、喝茶，到斯塔夫罗波尔还有多少路，已经走过的路相当全程的几

分之几。他还计算：他有多少钱，还可以剩多少，还清全部债务需要多少，一个月的生活费占他整个收入的几分之几。傍晚，他喝过茶后，计算出：到斯塔夫罗波尔还有整个路程的十一分之七，债务要七个月的节省再加上全部财产的八分之一才能还清，于是，他安心了，裹紧了衣服，躺在雪橇里，又打起盹来。现在，他已经是向往未来，向往高加索了。对未来的一切幻想，是和阿玛拉特伯克^①、契尔克斯女人、山、悬崖、凶险的急流和冒险行为等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但是诱惑人的光荣和威胁着人的死亡，构成了未来的兴趣。有时他非凡地勇敢，以惊人的力量杀死和征服了人数众多的山民；有时他本人就是山民，和他们并肩反对俄罗斯人，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可是一想到细节的时候，在这些细节里就出现了莫斯科的熟人。萨什卡·Б 也在这里站在俄罗斯人一边或者站在山民们一边跟他打仗。不知为什么连那个法国裁缝卡佩尔先生也参加了凯旋大会。如果这时想起了过去的屈辱、弱点、错误，那么连这些回忆也只能使人愉快。显然，在群山之间，急流之旁，契尔克斯女人和冒险行为之中，这些错误是不会重犯的。既然在内心已经忏悔了，事情就算过去了。在年轻人的种种思想里，还掺和着一个最珍贵的幻想。这就是对于女人的幻想。那个在群山之中的女人，在他的想象中，是一个契尔克斯女奴，她身材匀称，长长的辫子，一双眼睛又温柔又深邃。他想象山里有一间茅屋，她正佇立在门槛上等待他，这时他疲惫不堪，带着满身的尘土、鲜血和光荣回到她的身边，于是他感觉到她的亲吻、她的双肩，她的甜蜜的声音，她的温顺。她是可爱的，但是她没有受过教育，性情粗

① 阿玛拉特伯克是俄国作家马尔林斯基的一部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伯克是某些民族特有的官衔。

野。在漫长的冬夜里，他开始教育她。她聪明，理解力很强，天赋很高，很快就获得了一切必要的知识。有什么了不起？她很快就学会了各种语言，读法国文学作品，而且读得懂。譬如《Notre Dame de Paris》^①，一定是她喜欢读的。她也会说法语。在客厅里，她比最上流社会的妇女具有更多的天赋的尊严。她会唱歌，唱得朴素、有力、热情。“唉！多么荒唐！”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到了站了，得换雪橇和打发酒钱。可是他又找回刚才打断的那个荒唐的幻想，他又想起契尔克斯女人、荣誉、回到俄罗斯、侍从武官的职务、迷人的妻子。“可是根本没有爱情，”他自言自语地说。“地位，也是扯淡。可是六百七十八卢布呢？……还有能够给我一笔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的被征服的边疆呢？不过，这笔财富归我一人受用也是不好的。要分掉它。分给谁呢？给卡佩尔六百七十八卢布，然后看情况再说……”完全模糊了的幻梦遮住了思路，只有瓦纽沙的声音和行车中止的感觉才把年轻人健康的瞌睡打断，他自己也记不清，他又在一站换了一辆雪橇继续向前行进了。

次日早晨，一切仍然照旧——还是那些驿站、那些茶、那些晃动着马的臀部、那些和瓦纽沙简短的交谈、那些模糊不清的幻想和每晚的打盹、以及年轻人疲乏的一夜不醒的酣睡。

三

奥列宁离开俄罗斯中心越远，他的一切回忆也就离开他越远；他越接近高加索，他的心境也就越畅快。“完全离开，永不回

^① 法语：《巴黎圣母院》。

头，永不在社交界露面，”他有时这样想。“我在这里看见的人，不是那些人，他们谁也不认识我，谁也不可能到我曾经待过的莫斯科社交界打听我的过去。那个社交界也没有人知道我在这些人中间做些什么。”在这些途中遇见的、他所不承认与莫斯科的熟人居于平等地位的粗人中间，他整个身心好象有一种从过去的一切解脱出来的焕然一新的自由感觉。周围的人越是粗鲁，文明的标志越是少，他就越是觉得自由。他必得路过的斯塔夫罗波尔使他感到烦恼。招牌、甚至法国招牌、坐在弹簧马车里的太太、停在广场上的马车、人行道、以及在人行道上走过并且张望着过路人的身穿外套头戴礼帽的先生，都给他一种痛苦的感觉。“也许这些人里面有和我的熟人认识的，”他又回忆起俱乐部、裁缝、纸牌、烛光……离开斯塔夫罗波尔，就一切都令人满意了：虽然粗野，然而却美丽而且威武。奥列宁越来越快乐了。所有的哥萨克、车夫、驿站长，他都觉得是朴实的人，他和他们可以随便开玩笑，谈话，不必考虑谁是属于什么等级。大家都属于人类，他们全都不自觉的使奥列宁觉得可亲可爱，他们也友好地对待他。

早在顿河哥萨克军区的时候，就由雪橇改乘大车；过了斯塔夫罗波尔，天气已经暖和，奥列宁脱了皮衣坐在车上。春天来了——这在奥列宁是一个不期而遇的、快乐的春天。夜间已经不许人出村，说是晚上行路有危险。瓦纽沙有点害怕，把枪装上子弹放在驿车上。奥列宁更快活了。在一个驿站上，站长讲到不久前路上发生了一件可怕的谋杀案。开始碰见荷枪的人。“原来就在这里开始了！”奥列宁对自己说，他一直期待着看看人家给他说过好多次的雪山。有一次，将近薄暮的时候，诺盖^①车夫用

^① 诺盖是当地一种少数民族。

鞭子指了指云雾后发白的山。奥列宁贪婪地望过去，但是天气阴沉沉的，云彩遮到半山腰。奥列宁看见的是一些灰白色的曲卷着的东西，他无论怎样用力看，在这个他曾在书上读到和听人讲到无数次的雪山景物中也找不到什么好看的。他想，这里山和云的形状完全一样，人们向他谈论的雪山的特别优美，也象巴赫的音乐和他所不相信的爱情同样是虚构，——于是他不再期待看见雪山了。可是第二天一大早，清新凉爽的空气把他从驿车上拂醒了；他漫无目的地向右方望去。早晨是透彻地明净。忽然，在离他二十步开外的地方，乍一看去，仿佛是一群轮廓柔和的雪白的巨大的东西，它们的顶端衬着远方的天空显出奇异的、分明的、轻巧的边缘。当他弄清楚他和山与天空之间离得那么远，群山是那么庞大的时候，当他感觉到这种美是怎样的无限的时候，他惊呆了：这怕是幻景、是梦境吧。他为了更清醒点，摇晃了一下身子。但是那些山仍然是那样。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他问车夫。

“山嘛，”那个诺盖人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也看了很久，”瓦纽沙说，“真好看！坐在家里，谁也不会相信。”

三套马车顺着平坦的道路飞驰，那些山好象沿着天际也在奔跑，在初升的太阳下，山巅发出水红的光辉。起初，这些山只是使奥列宁惊奇，后来使他喜悦；可是再往后，当他更多更多地注视这不是从别的黑色的山、而是直接从草原上崛起、绵延不断地奔向远方的雪山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深入地体会这种美，并且感觉到山。从这一刻起，只要是他所见的，所想的，所感的，他觉得都获得一种新的特性，象山那样严峻端庄的特性。一切莫斯科的回忆、羞愧、悔恨，一切对高加索的可鄙的幻想，统统消失了，

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才是开始，”仿佛有一个庄严的声音对他说。不论是道路也好，在远方影影绰绰的捷列克河也好，村庄也好，人民也好——现在他觉得这一切已经不再是儿戏。他望了望天空——心里想起山。他看看自己，看看瓦纽沙——心里想的还是山。有两个骑马的哥萨克走过去，装在布套里的枪在他们背后有节奏地摇动着，他们的马奔跑时枣红的和灰色的蹄子交错着；可是那些山啊……捷列克河对岸可以看见村中的炊烟；可是那些山啊……太阳升起了，芦苇丛中的捷列克河闪闪发光；可是那些山啊……从村里驶出一辆车子，走出一些女人，又漂亮又年轻的女人；可是那些山啊……“阿布列克^①在草原上来回奔驰，而我坐着车在赶路，我不怕他们，我有枪，有力量，有青春；可是那些山啊……”

四

沿岸散布着格列宾哥萨克村庄、全长约八十俄里的捷列克河，不论是从地势或从居民说来，都具有同样的特点。这条把哥萨克和山民分开的捷列克河，浑浊而且湍急，然而这一段已经算是宽阔而平静的了，右岸低洼，芦苇丛生，经常淤积灰色的沙子，而左岸虽然不高，然而陡峭，岸边的百年橡树、腐烂的梧桐和幼树的根子不断被冲刷。在右岸散布着已经归顺俄国的、但仍然不平静的车臣人的村庄；沿左岸离河半俄里一带，都是哥萨克村庄。早年这些村庄大部分都是紧靠河边；但是捷列克河冲坏了南

① 越过捷列克河到俄罗斯土地上进行偷窃或掠夺的未归顺的车臣人，这种人被称为阿布列克。——作者注。

岸的山脚，逐年向北移动，现在只能看见乱草丛生的古老遗址，花园、梨树、酸枣和杨树，以及到处蔓延缠绕的黑莓丛和野葡萄。那里已经荒无人烟，成为麋鹿、豺狼、兔子和野雉喜爱的地方，沙地上处处可以看见它们的脚印。村与村之间，是在森林中采伐出的、象用炮弹轰得一样笔直的道路。沿路没有哥萨克守卫的哨所；哨所与哨所之间的瞭望台上有哨兵值班。属哥萨克管辖的只有狭窄的三百俄丈^①宽的多林的肥沃地带。从这里往北，是诺盖草原（或者叫莫兹多克草原）的流沙地带，这草原一直往遥远的北方伸展，天晓得在什么地方和特鲁赫缅、阿斯特拉罕、吉尔吉斯—凯萨茨草原会合起来。捷列克河对岸以南，是大切奇尼亚、科奇卡雷科夫山脉、黑山、还有一条什么山脉，最后，就是只能看见而谁也没到过的雪山。在这肥沃的、多林的、植物富饶的地带，从远古以来就住着尚武的、美丽的、富裕的、信奉旧教的俄罗斯居民，他们称为格列宾哥萨克。

很早很早以前，他们的祖先，旧教徒，从俄罗斯逃出来，来到捷列克河南岸多林的大切奇尼亚山地第一条山脉格列宾，在车臣人中间落了户。哥萨克在车臣人中间生活，跟他们通婚，吸收了山民的风俗习惯；可是仍然保持着俄罗斯语言原有的纯洁性和旧信仰。有一个至今仍在哥萨克中流传的传说，说是伊凡雷帝曾来到捷列克河，把格列宾地方的老人召到他的驾前，赐给他们这边河岸的土地，训诫他们和睦地过日子，并答应不强迫他们归属俄罗斯，也不强迫他们改教。直到现在，哥萨克还认为他们和车臣人有着血缘关系，他们性格的主要特点也是爱自由，爱游手好闲，爱抢劫和战争。俄罗斯的影响仅仅表现在象干涉选举、

^① 1 俄丈合 2.134 米。

撤消教堂的钟和驻扎的或过境的军队这些给他们印象不佳的方面。按其好恶,哥萨克对杀死他们弟兄的山民骑手的憎恨,远不如对驻在那里保护他们的村庄的、但抽烟熏臭了他们的屋子的俄罗斯士兵的憎恨来得强烈。他们敬重敌人——山民;但是蔑视俄罗斯士兵,视他们为外人和压迫者。在哥萨克心目中,俄罗斯人是一种陌生的、粗野的、可鄙的人,其实,他们是把常来串村的小贩和他们鄙视地称为“擀羊毛毡的”小俄罗斯移民当作了俄罗斯人。他们的所谓衣着考究就是对契尔克斯服装的模仿。最好的武器是从山民手里夺来的,最好的马也是从他们那里买来或者偷来的。好样的哥萨克喜欢炫耀自己精通鞑靼语言,当玩得起劲的时候,甚至跟自己的弟兄也讲鞑靼话。虽然如此,这一小群被抛在天涯海角的、住在半开化的伊斯兰教徒和士兵中间的基督教徒,却认为自己是高度文化的,并且只承认哥萨克才是人;用轻视的眼光看待其他一切的人。哥萨克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哨所、战争、打猎或者捕鱼上。他几乎从来不在家里干活儿。他在村里逗留是例外,除非是他回来欢度假日。哥萨克家家酿酒,醉酒与其说是一般人共同的爱好,不如说是一种不履行它就认为改变信念的仪式。哥萨克把妇女看作供自己享福的工具;只有姑娘才许游玩作乐,而妇女不得不从年轻时起就为他干活,一直做到年老力衰,而且向妇女要求的是东方式的顺从和劳动。由于这种观点的结果,妇女不论在体力上或精神上都十分发达,虽然表面上顺从,可是在家庭生活中,一般说来,也象东方那样,享有在西方大得无比的权势和地位。由于她不参加社会生活,习惯干男人的沉重的工作,使她在家庭中得到更大的权威和力量。哥萨克认为在外人面前跟自己的女人说些亲热的话或者闲扯是不体面的,可是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由得感到她的

优越。整个家庭、全部家财、所有经济都是靠她的操劳挣来的和维持着的。虽然他坚决地相信，劳动对于哥萨克是可耻的，只有对劳苦的诺盖人和妇女才合适，可是他模糊地感觉到，他所享有的一切，和所谓是自己的一切，都是这劳动的产物，他认为是自己奴仆的妇女——母亲或者妻子，有权力剥夺他们所享有的一切。此外，由于格列宾哥萨克妇女经常担负男人式的繁重的劳动和操心，这使她们具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男性性格，惊人地发展了她们的体力和健全的思想、果断坚毅的性格。哥萨克妇女多半都比男人有力、聪明、成熟、而且美丽。格列宾哥萨克女人的美特别惊人，因为她们有纯粹契尔克斯人的脸型，又有北方女人的魁梧的体格。哥萨克女人穿的是契尔克斯服装：鞑靼式的衣衫、短袄、平底皮鞋；但是头巾的扎法却是俄罗斯式的。穿戴和房间的摆设之讲究、清洁和雅致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习惯和必需。女人，特别是姑娘，在和男人的关系上享有完全的自由。诺沃姆林斯克村被认为是格列宾哥萨克的老根，这里比别的村更多地保存着古老的格列宾哥萨克的风俗，这个村的女人，自古以来就以美丽闻名于全高加索。哥萨克的生计全靠葡萄园、果木园、南瓜园、西瓜园、捕鱼、打猎、种玉蜀黍和谷子，以及战争的掠夺。

诺沃姆林斯克村离捷列克河有三俄里，中间隔着茂密的森林。村子一头有一条大路穿过，路旁是一条河；村子另一头是葱茏翠绿的葡萄园和果木园，还可以看见诺盖草原的“沙浪”（淤积的砂层）。村子周围是土城和带刺的乌荆子。从村子出进都通过一座高高的圆柱大门，门顶是用芦苇搭成的不大的遮簷，门旁有一尊大炮支在木架上，这尊已有百年不用、变得奇形怪状的大炮，当年曾击退过哥萨克。在大门旁，穿制服、带马刀和步枪的哥萨克，有时站岗，有时不站岗；对经过的军官有时敬礼，有时

不敬礼。在大门簷盖下挂着一块白牌子，上面用黑漆写着：二六六户，男八九七人，女一〇一二人。哥萨克的房屋都是建筑在离地一俄丈或者更高一些的柱子上的，整洁地覆盖着芦苇，屋脊高高地耸立着。所有的房屋，即使不是新的，也都笔直而且清洁，带有各式各样的高大门廊，彼此挨得不但不紧，而是绰有余地、如画地坐落在宽阔的街上或者巷子里。在许多房屋的明亮的大窗户前面，在菜园后面，深绿色的杨树高过屋顶，柔嫩浅绿的洋槐挂着芬芳的白色花朵，那里还有耀眼的黄灿灿的向日葵和藤蔓缠绕的葫芦和葡萄。广场上有三个铺子，里面卖布疋、葵花籽、皂荚和甜饼；在高大的围墙后面，从一排老杨树中间可以看见比其他房屋又长又高的、带有窗扇的团长的房屋。村子街上，平时很少看见人影，特别是在夏天。哥萨克男人都出外服役：在哨所或者出征；老人在打猎、捕鱼或者和女人们一起在花园和菜园里干活儿。只有最老的和最小的或者病人才留在家里。

五

这是只有高加索才有的特别的傍晚。太阳落山了，但是天还很亮。晚霞遮住三分之一的天空，霞光分明地衬出乳白色的巍峨高山。空气稀薄，凝然不动，似乎有响声。好几俄里长的高山影子，投到草原上。在草原，在河对岸，在每条道路上，到处看不见人影。只要一出现骑马的人，哨所的哥萨克和村里的车臣人就带着惊奇的眼光看他们，极力揣测他们可能是些什么歹人。一到晚上，人们由于彼此惧怕，都挤到屋子里，只有飞禽走兽不怕人，自由自在地在荒野里寻食。哥萨克女人把葡萄藤蔓扎好，就说说笑笑地赶快走出园子。园子和村子四周都空旷无人；可

是傍晚时刻，村子里却特别热闹。人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赶着吱吱呀呀的大车从四面八方回到村里。姑娘们掀起衣衫，拿着树条，说说笑笑，奔出大门迎接一群在云雾般的尘土和草原带来的蚊虫中间挤在一块的牲口。肥壮的母牛和水牛满街乱走，几个穿花衣裳的哥萨克女人在牛群中跑来跑去。从牲口的吼叫声中可以听见她们响脆的说话声、欢畅的笑声和尖叫声。那边有一个骑马带枪的、从哨所请假回来的哥萨克，走到一所房子前，弯腰敲了敲窗户，接着露出一个年轻漂亮的哥萨克女人的头，于是听见一阵含笑的亲热的谈话。那边有一个穿破衣裳的高颧骨的诺盖长工拉一车芦苇从草原回来，他在哥萨克大尉的清洁宽敞的院子里把吱吱作响的大车掉转头，从公牛摇摆着的头上卸下轭具，跟主人用鞑靼话高声交谈着。有一个水洼差不多占满了全街，多少年来人们都是紧贴着墙边从它旁边绕过，这时有一个女人背一捆柴禾，把衣衫高高地提到雪白的大腿上，一个打猎回来的哥萨克开玩笑地喊道：“再提高点，不要脸的，”并且用枪瞄了瞄她，这个女人放下衣衫，柴禾也丢掉了。一个哥萨克老人捕鱼归来，卷着裤脚，露着汗毛斑白的胸口，背着渔网，网里是活蹦乱跳的银白色的鲤鱼；他为了抄近路，从邻居的围墙缺口穿过来，正在扯下挂在围墙上的粗呢上衣。那边有个女人在拖一截干树枝，可以听见墙角后面的斧头声。街上只要有平地，就有小孩子在那里转陀螺，尖声地喊叫。女人们懒得绕路，都从篱笆爬过去。所有的烟囱都升起了烧干粪的芬芳的炊烟。每家院子里都可以听见夜的寂静来临前的更加忙碌的声音。

乌莉特卡老大娘是当教员的少尉的妻子，象其他女人一样，也走出大门，等她女儿玛丽扬卡^①从街上赶来的牲口。她还没

^① 玛丽扬卡是玛林娜的小名。

来及打开篱笆门，一头被蚊子围着的大水牛就低吼着冲开了大门；几头肥壮的母牛在它后面慢慢地走着，睁得圆圆的大眼认出了女主人，用尾巴均匀地抽打自己的两肋。体态匀称的漂亮姑娘玛丽扬卡走进门来，就扔掉手里的树条，关上篱笆，撒起敏捷的腿把院里的牲口分开和赶走。“把鞋子脱掉，鬼丫头，”母亲喊道，“鞋全踩破了。”玛丽亚娜^①丝毫没有因为叫她鬼丫头而生气，她认为这是亲热的称呼，仍然快乐地做自己的事。玛丽亚娜的脸被包头的头巾遮着；她穿着粉红长衫，外套一件绿上衣。她跟着肥大的牲口隐没在牛棚里的时候，只听见她从那里面对水牛发出温柔的劝告：“不愿意站着！你这家伙！去你的吧，我的老奶奶！……”不大一会儿，姑娘和老太婆从小牛棚向藏奶室走去，两个人都提着大罐子牛奶——当天挤出来的。从缸瓦的烟囱里，很快升起干粪的炊烟，牛奶正在做成熟奶油；姑娘在烧火，老太婆向大门口走去。黄昏已经笼罩着全村。空气中弥漫着蔬菜、牲口和芬芳的干粪炊烟的味道。大门口和街上，到处是拿着燃着的破布条子的女人奔忙着。院子里可以听见挤过奶的牛的喘息声和静静的反刍声，各家院子里和街上，妇女和儿童高声交谈着，平时很少听见男人喝醉酒的声音。

对面院子里走出一个高高大大、相貌威武的老太婆，到乌莉特卡老大娘这里来借火；她手里拿着一块破布。

“怎么样，大嫂子，收拾好了吗？”她说。

“女儿在烧火呢。你要借火吗？”乌莉特卡老大娘说，能给人帮忙，她觉得很光彩。

两个女人走进屋里；不习惯对付小巧物件的粗糙的手，颤颤巍巍地把那在高加索视为珍品的火柴盒打开。那个来点火的相

^① 玛丽亚娜也是玛林娜的小名。

貌威武的老太婆在台阶上坐下，显然是想拉拉家常。

“大嫂子，你那当家的在学校里？”进来的老太婆说。

“一直在教孩子，大嫂子。捎信来说，过节时回来，”少尉的妻子说。

“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处处有用。”

“谁说不是呢，是有用。”

“我的孩子卢卡什卡在哨所里，想回家，请不准假，”进来的老太婆说，虽然少尉的妻子早已知道这个。她需要讲一讲刚送进哥萨克兵营的她的卢卡什卡，她希望儿子能娶少尉的女儿玛丽亚娜做媳妇。

“在哨所里？”

“是啊，大嫂子。自从上次过节回趟家，以后再没回来过。前几天托福穆什金给他捎了一件衬衫。他说他不错，很受长官的夸奖。说他们又在搜捕高加索山贼。说卢卡什卡很快乐，很好。”

“那就谢天谢地了，”少尉的妻子说。“一句话：是把快手。”

由于卢卡什卡胆大，由于他抢救过一个落水的小孩，人们给他起个绰号叫快手。少尉的妻子提起这个绰号，为的是使卢卡什卡的母亲高兴。

“谢谢上帝，大嫂子，儿子是个好儿子，好样的，人人都夸，”卢卡什卡的母亲说，“只要他娶了亲，我死也瞑目了。”

“那有什么难，村子里的姑娘有的是。”狡猾的少尉妻子回答，一面用她那老树皮似的手使劲盖上火柴盒。

“有的是，大嫂子，有的是，”卢卡什卡的母亲说，摇着头，“你的姑娘玛丽亚奴什卡^①，你的那个姑娘啊，那才是千里挑万里拣的呢。”

^① 玛丽亚奴什卡也是玛林娜的小名。

少尉的妻子知道卢卡什卡母亲的意思，虽然她也觉得卢卡什卡是一个好哥萨克，可是她还是岔开了这个话题，一来因为她是少尉的妻子并且有钱，而卢卡什卡是一个普通的哥萨克，是一个孤儿。二来因为她不愿很快和女儿分离。主要的是因为在礼节上需要作这样的表示。

“当然罗，等玛丽亚奴什卡长大了，也要找个人家的，”她慎重而谦虚地说。

“我打发媒人来，一定来，等把葡萄园收拾好了，我们就来提婚，”卢卡什卡的母亲说。“我们来向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提亲。”

“干吗要向伊利亚提亲！”少尉的妻子骄傲地说，“跟我说一样。做什么都得有个时机。”

卢卡什卡的母亲从少尉妻子的严峻的脸上看出，再说下去就没趣了，用火柴点着破布，站起身来说：“不要这样说，大嫂子，记住我的话。我走了，该去烧火了，”她又说了一句。

她伸直了手摇着燃烧的破布过街的时候，遇见玛丽扬卡，姑娘向她鞠躬。

“好一个美女，好一个能干的丫头，”她看着漂亮的姑娘，心里想道。“已经是大姑娘了！该是出嫁的时候了，嫁个好人家，嫁给卢卡什卡。”

老大娘乌莉特卡也有自家的心事，她坐在门槛上没有起来，在沉思什么，直到女儿来叫她。

六

村子里的男人不是去出征，就是在哨所里，或者象哥萨克所

说的“在岗楼上”。快手卢卡什卡，就是两个老妇人在村里谈到的那个青年，将近傍晚时分在下普罗托茨克哨所的瞭望台上站岗。下普罗托茨克哨所紧靠捷列克河岸。他用臂肘倚在瞭望台的栏杆上，眯缝着眼睛，时而望望捷列克河对岸的远方，时而望望下面哥萨克同伴，偶尔跟他们交谈两句。太阳已经接近在曲卷的云彩上泛着白光的雪山顶峰。山脚翻滚着的云彩越来越显现出黑影。空气中充满了傍晚的明静。从茂密的野生森林里吹来清新的凉风，但是哨所附近还是炎热的。哥萨克的谈话声显得更响亮，在空中经久不散。在深棕色的湍急的捷列克河上，不动的河岸和流动的河水分得更清楚了。河水开始退了，在岸上和浅滩上有几片潮湿的沙土露着深黄的颜色。哨所正对面的岸上荒无人烟；直到山脚，都是一眼望不尽的低矮的荒凉的芦苇。旁边不远的低洼的河岸上，可以看见车臣人村庄的土屋、平坦的屋顶和漏斗形的烟囱。瞭望台上的哥萨克用他那锐利的眼睛注视着对岸归顺的村庄傍晚炊烟中车臣女人移动的身影，远远可以看见她们穿着青色的和红色的衣裳。

虽然哥萨克时时刻刻等待阿布列克从鞑靼人那边过河袭击，特别是在五月，这时捷列克河上的森林密得徒步很难穿过，而有些地方河水又浅得可以涉水而过，虽然前两天团长派骑者送发一份通告，内称据密探报告，发现一帮歹徒八名企图渡河，因此指示加倍小心，可是，在哨所里并没有加严戒备。哥萨克跟在家里一样，马不备鞍，身上不带武器，有人在捕鱼，有人在醉酒，有人在打猎。只有值班的马备着鞍韉，带着腿绊在森林旁边草坪上吃草，也只有站岗的哥萨克才穿着束腰无领长袍，佩着枪和刀。班长是个瘦高的哥萨克，背脊特别长，手脚特别小，他敞开上衣，带着懒散而百无聊赖的当官的神气坐在屋檐旁土台

上，合着眼，把头时而歪到左手时而歪到右手上。一个留着花白的大胡子、穿一件束有黑皮带的衬衫的上了年纪的哥萨克，躺在水边，懒洋洋地望着波浪滔滔、漩涡翻滚的单调的捷列克河。其他的人也热得脱了上衣，有的在河里洗衣裳，有的编笼头，有的躺在地上哼着歌儿，或躺在岸上滚热的沙土里。一个面孔瘦削、晒得黑黑的哥萨克，显然是烂醉如泥，仰面朝天躺在屋檐土台上，两小时前那里还是阴影，可是现在炙热的斜阳正射到那里。

站在瞭望台上的卢卡什卡是一个高个、漂亮、模样非常象母亲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的面貌和全身，虽然具有青春期的瘦削，但却显示出极大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他入伍虽说不久，但从他脸上那种开朗的神情和沉着自信的姿态，可以看出他已经学到了哥萨克或者一般常带武器的人所特有的那种英武而且颇为高傲的气概，他已经成为一个知道自己全部价值的哥萨克。肥大的束腰无领长袍有的地方已经破了，帽子象车臣人那样推到脑后，靴统松到膝盖以下。他的衣着不算阔绰，但穿在他身上却显出那种跟车臣的骑手学来的哥萨克气派。一个真正骑手全身上下的装束永远是肥肥大大，破破烂烂，不拘小节；只有武器是阔绰的。但是破旧的衣着的穿戴、束扎和武器的佩带都有一定的式样，它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而且它一眼就被哥萨克和山民识别出来。卢卡什卡就有这种骑手的派头。他双手扶着马刀，眯缝着眼，老是注视着远方的村庄。他的五官分开来看并不好看，可是他那匀称的体格、乌黑的眉毛、聪明的脸型，令人一眼看去就不由得要说：“好一个小伙子！”

“瞧那些娘儿们，村里出来这么多的娘儿们！”他懒洋洋地露出雪亮的牙齿，也不专对哪个人，用尖利的声音说。

在下面躺着的纳扎尔卡连忙抬起头来说：

“大约是出来打水的。”

“放一枪吓唬她们一下，”卢卡什卡笑着说，“那就会乱成一团！”

“打不到。”

“你得了吧！我的枪能打过头。过些日子，等他们过节的时候，我到吉列伊汗那里去做客，喝布札酒^①，”卢卡什卡说，一面气忿忿地挥走叮他的蚊虫。

密林里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转移了哥萨克们的注意。一只花毛的杂种猎狗在寻找踪迹，拚命摇着脱毛的尾巴向哨所跑来。卢卡什卡认出这是他的邻居——猎户叶罗什卡大叔——的狗，狗的后面，可以看见那个猎人在密林中正在移动的身影。

叶罗什卡大叔是一个彪形大汉，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肩膀和胸脯也是宽阔的，在没有人和他比较的森林里，他显得并不很高，因为他的粗壮的四肢长得非常相称。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粗呢上衣，把下襟掖在腰间，脚上是用绳子绑着裹在包脚布上的泡软的鹿皮，头戴一顶破旧的白色小帽。他一个肩上背着捕野雉的网罩和口袋，口袋里装着引诱鹞鹰用的母鸡和青鹰；另一个肩上用皮带背着打死的野猫；腰后掖着几个布口袋，口袋里装的是子弹、火药、面包，还掖着拂蚊子用的马尾、一把刀鞘已经破烂而且满染陈旧血迹的大匕首和两只打死的野雉。他望了望哨所，停住了。

“嗨，良姆！”他用洪钟般的低音向狗喝了一声，远处的森林响起了回声。他把短筒的大枪（哥萨克称为火药枪）挎到肩上，

① 鞑靼人用黄米酿的一种水酒。——作者注。

举了举帽子。

“一天过得好啊，好人儿！嗨！”他用同样快乐有力的声音对哥萨克们说，他不费劲就说得那么响，仿佛向对岸什么人喊叫似的。

“你好，大叔！你好！”从四面八方响起年轻哥萨克们快乐的声音。

“看到什么没有？讲给我听听！”叶罗什卡喝道，一面用束腰无领长袍的袖子把汗珠从他那又大又红的脸上擦掉。

“告诉你，大叔！有一只好大的鹞鹰就在那边梧桐树上落脚！一到晚上就出来盘旋，”纳扎尔卡说，一面眨巴着眼皮，抽动着的一边的肩膀和腿。

“你说真的！”老汉不相信地说。

“真的，大叔，你去守着吧，”纳扎尔卡笑着肯定地说。

哥萨克们都笑起来。

这个滑稽鬼并没看见什么鹞鹰；但是哨所里的年轻哥萨克们已经成为习惯：只要叶罗什卡大叔一来他们这里，他们就逗他，哄他。

“哎，傻瓜，净撒谎！”卢卡什卡从瞭望台上对纳扎尔卡说。

纳扎尔卡马上就闭了口。

“应该去守，我一定去守，”老汉回答，为的使所有的哥萨克皆大欢喜。“看到野猪没有？”

“说得倒容易！看见野猪！”班长说，他很高兴有个开心的机会，身子歪来歪去用两只手在背脊上搔痒。“现在要捉的是阿布列克，不是野猪。你什么都没听说吗，大叔？”他又问了一句，无缘无故地眯缝着眼，张开两排密密的白牙。

“捉阿布列克？”老汉说。“没有，没有听说。怎么样，有奇希

尔^①吗？拿来喝吧，好人儿。累坏了，真的。过些时候，我给你们拿新鲜的野味来，真的拿来。拿酒来吧，”他又说了一句。

“怎么样，你想不想去守啊？”班长问道，装着没有听清对方说什么。

“夜里去守，”叶罗什卡大叔回答，“靠上帝保佑，过节以前说不定能打到什么；打到东西也分给你一点，真的！”

“大叔！喂！大叔！”卢卡^②在上面尖利地喊道，引起人们的注意，所有的哥萨克都抬头看他。“你到上游的河岔子去找，那里有大群的野猪。我不撒谎。真的！前些日子我们的弟兄打到一只。我说的是实话，”他一面把背上的枪背好，一面又说了一句，从他的声调可以看出他不是说笑话。

“哎，快手卢卡什卡在这里！”老汉往上望着，说道。“在什么地方打到的？”

“你没有找到吗！可见你还是孩子，”卢卡什卡说。“就在沟渠旁边，大叔，”他晃着脑袋认真地说了一句。“我们正顺着沟渠走，只听见它喀嚓喀嚓地响，我的枪放在套子里。伊利亚斯卡忽通一枪……大叔，我指给你看是在什么地方，——不远。稍微等一下。老兄，野猪走的路我都知道。莫谢夫大叔！”他坚决地、几乎命令似地对班长说，“该换岗了！”他拾起枪，不等下命令就从瞭望台上走下来。

“下来吧！”已经过了一会，班长才说，一面环顾着四周。“轮到你了，古尔卡？去吧！真是，你的卢卡什卡真学得机灵了，”班长对老汉说。“跟你一样，老在外面跑，在家里坐不住；前几天他打死了一只野猪。”

① 奇希尔是高加索一带家酿的红葡萄酒。

② 卢卡什卡的本名。

七

太阳已经落山，黑夜的阴影从森林那边很快地移过来。哥萨克在哨所附近干完了活儿，都到屋里吃晚饭去了。只有那个老汉还留在梧桐树下等待鹞鹰，不时地拉一拉系着腿的青鹰。鹞鹰站在树上，但不下来捉小鸡。卢卡什卡在最密的荆棘丛中野鸡惯走的小径上不慌不忙地安置捉野鸡的索套，他一支接着一支地唱着歌儿。他虽然体高手大，但是可以看出，不论粗细活儿，样样都得心应手。

“嗨，卢卡！”他们见从不远的密林里传来纳扎尔卡的尖利响亮的声音。“哥萨克都去吃饭了。”

纳扎尔卡挟着一只活野鸡，穿过荆棘丛向小径走来。

“噢哟！”卢卡什卡说，停止了唱歌。“在哪儿捉来的野鸡，大概是我下的索套……”

纳扎尔卡和卢卡什卡同岁，也是在春天刚入伍。

他是一个丑陋瘦弱的小伙子，说话的声音尖利刺耳。他们是邻居又是同伴。卢卡什卡盘着腿坐在草地上整理索套。

“不知道是谁的。大概是你的。”

“是不是在坑后梧桐树旁边的那个？就是我的，是昨天放的。”

卢卡什卡站起来看了看被捉住的野鸡。用手摸了摸深蓝深蓝的脑袋，野鸡吃惊地伸长了脖子，滚动着眼珠，他把它抱过来。

“今天我们做鸡肉饭；你去把它宰了，摘掉毛。”

“怎么，我们自己吃还是要请班长？”

“够他的了。”

“我怕杀鸡，”纳扎尔卡说。

“给我来杀。”

卢卡什卡从短剑下面取出一把小刀，很快地用它一捅。野鸡颤抖起来，但还未来得及展开翅膀，血淋淋的脑袋就垂了下去，拍着翅膀挣扎着。

“就是这样办！”卢卡什卡把野鸡扔掉，说。“要吃一顿肥肥的鸡肉饭。”

纳扎尔卡瞅着野鸡，打了一个寒战。

“你听说吗，卢卡，鬼东西又要派我们去放潜伏哨了，”他拿起野鸡又说道，鬼东西是指班长。“把福穆什金派去买奇希尔，本来该是他的班的。谁愿意去守夜！倒霉的事净找到我们头上。”

卢卡什卡吹着口哨向哨所走去。

“把绳子带走！”他喊了一声。

纳扎尔卡服从了。

“我今天要给他讲，真的，我要讲，”纳扎尔卡继续说。“咱们就说：咱们不去，累了，就这么说。还是你说吧，真的，他听你的话。不然这怎么行呢！”

“没事找事！”卢卡什卡说，显然他在想别的，“净说废话！如果夜里从村子赶出来，那才叫气人呢。那里有好玩的，可是这里有什么？在哨所里待着，放潜伏哨，还不都一样。你这个人真是！……”

“你回村里去吗？”

“过节回去。”

“古尔卡说，你的杜娜伊卡和福穆什金要好呢，”纳扎尔卡

忽然说。

“见她的鬼去吧！”卢卡什卡答道，他咧开密密的白牙，但是没有笑。“难道我不能再找一个？”

“古尔卡这样说的：他到她那里，她丈夫不在家。福穆什金坐在她那里，吃馅饼。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走到窗子前他听见她说：‘鬼东西不在家。亲人儿，不吃馅饼了吗？不要回家去睡觉吧。’他在窗前说：‘好极了。’”

“胡说！”

“真的，我敢发誓。”

卢卡什卡沉默了一会儿。

“她找到了别人，就去她的吧：姑娘还少吗？她不这样，我也已经厌恶她了。”

“你瞧你这个怪人！”纳扎尔卡说。“你最好是找少尉的女儿玛丽扬卡。怎么样，她还没有相好的吧？”

卢卡什卡脸色变得阴沉了。

“玛丽扬卡又怎么样！都一样！”他说。

“你试试看……”

“你想的什么？村里的姑娘不是有的是吗？”

卢卡什卡又吹起口哨，向哨所走去，一面撕掉树枝上的叶子。经过灌树丛时，他忽然停住了，发现一棵光滑的小树，他从短剑下面取出小刀，把它割下来。

“可以做通条，”他说着，就把树条在空中挥得唿唿地响。

哥萨克们在土坯砌的哨所门厅里的土地上，围着鞑靼式的矮桌子坐着吃晚饭，这时正谈到该谁去放潜伏哨的事。

“今天该谁去？”一个哥萨克对着敞开的门口向班长喊了一声。

“该谁去？”班长应了一声。“布尔拉克大叔去过了，福穆什金去过了，”他不十分自信地说。“你们去，好不好？你和纳扎尔^①，”他对卢卡什卡说，“叶尔古绍夫也一齐去；他大约醒酒了。”

“连你自己都没醒酒，他怎么会醒酒！”纳扎尔卡低声说。

哥萨克们笑起来。

叶尔古绍夫就是那个喝醉酒睡在屋旁的哥萨克。他刚擦着眼睛，踉踉跄跄地走进门厅。

这时卢卡什卡站起来，把枪背好了。

“你们快点去吧；吃了晚饭就去吧，”班长说。不等表示同意，班长就把门关上，看样子，他并不怎么希望哥萨克们听从。“要不是有命令，我也不会派你们，不然，说不定队长会亲自来巡查。并且听说有八个阿布列克要过河。”

“当然应该去，”叶尔古绍夫说，“规矩嘛！不能不去，赶上了这种时候。我说，应该去。”

这时，卢卡什卡两手抱着一大块鸡肉放在嘴边，时而看看班长，时而看看纳扎尔卡，仿佛对眼前所发生的事毫不关心，并且嘲笑他们两个。哥萨克正要去放潜伏哨，这时在梧桐树下白坐到天黑的叶罗什卡大叔走进黑暗的门厅。

“喂，孩子们，”他的低音在低矮的门厅里嗡嗡作响，压住了所有的声音，“我和你们一起去。你们守车臣人，我守野猪。”

八

叶罗什卡大叔和三个披着毡斗篷、挎着枪的哥萨克走出哨

^① 纳扎尔是纳扎尔卡的本名。

所，他们沿着捷列克河向指定放潜伏哨的地点走去，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纳扎尔卡简直不想去，但是卢卡喝了他一声，他们才很快地准备好。哥萨克默默地走了几步，就从沟渠转弯，沿着刚能看见的芦苇小径向捷列克河边走去。岸边横着一根被浪头抛上来的又粗又黑的木头，木头周围的芦苇是不久前才被踩倒的。

“就在这里守，好不好？”纳扎尔卡说。

“不然到哪里去！”卢卡什卡说，“在这里坐吧，我去指给大叔看，很快就回来。”

“这里是最好的地点：人家看不见我们，可是我们能看见人家，”叶尔古绍夫说，“就在这里坐；头等的位置。”

纳扎尔卡和叶尔古绍夫铺上毡斗篷，在木头后面安顿好，卢卡什卡和叶罗什卡大叔继续向前去了。

“就离这里不远，大叔，”卢卡什卡说，他在老汉前面脚步不出声地走着，“我指给你看野猪从哪里走过。老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指给我；你是个能干的，快手，”老汉也低声说。

又走了几步，卢卡什卡停住了，弯下身来看看一片水洼，他吹了一声口哨。

“就是这里，到这里喝水来的，看见没有？”他说，指着新踩的蹄印，声音低得刚能听见。

“基督保佑你，”老汉回答，“那家伙一定在渠那边水坑里，”他又说。“我坐在这里守着，你走吧。”

卢卡什卡往上纵了纵斗篷，独自一人沿着河岸走回去，他时而很快地看看左边象一堵墙壁似的芦苇，时而看看身旁陡岸下面波涛翻滚的捷列克河。“大约他们也在守卫或者在什么地方

爬行，”他心中这样想象车臣人。忽然一阵强烈的沙沙声和溅水声使他打了一个寒战，他抓起枪来。河岸下面，跳出一只野猪，唿唿哧哧地喘着气，它那黑色的身影在发光的水面上一闪，就消失在芦苇丛里。卢卡什卡急忙拿起枪贴到肩窝上，但是没来得及射击：野猪已经隐入丛藪里了。他懊丧地啐了一口，继续往前走。快到潜伏哨，他又停住，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他的口哨有了应声，他才向同伴走去。

纳扎尔卡缩做一团，已经睡着了。叶尔古绍夫盘着腿坐着，他向一旁挪动一下，让点地方给卢卡什卡。

“在这里坐着真开心，真的，是个好地方，”他说。“送到了吗？”

“指给他看了，”卢卡什卡回答，一面把斗篷铺开。“刚才有一只老大的野猪在水边走动。大约就是我说的那只！你也许听见动静了？”

“听见象是有野兽喀嚓喀嚓地响。我马上就知道是野兽。我心里想：卢卡什卡把野兽惊动了，”叶尔古绍夫说，把身子蜷缩到斗篷里。“我现在睡觉，”他又说，“鸡叫头遍你叫醒我；要照规矩办事嘛。我先睡觉，睡一会儿；然后你来睡觉，我来坐着；就这么办。”

“谢谢，我连睡都不想睡，”卢卡什卡回答。

夜黑漆漆的，很暖和，而且无风。只有一边天际闪烁着星星；另一边，从山那边起，大半个天被大块的乌云遮着。和群山连成一片的乌云，在无风的空中慢慢地越移越近，蔚蓝的星空明显地衬出乌云的卷边。哥萨克只能看见前面的捷列克河和远方；后面和两旁都是黑墙似的芦苇。芦苇有时无缘无故地摇动，互相碰得沙沙作响。从下面望去，摇曳的芦花仿佛是远在明亮

的天际的蓬蓬松松的树枝。前面脚下就是河岸，河岸下是滚滚的流水。往前看，光闪闪的移动的棕色水流在浅滩和岸边总是皱起同样的波纹。再往前看就是水、岸、乌云——所有这一切都溶成一片无法穿透的黑暗。水面上有黑影移动，哥萨克的有经验的眼力认出这些黑影是上游带下来的一段木头。仅仅有时闪光映到水中，象映到一面黑镜子上似的，现出对面坡度徐缓的河岸轮廓。均匀的夜间的声响，芦苇的沙沙声，哥萨克的鼾声，蚊虫的嗡嗡声和流水声，有时被远方的枪声打断，有时被河岸塌土的声音打断，有时被大鱼的泼刺声打断，有时被野生密林中的野兽的劈劈拍拍的声音打断。有一次，一只猫头鹰沿着河边飞过，翅膀每扇动两下就互相碰击一下。飞到哥萨克头上，它向森林转去，快飞到树上的时候，不是每隔一下，而是每次扇动翅膀就互相碰击一下，然后落到一棵老梧桐树上，久久地骚动着。每次响起这突然的声音，没有睡眠的哥萨克的听觉就更加紧张起来，眯缝着眼睛，不慌不忙地摸着枪。

大半夜过去了。乌云向西移去，从它那撕碎的边缘露出布满繁星的清澈的天空，金钩倒悬的月亮，把群山的上空照得通红。开始吹来阵阵袭人的凉气。纳扎尔卡醒来，说了一会儿话，又睡了。卢卡什卡觉得闷得慌，站起来，从短剑下取出小刀，开始把小棍削成通条。他的头脑里总是萦回着这样的想法：在那边山里住着车臣人，这些好汉们向这边走来，他们不怕哥萨克，可以从别的地方渡河。想到这里，他就探着身子，顺着河边望去，可是什么也没看见。他有时望望河，望望那在幽暗的月光下和水分辨不清的远方的河岸，他已经不再想车臣人，只等叫醒同伴就回村里去了。他想到村里的冬妮卡，他的相好的（哥萨克是这样称呼情人的），但是他一想起她就有气。呈现出早晨的迹

象：银色的雾在水面上发白，离他不远有几只年轻的鹰刺耳地尖叫，拍打着翅膀。最后，从村子远远传来第一遍雄鸡的高唱，跟着是另一只雄鸡的长鸣，然后又有其他的啼声响应它。

“该是叫醒他们的时候了，”卢卡什卡想道，他已经把通条削好，感到自己的眼皮发沉。他转身对着同伴们，细细辨认哪双脚是谁的；可是他忽然觉得，捷列克河对面发出拍水的声音，于是他再一次望望那在倒悬的月牙下发亮的山根，望望对岸的轮廓，望望捷列克河和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漂浮在河上的木段。他仿佛觉得它在移动，而捷列克河和浮木却凝然不动；但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他又细看。有一根带枝杈的黑色浮木特别引他注意。有点奇怪，这根浮木不摆动也不打转，它在河的正中间浮动。他甚至觉得，它不是顺流而下，而是横过捷列克河向浅滩浮去。卢卡什卡伸长了脖子死盯着它。浮木游到浅滩就停住了，奇怪地动弹着。卢卡什卡仿佛看到，从浮木下面伸出一只手来。“这回我可要打死一个阿布列克了！”他想。他抓起枪，从容不迫而迅速地架好枪架，把枪放好，贴紧肩窝。无声地扳住扳机，屏着气息，一面不断注视着，开始瞄准了。“我不叫醒他们，”他想。然而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一动不动，侧耳倾听着。浮木忽然噗咚一声落入水中，横过河面，向这岸游来。“可别有失闪！”他想，在朦胧的月光下，他看见一个鞑靼人的脑袋在浮木前闪动一下。他瞄准了那个脑袋。他觉得那脑袋已经近极了，就在枪筒的末端。他又望过去。“就是他，阿布列克，”他快乐地想，忽然，猛一使劲，跳起身跪了下来，又挪动一下枪，看准了目标，这时它在长筒枪的末端刚能看得出，于是，他按照哥萨克从小就养成的习惯祷告了一句：“圣父圣子保佑，”就扳动扳机。勃然爆发的闪光一瞬间照亮了芦苇和水。猝然脆响的枪声响彻了河上，传到很远

的地方变成隆隆的声音。浮木已经不是横着河面游动了，而是旋转着，晃荡着顺流而下。

“抓着，我说！”叶尔古绍夫喊叫起来，一面摸索枪，从木头后面欠起身来。

“住嘴，鬼东西！”卢卡咬紧了牙关，向他低声说。“阿布列克！”

“放枪打谁？”纳扎尔卡问，“打谁，卢卡什卡？”

卢卡什卡什么也没回答。他上了子弹，又注视着往下浮走的树木。流了不远，它停在一个浅滩上，从它后面露出一个挺大的东西，在水里摇动。

“打什么？你为啥不说话？”两个哥萨克又问。

“阿布列克！不是告诉你吗？”卢卡说。

“甬吹牛了！许是走火了吧？……”

“我打死一个阿布列克！就是为这放枪！”卢卡什卡说，由于激动嗓子都嘶哑了，他一跃站了起来。“有一个人洒水……”他指着浅滩说。“我把他打死了。朝这边看。”

“别胡扯了，”叶尔古绍夫揉着眼又重说一句。

“什么胡扯？你看嘛！朝这边看，”卢卡什卡说，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把他揪过来，痛得他叫了一声。

叶尔古绍夫朝卢卡什卡指的方向望去，他看出那具尸首后，忽然改变了腔调。

“哎哟！我告诉你，准还有，我给你说实话，”他轻轻地说，开始检查枪。“这个是打头站的；不是这里，就是对岸不远的地方，准还有；我给你说实话。”

卢卡什卡解开腰带，开始脱下束腰无领长袍。

“你到哪去，傻瓜？”叶尔古绍夫喊道，“你只要去试试，就会

白白把命送掉，我给你说实话。既然被打死了，他就跑不了。给我一点火药，我要上火药。你有吗？纳扎尔！你快到哨所去，可不要走河岸，他们会干掉你的，我说实话。”

“就我一个人去！你自己去吧，”纳扎尔卡生气地说。

卢卡什卡脱掉长袍。向河岸走去。

“不要去，不是告诉过你，”叶尔古绍夫说，一面向枪膛的火药池里撒火药。“你瞧，他不动弹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天快亮了，等一等哨所就来人。纳扎尔，去吧；害怕了！不要怕，我说。”

“卢卡，我说卢卡！”纳扎尔卡说，“你讲一讲，是怎样干掉的。”

卢卡改变了主意，不马上下到水里。

“你们快到哨所去，我在这里守着。叫哥萨克们派出一班骑兵侦察。如果河这边有情况……好搜索！”

“我说，他们会逃掉的，”叶尔古绍夫站起来说，“非捉到不可，说实话。”

叶尔古绍夫和纳扎尔卡都站起来，画了十字，就向哨所走去，不是沿着河岸，而是披开荆棘穿过森林小径。

“喂，卢卡，要当心，一动也别动，”叶尔古绍夫说，“不然他们也会在这里宰掉你的。你要留神，别大意了，我说。”

“去吧，我知道，”卢卡说，查看一下枪，又坐到木头后面。

卢卡什卡一个人坐着，向浅滩张望，细心地倾听哥萨克有没有走来；可是哨所离得很远，等得他急躁不安；他心中总是想，和被打死的一齐来的阿布列克就要逃掉了。他对现在逃掉的阿布列克，就象对昨晚走掉的野猪一样觉得惋惜。他时而望望自己的周围，时而望望对岸，期待马上再看见一个，他整了整枪架，准备射击。至于人家也会打死他的念头，他连想都没去想。

九

天已经开始亮了。停在沙滩上微微摇荡着的车臣人的整个尸体，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忽然，离卢卡不远的地方，响起芦苇喀嚓喀嚓的声音，传来脚步的声音，芦花也在摇动。哥萨克把枪机扳到第二道卡齿，口中念念有词：“圣父圣子保佑。”随着枪机的响声，脚步声停止了。

“嗨，哥萨克！不要打大叔，”响起镇静的低音，叶罗什卡分开芦苇，向他走来。

“差一点儿把你打死，真的！”卢卡什卡说。

“放枪打什么？”老汉问。

老汉洪亮的声音响彻了森林，顺着河流滚滚而下，顿时驱散了哥萨克周围夜的沉寂和神秘。仿佛周围忽然变得更亮堂更鲜明了。

“你连一只野兽都没守到吧，大叔，我可打到一只，”卢卡什卡放下机枪，故作镇静地站起来说。

老汉目不转睛地望着那现在已经看得清楚的发白的背脊，在它周围，捷列克河水激起了波纹。

“背着一段木头泅水。我看出了他，可是……你往那边瞧！就是那儿！穿着蓝裤子，似乎还带一支枪……瞧见了么？”卢卡说。

“怎么没瞧见！”老汉愤愤地说，他的脸上现出一派庄重而且严峻的表情。“打死了一个骑手，”他好象不胜惋惜地说。

“我正坐着，一瞧，对岸什么东西黑糊糊的？老远老远我就看出是个人走到河边，下到水里。多么奇怪！大段树枝，一个

老大老大的树枝在水上游，不是往下游，是横着过来。一瞧，哟，从它下面露出一个人脑袋。你说怪不怪？我摆好了枪，从芦苇里我看不见；我欠起身来，他大约听见了，狡猾的东西，向浅滩游去，爬了上去，往四外张望。别逞能，我心里想，你逃不脱的。他只是爬上去望了望。（哎哟，我喉咙堵得难受！）我把枪准备好，一动不动，等待机会。他停了又停，于是又游了，游到月光底下，连脊梁都看得见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保佑。’透过烟一瞧，他在乱动弹呢。他呻吟着，也许是我这样觉得吧？我想，谢天谢地，打死了！他给冲到浅滩上，全看得一清二楚的，他想站起来，但是没有力气。挣扎了一会儿，就躺下不动了。看得清清楚楚的。瞧他一动不动，准是完蛋了。他们两个回哨所报告去了，不叫其余的逃掉！”

“你还想再捉到！”老汉说。“老弟，早跑远了……”他又伤感地摇摇头。这时可以听见步行的和骑马的哥萨克大声地谈话，弄得树枝子喀嚓喀嚓乱响，沿着河岸来了。

“把小船带来没有？”卢卡喊了一声。

“真能干，卢卡！拖到岸上来！”有一个哥萨克喊道。

卢卡什卡不等小船来到，就开始脱衣服，目不转睛地瞅着捕获物。

“等一等，纳扎尔卡就把船撑过来了，”班长喊道。

“傻瓜！也许还活着呢！装死！带着短剑，”又有一个哥萨克喊道。

“废话！”卢卡脱着裤子喊道。他很快就脱了衣服，画了个十字，纵身一跃，就在溅起的水花中钻入水里，浑身都沾湿了，雪白的胳膊一左一右向前甩开，背脊高高地露出水面，大声喘着气，向浅滩横渡过去。岸上的一群哥萨克，几个声音同时大声谈论

着。有三个骑兵巡逻去了。小船从河湾那边划过来。卢卡什卡爬上浅滩，俯下身来把那个车臣人晃了两下。只听见卢卡从那里尖声叫道：“挺尸了！”

车臣人头部中弹。他穿着蓝裤子、衬衫、束腰无领长袍，背上绑着枪和短剑，此外还绑着一个大树枝子，这就是那个起先瞒过卢卡什卡的树枝子。

“喏，好大一条鲤鱼！”围成圈的哥萨克中间有人说，这时，那个从小船里拖上来的车臣人的尸体躺在岸上，压倒了一片野草。

“你看他的脸多黄！”其中又一个说。

“咱们的骑兵到哪儿搜索去了？他们大约全在对岸。如果不是打前站的，是不会这样洒水的。单个儿游过来干吗？”第三个人说。

“准是个能手，居然打先锋。看样子是个了不起的骑手！”卢卡什卡嘲笑地说，他在岸上拧着湿衣裳，不停地打哆嗦。“胡子还染过，修剪过。”

“背上还绑个口袋，里面装着粗呢上衣。这样洒水轻一点，”有一个人说。

“卢卡什卡，你听我说！”班长拿着从死者身上取下的短剑和枪，说。“你把短剑和上衣拿去，这支枪给我，我给你三个卢布。瞧，枪筒上有个砂眼，”他说着就向枪口吹气，“我不过是想留个纪念。”

卢卡什卡一句话没说，这样敲诈勒索显然使他气愤，但是他知道这是免不了的。

“咳，这算什么玩意儿！”他沉着脸子把车臣人的上衣向地上一摔，“上衣是件好的倒也罢了，而实际上，是一件乞丐的衣裳。”

“背柴时可以穿穿，”另外一个哥萨克说。

“莫谢夫！我要回家去，”卢卡什卡说，看样子，他已经忘了自己的气愤，想利用给官长送礼的机会找点便宜。

“回就回呗！”

“弟兄们，把尸首弄回哨所去，”他向哥萨克们吩咐道，一面老是查看枪。“给它搭一个棚子挡挡太阳。也许山里有人来赎。”

“天还不热呢，”有一个人说。

“给豺狼撕掉了呢？那怎么是好啊？”又一个哥萨克说。

“我们派人守着，不然有人来赎，一看撕得鸡零狗碎的，那可不好。”

“卢卡什卡，怎么样：请弟兄们喝一维德罗^①吧，”班长又快乐地说了一句。

“这是老规矩，”哥萨克们附和着说。“瞧你运气多好：刚出来混事就打死一个阿布列克。”

“你们把短剑和上衣都买了吧。多给点钱。裤子也卖给你们。去你的吧，”卢卡说。“我穿不上：这家伙是一个精壮的汉子。”

有一个哥萨克花了一卢布把上衣买去。另一个用两维德罗酒把短剑换了去。

“弟兄们，喝吧，我请一维德罗酒，”卢卡什卡说，“我亲自从村里运来。”

“把裤子剪成头巾送给姑娘们，”纳扎尔卡说。

哥萨克们哄然大笑。

“够了够了，不要笑了，”班长重复着说，“把尸首弄走。干吗

^① 俄国液量名，1维德罗合12.3升。

要把这么脏的东西放在屋子旁边……”

“干吗站着不动？弟兄们，把它拖到这里！”卢卡什卡对那些不愿意碰死尸的哥萨克们用命令的口气喊了一声，哥萨克们都执行他的命令，就仿佛他是首长似的。哥萨克们把尸首拖了几步，就把腿放下，这双腿毫无生气地抖了一下就落在地上，哥萨克们闪开来，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纳扎尔卡走到尸体跟前，把扭歪了的头颅摆正，露出太阳穴上血淋淋的圆圆的伤口和死者的整个面孔。

“瞧，做了个多么好的记号！正在脑子上！”他说，“这一下可丢不了啦，主人认得出。”

没有人说话，安静的天使又在哥萨克们的头上飞翔。

太阳已经升高了。四射的光芒照到饱含露水的绿叶上。不远的捷列克河在醒来的森林里滚滚地流着；野鸡从四面互相啼叫着迎接早晨。哥萨克们在死者周围默默不动地站着，不住地望着他。他那穿一条湿得发黑的蓝裤子，在瘪下去的肚子上束着腰带的棕色的身体匀称而且漂亮。肌肉发达的两只胳膊顺着两肋直直地放着。新剃的发青的圆脑壳带着血液凝结的伤口偏颇地往后歪着。平滑的晒黑的前额和新剃的脑壳界线分明。他睁着玻璃似的眼睛，瞳人在下方凝然不动，仿佛是越过一切往上望着。从剪短的红胡子下面露出薄薄的松弛的嘴唇，唇上仿佛停留着一丝善意的讥笑。他的小手长满了红毛，手指往里弯曲着，指甲也是染红了的。卢卡什卡还没有穿上衣裳。他浑身透湿，脖颈更显得发红，眼睛比平时更光亮；宽宽的颧骨颤抖着；他那白净而健康的身体在早晨的新鲜空气中微微冒着热气。

“本来也是个人物来的！”他说，显然是在欣赏死人。

“是啊，要是碰到他的手里，他也不会放过你的，”哥萨克中

间有人说。

静穆的天使飞走了。哥萨克们动作起来，谈起话来。有两个人去砍灌木准备搭棚。其他的人溜溜达达地走回哨所去。卢卡和纳扎尔卡跑过去收拾东西准备回村子。

半小时后，卢卡和纳扎尔卡几乎是跑步穿过捷列克河和村子中间的森林向家里走去，一面走一面不停地说话。

“记住，你不要对她说是我叫你来的；你就去看一看她丈夫在不在家？”卢卡厉声地说道。

“我顺便绕到亚姆卡家看看，——咱们吃喝它一顿吗？”顺从的纳扎尔卡问。

“今天不吃不喝，什么时候吃喝，”卢卡回答。

两个哥萨克走进村子，喝了酒，一倒头就睡到晚上。

十

在上述事件之后的第三天，有两个高加索步兵连来到诺沃姆林斯克村。卸了马的连队辎重车停在广场上。伙夫们掘好坑，从各家院子里顺手牵羊地拖来一些木头，煮起粥来。司务长在检查人数。辎重兵楔橛子拴马。设营员们象管家似的在大街小巷穿来穿去，给军官和士兵们分配住处。这里是排成一列的子弹箱。这里是炮车和马匹。这里是煮粥的大锅。这里是上尉，是中尉，是司务长奥尼西姆·米哈伊洛维奇。这一切就是发生在听说连队奉命在那里驻扎的村子里；因此，连队到了这里，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为什么驻扎在这里？这些哥萨克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欢迎他们驻扎在那里吗？他们是不是分裂教派？这都没有关系。那些散了队的、疲惫不堪的、满身尘土的士兵们，

象一群归巢的蜜蜂似的，吵吵嚷嚷和毫无秩序地散布在广场上和大街上；全然不去理会哥萨克们对他们的反感，三三两两，有说有笑，武器碰得锵锵作响，走进人家的屋里，把军用品挂起来，打开袋子整理东西，跟女人们开玩笑。在士兵喜爱的地方——煮粥的地方，聚了一大堆人，士兵们嘴里叼着烟袋，一会儿望望炊烟——它慢慢升到炎热的高空，凝聚成一朵白云，一会儿望望篝火——它在洁净的空气中象融化了的玻璃似的颤动着，他们挖苦和取笑哥萨克男人和女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俄罗斯人的完全不一样。在各家的院子里都可以看见士兵，都可以听见他们的大笑声，听见哥萨克女人们卫护自己的家和不让士兵们使用水和器皿的厉声尖叫，小孩子和小姑娘假依着母亲，母亲也假依着他们，他们带着吃惊的眼神盯视着从未见过的军人的每一动作，并且敬而远之地跟在他们后面跑。老年的哥萨克走出屋子，坐在屋根的土台上，阴沉沉地一言不发地看着士兵们忙碌奔走，仿佛他们对这一切只好听之任之，不明白会闹成什么样子。

奥列宁在高加索团队当士官生已经三个月了。他分配到村中最好的房子，房东就是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和妻子乌莉特卡大娘。

“这怎么得了，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气喘吁吁的瓦纽沙对奥列宁说。这时奥列宁身穿束腰无领长袍，骑着在格罗兹买的卡巴尔达马，在赶了五小时的路以后正高高兴兴地进入给他指定的住处的院子。

“怎么啦，伊万·瓦西里奇^①？”他问道，一面抚摩着马，快乐地望着满头大汗、头发蓬乱、面色难看的瓦纽沙，他跟着行李车

^① 是瓦纽沙的尊称，在这里是主人跟他开玩笑。

先到，正在整理东西。

奥列宁看上去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本来剃得光光的两颊，现在冒出年轻人的胡须。由于夜生活弄得枯槁憔悴、又黄又瘦的面孔，现在两颊、前额、耳后都露出发红的、晒黑的健康颜色。本来是洁净的、簇新的黑色燕尾服，现在换上白色的、肮脏的、打着宽大皱褶的束腰无领长袍，而且佩上武器。本来是新浆洗过的小领子，现在紧箍着晒黑的脖颈的是粗绸子上衣的红领子。他是学契尔克斯人的装束，但学得不好；谁都可以认出他是俄罗斯人，而不是骑手。看来满象那回事，其实不象。虽然如此，他全身仍然散发着健康、快乐和得意的气息。

“您觉得好笑；是吧，”瓦纽沙说，“您自己去试试跟这里的老乡谈谈，他们硬是给你钉子碰。你从他们嘴里连一句好听的话也掏不出。”瓦纽沙怒冲冲地把铁桶往门槛一扔。“不象咱们俄罗斯人。”

“你不会找村长去吗？”

“我知道他住在哪里？”瓦纽沙气愤地说。

“谁把你气成这个样子？”奥列宁环顾着周围说。

“真见鬼！呸！正当家的不在，说是‘鲛鱼’^①去了。老太婆凶得象个魔鬼，上帝保佑！”瓦纽沙抓住头发，说。“我真不知道在这里怎样过下去。比鞑靼人还坏，真的。枉有个基督徒的称号。鞑靼人已经够呛的了，但比起来还算高尚的。‘鲛鱼去了’！亏她想得出‘鲛鱼’！”瓦纽沙把话说完了，转过脸去。

“怎么啦，有点不象在咱们家里，是不是？”奥列宁戏弄地说，他仍然没有下马。

① 在靠岸的河水里插篱笆捉鱼。

“请您把马交给我吧，”瓦纽沙说，他显然被新的秩序弄糊涂了，但是也无可奈何。

“这么说来，鞑靼人还要高尚点？瓦纽沙，是不是？”奥列宁一面下马，拍了拍马鞍子，重复着说。

“你还笑呢！你觉得好笑！”瓦纽沙怨声怨气地说。

“等一等，别生气，伊万·瓦西里奇，”奥列宁仍然含着笑说。“让我到房东那里看看，一切都会弄好的。我们还要住得称心如意呢！不过你别着急。”

瓦纽沙没有答话，只是眯缝着眼鄙薄地瞧了瞧主人的背影，摇了摇头。瓦纽沙把奥列宁只当作主人，而奥列宁把瓦纽沙也只当作仆人，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他们是一对朋友的话，那么他们俩一定会感到惊奇。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确是朋友。瓦纽沙刚到主人家时才十一岁，奥列宁跟他同年。奥列宁十五岁时，有一个时期，对瓦纽沙进行了教育，教会了他读法文，瓦纽沙对这特别引以为骄傲。直到现在，瓦纽沙在高兴的时候还卖弄几句法国话，并且接着总是一阵傻笑。

奥列宁跑上台阶，推开通到过厅的门。玛丽亚娜穿一件哥萨克姑娘家常穿的粉红长衫，吃惊地从门口闪开，紧靠着墙站在那里，用鞑靼式长衫的宽袖子遮着脸的下部。奥列宁把门再推开一点，在半明半暗中看见了哥萨克姑娘的高大苗条的身材。怀着急不及待的青春的好奇心，他不由得注意到在薄薄的印花布长衫下衬出矫健的少女身姿，以及那双美丽的黑眼睛带着儿童的畏惧和野性的好奇心注视着他。“这就是她！”奥列宁想道。“还有很多这样的呢，”接着他心中又起了这个念头，于是他推开通到屋里的门。乌莉特卡老大娘也穿着一件长衫，正背着他弯腰扫地。

“你好，老大娘！我是来谈租房的事……”他开始说。

那个哥萨克女人没有直起腰来，把她那严厉的、然而还很美的脸转过来对着他。

“干吗来了？要笑我们来了？是不是，我要笑给你看看！你这个染上黑死病的！”她喊道，斜着眼睛从紧皱的眉头下面瞅着他。

奥列宁起初想，劳苦勇敢的高加索军团一定到处受人欢迎，特别是受战友哥萨克们的欢迎，所以受到这样的接待使他莫名其妙。可是他没有慌乱，他想解释一下他是准备付房钱的，但是老太太不让他说完。

“你干吗来了？谁要你那倒霉的钱？你这个光脸皮！等一会主人回来，他会给你房子的。我不要你的臭钱。说得倒容易，真没见过！吸烟把屋子熏臭了，想付房钱了事，没见过这种臭东西！枪子儿打穿你的肚皮，穿透你的心！……”她打断奥列宁的话，尖着嗓子喊道。

“看起来，瓦纽沙是对的！”奥列宁想道。“鞑靼人要高尚些，”伴随着乌莉特卡大娘的骂声，他走出屋子。正在他走出去的时候，还是穿着那件粉红色的长衫、但是已经用白头巾遮到眼睛的玛丽亚娜，忽然从他面前溜出了过厅。她赤着脚飞快地从台阶咚咚地跑下去，猛然停住脚，转过脸来，用笑眯眯的眼睛看了看年轻人，就拐过屋角不见了。

那坚实的年轻的步伐，那白头巾下光闪闪的眼睛刺人的一瞥，那美人的矫健体格之匀称苗条，现在使奥列宁更感到吃惊。“大概就是她了，”他想道。他不再去想那租房的事，老是张望玛丽亚娜；他走到瓦纽沙跟前。

“瞧，那姑娘多么野，”瓦纽沙说，他还在车旁忙来忙去，但已

经有点高兴了，“活象一匹马群里的小马驹！拉法姆^①！”他又说一句，接着得意地高声哈哈大笑起来。

十 一

将近傍晚，主人捕鱼回来了，他得知他可以得到房租，就劝慰了妻子，满足了瓦纽沙的要求。

新居一切都安置好了。房东搬到冬天住的房间，把夏天住的房间以每月三卢布的租金让给士官生。奥列宁吃过东西，就睡了。傍晚醒来，他洗了脸，把身上收拾干净，吃了中饭，就坐在朝街的窗户跟前抽起烟来。炎热减退了。带有镂花屋脊的茅舍的斜影，移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已经爬上对面房屋的墙根了。对面房屋陡峭的芦苇顶盖，在落日的光辉下闪闪发光。空气清凉了。村子里是一片寂静。士兵们分头住下，安静下来。牲畜还没有赶回来，人们还没有干完活儿回家。

奥列宁的住处几乎是在村头。有时，从捷列克河对岸的远方，就是从奥列宁来的那些地方，传来低沉的枪声，——这是从切奇尼亚或者卡尔梅克平原传来的。过了三个月的野营生活，奥列宁觉得非常好。在刚刮过的脸上，他感到凉爽，在强壮的身体上，他感到行军后异乎寻常的清洁，在歇过乏的四肢上，他感到宁静和力量。在他的心灵上也感到清新和明净。他回忆起危险已经过去的行军生活。回忆起他在危险中表现得很好，并不比别人差些，他被认为是勇敢的高加索军人中的一员。莫斯科生活的回忆已经飞到九霄云外。旧生活一扫而光，新的生活，全然

^① 法语：女人！

崭新的、还没有犯过错误的生活开始了。他可以在这里的新人中间做一个新人，赢得一个新的好名声。他体验到一种无缘无故的生活的喜悦——这是一种青春的感觉。他时而往窗外看看在屋旁阴影里转陀螺的孩子们，时而看看刚收拾好的房间，他不住地想，在这对他说来还是新鲜的哥萨克村庄的生活中安顿下来，他是多么愉快。他再看一看山和天空，一种庄严的大自然的严峻感情，掺进他的一切回忆和幻想里。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了，并不象他离开莫斯科时所想的那样，而是出乎意外美好地开始了。山啊，山啊，山啊，他所想所感的一切，都含有它的气息。

“亲母狗！舔瓦罐！叶罗什卡大叔亲母狗！”在窗下转陀螺的孩子们忽然对着小巷子喊道。“亲母狗！卖了剑，喝了酒！”孩子们一面喊，一面挤做一团跑开了。

这是对叶罗什卡大叔喊的，这时他挎着枪，腰间挂着野鸡，打猎回来了。

“我的罪过，孩子们！我的罪过！”他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面用力甩开两手，往街两旁的窗户张望着。“把母狗也卖掉喝了酒，是我的罪过！”他重复着说，看样子是生气了，但装作满不在乎。

孩子们这样招呼老猎人使奥列宁觉得奇怪，而使他更惊奇的是那个被称做叶罗什卡大叔的人那副富有表情的聪明的面孔和强壮的身体。

“老大爷！哥萨克！”他对他说。“到这里来。”

老汉往窗口望了望，停住了。

“你好，好人儿，”他说，在剪得短短的头发上举了举他的小帽。

“你好，好人儿，”奥列宁回答。“孩子们对你喊些什么？”

“逗着我老头子玩呢。这没什么。我喜欢。让他们取笑大叔好了，”他说，腔调硬朗而且好听，受人尊敬的老年人都是这样说话的。“你是军队的官长吗？”

“不是，我是士官生。你在哪里打到的野鸡？”奥列宁问道。

“在森林里打到三只野鸡，”老汉说着，就转身把宽阔的背脊对着窗户。在他背后挂着三只野鸡，它们的脑袋掖在腰带里，束腰无领长袍上染着斑斑的血迹。“难道你没见过吗？”他问。“你想要就拿去两只吧。给你！”他从窗口递进来两只野鸡。“怎么，你是猎人吗？”他问。

“是猎人。我在行军的时候亲手打死四只。”

“四只？这么多！”老汉嘲笑地说。“你爱喝酒吗？喝奇希尔吗？”

“为什么不啊？我爱喝一盅。”

“啊，我看出你是一条汉子！咱们要交个朋友，”叶罗什卡大叔说。

“来吧，”奥列宁说。“咱们喝一杯奇希尔。”

“我就来，”老汉说。“你把这野鸡拿去吧。”

从老汉的脸上看得出，他很喜欢士官生，并且他马上就懂得，在士官生这里可以白喝酒，所以可以送给他一对野鸡。

几分钟后，屋门口出现了叶罗什卡大叔的身影。这时奥列宁才清楚地看出：虽然这个人留着雪白雪白的大胡子，枣红色的面孔全都刻画着老年的、有力的、劳动的皱纹，可是他的体格是多么魁伟和粗壮。他的胳膊、腿、肩膀，是这样丰满和滚圆，只有年轻人才是这样的。在他的头上，从短发下面露出几道深深的疤痕。青筋暴露、粗壮得象公牛似的脖颈满盖着纵横交错的皱

褶。长满老茧的双手僵硬而且全是伤痕。他轻快利落地迈过门槛，把枪取下放在墙角，迅速地扫视了一下而且估了估屋里摆设的家当，于是迈开包在鹿皮里的外八字脚轻轻地走到屋子中间。一股强烈的、然而并不难闻的奇希尔、伏特加、火药和晒干的血的混合味道，跟他一起涌进屋里。

叶罗什卡大叔对圣像行了礼，捋了捋胡子，走到奥列宁跟前，向他伸出一只粗大的黑手。

“科什基利德！”他说。“这是鞑靼话，意思是祝你健康，祝你平安。”

“科什基利德！我懂，”奥列宁回答，也把手伸给他。

“嗨，你不懂，你不懂规矩！傻瓜！”叶罗什卡大叔责备地摇着头说。“人家对你说科什基利德，你就说：阿拉 拉兹 博松，意思是托天之福。要这样说，我的老弟，不要说科什基利德。我全教给你。以前我们这里有个伊利亚·莫谢伊奇，是你们俄罗斯人，俺俩是朋友来着。是条好汉。酒鬼，小偷，猎人，一个好样的猎人！我把什么都教会了他。”

“你要教我什么？”奥列宁问，他对这个老汉越来越感兴趣。

“我带你打猎，教你捕鱼，叫你认一认车臣人，你愿意的话，给你找个相好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是滑稽家！”老汉笑起来，“我坐一坐，老弟，我累了。卡尔加？”他又问了一句。

“卡尔加是什么意思？”奥列宁问。

“意思是：好，是格鲁吉亚话。我常这样说；我的口头语，卡尔加是我喜爱的话；我说卡尔加，是我开玩笑呢。怎么样，老弟，吩咐把奇希尔拿来。老总，你有勤务兵吗？有？伊万！”他喊道。“你们当兵的都叫伊万。你的勤务兵也叫伊万，是不是？”

“对了，叫伊万。瓦纽沙！向房东买点奇希尔来。”

“瓦纽沙也好，伊万也好，反正都一样。为什么你们当兵的都叫伊万？伊万！”老汉喊了一声。“老弟，你要新开的那桶酒。他家的奇希尔是全村最好的。要注意，三十戈比一两，多要不给，这就够那个老巫婆高兴的了……我们这里的人都不地道，蠢得很，”当瓦纽沙走出屋子的时候，叶罗什卡大叔用推心置腹的声调继续说，“他们不把你们当人看。他们觉得你比鞑靼人还坏。他们说俄罗斯人都是世俗的人。可是我看，你虽说是兵，但仍然是人，也有一颗人心。我说的对吗？伊利亚·莫谢依奇是个兵，可是，他为人多么好啊！是不是，老弟，就是为了这，我们这里的人都不喜欢我；我无所谓。我是个乐天派，我谁都爱，我是叶罗什卡嘛！就是这样的，老弟！”

说到这里，老汉亲热地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

十二

在这工夫，瓦纽沙已经整顿好自己的家务，甚至在连部的理发师那里理了发，并且把裤脚儿放在靴子外面，这表示连队已经住在宽敞的宅院里，他的心情十分舒畅。他聚精会神地但不怀善意地把叶罗什卡打量了一番，象打量一个从未见过的野兽一样，他看了看被他弄脏了的地板，摇摇头，从条凳下面拿出两个空瓶子，就到房东那里去了。

“您好，亲爱的，”他下决心表现得特别和善。“我们老爷吩咐买酒来了；给我们倒一点，善人们。”

老太婆一句话不答。姑娘在一面鞑靼式的小镜子前戴头巾；她默默地回头看了看瓦纽沙。

“我们给钱，敬爱的，”瓦纽沙摇了摇兜里的铜币。“你们待

我们好，我们也待你们好，这样才好，”他加添了几句。

“要多少？”老太婆突然问道。

“二斤。”

“亲爱的，你去给他们倒二斤，”乌莉特卡老大娘对女儿说。

“倒那个刚打开的，好孩子。”

姑娘拿起钥匙和大肚长颈瓶就同瓦纽沙一起走出了屋子。

“请问你，这个女人是谁？”当玛丽扬卡经过窗口的时候，奥列宁指着她问老汉。

老汉眨眨眼，用肘弯捅了捅年轻人。

“你等一下，”他说着就把头伸出窗外。“喀姆！喀姆！”他咳嗽了几声，就低沉着嗓子喊道：“玛丽亚奴什卡！哎，小妞儿玛丽亚奴什卡！爱我吧，亲爱的！我是个滑稽鬼，”他又对奥列宁低声说了一句。

那姑娘头也不转地均匀而有力地甩开两手，用哥萨克姑娘所特有的潇洒而矫健的步伐从窗口走过，她慢慢地转动被长睫毛遮着的黑眼睛，仅仅向老汉膘了一眼。

“爱我吧，你会幸福的！”叶罗什卡喊道，又对奥列宁眨眨眼，疑问地看着他。“我是个好汉子，我是个滑稽鬼，”他又说。“这姑娘是个皇后？对吧？”

“美女，”奥列宁说。“叫她到这里来。”

“那可不行！”老汉说。“人家正要把她说给卢卡什卡呢。卢卡是个能干的哥萨克，骑手，前几天打死一个阿布列克。我给你找个更好的。给你找个浑身上下穿绫罗戴金银的。我说得出就办得到；找一个美人。”

“这么大年纪，还说这种话！”奥列宁说。“这是罪过啊！”

“罪过？有什么罪过？”老汉坚决地回答。“看看漂亮的姑娘

就算罪过？和她玩玩就算罪过？难道爱她也算罪过吗？你们那里都是这样的吧？不，老弟，这不算罪过，这是超度灵魂。上帝造了你，上帝也造了姑娘。老弟，他造了一切。所以看看漂亮的姑娘不算罪过。造出她来，就是让人爱她，让人从她身上得到欢乐。我是这样看法，亲爱的。”

玛丽亚娜穿过院子走进一间摆满了桶的黑暗冰冷的贮藏室，她习惯地念着祷词走到桶跟前，把端子放了进去。瓦纽沙站在门口，微微含笑地看着她。他觉得她穿的那件长衫，后面紧箍着，前面往上吊着，太可笑了，更可笑的是她脖颈上挂着一串银币。他想，这不是俄罗斯式的打扮，他们仆人要是看到这样装束的姑娘，会哄然大笑的。“拉·非·利·科·姆·塞·特·雷·比·耶，^①别有风味，”他想，“我现在就去告诉老爷。”

“干吗挡着亮，鬼东西！”姑娘忽然喊了一声。“把瓶子拿过来嘛。”

玛丽亚娜把瓶子灌满红色的凉葡萄酒，就递给瓦纽沙。

“把钱交给妈妈，”她推开瓦纽沙拿着钱的手，说。

瓦纽沙微笑一下。

“您为什么这么凶，亲爱的？”他和和气气地说，犹犹豫豫地不知怎样办是好，这时姑娘已经把酒桶盖好。

她笑了起来。

“难道你们和气吗？”

“我和我们老爷都很和气，”瓦纽沙确信地回答。“我们可和气呢，不管住在哪里，我们的房东总是感激我们。因为他是贵族。”

^① 不准确的法语：这个姑娘很好看。

姑娘停下来听他讲。

“他结过婚吗，你们家老爷？”她问。

“没有，我们老爷还年轻，没有结婚。因为贵族老爷从来不在年轻时候结婚，”瓦纽沙用教训的口吻反驳道。

“看你说的！吃得象头水牛似的，还说年轻不能结婚！他是你们军队的长官吗？”

“我们老爷是士官生，意思是说，还不是军官。可是这个称号比将军还大，是个大人物。因为不光是我们的团长认识他，连沙皇也认识他，”瓦纽沙骄傲地说。“我们不是那种叫花子军队，我们老爷是个枢密官，有一千多农奴，给我们寄钱一寄就是上千卢布。所以人家都喜欢我们。就是当个连长又怎么样，没有钱还不是白搭？……”

“走了，锁门了，”姑娘打断了他的话。

瓦纽沙把酒拿回去，对奥列宁说，拉·非·利·塞·特·雷·茹·利^①，接着哈哈傻笑一阵就走开了。

十 三

在这工夫，广场上号声响了。人们做完工回来了。大门口牲畜群哞哞地吼叫，在金色的尘土云雾里拥挤着。姑娘们和女人们在街上和院子里忙着赶牲口。太阳完全隐没在远方的雪山后面。一片淡蓝色的阴影遮着了天和地。在黑暗的果园上空，露出刚刚发亮的星星，村子里的声响渐渐静下来。哥萨克女人们收拾好牲口，都嗑着葵花子走到街的拐角，在土台上坐下来。

① 不准确的法语：这个姑娘很美丽。

玛丽亚娜挤完了两只黄牛和一只水牛的奶，也加入了其中的一伙儿。

这一伙儿里面有几个妇女和姑娘，还有一个哥萨克老人。

他们正在谈论打死阿布列克的事情，哥萨克老人讲，女人们问。

“我想，会给他很大的奖赏吧？”一个女人说。

“哪还用得着说？听说要给他寄来十字勋章呢。”

“就是这样，莫谢夫也想欺负他。把枪没收了去，基兹利亚尔的官长都知道了这件事。”

“真下流，这个莫谢夫！”

“听说卢卡什卡回来了，”一个姑娘说。

“和纳扎尔卡一起在亚姆卡（亚姆卡是一个没有结婚的放荡女人，她开设一个小酒店）那里玩呢。听说他们喝了半维德罗酒。”

“这个快手真幸运！”有一个人说。“简直是一个快手！没有说的！小伙子是好样的！多么麻利！一个真正的小伙子。他父亲基里亚克就是这样的人；完全象父亲。他被打死的时候，全村都为他哭了……瞧，好象是他们来了，”那个说话的人指着顺着街向他们走来的哥萨克，继续说。“叶尔古绍夫也和他们一起来了！瞧那个醉鬼！”

卢卡什卡和纳扎尔卡、叶尔古绍夫喝完了半维德罗酒，向姑娘们走来了。他们三个人，特别是那个年纪大的哥萨克，面孔都比平常红。叶尔古绍夫踉踉跄跄的，老是放声大笑，撞着纳扎尔卡的腰。

“骚货，你们怎么不唱歌？”他对姑娘们喊道。“我说，唱个歌给我们助兴吧。”

“你们好？你们好？”响起了一阵欢迎声。

“唱什么歌？又不是过节。”一个女人说。“你灌足了，你唱吧。”

叶尔古绍夫哈哈大笑，推了推纳扎尔卡：

“你唱一个，怎么样！我也唱，我能干，我说。”

“怎么，美人儿，睡着了吗？”纳扎尔卡说。“我们从哨所来喝庆贺酒来了。我们刚才庆贺了卢卡什卡。”

卢卡什卡走到那伙人跟前，慢慢地举了举皮帽子，就在姑娘面前站住了。他那宽宽的颧骨和脖颈都是红的。他站在那里轻轻地、庄重地说话；但是这种缓慢而庄重的动作比纳扎尔卡的信口胡扯和忙忙乱乱却更能活跃气氛，而且增加力量。他好似一匹小马驹撒过欢，摇了摇尾巴，打了一个鼻响，四蹄象钉在地上似的站住了。卢卡什卡静静地站在姑娘们面前；眼睛含着笑意；他很少讲话，时而看看喝醉了的同伴，时而看看姑娘们。当玛丽亚娜向拐角走来的时候，他稳稳地、不慌不忙地举了举帽子，让到一旁，然后又在她面前站着，一只脚微微向前伸出，大拇指插进腰带里，摆弄着短剑。玛丽亚娜慢慢地低下头回答他的鞠躬，坐到土台上，从怀里掏出葵瓜子。卢卡什卡目不转睛地望着玛丽亚娜，她嗑着葵瓜子，慢慢地吐着壳儿。当玛丽亚娜走来的时候，大家都安安静静的。

“怎么样？这次回来要住很久吗？”一个哥萨克女人打破了沉默，问道。

“明天早上回去，”卢卡什卡庄重地回答。

“是啊，愿上帝保佑你得到好处，”那个年老的哥萨克说，“刚才还说来着，我很高兴。”

“我也是说嘛，”喝醉了的叶尔古绍夫笑着接过去说。“瞧这

些客人!”他指着过路的士兵又说。“士兵的伏特加真好，我爱喝!”

“三个魔鬼派到我家住，”一个哥萨克女人说。“老爷爷到村公所去一趟；说是没关系，没法子可想。”

“啊哈！你尝到苦头了吧？”叶尔古绍夫说。

“大约他们用烟熏你们了吧？”另一个哥萨克女人问。“在院子里抽多少都可以，可不能让他们在屋子里抽。就是村长来说，也不行。他们还会偷东西呢。你瞧吧，他准不让住在自己家里，我是说村长那个鬼儿子。”

“你不乐意吧！”叶尔古绍夫又说。

“又有人说，要命令姑娘们给士兵铺床叠被呢，还要把奇希尔掺上蜜给他们喝，”纳扎尔卡说，他也学卢卡什卡伸出一只脚，也象他那样把皮帽子推到脑后。

叶尔古绍夫爆发出一阵大笑，抓起坐在他身旁的姑娘就拥抱。

“我是说真的。”

“唉，黑鬼，”姑娘尖声叫道，“我要告诉你老婆！”

“告诉去吧！”他叫道。“纳扎尔卡说的是实话；来过公事，他识字。是真的。”说着，他又挨排地搂第二个姑娘。

“胡缠什么，混帐东西！”那个红润的圆脸的乌斯坚卡笑着尖声叫道，一面挥起手来打他。

哥萨克向旁边一闪，险些儿摔倒。

“瞧，谁说姑娘没有劲儿：差一点把我打死。”

“嗨，你这个黑鬼，鬼把你从哨所里送来了！”乌斯坚卡说，躲开他，又哄然大笑起来。“你睡过头了，没有打死那个阿布列克，是不是？要是他把你杀死，那才好呢。”

“那你会痛哭的!”纳扎尔卡笑道。

“瞧，她一点不难过。还说痛哭呢? 纳扎尔卡，你看?”叶尔古绍夫说。

卢卡什卡始终默默地看着玛丽亚娜。他的注视显然使姑娘不好意思。

“玛丽扬卡，听说有个当官的住在你家里?”他向她走近一点说。

玛丽亚娜象平时一样，不马上回答，她慢慢地向哥萨克们抬起眼睛。卢卡什卡的眼睛含着笑，仿佛在他和这个姑娘之间这时发生一件特别的、与正在进行的谈话无关的事情。

“是的，他们家倒好，有两间屋子，”一个老太婆替玛丽亚娜答话，“福穆什金家里也搬进一个当官的，听说所有的角落都堆满了东西，弄得家里的人没地方住。村子里开进了大队人马，真没听说过!”她说。“他们来这里搞些什么鬼名堂!”

“听说要在捷列克河上修桥，”有一个姑娘说。

“可是我听人家说，”纳扎尔卡向乌斯坚卡走近一点，说，“他们要挖一个坑，把姑娘都填进去，因为她们不爱年轻小伙子。”他又做出一个他所喜爱的姿势，接着大家都哄然大笑，而叶尔古绍夫随即就去拥抱那个老女人，而放过应该轮到的玛丽亚娜。

“为什么不拥抱玛丽扬卡? 挨着次序把大家都搂一遍嘛，”纳扎尔卡说。

“不，我的这个老家伙更甜蜜，”哥萨克喊道，一面亲吻正在挣扎的老太婆。

“勒死我了!”她笑着喊道。

街头整齐的脚步声打断了笑声。三个穿着军大衣、挎着枪的士兵齐步行进着，他们是到连部辐重堆栈去换岗的。上等兵

是个年老的勋章获得者，他忿忿地看了看哥萨克们，他领着士兵向卢卡什卡和纳扎尔卡站着的街道走来。纳扎尔卡让开了路，但卢卡什卡只是眯缝着眼睛，把头 and 宽阔的背转过去，动也不动。

“有人站在这里，绕路走吧，”他说，斜着眼轻蔑地向士兵摆了摆手。

士兵们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踏着整齐的脚步，从旁边走过去。

玛丽亚娜笑起来，接着所有的姑娘都笑起来。

“嗨，穿得多么神气！”纳扎尔卡说。“象穿长衫的唱诗班似的，”他模仿他们在路上正步走了几步。

又爆发了一阵大笑。

卢卡什卡慢慢地向玛丽亚娜移近。

“你们那位官长住哪间屋子？”他问。

玛丽亚娜想了想。

“我们让出那间新屋子，”她说。

“他是怎么样的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卢卡什卡在她身旁坐下，问道。

“我又没问，”姑娘回答。“我去给他打奇希尔的时候，看见他和叶罗什卡大叔坐在窗口，象是红头发的。拉来满满一车家当。”

她垂下了眼睑。

“我很高兴，能够请假从哨所回来一趟！”卢卡什卡说，他在土台上向姑娘更近移一点，老是注视着她的眼睛。

“怎么样，回来要住多久？”玛丽亚娜微微含笑问道。

“明儿一早就走。给我点葵瓜子，”他伸出手来，又说了一句。

玛丽亚娜咧嘴微笑了，她解开长衫的领子。

“别全拿走，”她说。

“说真的，我老想你，说实在的，”卢卡用抑制的沉静的低声说，一面从姑娘的怀里掏出一把葵瓜子。他把身子向她凑得更近，向她耳语了几句，眼睛含着笑。

“我不去，说不去就不去，”玛丽亚娜忽然大声说，躲开他一点。

“真的……我给你说真的！”卢卡什卡低声说，“来吧，玛申卡^①。”

玛丽亚娜摇头表示不愿意，但是微笑着。

“玛丽扬卡姐姐！姐姐！妈妈叫你吃饭呢，”玛丽亚娜的弟弟一面喊，一面跑来。

“我就去，”姑娘回答，“你回去吧，亲爱的，你一个人先回去；我马上就来。”

卢卡什卡站起来举了举皮帽子。

“看样子我也该回家了，还是回去好些，”他说，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强忍着微笑，他拐过屋角不见了。

这时，夜已经完全降临村镇。明亮的星星撒满了黑暗的天空。街上漆黑，空旷无人。纳扎尔卡和姑娘们留在土台上，可以听见他们的笑声，卢卡什卡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姑娘们，忽然象猫似的弓着身子，按着晃动的宝剑，不出声地跑开了，他不回家，而是朝着少尉的家跑去。跑过两条街，转进一条小巷子，他拢起长袍的下襟，就坐在篱笆的阴影里地上。“少尉的女儿好神气，”他是在想玛丽亚娜，“玩一玩都不肯，鬼东西！走着瞧吧。”

① 玛申卡也是玛林娜的爱称。

一个渐渐走近的女人的脚步声引起他的注意。他侧耳倾听，暗自笑起来。玛丽亚娜低着头，迈开快速均匀的步子直向他走来，一面用树枝敲打着篱笆的桩子。卢卡什卡站起身来。玛丽亚娜一哆嗦，站住了。

“哎哟，该死的鬼东西！吓死我了。你没有回家，”她说，高声地笑起来。

卢卡什卡用一只手搂着姑娘，用另一只手扶着她的脸。

“我有话想对你谈谈……我敢发誓！……”他的声音颤抖了，中断了。

“有什么话偏要在夜里谈，”玛丽亚娜回答说。“妈妈在等着我呢，你去找你的相好的去吧。”

她从他手里挣脱出来，往前跑了几步。她跑到自己的院子篱笆跟前，站住了，转过身来对着哥萨克，他和她并排地跑着，不住地央求她等一会儿。

“你要说什么，我的夜游神？”她又笑起来。

“你别笑我，玛丽亚娜！真的！我有相好的又怎么样呢？见她的鬼去吧！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不要命地爱你，你要什么，我都办得到。你听！（他摇响了口袋里的钱。）现在咱们可以过好日子了。人人都过得乐呵呵的，可是我呢？从你身上半点欢乐也得不到，玛丽亚娜什卡！”

姑娘一言不发，站在他面前，用指头的迅速动作把树枝折成一段一段的。

卢卡什卡突然握紧了拳头，咬紧了牙关。

“为什么老让我等了又等！难道我不爱你吗，亲爱的？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忽然愤愤地皱着眉头说，并且抓住她的双手。

玛丽亚娜没有改变脸上沉静的表情和声调。

“你别胡闹，卢卡什卡，你听我的话，”她回答，并不把手挣脱，但是身子离他远一点。“当然罗，我是个姑娘，可是你得听我的话。如果你是爱我的，你听我说，我作不了主。你放开我的手，让我自己说。我愿意嫁给你，可是你别指望我干什么蠢事，”玛丽亚娜没有把脸转过去，说。

“嫁给我？婚事咱们作不了主。你先爱爱我，玛丽亚奴什卡，”卢卡什卡说，他的态度忽然从阴郁而粗暴又变得和善、顺从和温柔了，微笑着逼视她的眼睛。

玛丽亚娜紧贴着他，用力吻了吻他的嘴唇。

“好兄弟！”她猛一使劲抱紧了他，低声说着。然后，挣脱了身子就跑掉了，头也不回地转进自己的大门口。

虽然哥萨克央求她再等一会儿，他有话要对她说，但是玛丽亚娜没有站住。

“走吧！人家看见！”她说。“可不是，好象那个鬼房客在院子里闲逛呢。”

“少尉的女儿要嫁给我！”卢卡什卡心中想道。“嫁给我自然好，可是你先爱爱我啊。”

他在亚姆卡那里找到纳扎尔卡，他们俩饮酒取乐了一阵，他就到杜妮亚什卡家去了，虽然她是不忠实的，他还是在那里宿了一夜。

十四

的确是这样，在玛丽亚娜进门的时候，奥列宁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听见了她说“那个鬼房客在闲逛”。他和叶罗什卡大

叔在他的新房子台阶上消磨了整个晚上。他吩咐把桌子、茶炊、酒、点着的蜡烛，都搬出来，他对着一杯茶，抽着一支雪茄，听着老汉（他就坐在他的脚边台级上）讲故事。虽然空气平静，蜡烛还是溶泻，烛光向四面摇曳，时而照到簷下的柱子，时而照到桌子和杯盘，时而照到老汉的短短的白发。飞蛾在盘旋，扑打桌面和杯子，翅膀上撒下白粉，它们有时飞到烛火上，有时飞到亮光圈外的黑暗中。奥列宁和叶罗什卡两个人喝了五瓶奇希尔。叶罗什卡每次斟满杯子，总是把一杯递给奥列宁，跟他一起干杯；他谈起来没完没了。他讲哥萨克的古老生活，讲他的父亲什罗基^①——他一个人能背一只十普特^②重的野猪，一口气能喝两维德罗奇希尔。讲他从前的生活和他的好友吉尔奇克，他们俩在瘟疫盛行期间到捷列克河对岸偷运毡斗篷。讲打猎——一个早晨曾打死过两只鹿。讲他的相好的——她每夜都偷跑到哨所去找他。所有这一切都讲得有声有色，以致奥列宁不觉得时间是怎样过去的。

“就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朋友，”他说，“你没有看见我的黄金时代，要是那时认识我，你会看见我的本领的。如今叶罗什卡舔瓦罐，那时我叶罗什卡，团队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有头等的马？谁有古尔达^③宝刀？到谁那儿去喝酒？跟谁一起游玩作乐？派谁到山里杀死阿赫麦特汗？全都是我叶罗什卡。姑娘们爱谁？也是我叶罗什卡。因为我是真正的骑手。我是醉汉，是小偷——从山里偷来成群的马，是歌手；样样我都在行。如今

① “什罗基”在俄语意思是“宽阔的”，实际上这是他的外号，指他的肩膀宽阔，臂力过人。俄国的农奴往往没有自己的姓，后来外号就成为姓了。

② 1 普特合 16.38 公斤。

③ 在高加索，最珍贵的刀剑是以铸造匠古尔达的名字命名的。——作者注。

这样的哥萨克不多见了。看去简直叫人恶心。这么高（叶罗什卡把手抬高离地三尺），穿一双笨靴子，眼睛老是瞅着那双靴子，他们的乐趣只有这么一点儿。他们也醉酒；但是喝起酒来也不象一条好汉，不象样。从前我是什么人啊？我是小偷叶罗什卡；不光是每个村镇，就是山里也知道我。王公也是我的朋友，常来找我。我跟谁都交朋友：鞑靼人也好，亚美尼亚人也好，士兵也好，军官也好，都是朋友。我无所谓，只要是酒友就行。他说，你要戒绝跟世俗的人们往来；不同士兵一起饮酒，不同鞑靼人一起吃饭。”

“是谁说的？”奥列宁问道。

“是我们唱诗班领唱人说的。可是你听鞑靼的教士是怎样说的。他说：‘你们是不信教的，是吉亚乌尔^①，为什么吃猪肉啊？’那就是说，各有各的规矩。可是我看都是一样。都是上帝创造出来为人享乐的。什么罪恶都没有。就拿野兽说吧，它生活在鞑靼人的芦苇丛里，也生活在我们的芦苇丛里。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上帝给他什么，它就吃什么。可是我们的人都说，为了这我们要到地狱里舔烙铁。我想这都是假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加添了一句。

“什么是假的？”奥列宁问。

“领唱人的话是假的。老爷，我们在契尔夫列纳亚的时候有个班长，是我的朋友。是一个跟我一样的好汉。在切奇尼亚被人杀死了。他说领唱人的话都是脑子里凭空想出来的。他说，人死了，坟头上不过长长青草，再没别的。”老汉笑起来。“是个不顾死活的人！”

^① 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的称呼。

“你多大年纪？”奥列宁问道。

“只有上帝才知道！总有七十了。你们女皇^①在世时，我已经不小了。你算算我有多大了。七十岁有吗？”

“有。可是你还是一条好汉呢。”

“当然罗，谢谢上帝，我很健康，完全健康；不过有个女人，妖婆，毁了我……”

“怎么啦？”

“就是这样毁了我……”

“那么你死了，坟上也长草吗？”奥列宁重复他的话。

叶罗什卡显然不愿明白地说出自己的意思。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在想什么？喝酒！”他喊道，微笑着把酒递给奥列宁。

十 五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回忆着，继续说。“对了，我是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猎人。全团找不到第二个象我这样的。不论什么飞禽走兽，我都能给你找到和指出；它叫什么，住在哪儿，我全知道。我有几条狗，有两支枪，有几张鱼网，有一匹母马和一只鹰，——我全有，谢谢上帝。如果你不吹牛，你是一个真正的猎人，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是个什么人？我能找到踪迹，因为我知道野兽的习性，我知道它在哪儿睡觉，在哪儿喝水，到哪儿闲躺着。我做了个坐墩，整夜地坐在那儿守着。干吗要坐在家！在家里净作孽，酗酒，还有女人们来瞎扯；小孩子吵闹；

① 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

弄得你发疯。可是那就太美了：傍晚出去，找个好地方，挤进苇丛里，坐下来，象个好汉爷似的，坐那儿等着。树林里不论有什么动静，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抬头看天，星星在移动，细细地看它们，你就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周围望望——树林在微微作响，你老是等着，马上就要听见劈劈拍拍的声音，野猪就要来泥塘里打滚了。你听见年轻的鹰唧唧地叫，村里雄鸡彼此呼应，还有鹅叫。鹅叫表示到了半夜。这一切我全知道。有时远方传来枪声，于是引起种种念头。你就想：这是谁在放枪？也象我一样的哥萨克等到了一只野兽吧，他打中它没有，或者只是打伤了它，于是它在芦苇里乱窜，白流了鲜血，怪可怜的。我不喜欢这样！太不喜欢了！为什么把野兽打伤？傻瓜！傻瓜！或者你暗自想：也许是阿布列克打死一个蠢笨的哥萨克。这一切念头都在你脑子里出现了。有一次我坐在水边，看见一个摇篮从上游漂来。一个非常完整的摇篮，只是边儿破掉一点。于是念头又来了。这是谁的摇篮？我想，一定是你们当兵的魔鬼到了车臣人的村子，抓车臣女人，不知哪个魔鬼把小孩弄死了：抓起腿来就往墙角上摔。他们做不出这种事吗？唉，人是没有心肝的！一想到这儿，就怜惜起来。我心里想：扔了摇篮，抓走了女人，烧了房屋，他们的骑手就拿起枪，到我们这边抢劫来了。老是在那里坐着，想着。当你一听见一群野猪在密林里乱窜，你的心就跳。亲爱的，你们来吧！它们到处闻来闻去，你心里想：坐着别动，可是心一个劲地咚，咚，咚！简直把你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今年春天，有一次来了一大群野猪，黑压压的一片。‘圣父圣子保佑……’我刚想放枪。母猪向小猪一哼哧鼻子，说：‘不好，孩子们，有人在守着呢，’于是全都从灌木丛里跑掉了。母猪离得这么近，好象用牙都可以咬住它。”

“母猪怎么会对小猪说有人在守着呢？”奥列宁问。

“你是怎样想的？你以为野兽是傻瓜？不，它比人还聪明呢，尽管你叫它猪。它啥都懂。举个例子说吧：你在别人的脚印上经过，没注意到它。可是野猪一碰到你的脚印，马上就跑得远远的；这就看出它有智力，你闻不到自己的气味，可是它能闻到你的。所以说：你想杀死它，它想活着在林子里游玩。你有你的法律，它有它的法律。它是猪，可是它并不比你差；它也是上帝造的。唉呀！人是愚蠢的，人愚蠢啊，愚蠢啊！”老汉重复了几遍，垂下头思索起来。

奥列宁也思索起来，下了台阶，背着两手，默默地走来走去。

叶罗什卡重新打起精神，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飞蛾，它们在摇曳的烛光上盘旋着，掉进火里。

“傻瓜，傻瓜！”他说。“往哪儿飞？傻瓜！傻瓜！”他欠起身来，用粗大的手指赶走飞蛾。

“会烧死的，小傻瓜，地方多得很，偏向这儿飞，”他一面柔声细语地说着，一面用他那粗壮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捉它的翅膀，然后再放走它。“你自取灭亡，可是我可怜你。”

他一面闲扯一面喝酒，坐了很久。而奥列宁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忽然，大门外的低语声使他吃了一惊。他不由得屏住气息，听见女人的笑声，男人的说话声和接吻声。他故意踩响草地，走到院子另一边。过了一会儿，篱笆响了。穿黑色束腰无领长袍和戴白羊皮帽的哥萨克（这是卢卡）顺着围墙走过，扎着白头巾的女人从奥列宁身旁过去了。“我跟你没什么关系，你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玛丽亚娜的坚决的步子好象这样对他说。他目送着她，直送到主人门前的台阶，甚至隔着窗户看见她取下头巾，坐在长凳子上。忽然，一种忧郁孤独之感，一些模糊的意愿

和希望以及对某人的羡慕占据了年轻人的心。

最后几家灯火熄灭了。村里最后的声音静下去了。篱笆、院子里闪着白光的牲口、屋顶、挺拔的白杨——一切都仿佛进入健康的、寂静的、经过一天劳动的梦境。只有嘹亮的不断的青蛙叫声从潮湿的远方传来，使人感到聒耳。东方星稀了，仿佛溶化到越来越亮的天空里。可是头上的星星却更加深远和繁密。老汉把头歪到一只手上打盹儿。对面院子的公鸡啼了一声。奥列宁还是走来走去，在思索着什么。传来几个人唱歌的声音。他走到围墙跟前倾听着。几个青年哥萨克的声音合唱出一支快乐的歌儿，其中一个青年的声音唱得特别起劲。

“你知道这是谁在唱歌吗？”老汉清醒一下，说。“这是骑手卢卡什卡。他打死一个车臣人，所以这么高兴。为了这也值得高兴？傻瓜，傻瓜！”

“你打死过人吗？”奥列宁问。

老汉忽然支着两肘直起身子，把脸凑近奥列宁的脸。

“鬼东西！”他对他喊道。“你问的什么话？不该说这种话。毁灭生灵可非同小可啊，可不是小事！再见，老弟，我酒足饭饱了，”他一面站起来一面说。“明天去打猎吗？”

“去。”

“注意，早点起身，睡过了头要受罚的。”

“大约我会比你起得早，”奥列宁回答。

老汉走了。歌声停了。可以听见脚步声和快乐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歌声又起了，但是比较远，叶罗什卡洪钟般的声音加入了先前的几个声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啊！”奥列宁想道，他叹息了一声，独自一个回到自己的屋里。

十六

叶罗什卡大叔是非现役军人，是单身的哥萨克；他的妻子在二十年前改信正教，离家私奔，嫁给一个俄罗斯的司务长；他没有子女。他讲他从前是村里头条好汉，并非夸口。全团无人不知他昔日的勇敢。在他的记忆中，他不止杀死一个车臣人和俄罗斯人。他常到山里打劫，到俄罗斯人那里盗窃，坐过两次牢。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森林里打猎，他能在那里一连几昼夜只吃一块面包，只喝一点水。可是在村里他能从早玩到晚。从奥列宁那里回来，他睡了两个钟头，天没亮就醒了，睡在床上暗自品评他昨晚认识的人。奥列宁的单纯使他欢喜（所谓单纯，就是奥列宁不吝惜酒）。奥列宁本人也使他欢喜。他惊奇的是，为什么俄罗斯人都是单纯而且富有，为什么他们啥都不懂，可是都是有学问的。他思索这些问题，还思索他能从奥列宁那里讨点什么。叶罗什卡的屋子相当大而且不旧，但一看便知它缺少女人的照料。跟哥萨克人经常爱干净相反，整个屋子肮脏不堪，杂乱无章。桌子上扔的是血痕斑斑的上衣，半块油饼，旁边是搞了毛和撕烂了的喂鹞鹰的穴鸟。长凳上凌乱地放着皮靴、枪、短剑、口袋、潮湿的衣裳和破布。墙角有一个木桶盛着又脏又臭的水，水里泡着另一双鹿皮靴子；那里还放着一支枪和赶野鸡的盾牌。地上横七竖八地扔着网和几只打死的野鸡，桌子旁有一只缚着腿的母鸡走来走去啄着脏污的地板。在没有生火的炉子上放着一个盛满牛奶似的液体的瓦罐。炉子上还有一只青鹰尖声地叫，它老想挣脱绳子，一只脱毛的鹞鹰乖乖地坐在炉边，斜着眼瞅那只母鸡，有时向左右歪歪头。叶罗什卡大叔仰面躺在吊

在墙和炉子之间的短床上，他穿一件衬衫，把两条粗壮的腿翘在炉子上，正在用粗大的手指抠那被鸱鹰抓破的两手上的痂，因为他总是不戴手套把鸱鹰带出门。整个屋子的空气，特别是老汉周围，充满了老汉身上经常发出的那股强烈的、并不难闻的、混合的气味。

“大叔，乌依杰麻？（意思是：大叔在家吗？）”他从窗口听见尖利的叫声，他立刻就知道是邻人卢卡什卡的声音。

“乌依杰，乌依杰！在家，进来吧！”老汉喊道。“邻居马尔卡，卢卡·马尔卡，是到大叔这里来还是到哨所去？”

一听主人叫喊，鸱鹰全身抖动一下，扑打着翅膀，在系绳上猛挣。

老汉爱卢卡什卡。他瞧不起年轻一辈的哥萨克，只有卢卡什卡例外。此外还因为卢卡什卡和他母亲这两位邻人常常送老汉酒、熟奶油、及其他叶罗什卡所没有的家常吃喝。一辈子都是热心的叶罗什卡，总是用一种实际的观点来解释他的动机。“为什么不这样呢？人家过的不错，”他自言自语。“我送给他们一点鲜肉，一只野鸡，他们也不会亏待大叔的，下次他们就会把包子和薄饼送来……”

“你好，马尔卡！我很高兴看见你，”老汉快乐地喊道，动作迅速地把一双赤脚放下床来，跳到地上，在轧轧作响的地板上迈了两步，看了看他那外八字脚，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脚好笑：他咧咧嘴，跺一下赤裸的脚后跟，又跺一下，做一个滑稽的动作。“挺利落的，是吧？”他问道，他的小眼睛闪闪发光。卢卡什卡微微含笑。“怎么，回哨所去？”老汉说。

“给你送奇希尔来了，大叔，这是在哨所里答应的。”

“主保佑你，”老汉说，他把扔在地上的宽大的裤子和内衣拾

起来穿上，束上皮带，从瓦罐里倒点水洗洗手，往旧裤子上擦擦，用一截梳子梳梳胡子，站到卢卡什卡面前。“好了！”他说。

卢卡什卡找到一个碗，擦干净了，倒了酒，坐到小凳子上，把酒递给大叔。

“祝你健康！圣父圣子保佑！”老汉庄严地接过酒，说。“祝你得到你所希望的，愿你做一个英雄，获得十字勋章！”

卢卡什卡也念着祷词喝一口酒，然后把碗放到桌子上。老汉站起来，拿来一条干鱼，把它放在门槛上用棍子敲得软和点，然后用他那粗糙的手捧着它放进他的唯一的青色碟子里，摆到桌子上。

“什么我都有，下酒的菜也有，谢谢上帝，”他骄傲地说。“莫谢夫怎么样啦？”老汉问道。

卢卡什卡把班长没收他的枪的事情讲了一遍，显然他是想知道老汉的意见。

“为了一支枪不值得，”老汉说，“舍不得枪，就得不了奖。”

“哪里！大叔！人家说，还没有当上骑兵的哥萨克能得什么奖呢？那支枪是支好枪，克里木造的，值八十卢布呢。”

“咳，算了吧！有一次我跟中尉发生了争执：他要我的马。他说，把马给我，我就保举你做少尉。我没有给他，也就没当上少尉。”

“你不知道，大叔！我要买一匹马，据说在河对岸没有五十卢布就买不到。妈妈还没有把酒卖掉。”

“咳！咱们不发愁，”老汉说，“大叔叶罗什卡象你这样岁数，他已经从诺盖人那里偷来成群的马了，还把它们全赶过捷列克河。有时，一匹好马只换一俄升^①伏特加或者一件斗篷。”

① 1 俄升合 1.299 公升。

“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换掉了？”卢卡什卡问。

“傻瓜，傻瓜，马尔卡！”老汉轻蔑地说。“不许的，——对待偷来的东西不许小气。你们大约连见都没见过怎样偷马。干吗不说话啊？”

“说啥，大叔？”卢卡什卡说。“我们显然不是那种人。”

“傻瓜，傻瓜，马尔卡！不是那种人！”老汉学着卢卡什卡的腔调嘲弄他说。“我在你那么大岁数可不是那样的哥萨克。”

“是什么样的呢？”卢卡什卡问道。

老汉轻蔑地摇了摇头。

“叶罗什卡大叔为人单纯，一点不吝啬。所以走遍切奇尼亚到处都有我的朋友。有朋友来找，我就请他喝个够，把他招待得乐滋滋的，同床睡觉；我找他去，总是带着礼物。人们都是这样行事的，不象现在这个样子：尽干些孩子玩意儿，嗑嗑葵花子，吐吐皮儿，”老汉一边鄙夷地作出结论，一边把面孔做出如今的哥萨克怎样嗑葵花子和吐皮的样子。

“这我是知道的，”卢卡什卡说。“的确这样！”

“你要想做一个好汉，那你就得做一名骑手，不要做一个乡巴佬。连乡巴佬买马也大大方方地掏出钱来，才把马牵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不论是在村里或者在哨所里，大叔，都是闷得慌；没有地方可以去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场。所有的人都是胆小鬼。就拿纳扎尔卡来说吧。前几天我们到车臣人的村子里。吉列伊汗约我们到诺盖去偷马，谁也不肯去；我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你看大叔怎么样？你以为我老了！不，我不老。给我牵马来，我现在就到诺盖去。”

“光说空话有啥用？”卢卡说，“你告诉我怎样跟吉列伊汗打

交道。他说，只要把马牵到捷列克河就行，哪怕赶来一群，他也能藏好。要知道他也是个光脑袋的鞑靼种，怎能叫人相信他。”

“吉列伊汗信得过，他全家都是好人；他的父亲是个忠实的朋友。不过要听大叔的话，我不会教错你的；你叫他发誓，那就没错了；跟他一起走路，随时要把手枪准备好。特别是在分马的时候。有一次我险些儿给一个车臣人宰掉，因为我问他要十卢布一匹马。相信是相信，可是睡觉时枪可不能离身。”

卢卡什卡注意地听老汉讲话。

“大叔，是不是真的？人家说你有虎耳草^①，”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虎耳草我是没有的，不过我可以教你怎样去找，因为你是个好孩子，你不会忘掉老汉的。教你，好不好？”

“教我，大叔。”

“你知道乌龟吗？它是个鬼啊，那个乌龟。”

“我怎么不知道！”

“你找到它的窝，用篱笆把窝围起来，叫乌龟进不去。它来了，围着篱笆转了一圈，就走开了；它找到虎耳草，啣了来，篱笆就垮了。第二天早晨你要赶快去看看：在篱笆开口的地方，就有虎耳草。拿着它，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不论是锁或者门栓都挡不住你了。”

“你试过了吧，大叔？”

“试倒没试过，是好人告诉我的。我只会念咒语，我一骑上马，就念‘平安咒’，那就谁也打不死我。”

① 在俄罗斯童话中，传说虎耳草有破门断锁的魔力。

“什么是‘平安咒’啊，大叔？”

“你不知道吗？咳，你这人啊！你问大叔就算问对了。你听着，跟着我念：

平平安安住在西奥尼。

这是你的皇上老爷子。

我们骑上骏马。

索福尼哭，

扎哈里叫。

我主曼德雷奇

永远爱护人。

永远—永远—爱护人，”老汉重复着。“你知道了吧？你念一遍！”

卢卡什卡笑了。

“真有意思，大叔，一念咒就不会打死你？也许是碰巧了吧。”

“你们都变聪明了。你把它全学会，念它。这不会有什么坏处的。你念了‘曼德雷奇’，就对头了，”老汉自己也笑了。“可是你别到诺盖去，卢卡，说真的！”

“为什么？”

“不是那个年月了，你们也不是那样的人了，你们这些哥萨克都是狗屎。你看开进来多少俄国兵！他们会判你重刑的。真的，丢掉这个念头吧。你们哪行！想当年我跟吉尔奇克……”

于是老汉又讲起他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卢卡什卡往窗外瞧了一眼。

“天大亮了，大叔，”他打断了他的话。“我该走了，改日再来吧。”

“基督保佑，我要到那个军人那里去了，我答应带他去打猎，人看来倒是好人。”

十七

卢卡什卡离开叶罗什卡就走回家去。在他回家的时候，潮湿的饱含露水的晨雾从地面升起，笼罩着村镇。只听得见叫声的牲口开始从四面八方动弹起来。雄鸡啼得也更勤更高了。空气变得透明，人们开始起身了。卢卡什卡走到跟前，才看清楚被雾弄湿的自己院子的围墙、屋子的台阶和敞着门的贮藏室。从雾里可以听见院子里劈柴火的斧头声。卢卡什卡走进了屋子。他的母亲站起来，站在炉子前面添柴火。小妹妹还在床上睡着。

“怎么样，卢卡沙，玩够了吧？”母亲轻轻地说。“昨天在哪儿过了一夜？”

“就在村子里，”儿子不乐意回答，从套子里取出枪来检查。

母亲摇了摇头。

卢卡什卡向枪上火药池里倒点火药，取出小袋子，从里面掏出几个空的弹药套，开始填火药，用破布裹着子弹把火药仔细地捣结实。他用牙试试装满火药的弹药套，察看一遍，就把它放进小袋里。

“妈妈，我给你说过要把口袋补一补，补了没有？”他说。

“当然补了！哑巴昨夜在补什么东西来的。你该回哨所了吧？连多看你一眼也捞不到。”

“收拾好就走，”卢卡什卡回答，一面包着火药。“哑巴呢？出去了吗？”

“大概在劈柴。她老是想你得伤心呢。她说她总是看不

见你。她用手指指脸，舌头弹个响，两只手按着胸口，意思是说：‘我可怜他。’去叫她，怎么样？打死阿布列克的事，她全懂得。”

“叫她来吧，”卢卡什卡说。“我有一块油脂放在那里的，拿给我。刀该涂油了。”

老太太出去了，几分钟后，卢卡什卡的哑巴姐姐沿着轧轧作响的台阶走进了屋子。她比弟弟大六岁，面貌非常象他，只不过有着聋哑人常有的那种迟钝、粗野而且变化无常的表情罢了。她穿着一件打补钉的粗布长衫；两只脚赤裸着，非常肮脏；头上顶一块旧的蓝头巾。她的脖颈、手和脸都象农民的那样茁壮。从衣着和从其他一切可以看出，她是经常担负着男人干的重活。她抱进一捆柴火扔到炉旁。然后，她高兴地微笑着（微笑使她整个脸布满了皱纹）走到弟弟跟前，推了推他的肩膀，于是用两只手、脸和整个身子向他做出迅速的手势。

“好，好！能干，斯乔普卡！”弟弟点头回答。“把一切都准备好，修补好，真能干！这是给你的酬谢！”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块甜饼递给她。

哑巴脸红了，她高兴得粗野地吼叫起来。她抓起甜饼，更快地打着手势，时时指着一个方向，用粗大的手指划着眉毛和脸。卢卡什卡懂得她的意思，不住地含笑点头。她是说，弟弟应该送姑娘们一点吃的，还说，姑娘们都爱他，有一个姑娘，那就是玛丽亚娜，长得最美，她也爱他。她比划玛丽亚娜的时候，很快地指指她的院子，指指自己的眉毛和脸，咂咂嘴，摇摇头。她把手贴近胸口，亲亲自己的手，作出拥抱的样子，这是表示“她爱他”。母亲回到屋里，看出她在说什么，微笑着摇了摇头。哑巴把甜饼拿给她看，又高兴得吼了一声。

“前些日子我对乌莉特卡说，我要托人去说媒，”母亲说，“我

这话她还听得进。”

卢卡什卡默默地看了看母亲。

“怎么样啦，妈妈？要把酒运到市上。需要买匹马。”

“到时候我就会运的；先得买几个桶，”母亲说，看样子她不愿儿子干预家务。“你走的时候，”老太太对儿子说，“想着把过厅里几个口袋带走。是向人家借的，准备给你带回哨所去的。要不要放进褡裢里啊？”

“行了，”卢卡什卡回答。“如果吉列伊汗过河来找我，你叫他到哨所去，得有些日子请不准假。我有事要跟他商量。”

他准备走了。

“叫他去，卢卡沙，叫他去。你怎么老是在亚姆卡那里玩？”老太婆说。“我夜里起来照料牲口去，听见象是你唱歌的声音。”

卢卡什卡没有回答，走到过厅里，把口袋挎到肩上，把衣襟掖到腰里，拿起枪，在门口站住了。

“再见，妈妈，”他倚着大门对母亲说。“你装一小桶酒托纳扎尔卡带来。我答应请弟兄们喝一杯；他等会儿来取。”

“基督保佑你，卢卡沙！上帝和你同在！托他带去，倒新桶里的酒托他带去，”老太婆回答，她向围墙走去。“你听我说，”她把身子探到围墙外边，又说起来。

哥萨克停住了。

“你在这里游游逛逛，倒也罢了，谢天谢地！年轻人不取乐谁取乐啊？上帝赐了你运气。这很好。可是到了那边，可要注意，孩子，不能那样……最要紧的是把长官服侍好，可不许胡闹！我把酒卖了，给你准备买马的钱，给你说一门好亲事。”

“得了，得了！”儿子皱着眉头回答。

哑巴为了引起弟弟的注意，叫了一声。她指指头和手，意思

是说：剃光脑袋的车臣人。然后紧皱眉头，装出瞄准的样子，大叫一声，摇着头很快地唱起来。她是说，希望弟弟再打死一个车臣人。

卢卡什卡懂得她的意思，咧嘴笑了笑，迈开轻快的步伐，扶着背后斗篷下面的枪，在浓雾中消失了。

老太婆在门口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回到屋里，就立刻干起活儿来。

十 八

在卢卡什卡走回哨所时，叶罗什卡大叔吹了一声口哨，把狗唤到跟前，就翻过篱笆，从屋后绕到奥列宁的住处（他出门打猎讨厌碰见女人）。奥列宁还在睡觉，甚至瓦纽沙虽然醒了，也没有起来，他东张西望，正在寻思是不是该起床的时候了，就在这时候，叶罗什卡大叔挎着枪，全副猎人装束，推开了门。

“拿棍子！”他用他那沉重的声音喊道。“警报！车臣人来了！伊万！给老爷升茶炊。你也起来！快！”老汉喊道。“我们就是这样的，好人儿。连姑娘们都起来了。你从窗口往外瞧，瞧，她都挑水去了，你还在睡着。”

奥列宁醒来了，从床上跳下来。他一看见老汉，一听见他的声音，就感到神清气爽，快乐起来。

“快！快，瓦纽沙！”他叫唤着。

“你不是要去打猎吗！人家都吃早饭了，你还在睡觉。良姆！你到哪儿去？”他这是喝狗。“枪准备好了吗？”老汉大声喊叫，就好象屋子里有一大群人似的。

“我错了，没办法。准备火药，瓦纽沙！把火药填好！”奥列

宁说。

“罚款!”老汉喊道。

“久捷乌列乌?”①瓦纽沙得意地笑着说。

“你不是我们的人!不说我们的话,鬼东西!”老汉呲出牙根,向他呵斥。

“第一次可以饶恕,”奥列宁一边穿大皮靴,一边开玩笑地说。

“原谅你初犯,”叶罗什卡回答,“下次再睡过头,罚你一桶酒。天一热,就碰不到鹿了。”

“就算你能碰到它,可是它比咱们人还聪明啊,”奥列宁重复昨晚老汉说的话,说道,“你骗不了它的。”

“好,你笑吧!等会儿打死一只,咱们再说。快点!瞧,房东到你这儿来了,”叶罗什卡往窗外望着,说。“瞧他打扮的,穿上了新衣裳,他是要叫你看他是个军官。咳,这个人头儿啊!”

果然,瓦纽沙报告房东来见老爷。

“拉尔让,”②他意味深长地说,他这是向老爷示意少尉来访的目的。接着,少尉穿着带军官肩章的簇新的束腰无领长袍和光亮的皮靴——在哥萨克这是稀罕东西,脸上堆着笑,一摇一摆地走进屋子,他表示欢迎他的到来。

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哥萨克,他到过俄罗斯内地,现在是教员,主要的,他是个“高贵的人”。他想显示他是高贵的人;可是一看见他那副装腔作势的怪相:坐立不安、自以为是、语无伦次,就不由得使人把他当作叶罗什卡大叔一类的人。这从他晒黑的脸上、手上、发红的鼻子上也可以看出来。

① 不准确的法语:您想喝茶吗?

② 法语:钱。

奥列宁请他坐下。

“你好，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仁兄！”叶罗什卡说，他站起带着讽刺意味（奥列宁这样觉得）鞠了个大躬。

“你好，大叔！你也在这儿？”少尉回答，随便向他点点头。

少尉四十岁上下，留一撮山羊胡子，又干又瘦，但人倒漂亮，而且对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来说，还显得很嫩少。他到奥列宁这里来，显然是怕人家把他当作普通的哥萨克，所以想让人一下子就感到他的身价。

“这是我们的埃及的宁录^①，”他得意地微笑着，指着老汉对奥列宁说。“‘在主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在我们这里样样都是第一把能手。您老已经知道了吧？”

叶罗什卡大叔看着自己那双穿着浸湿了的生皮靴子的脚，沉思地摇摇头，仿佛是对少尉的博学多才表示惊奇，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说：“野鸡的泥路！他真会胡诌！”

“是啊，我们正想去打猎呢，”奥列宁说。

“是了，是了，”少尉说。“我找您有点小事。”

“有何见教？”

“我知道您是个高尚的人，”少尉开始说，“正象我了解自己一样，我们都有军官的头衔，正因为我们都是高尚的人，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慢慢商量。”他停了一下，含着微笑看了看老汉和奥列宁。“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就请依照我的意见，因为我的妻子在我们阶层中是个愚蠢的妇女，她现今完全不能了解您昨天说的话。因为我的房子租给团部副官，不带马棚也要六卢布

① 《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章记载：“古实又生宁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象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在这里教师有炫示自己学问的意思。

一月,可是,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免费让人使用。因为您乐意,我本人是个有军官头衔的人,而且作为本乡的居民,我可以亲自同您商谈一切,不必按照我们的习俗,在一切方面我都可以遵照条件……”

“他说得真干脆利落,”老汉咕哝着说。

少尉还说了很久类似的话。从他的话里,奥列宁挺费劲才弄明白少尉是希望租金每月六个卢布。他欣然同意,并请客人喝一杯茶。少尉谢绝了。

“按照敝乡的陋俗,”他说,“我们认为使用世俗的杯子是一桩罪过。虽然以我的教育,对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的妻子,由于人的弱点……”

“那么,您请不请喝茶呢?”

“如果允许的话,我把我的茶杯取来,专用的茶杯,”少尉回答,他走到门廊下。“把茶杯拿来!”他喊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从门外伸进一只穿着粉红袖子的晒黑的年轻姑娘的手,手里拿着一个杯子。少尉走过去接过杯子,跟女儿咕唧了几句。奥列宁给少尉在专用的杯子里斟了茶,给叶罗什卡在世俗的杯子里斟了茶。

“但是,我不想耽误您,”少尉说,茶很烫,他忍耐着喝完了自己杯里的茶。“我对于捕鱼也有强烈的嗜好,我在这里不过是短期休假,如同暂时休假一样。我也有意思试试运气,看看捷列克河的赠品^①,是不是也有我的份儿。我希望,您也到寒舍坐坐,按照敝乡的风俗,喝一杯房东的酒。”他加添着说。

少尉告辞,握了握奥列宁的手就走了。在奥列宁准备出发

① 这是莱蒙托夫的一首诗的题目。

的时候，他听见少尉向家里人发出威严的、有条有理的命令。几分钟后，奥列宁看见少尉穿着卷到膝盖的裤子和破旧的外衣，背着鱼网从他的窗前走过。

“骗子手，”叶罗什卡喝完他那世俗茶杯的茶，说道。“怎么，你真的付他一月六个卢布的房租？真没听说过！村里最好的房子也只能租两卢布。这个滑头鬼！三个卢布我就把我的租给你。”

“不，我就在这里住下了，”奥列宁说。

“六个卢布！明明是捉冤大头。咳！”老汉说。“伊万，拿酒来！”

在上路以前吃了东西，喝了酒，早晨七点多钟，奥列宁和老汉一块儿走上了大街。

他们在大门口碰见一辆已经套好的大车。玛丽亚娜拉着拴在牛角上的绳子，正在牵着牛拉车；她用白头巾遮到眼睛，长衫上套一件上衣，穿一双皮靴，手中拿着一根长长的树枝子。

“小妞儿！”老汉说，做出要捉她的样子。

玛丽亚娜用树枝子抽他一下，一双美丽的眼睛快乐地向他一闪。

奥列宁兴头更高了。

“咱们走吧，走吧！”他说，把枪背到肩上，感觉姑娘的目光投到自己身上。

“呵！呵！”在他后面响起玛丽亚娜吆喝牲口的声音，接着，开始走动的大车发出轧轧声。

在村后牧场的路上，叶罗什卡一路走一路谈。他不能忘记少尉，老是骂他。

“你为什么这样生他的气？”奥列宁问。

“吝啬鬼！我不喜欢，”老汉回答。“挺尸的时候，啥也带不走。为了谁积蓄？盖了两所房子。跟弟弟打官司又赢了一个园子。这个狗东西还是个刀笔吏呢。别的村里都来请他写状子。他怎样写，官司就怎样判。正做到节骨眼上。可是攒了钱给谁呢？统共只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女孩子一出嫁，就没有什么人了。”

“攒了钱赔嫁啊，”奥列宁说。

“赔什么嫁啊？姑娘有人要，是个好姑娘。他是这么一个鬼东西，嫁女儿也要嫁个有钱的。想敲一大笔聘礼。卢卡是个哥萨克，我的邻居，并且是我的侄子，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打死一个车臣人，前些时候给他说过媒；可是他总不答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托；说是姑娘还年轻。可是我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他想让人家磕头作揖地求他。如今还拿着姑娘要这一套，真丢人。反正卢卡什卡要说成这头亲事。因为他在村里是拔尖的哥萨克，骑手，打死一个阿布列克，奖他十字勋章。”

“可是那是怎么回事呢？昨晚我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看见房东的姑娘同一个哥萨克在接吻呢，”奥列宁说。

“你胡说，”老汉停住脚步叫了一声。

“说实话！”奥列宁说。

“女人是个鬼，”叶罗什卡沉思地说。“什么样的哥萨克？”

“我没有看清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帽顶是白羊皮的？”

“是的。”

“上衣是红的？有你这么高？”

“不，比我高些。”

“就是他。”叶罗什卡哈哈大笑。“就是他，我的马尔卡。他

是卢卡什卡。我叫他马尔卡，是要笑。就是他。我喜欢他！我以前也是这样的，老弟。看管他们有什么用？从前，我的情人跟母亲、跟嫂子一块儿睡，可是我还是钻了进去。她常常住在楼上；她母亲是个妖婆，鬼东西，恨透了我，我时常跟朋友——他名叫吉尔奇克，一块儿去。我们来到她的窗下，我爬到他的肩上，掀开窗门，就摸了进去。她睡在条凳上。有一次我弄醒了她。她差点儿喊起来！没有认出是我。这是谁啊？我又不能说话。她母亲已经动弹了。我摘下帽子，向她的脸上伸过去，她一看见帽子上的线缝，就认出来了。她跳了出来。那时候我啥都不缺。熟奶油啦，葡萄啦，她什么都拿给我，”总是从实际的观点看一切的叶罗什卡加添了一句。“不止一个相好的。好日子啊。”

“现在如何？”

“现在，咱们跟着狗走，看见野鸡落到树上，就射它。”

“你也跟玛丽亚娜胡缠吗？”

“你注意着狗。晚上我再说，”老汉指着自己的爱犬良姆，说。

他们沉默了。

谈着话走了百十步，老汉又停下了，他指了指横在路上的树枝子。

“你对这有什么想法？”他说。“你是想这没有什么吧？不，这根棍子这样躺着不吉利。”

“怎么不吉利？”

他咧嘴笑了笑。

“你啥也不懂。你听我说。棍这样躺着的时候，你可别迈过去，要么你绕着走，要么你把它从路上扔开，并且要念祷词：‘圣父圣子及圣灵保佑’，然后再走，上帝就会保你平安。啥事都没

有。这还是老人们教给我的。”

“别胡说了！”奥列宁说。“你最好谈一谈玛丽亚娜。她是不是跟卢卡什卡相好？”

“嘘！现在不要吭声了，”老汉又低声打断了这个谈话，“好好听着。我们走到四面森林里来了。”

老汉无声地踏着软皮靴，沿着通向茂密的、野生的森林的窄狭小道向前走去。他几次皱着眉头回头看奥列宁，因为奥列宁咯咯咚咚踩着他那大皮靴弄得沙沙作响，而且漫不经心背着枪，有好几次挂着沿路的树枝子。

“不要响，轻点儿走，当兵的！”他忿忿地低声对他说。

从空气中可以感觉太阳已经升起。雾散了，但还遮盖着森林树梢。森林显得非常之高。每走一步地势都有变化。以为是棵树，原来是棵灌木；而一棵芦苇却象一棵树。

十 九

晨雾一部分上升，露出了湿漉漉的芦苇房顶；一部分变成露水，湿润了围墙附近的道路和青草。炊烟从各家的烟囱里涌出来。人们开始往村外走——有的去干活儿，有的去捕鱼，有的去哨所。两个猎人顺着潮湿的、长满着草的道路并肩走着。猎狗摇着尾巴在路旁跑着，不时地回头望望主人。成群的蚊虫在空中飞舞，追击着猎人，围攻他们的背、眼和手。空气中散发着青草和树木的潮湿味道。奥列宁不断地回头望那辆大车，坐在车上的玛丽亚娜拿着树枝子正在赶牛。

周围静悄悄的。村子里的声音原先可以听见，现在已经传不到猎人的耳边了；只有狗走在乌荆子上发出毕剥声，有时鸟儿

此呼彼应地啼叫。奥列宁知道森林里是有危险的，阿布列克常常在这里出没。他也知道，在森林里行路，枪是有力的防御武器。他本人并不害怕，可是他觉得，要是别人处在他的地位会害怕的。他怀着特别紧张的心情注视着雾气弥漫的潮湿的森林，倾听着偶尔响起的微弱的声音。他紧紧抓住枪，心中有一种愉快而新奇的感觉。叶罗什卡大叔走在前头，每经过有一对对野兽脚印的泥潭，他就停下来细细地观察，指给奥列宁看。他几乎不说话，仅仅偶尔低语几句。他们走的道路曾经被大车压过，现在早已长满了青草。路两旁的榆树和梧桐长得如此茂密，简直无法透过它们看见东西。几乎每棵树从上到下都被野葡萄缠满了；地上是长得密密实实的发黑的乌荆子丛藪。每一小块林中空地都长满了黑莓和摇曳着灰色芦花的苇子。有些地方，野兽走的大道和象隧道似的野鸡走的小径，从人行的路上伸向森林的深处。这座没有被牲口践踏过的森林，处处使奥列宁吃惊，他从未见过植物的生命力这样旺盛。这座森林、危险、老汉和他那神秘的低语、玛丽扬卡和她那英俊挺拔的身段、群山——这一切都使奥列宁觉得是在做梦。

“落下一只野鸡，”老汉低语道，四外张望着，把帽子拉下来压着自己的脸。“把脸遮起来，”他忿忿地向奥列宁挥挥手，然后几乎是用四肢向前爬去，“野鸡讨厌人的嘴脸。”

当老汉停下来向树上端详的时候，奥列宁还落在后面。野鸡朝着向它吠的狗叫了一声，奥列宁也看见了它。正当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叶罗什卡的粗筒子枪象大炮似的打响了，那只野鸡扑闪一下翅膀，羽毛纷纷落下来，接着就掉到地上。奥列宁在向老汉走去的时候，惊起了另一只野鸡。他拿起枪，瞄了瞄，就射了出去。野鸡腾空飞起，然后象一块石头似的，碰着树枝落到树

林里。

“好样的!”不会打飞鸟的老汉笑着说。

他们把野鸡拾起来,又往前走。被运动和夸奖弄得兴奋的奥列宁,一路走,一路跟老汉谈话。

“别说!到这儿来,”老汉打断了他的话,“昨天我在这儿看见鹿的脚印。”

他们转进森林深处,走了三百来步,来到生满芦苇和有的地方浸着水的空地。奥列宁还是落在后面,叶罗什卡大叔在他前面二十来步的地方弯下身来,意味深长地点着头,招手叫他。奥列宁走到他跟前,看见老汉指给他看的是人的脚印。

“你看见吗?”

“看见了。怎么?”奥列宁尽可能保持镇静地说。“是人的脚印。”

不由得在他脑子里闪出了库珀的《探路人》^①和阿布列克,他看了看老汉那副神秘的样子,不准备问他,他不知道他那副神秘的样子是由于危险还是由于猎物的发现而引起的。

“不,这是我的脚印,”老汉随便地答道,他又指指草,那下面有刚能看得见的野兽的脚印。

老汉向前走去。奥列宁紧跟着他。走了二十来步,向洼地走下去,他们来到密林中一棵枝叶茂盛的梨树下面,这里的土地发黑,有野兽刚拉下的屎。

这地方缠满了野葡萄,象是一座舒适的亭子,又暗又凉快。

“早晨它在这儿来着,”老汉松了口气说,“瞧见吗,窝还发潮,刚睡过的。”

① 库珀(1789—1851),美国小说家,著有描写北美边疆冒险生活的小说《皮袜子故事集》,《探路人》是其中一篇。

忽然，离他们十步开外的树林里发出一声可怕的喀嚓巨响。两个人都吓了一跳，抓起了枪，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只听见树枝折断的声音。响起一阵均匀的、迅速的疾驰的蹄声，转瞬就听不清了，喀嚓的脆响变为咚咚的低音，在寂静的森林中越去越远，越来越扩散开来。奥列宁心里仿佛有块东西坠落下去。他向葱绿的密林里看了半天才看见老汉。叶罗什卡把枪顶住肩窝，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帽子推到脑后，眼睛发出奇异的光，张着嘴，嘴里露出被蛀的黄牙，就这样僵着不动了。

“是一只带角的，”他说。他把枪往地上一扔，绝望地揪住自己的白胡子。“站在这儿！本该从小路过来！傻瓜！傻瓜！”他愤恨地揪住自己的胡子。“傻瓜！笨猪！”他反复地说，用力扯自己的胡子。在雾气弥漫的森林上空仿佛有什么东西飞过；惊跑的鹿飞奔的蹄声越去越远，越来越扩散开来……

直到黄昏，奥列宁和老汉才回来，他又累又饿，可是精神饱满。午饭准备好了。他和老汉一起吃了饭，喝了酒，开始觉得暖和而且快乐起来，又走到门廊底下。在他的眼前又现出夕阳中的群山。老汉又讲起他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打猎、阿布列克、相好的、无忧无虑的勇敢的生活。俊美的玛丽亚娜又出出进进地从院子里走过。长衫下衬出美女的强健的少女身姿。

二十

第二天，奥列宁独自一人去他们把鹿惊跑的地方。他不走大门，也象村里人那样，从有很多荆棘的篱笆翻过去。他还没来得及把挂在刺上的束腰无领长袍摘掉，他那条跑到前面的狗已经惊起了两只野鸡。他一进入乌荆子丛里，每走一步都有野

鸡惊起（老汉昨天没有把这个地方告诉他，他是想留着用网子来捕的）。奥列宁放了十二枪打死五只，他披荆斩棘地寻找打死的野鸡，累得汗流浹背。他把狗唤回来，拉开扳机，把子弹放进霰弹里，用长袍袖子挥着蚊子，不声不响地向昨天那个地方走去。但是唤着狗是不可能的，它在路上还是跟踪追迹，他又打死两只野鸡，去捡它们又耽搁了一会儿，直到中午他才找到昨天到过的地方。

天气十分明净，寂静，炎热。早晨那股清凉，甚至在林中也灼干了，无数的蚊虫简直把脸、背和手叮得满满的。狗由黑的变成青灰色的：它的背上落满了蚊子。那件长袍也变成这样的颜色。奥列宁打算逃开这些蚊子；他觉得，夏天简直无法在村里居住。他已经走回家去了；但是他想到，这里也是人住的地方，于是决心忍受着，让它去咬。说也奇怪，快到中午时分，这种感觉甚至使他愉快。他甚至觉得，如果在他四周没有被蚊子包围的气氛，没有在汗湿的脸上一抹就是一手的蚊虫稠浆，以及周身坐立不安的痒痒，那么，这里的森林就会失去它的特色和魅力。这无数的蚊虫跟这里无比丰富的野生森林，跟这里充满森林的无数鸟兽，跟这里深绿的叶子，跟这里芳香的暑热的空气，以及跟这里到处从捷列克河渗透出来的、在低垂的树叶下潺潺流水的浑浊的沟渠，都极相称，因此先前他觉得可怕而且无法忍受的，现在反倒觉得愉快了。他把昨天发现鹿的地方走了一遍，但他什么也没遇见，他想休息一下。太阳高悬在森林上空，当他走到空地或者路上的时候，阳光一个劲地直射到他的背上和头上。七只沉重的野鸡压得他的腰酸背疼。他找到昨天的鹿的蹄印，从灌木丛里钻到森林的深处，钻到昨天鹿睡觉的地方，他就在鹿窝旁边躺下来。他观察了一下周围深绿的树木，观察了一下被

鹿汗湿的地方、昨天的鹿粪、鹿的膝盖的印记、鹿掘起的一块黑土以及昨天自己的脚印。他觉得又凉快又舒适；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忽然，他心头涌现一种奇怪的感情——无缘无故的幸福和对一切的爱，于是他按照童年的老习惯画十字，并且对某人表示感谢。他忽然特别清醒地感觉到：“我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现在独自一人躺在天晓得什么地方，躺在鹿住的地方，这是一只美丽的老鹿，也许它从来没见过人，躺在从来没有人坐过、也没人想到的地方。我坐在这里，周围是小树和老树，其中有一棵缠着野葡萄藤；离我不远有野鸡互相追逐，四处乱窜，它们也许已经闻到被打死的弟兄们。”他摸了摸自己的野鸡，把它们察看一遍，在长袍上擦了擦温暖的血淋淋的手。“也许豺狼也闻到了，露出不满的面孔钻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周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百个、一千个、百万个蚊子，在它们看来象巨大的绿洲似的树叶之间飞来飞去，它们在空中嗡嗡地叫，它们在我附近全都嗡嗡地述说着什么和为了某事而述说着，它们每个也都象我似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他清清楚楚地想象到蚊子在想什么和嗡嗡地叫什么。“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弟兄们！这儿有人可以吃，”它们嗡嗡地叫着说，从四面八方向他围攻。他这时明白了，他并不是什么俄国贵族，莫斯科交际场中的人，某人某人的朋友和亲戚。而不过是一个蚊子，或者是一个野鸡，或者是一只鹿，就象现在活在他周围的一切生物一样。“就象他们一样，象叶罗什卡大叔一样，活些时候就死去。他说得对：不过坟头上长长青草罢了。”

“坟上长青草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继续想下去。“还是要活下去，要活得幸福；因为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幸福。不管我

是什么，就算是一个野兽，跟一切动物一样，在它坟头上只长青草，此外什么也没有，或者我是一个躯壳，其中安装着上帝的一部分，即使这样，我还是要以最好的方式生活。为了要活得幸福，应当怎样生活呢？为什么我以前是不幸福的呢？”于是他开始回忆他从前的生活，可是他对自己厌恶起来。他觉得自己曾是一个苛刻的利己主义者，虽然他当时实在并不需要什么。他不住地往四外张望，看看被阳光穿透的绿荫，看看落日和明朗的天空，始终觉得自己跟刚才一样幸福。“为什么我现在是幸福的？以前我为了什么而生活？”他想道。“我为了自己曾是多么苛求，曾是如何挖空心思而一无所得，得到的只是耻辱和痛苦！而我现在并不需要什么却得到了幸福！”忽然有一道新的光明使他豁然开朗。“幸福原来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幸福乃在于为他人而生活。这一点是明确的。人人都有获得幸福的要求；因此，这种要求是合乎情理的。用自私自利的方法满足这种要求，也就是说，为自己寻求财富、荣誉、舒适的生活、爱情，可是，有时由于种种情况，不可能满足这些欲望。由此看来，不合乎情理的是这些欲望，而不是想获得幸福的要求。不论外界的条件如何，而永远都可以得到满足的是什么欲望呢？究竟是什么呢？是爱，是自我牺牲！”发现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新的真理以后，他是如此高兴和激动，他跳起来，急不可待地想寻找他可以为之快点牺牲自己的人，可以为之做善事的人，可以爱的人。“既然我什么都不需要，”他老是在想，“为什么不为他人而生活呢？”他拿起枪，一心想快点回家去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并且找一个做善事的机会，他于是就走出了密林。来到空地上，他张望了一下：太阳已经从树梢上看不见了，空气有点凉意，地形变得完全认不出了，不象是村子四周。忽然一切都变了——气候和森林

的性格都不同了：天空遮满乌云，风在树梢上簌簌作响，周围只能看见芦苇和年深日久的折断的树木。他唤那条离开他去追逐什么野兽的狗，他的声音仿佛是从荒野发出的回声。他忽然不寒而栗。他害怕起来。他想到阿布列克和人家给他讲的谋杀事件，他在等待着：马上就会从随便哪棵灌木里跳出一个车臣人，那他就得保卫自己的生命，或者死去，或者贪生怕死。他想起了上帝和未来的生活，好象很久没想起这些了。周围是同样阴暗的、严酷的、荒野的自然景物。“值得不值得为自己而生活，”他想到，“而你眼看就要死去，而且没有做一件善事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朝着他认为是往村子的方向走去。他已经不再想打猎的事，他感到难以支持的疲倦，他特别注意地、几乎是带着恐怖张望每棵灌木和每棵树，每分钟都在期待着生命的终结。转了半天，他走到一条沟渠，沟渠里流着从捷列克河流来的带沙的冰冷的水；为了不再乱撞，他决定沿着沟渠走。他走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条沟渠会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忽然芦苇在他背后响了一声。他吓了一跳，抓起了枪。他害羞了；原来是过于热心的狗呼呼地喘着气跳到凉水沟里，在那里喝水呢。

他和狗一起喝足了水，朝着狗奔跑的方向走去，他认为狗会把他领到村子。虽然有狗做伴，但是他总觉得周围愈来愈阴惨。森林发暗了，风愈来愈厉害地刮着折断了枝子的老树顶梢。有几只大鸟一边尖叫，一边绕着这些老树上的巢盘旋。植物变得更贫乏了，更常碰见簌簌作响的芦苇和满是兽类足迹的不生草木的林中沙地。在轰隆的风声中，还夹杂着一种令人不快的单调的呜呜声。他心里简直变得阴森森的了。他摸了摸腰后的野鸡，有一只不见了。那只野鸡坠断了绳子，丢掉了，只剩下血淋淋的脖颈和头矗在腰后。他从来没有这样觉得可怕。他开始祈

祷上帝，他只怕一件事——没做一点善事和好事就死掉；他是这样希望活着，为了完成自我牺牲的伟绩活着。

二十一

忽然，好象阳光照亮了他的心灵。他听见俄国人说话的声音。听见捷列克河迅速而均匀的流水声音，在他面前两步远，出现了棕黄色的流动着的河面，以及河岸上褐色的潮湿的沙地和沙洲，出现了远方的草原，在水面上显得很清楚的哨所钟楼，在乌荆子丛中走动的绊着脚的备着鞍子的马，还有那山。红色的太阳从乌云里露出一瞬间，它的最后的光线快乐地照亮了一下沿河的一切，照亮了芦苇、钟楼和聚成一堆的哥萨克们，其中卢卡什卡身材特别矫健，不禁引起了奥列宁的注意。

奥列宁又无缘无故地感到自己是完全幸福的。他无意走到了捷列克河上下普罗托茨克岗哨，对岸是归顺的车臣人的村子。他跟哥萨克们问过，但还是没找到对谁做一件善事的借口，于是就走进屋子里。在屋里也没找到机会。哥萨克们待他很冷淡。他进入一所土坯屋里抽起纸烟来。哥萨克们不大注意奥列宁，首先因为他吸纸烟，其次因为今晚他们别有消遣。从山里来了没有归顺的车臣人——被打死的阿布列克的亲属，他们带着密探来赎尸首。人们在等着从村里来的哥萨克长官。死者的兄弟身材高大而挺拔，留着剪短了的和染红的胡子，虽然他的穿戴是破烂不堪的束腰无领长袍和皮帽，但他却象一个王子似的镇静和庄严。他的面孔非常象被打死的阿布列克。他对任何人都不屑一瞥，也没有看死者一眼，他蹲在阴凉的地方抽着烟袋，不时地吐唾沫，偶尔用粗重的喉音发出几声命令，跟他

同来的人恭敬地听着。显然这是一个骑手，他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曾不止一次地见过俄罗斯人，而这时在俄罗斯人身上不仅没有什么可以使他惊奇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引他注意的。奥列宁走到死者跟前想看看他，但是这位弟弟镇静而轻蔑地翻起眼来瞅了瞅奥列宁，愤怒地、急促地说了一句话。密探赶快用束腰无领长袍盖上死者的脸。骑手脸上那副威严的表情使奥列宁吃惊；他本想跟他谈谈，问他是哪个村庄的，但是车臣人膘了他一眼，轻蔑地啐口唾沫，转过身去。奥列宁十分惊异这个山民不愿理睬他，他认为他这种淡漠不过是由于他的愚蠢或者语言不通。他找他的同伴说话。他的同伴是密探也是翻译，他也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但不是红胡子，而是黑胡子，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生着一口雪白雪白的牙齿和一对晶亮的眼睛。密探很乐意谈话，并且要了一支香烟。

“他们弟兄五个，”密探用他那半通不通的俄国话讲道，“已经被俄罗斯人打死了三个，只剩下两个；他是一个骑手，大大的骑手，”密探指着车臣人说。“当艾哈迈德汗（被打死的阿布列克的名字）被打死的时候，他蹲在对岸的苇丛里；他全都看见了：人们怎样把他放到船上，又怎样把他搬到岸上的。他在那儿一直坐到夜里；他想放枪打死那个老头子，别人把他劝住了。”

卢卡什卡走到谈话的人身边坐下来。

“你是哪村的？”他问。

“就在那边山里，”密探回答，他指着河对岸云雾弥漫的蔚蓝的山峡。“你知道苏尤克-苏吧？苏尤克-苏过去再走十俄里。”

“你认识苏尤克-苏的吉列伊汗吗？”卢卡什卡问道，显然对这个相识引以为荣。“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我的邻居，”密探回答。

“好样的！”卢卡什卡显然很感兴趣，用鞑靼话跟翻译交谈起来。

不一会儿，骑着马的中尉和带着两个随从的村长来到了。中尉是一个新上任的哥萨克军官，他向哥萨克们问好；但是谁也不按照军队的规矩向他喊：“祝您健康，大人”，仅仅有人用普通的问好回答他。有几个人，其中也有卢卡什卡，直起身来立正站着。班长报告岗哨上平安无事。这一切都使奥列宁觉得好笑：就仿佛这些哥萨克是在扮演士兵。这套礼节很快就过渡到普通的关系；中尉跟其他的哥萨克一样，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操一口流利的鞑靼话跟翻译谈起来。哥萨克们写好一张文件交给密探，然后从他手里拿过钱，就向尸首走去。

“你们里面谁是加夫里洛夫·卢卡？”中尉说。卢卡什卡脱掉帽子，走向前去。

“关于你的事，我已经向团长打了报告。结果怎样，我还不知道，我请求奖你十字勋章，因为你当班长还嫌早。你识字吗？”

“不识字。”

“嗨，多么漂亮的小伙子！”中尉说，他继续扮演当官的。“戴上帽子吧。他是哪一家的加夫里洛夫？是‘什罗基’家的吗？”

“是他的侄子，”班长回答。

“知道，知道。好，动手吧，帮帮他们的忙，”他转向哥萨克们说。

卢卡什卡快乐得脸上发光，显得比平时更漂亮了。他离开班长，戴上帽子，又蹲到奥列宁身旁。

当尸首搬上小船的时候，那个车臣人的兄弟向河岸走去。哥萨克们不由得闪开给他让路。他用一条有力的腿往岸上一蹬，

就跳到小船上。奥列宁看见，他在这时才第一次迅速地扫视一遍哥萨克们，又急促地向同伴问一句话。同伴指着卢卡什卡回答了一句。车臣人看了他一眼，就慢慢地转身往对岸望去。他那一瞥所含的不是仇恨，而是冷淡的轻蔑。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什么？”奥列宁问那个活泼好动的翻译。

“你们杀死我们，我们宰掉你们。有来有往，以暴易暴，”密探说，他显然是在撒谎，呲着白牙笑了，接着就跳到船上。

死者的兄弟坐在船上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岸。他是这样憎恨和蔑视，他甚至对这里任何东西都不感到兴趣。密探站在船尾，时而这边时而那边地划着桨，麻利地掌着船，不停地说话。小船斜刺地横渡河流，越来越小，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最后，眼看着他们靠了河岸，岸上有他们的几匹马。他们把尸首搬上去；虽然马老是向一旁躲闪，人们还是把尸首放到鞍上，然后都骑上马，顺着从村旁经过的大路缓步走去，成群的人从村子里走出来看他们。这边河岸上的哥萨克们非常得意而且快乐。四面八方洋溢着笑声和戏谑的声音。中尉和村长被请到土屋里去吃饭。卢卡什卡带着满脸快乐的表情，努力装出庄重的样子，但是怎么也装不象，他坐到奥列宁身旁，肘子支着膝盖在削小棍。

“您为什么吸烟？”他好象怀着好奇的心情说道。“这难道是好事吗？”

他说这话，显然只是因为他看奥列宁怪尴尬的，在哥萨克中间没人理睬他。

“没什么，习惯，”奥列宁回答，“怎么？”

“哼！要是我们弟兄吸烟，那可就糟了！您瞧那山好象不

远，”卢卡什卡指着峡谷说道，“可是你怎么也走不到！……您一个人怎么回家：天这样黑。您如果愿意，我送您，”卢卡什卡说，“您向班长央求一下。”

“多么能干的小伙子，”奥列宁望着哥萨克的快乐的面孔，想道。他想起玛丽亚娜，想起他在大门后偷听到的接吻，他为卢卡什卡惋惜起来，惋惜他没有受过教育。“多么荒唐和错误！”他想道。“杀了人，他还觉得幸福，得意，仿佛他做了一件大好事。难道无法使他明白，这没什么可欢天喜地的？幸福不在于杀人，而在于自我牺牲？”

“以后可不要碰上他，老弟，”送走小船的一个哥萨克对卢卡什卡说。“你听见他是怎样问你的吗？”

卢卡什卡抬起头来。

“你是说干儿子吗？”卢卡什卡说，所谓干儿子是指那个被打死的车臣人。

“干儿子是站不起来了，我说的是那个干儿子的红胡子兄弟。”

“他自己能够囫圇着回去就托天之福了，”卢卡什卡笑着说。

“你高兴什么？”奥列宁对卢卡什卡说。“如果你的兄弟被打死了，你也高兴吗？”

哥萨克眼睛含笑向奥列宁望过去。奥列宁要对他说的话，他仿佛全都明白，但是他的想法要比这高一着。

“那有什么？难免的事！你当我们弟兄不被他们打死吗？”

二十二

中尉和村长走了；奥列宁为了想使卢卡什卡高兴和不至独

自一人在黑暗的树林里走路，他替卢卡什卡去请假，班长准了他的假。奥列宁以为卢卡什卡想看见玛丽扬卡，而他也乐于跟这个样子可爱、喜欢谈笑的哥萨克作伴。在他的想象中，不由得把卢卡什卡和玛丽亚娜联在一起，并且一想到他们就觉得快乐。“他爱玛丽亚娜，”奥列宁暗自想道，“我也可以爱她。”他们在黑暗的树林里走回家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对他来说是一种新的激情占有了他。卢卡什卡也是满心高兴。在这两个如此不同的青年之间，令人感到存在一种类似爱的感情。每当他们目光相遇，他们就想笑。

“你家大门在哪儿？”奥列宁问。

“在村子中间。我把你送到泥坑那儿，再往前您就不怕了。”奥列宁笑了。

“你以为我害怕吗？你回去吧，谢谢你。我一个人走。”

“没关系的！我又有什么事好干呢？您怎能不害怕？连我们都怕，”卢卡什卡也笑了，为了安慰他的自尊心，说道。

“你到我那儿去吧。咱们谈谈，喝两盅，早晨你再回去。”

“您以为我找不到过夜的地方啊，”卢卡什卡笑起来，“可是班长叫我回去。”

“昨天晚上我听见你唱歌来着，还看见你……”

“所有的人都是……”卢卡摇了摇头。

“听说你要结婚，是真的吗？”奥列宁问。

“母亲想给我娶亲。可是我还没有马。”

“你是非战斗员吗？”

“我哪儿是？我刚入伍。还没有马，又没地方去买。所以不能结婚。”

“一匹马值多少钱？”

“前些日子在河对岸有匹马要卖，给六十卢布还不肯脱手，马是诺盖种。”

“你跟我当护兵吧？（在行军中，护兵是跟随军官执行传令兵的职务的）。我来给你张罗，马，我可以送你一匹，”奥列宁忽然说道。“说真的，我有两匹，我不需要。”

“怎么说不需要？”卢卡什卡笑着说。“为什么要您送？等我们过上好日子，上帝会赐给的。”

“说真的！你不愿意当护兵吗？”奥列宁说，他很高兴他想起了送卢卡什卡一匹马的念头。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有点不好意思而且惭愧。他思索着，但不知说什么是好。

卢卡什卡首先打破了沉默。

“您在俄罗斯有自家的房子吗？”他问道。

奥列宁不禁讲起他不仅有一所房子，而且有好几所。

“房子好吗？比我们的大吗？”卢卡什卡憨厚地问道。

“大得很，大十倍，三层楼高，”奥列宁讲道。

“也有象我们这样的马吗？”

“我有一百匹马，每匹都值三四百卢布，不过跟你们的不一样。三百银卢布！都是赛马，你懂吧……可是我还是更爱本地的马。”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卢卡什卡问道，仿佛他老是在笑似的。“看您走到哪儿去了，”他指着他们从旁走过的小道说道，“您应当向右转。”

“是的，我是自愿，”奥列宁回答。“想看看你们这地方，还想作几次出征。”

“我希望现在就有机会去出征，”卢卡什卡说。“你听，豺狼在嚎呢，”他又说，侧耳倾听着。

“怎么样，你杀了人，你不怕吗？”奥列宁问。

“怕什么？我希望去出征！”卢卡什卡重复说。“我非常想去，非常想去……”

“也许咱们会一块儿去的。我们的连在节前就出发，你们的中队也一齐去。”

“您为什么自愿到这儿来！又有房子，又有马，又有仆人。要是我，就要痛痛快快地玩。您是什么官级？”

“我是士官生，现在已经保举我当军官了。”

“如果您不是吹牛，您的日子真那么好，要是我，我就蹲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就是这样，我也哪儿都不要去。您在我们这儿觉得好不好？”

“好。非常好，”奥列宁说。

他们这样说着话快到村子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森林中昏昏沉沉的幽暗仍在包围着他们。风在树梢的上空低鸣。豺狼仿佛就在他们附近，忽而嚎叫，忽而哈哈大笑，忽而哭泣；前面，已经可以听见女人说话和犬吠，清楚地显露出房屋的轮廓，闪烁着灯火，并且传来干粪炊烟的特别气味。特别是在今天晚上，奥列宁有这样的感觉，在这村子里有他的住屋，有他的家，有他的一切幸福，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都没有象在这村子里过得这样幸福，而且将来也不会过得这样幸福。今天晚上他爱所有的人，特别是爱卢卡什卡！回到家里，使卢卡什卡大为惊讶：奥列宁自从贮藏室里牵出他在格罗兹尼买的那匹马——不是他常骑的那匹，而是另外的一匹。虽然老点，但还不错，他把这匹马送给了他。

“您为什么要送给我？”卢卡什卡说。“我还没有给您做一点事呢。”

“在我算不了什么，真的，”奥列宁回答，“收下吧，以后你也送我点什么……咱们还一块儿出征呢。”

卢卡什卡不知如何是好。

“这怎么行呢？一匹马值不少的钱，”他眼睛不望着马说道。

“收下吧，收下吧！你要是不收下，我要生你的气了。瓦纽沙，把这匹灰马牵给他。”

卢卡什卡拿起了缰绳。

“好，那就谢谢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奥列宁象十二岁的孩子一样感到幸福。

“把马拴到这儿吧。这是一匹好马，我在格罗兹尼买的，跑起来很猛。瓦纽沙，给我们拿点奇希尔。咱们进屋子坐吧。”

酒拿来了。卢卡什卡坐下来拿起酒杯。

“上帝保佑，我也要报答您的，”他一边说一边干了一杯。“你叫什么名字？”

“德米特里·安德烈伊奇·奥列宁。”

“德米特里·安德烈伊奇·奥列宁，上帝保佑你。咱们要交个朋友。什么时候也到我们家里坐坐。我们虽然不是富人，朋友还请得起。你要是需要什么，熟奶油或者葡萄，我告诉母亲。如果你到哨所来，我侍候你去打猎，去过河，随便你要到哪儿去。你不知道我前些日子打死一个多么大的野猪！都分给哥萨克弟兄们了，不然我就送给你。”

“好的，谢谢。你可别用这匹马拉车，不然它就不好骑了。”

“怎么能用马拉车！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卢卡什卡低下头说，“不知你肯不肯，我有个朋友，吉列伊汗，他叫我在路上——就是从山里出来的路上——打埋伏，咱们一块儿去。我

不会出卖你的，我做你的穆里德①。”

“一块儿去，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儿去。”

看来，卢卡什卡完全安心了，他已经弄明白奥列宁对他的态度。卢卡什卡谈话时的态度之沉着和单纯使奥列宁惊异，甚至有点使他不愉快。他们谈了很久，卢卡什卡喝了很多酒，但是没有醉（他从来没醉过）。天已经很晚了，他握了握奥列宁的手，就离开他走了。

奥列宁向窗外望去，看他离开他后做什么。卢卡什卡低着头轻轻地走出去。然后，把马牵到大门外，忽然一抖脑袋，象猫似的跳到马身上，把马笼头的缰绳甩到脖颈两旁，尖叫一声，就沿着大街驰骋开了。奥列宁以为他要去和玛丽扬卡分享快乐；虽然卢卡什卡并没有这样做，但是奥列宁心情之好是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他象孩子似的高兴，忍不住向瓦纽沙不仅讲起他送给卢卡什卡一匹马，而且还讲了为什么要赠送，以及他的全部关于幸福的新学说。瓦纽沙不赞成这个学说，说是拉尔让·伊利尼扬帕②，说啥都是假的。

卢卡什卡跑回家，从马上跳下来，把马交给了母亲，嘱咐把它放到哥萨克马群里；他在当天夜里就应当回哨所去。哑巴姐姐牵走了马，并且打手势表示，她要是看见那个送马的人，就这样拜倒在他脚下。老太太听了儿子的话只是摇头，心里想，马是卢卡什卡偷来的，所以吩咐哑巴趁着天不亮就把马牵到马群里。

卢卡什卡一个人向哨所走去，不住地思索奥列宁的举动。

① 穆里德派本为伊斯兰教中的一个反动的宗派组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俄国高加索一带很流行。这一宗派的穆里德（教徒）要绝对服从穆里师德（教主）。一般非伊斯兰教的人所说的穆里德，相当“徒弟”、“部下”的意思。

② 不准确的法语：没有钱。

虽然他觉得马不算是好的，然而至少也值四十卢布，卢卡什卡对这个赠品很高兴。但是为什么要赠送，这一点他不能理解，因此他体验不到一点儿感激之意。相反，他头脑里老是萦回着一种模糊的猜疑，觉得士官生不怀好意。但是怀着什么恶意，他不能清楚地知道，他老是有这样的想法：一个陌生人把一匹价值四十卢布的马赠给他，什么也不图，只是为了行善，他觉得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喝醉了酒，那倒可以理解：想摆摆阔。可是士官生是清醒的，这样看来，他准是想收买他做什么坏事。“办不到！”卢卡什卡想道。“反正马在我手里，咱们走着瞧吧。我也不是傻瓜蛋。看谁能骗着谁！咱们瞧吧！”他一边想，一边觉得对奥列宁必须多加小心，因此对他起了一种恶感。他对谁也没有讲起他是怎样得到这匹马的。他对一些人说是买的；对另外一些人只是支吾其词。然而村里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卢卡什卡的母亲、玛丽亚娜、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及其他一些哥萨克知道了奥列宁无缘无故赠马的事，感到莫名其妙，并且对士官生开始存有戒心。虽然存有戒心，但这个举动却引起他们对奥列宁的单纯和富有怀着莫大的尊敬。

“听说没有，那个士官生，就是住在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家的那位，轻易地就把一匹值五十卢布的马送给卢卡什卡，”一个说。“阔佬！”

“听说了，”另一个沉思地回答。“大约他替他做了什么事了。咱们瞧吧，瞧他出的是什么鬼点子。快手卢卡什卡真幸运。”

“这些士官生都是些滑头鬼，滑极了！”第三个说，“你瞧他非放火不可，或者搞点别的什么鬼名堂。”

二十三

奥列宁的生活单调而平静。他跟长官和同事们很少往来。在高加索，一个有钱的士官生在这方面是有特别有利的条件的。不论是工作或训练，都派不到他。他为了参加一次远征已经被保荐为军官，而在这之前，长官先不打扰他。军官们认为他是贵族，所以对他都持自尊的态度。打牌和有歌队伴唱的军官们的纵酒豪饮，他在连队里是体验过的，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同时他也远离村里军官的社交界和军官们的生活。在哥萨克村子里的军官生活早已有其固定的方式。就象每个士官生和军官在要塞的时候一样，经常喝黑啤酒，打什托斯^①，谈论因参加远征所得的奖赏，在哥萨克村子里也是经常地和房东们喝奇希尔，请姑娘们吃东西和蜜，跟他们中意的姑娘纠缠；有时也和本地的姑娘结婚。奥列宁总是过着独特的生活，他对于这条被人走得烂熟的路子，有一种不自觉的反感。所以在这里他没有走高加索军官们生活的旧辙。

自然而然地，天一亮他就醒了。他喝了茶，站在自己门前台阶上欣赏一会儿山、晨景和玛丽亚娜；然后穿上破烂的牛皮上衣，穿上哥萨克叫作碎皮编成的靴子的浸湿了的鹿皮靴，腰间挎上短剑，拿起枪，带着装有食物和烟草的口袋，唤着狗，早晨五点多钟就从村子出发到森林里去了。晚上六点多钟回来，他又累又饿，腰带上系着五六只野鸡，有时带回来野兽，还带着没有动用的装着食物和烟卷的口袋。如果他的头脑里的思想也象口袋

^① 一种纸牌赌博。

里的烟卷一样，那么就可以看出，在这十四小时内，没有一个思想是活动过的。他回家时神清气爽，精神饱满，感到非常幸福。他说不出在这全部时间他在想什么。在他头脑里萦回的不是思想，不是回忆，不是幻想，而是这三种东西的片断的综合。清醒了一下，他问自己在想些什么。可是，他忽然觉得自己是在园子里和妻子一起干活的哥萨克，再不然就是山中的阿布列克，或者是离开他本人跑掉的野猪。他整天都是在倾听着、守候着和等待着野鸡、野猪或者鹿。

晚上照例是叶罗什卡大叔在他那里闲坐。瓦纽沙打来一瓶奇希尔，他们俩不紧不慢地谈天，喝足了酒，就心满意足的各自回去睡觉。明天又是打猎，又是有益于健康的疲倦，又是饭后过足酒瘾，又是感到幸福。有时，在节日或者在休息日，他整天在家里消磨时光。每当这时，他的主要的事情就是看玛丽亚娜，连他自己也不自觉，他从窗口或从台阶上贪婪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他看玛丽亚娜，爱她（他是这样觉得），就象他爱群山和天空的美一样，并不想跟她发生任何的关系。他觉得，他和她之间不可能存在她和哥萨克卢卡什卡之间可能存在的那种关系，更不可能存在有些富有的军官和哥萨克姑娘之间可能存在的那种关系。他觉得，如果也尝试一下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事情，那他就会失去旁观者的无穷乐趣，而得来的却是无限的痛苦、失望和悔恨。而且他对这个姑娘已经做了一件使他得到极大乐趣的自我牺牲的功绩；主要的，不知为什么他怕玛丽亚娜，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轻易对她说一句爱情的话。

夏天有一次奥列宁没有去打猎，在家里待着。完全出乎意外，一个莫斯科的熟人，一个在上流社会常和他见面的年纪很轻的人，进来找他。

“啊哈，mon cher^①，我亲爱的，当我知道您在这里，我是多么高兴！”他用莫斯科口音的法语开始说，并且继续夹杂着法语说下去。“有人告诉我：‘奥列宁’。哪个奥列宁啊？我是这么高兴……命运又使我们见面了。哎，您怎么样？干些什么？为什么？”

于是这位别列茨基公爵讲起自己的全部经历：他是怎样暂时到这团里来的，总司令怎样叫他去当副官，在出征后他就到他那里去，虽然他对这并不感兴趣。

“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服务，至少也要挣个前程……十字勋章……一官半职……将来调到近卫军。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就是不为自己，也得为亲戚朋友。公爵待我很好；他是一个很有体面的人，”别列茨基滔滔不绝地说。“为了这次出征，已经呈请奖我一枚安娜勋章。在没有出征以前我住在这里。这里好极了。多么漂亮的女人！哎，您的生活如何？我们的上尉对我说——您知道吧，就是那个善良的蠢家伙……他说您过着可怕的野人的生活，跟谁都不来往。我是了解您不愿意跟本地的军官接近的。我很高兴现在咱们能够常常见面。我住在哥萨克班长家里。那里有一个多么好的姑娘，乌斯坚卡！我告诉您——简直迷人！”

从他嘴里越来越多地倾泻出的法语和俄语，这是奥列宁以为他永远离开了的那个社会的语言。大家都认为别列茨基是一个可爱的温厚的小伙子。也许他的确是这样的人；但是奥列宁却觉得，虽然他有一副温厚而漂亮的面孔，但是他非常令人不愉快。在他身上发散出一股他与之决裂的齷齪味道。使他最可气

① 法语：我亲爱的。

的是，他不能、而且简直无力断然推开这个来自另外社会的人，就仿佛他从前生活过的这个旧社会对他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他对别列茨基和对自己都很恼火，并且违反自己的意愿，在自己的谈话里也插进一些法语，打听总司令和莫斯科熟人的消息，又因为只有他们俩在哥萨克村庄里说法语，所以鄙夷地谈起同事的军官们，谈起哥萨克们，并且对别列茨基的态度很友好，答应拜访他和请他常到自己这里来。但是奥列宁本人仍然没有去找别列茨基。瓦纽沙却赞赏别列茨基，说他是真正的贵族老爷。

别列茨基一下子就过起村里富有的高加索军官们惯常过的生活。奥列宁眼看他一个月的工夫就成为村里的老居民：他请老人喝酒，举行晚会，他本人也参加姑娘们的晚会，夸耀胜利，甚至弄到这步田地，不知为什么姑娘和女人们都喊他老爷爷，而哥萨克们对他也习惯了，认为这是一个爱酒和爱女人的人，甚至喜欢他甚于喜欢奥列宁，因为他们觉得奥列宁是个谜。

二十四

一天早晨五点钟，瓦纽沙在茅屋台阶上用靴筒子吹着了茶炊的火。奥列宁已经骑着马到捷列克河洗澡去了（不久前他想出一件新鲜的娱乐——到捷列克河给马洗澡）。女房东在藏奶室里烧炉子，又黑又浓的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姑娘在棚里挤牛奶。“不乖乖地站住，该死的东西！”从那里传来姑娘不耐烦的声音，接着就听见均匀的挤奶声。在宅院附近的街上，传来急驰的马蹄声，奥列宁骑着一匹不备鞍子、身量不高、深灰色的皮毛发着亮光的湿漉漉的骏马来到了大门前。扎着红头巾的玛丽亚娜

的美丽的头，从棚子里伸出探望一下，又缩了回去。奥列宁身穿红色粗绸子衬衫和白色束腰无领长袍，紧束着佩有短剑的皮带，戴一顶高筒皮帽。他优雅地骑在膘肥体壮的潮湿的马背上，扶着背后的枪，弯身把大门推开。他的头发还是湿的，脸上焕发着青春和健康的光辉。他以为他美好，矫健，象一个骑手；其实不然。任何一个有经验的高加索人一眼就看出他仍然是一个大兵。看见姑娘伸出头来，他特别活泼地把腰一弯，把篱笆大门用力一推，收住缰绳，扬了一下鞭子，就进了院子。“瓦纽沙，茶预备好了吗？”他快乐地叫了一声，眼睛不去看棚子；他高兴地感觉到，那匹漂亮的马放松了臀部，紧挣着缰绳，全身的肌肉颤抖着，四蹄准备跳越围墙，在院子里的干燥的地上踏着步子。“塞普雷！”^①瓦纽沙回答。奥列宁觉得，玛丽亚娜的美丽的头还在从棚子里往外探着，但是他不回头看她。奥列宁从马背上跳下来，他的枪挂住了台阶，做了一个笨拙的动作，他惊慌地回顾一下棚子，那里谁也没有，只听见跟先前一样均匀的挤奶声。

他进了屋子，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带着一本书和烟斗到台阶上，面前摆着一杯茶，在倾斜的晨曦还没有射到的地方坐下来。这一天午饭前他不打算到哪里去，想写几封搁延很久的信；但不知为什么，他舍不得离开台阶上那块小天地，象进监牢似的不愿回屋里去。女房东生好了炉子，姑娘把牲口赶走，又回来收捡和在围墙上粘贴粪饼子。奥列宁还在读书，但他一点儿没有看懂他面前打开的书页上的字句。他的眼睛不断地离开书本去看那在他前面走来走去的强健的年轻姑娘。他怕漏掉她的任何一个动作——不论这个姑娘走到房屋投射的早晨潮湿的阴影里，或

① 法语：准备好了！

者走到被喜悦的晨曦照耀着的院子中间，她那鲜艳的衣服，匀称的体态，投在地上的黑影，都使得满院生辉。他高兴地看见，她一弯腰，是怎样潇洒优美，她那件最好看的衣服——粉红的长衫，在胸前和沿着端正的两腿，是怎样打成一道道的褶儿；她又是怎样直起腰来，在她那紧身的长衫下面，明显地露出胸脯起伏的轮廓；那一双虽然穿着红色的旧靴子而不走样的秀丽的脚，是怎样站到地上；她那卷起袖筒的强壮的胳膊是怎样绷紧了肌肉而且仿佛气愤地挥动着铁锹，她那又黑又深的眼睛有时是怎样向他看看。虽然细长的眉毛紧皱着，但是眼睛里却流露着快乐和觉得自己很美的神态。

“怎么，奥列宁，您早就起来了？”别列茨基穿着高加索军官的常礼服，走进院子来对奥列宁说。

“啊，是别列茨基！”奥列宁应了一声，伸出一只手来。“您怎么起得这么早？”

“有什么办法！我被撵出来了。我那儿今天晚上有舞会。玛丽亚娜，你也到乌斯坚卡那儿去，是不是？”他转过去对姑娘说。

奥列宁觉得奇怪，别列茨基怎么能就这样随便地对这个姑娘说话。但是玛丽亚娜仿佛没有听见似的，低着头，把铁锹扛到肩上，迈开她那矫健的男人的步伐向屋里走去。

“她害羞了，小妞儿，害羞了，”别列茨基望着她的背影说，“对您害羞了，”他快乐地微笑着，跑上了台阶。

“怎么，您那儿有舞会？谁把您赶出来了？”

“在乌斯坚卡那儿，就是在我的女房东那儿，有舞会，也请您去参加。舞会，就是馅儿饼加上一群姑娘。”

“我们去能做什么呢？”

别列茨基狡猾地微笑一下，挤了挤眼，向玛丽亚娜进去的那

间屋子摆了摆头。

奥列宁耸耸肩膀，脸红了。

“说真的，您是个怪人！”奥列宁说。

“哎，您给我们讲一讲啊！”

奥列宁紧皱着眉头。别列茨基看出这一点，就讨好地笑了笑。

“得了吧，那怎么可能，”他说，“你们住在一个院里……这么可爱的丫头，这么好的姑娘，地地道道的美人儿……”

“美得惊人！我还没见过这样美的女人呢，”奥列宁说。

“那么怎么样呢？”别列茨基完全不能理解，问道。

“这种事也许令人觉得奇怪，”奥列宁回答，“但是我为什么不说实话呢？自从我住在这里以后，女人对于我就仿佛不存在似的。这样很好，的确很好！我们跟这些女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叶罗什卡是另一回事；我和他有共同的爱好——打猎。”

“噢，原来这样？你说在我和阿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就是这么回事。您会说，她们都是乱七八糟的，这是另一回事了。A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 ①”

“阿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之流的女人我不认识，而且从来不善于和她们打交道，”奥列宁回答。“但是对那种人不能尊重，对这种女人我是尊重的。”

“那您就尊重好了！有谁妨碍您吗？”

奥列宁没有回答。看来，他想说完他已经开始说的话。这些

① 法语：“战争时就讲战争时的话！”相当我国“入乡随俗”之类的成语。

都是他急于要倾吐的。

“我知道我是例外。（他显然有点窘。）我这样安排生活，我不仅看不出有改变我的生活规律的必要，而且，我要是照您那样生活，我就不能在这儿生活下去，更不用说象现在这样幸福地生活了。再说，我和您不同，我所寻求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在她们身上看见了不同的东西。”

别列茨基不相信地抬起了眉毛。

“晚上还是请您到我这儿来吧，玛丽亚娜也来，我给您介绍。请您来吧！您要是觉得没意思，就离开。您来不来？”

“我可以去；但是，我对你说实话，我怕我认真地着了迷。”

“噢哟，哟，哟！”别列茨基喊道。“您只管来好了，我能使您安心。您来吧？说真的？”

“我可以去，但是，老实说，我不明白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

“我请求您。您来吧？”

“好，我去，也许会去的，”奥列宁说。

“得了吧，哪儿能看见这样迷人的女人，可是您却过着和尚的生活！何苦呢？干吗要毁坏自己的生活而不享受现成的东西？您听说咱们的连队要到沃兹德维仁斯卡亚去吗？”

“恐怕不是吧！我听说第八连要去，”奥列宁说。

“不，我收到了副官的信。他说公爵要亲自出征。我很高兴我又要跟他见面了。我开始厌倦这个地方了。”

“我听说不久要举行一次袭击。”

“没听说；我听说克里诺维岑为了一次袭击得到安娜勋章。他原希望升为中尉的，”别列茨基笑着说。“他算是倒了霉。他到司令部去了……”

黄昏来了，奥列宁开始在想晚会的事。邀请使他苦恼。他想去，但一想起那里的情景就觉得奇怪，荒唐，甚至有点可怕。他知道，那里除了有姑娘，不会有任何人，既没有哥萨克，也没有老太婆。那里会发生什么事？他怎样应付？说些什么话？她们会说些什么话？他和这些野性的姑娘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别列茨基讲过这种奇怪的、厚颜无耻的、同时又是严重的关系……他一想起就觉得奇怪：他在那里将要跟玛丽亚娜在一间屋里，也许，他得和她说话。当他想起她那一副庄严的姿态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而别列茨基却把这一切说得极为普通。“难道别列茨基对待玛丽亚娜也是这个样子吗？这倒有趣，”他想道。“不，最好是不去。这一切都是这样讨厌，下流，而主要的，是毫无意义。”但是，“那里会有怎样的情景？”这个问题又使他苦恼。而且他仿佛是受着诺言的束缚。他去了，还没下定最后的决心就已经走到别列茨基的住处，并且走了进去。

别列茨基住的房子和奥列宁住的房子一样。它建筑在离地二俄尺高的支柱上，有两个房间。奥列宁顺着陡梯进去的第一间里，摆放着鸭绒褥子、地毯、被子，还有按照哥萨克式样在正面墙上一个挨着一个摆得好看而且雅致的枕头。屋子两边墙上挂着铜盆和武器；长凳下面放着西瓜和南瓜。在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大炉子、一张桌子、几条长凳和几幅旧教的圣像。这里是别列茨基的卧室，里面放着行军床，可以驮载的箱子；小块壁毯上挂着武器；桌子上摆着化妆品和画像。长凳上扔着一件绸睡衣。别列茨基打扮的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穿着内衣躺在床上读《Les trois mousquetaires》^①。

① 法语：《三个火枪手》。

别列茨基跳下床来。

“您瞧我布置的。好吧？您来了很好。她们正忙得够呛。您知道馅儿饼是用什么做的吗？用面和猪肉还有葡萄。但主要问题不在这儿。您来瞧瞧那儿忙成什么样子！”

的确，他们从窗口望过去，看见房东的屋子里忙成一团。姑娘们时而拿着这、时而拿着那从屋子出出进进。

“快好了吗？”别列茨基喊道。

“马上就好！你饿了吗，老爷爷？”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

乌斯坚卡长得胖胖的，脸儿红红的，模样儿怪可爱，她卷着袖筒走进别列茨基的房间拿盘子。

“看你，走开！把盘子给摔了，”她对别列茨基尖叫道。“你最好去帮帮忙，”她笑着对奥列宁喊道。“别忘了给姑娘们准备点糖果。”

“玛丽扬卡来了吗？”别列茨基问。

“当然罗！她带来一块面团。”

“您要知道，”别列茨基说，“如果把这个乌斯坚卡穿戴起来，打扮一下，再保养保养，她会比我们所有的美人都美呢。有个哥萨克姑娘博尔谢娃，您见过吗？她嫁给了上校。她那 *dignité*^①才迷人呢！从哪儿能找到……”

“我没有见过博尔谢娃，可是依我看来，再没有比这种服装更好看的了。”

“啊哈，我对什么生活都能适应！”别列茨基快乐地叹息着说。“我去看看她们。”

① 法语：风度。

他把睡衣一扔，跑了出去。

“您来照管一下糖果！”他喊道。

奥列宁打发勤务兵去买糖饼和蜂蜜，给钱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厌恶，仿佛他在贿赂什么人似的，所以当勤务兵问买多少薄荷饼、多少蜜糖饼的时候，他没有作肯定的回答。

“你看着办吧。”

“把钱全买了吗？”老兵郑重地问道。“薄荷的贵些。十六戈比一个。”

“全买，全买，”奥列宁说，靠近窗口坐下，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的心跳得这么厉害，仿佛他在准备做一件重要而不好的事情似的。

当别列茨基走进姑娘们的房间的时候，奥列宁听见那里响起一阵喊叫声和尖叫声，几分钟后，他看见别列茨基随着一阵尖叫、喧哗和笑声跳出了屋子，顺着小梯子跑下来。

“被赶出来了，”他说。

几分钟后，乌斯坚卡走进房间，宣布一切都准备好了，郑重地邀请客人。

他们走进房间一看，果然一切都准备好了，乌斯坚卡正在整理靠墙的鸭绒垫子。在铺着一块小得不成比例的桌布的桌子上摆着干鱼和一瓶奇希尔。屋子里散发着生面和葡萄的味道。六七个穿着美丽的衣裳、没有象平时那样扎着头巾的姑娘挤在炉后墙角里，她们低语着，笑着，时而爆发出一阵哄笑。

“我恭请诸位向我的天使祈祷，”乌斯坚卡请客人们入座，说道。

奥列宁在一群毫无例外都很漂亮的姑娘中看见了玛丽扬卡，他在这种庸俗而难堪的场合和她相遇，他觉得痛苦而懊恼。

他感到自己蠢笨而且难为情，决定别列茨基怎样做他就怎样做。别列茨基颇为庄重地、并且自信而又洒脱地走到桌前，为乌斯坚卡的健康干了一杯，并且请大家也干一杯。乌斯坚卡说姑娘们不喝酒。

“掺点儿蜜可以喝，”姑娘群里一个声音说。

叫来刚从铺子里买了蜜和甜食回来的勤务兵。勤务兵皱着眉头，不知是羡慕还是轻蔑，他环视着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吃喝玩乐的老爷小姐们，小心翼翼，勤勤恳恳，把灰纸包里的一块蜂蜜和甜饼递上来，开始交待价钱和找回的零钱，但是别列茨基把他撵了出去。

别列茨基把蜜掺进盛着奇希尔的杯子里，把三俄磅^①甜饼往桌子上阔绰地撒开，把姑娘们从角落里硬拖了过来，让她们挨着桌子坐下，把甜饼分给她们。奥列宁不由自主地看见玛丽亚娜的那只晒黑的、但还纤巧的手拿着两块圆形的薄荷甜饼和一块棕色的甜饼，不知怎么办是好。谈话进行得不自然而且不愉快，虽然乌斯坚卡和别列茨基态度洒脱而且希望大家高兴。奥列宁踌躇了，他想应当说些什么，他觉得他引起了人家的好奇心，也许引起了嘲笑，他的羞怯也传染给别人。他脸红了，觉得特别是玛丽亚娜态度不自然。“大约她们在等待我们给她们钱，”他想道。“我们怎样给呢？怎样快点给了就走掉才好！”

二十五

“你怎么不认识自己的房客啊！”别列茨基对玛丽亚娜说。

“他从来不到我们那儿去，怎么认得他呢？”玛丽亚娜向奥列

① 1 俄磅合 409.51 克。

宁看了一眼，说道。

奥列宁不知为什么吓了一跳，忽然涨红了脸，连自己也不知说的什么，就说：

“我怕你母亲。我头一次去你们那儿，她给我一顿好骂。”

玛丽亚娜哈哈大笑起来。

“所以你就怕了？”她向他看了一眼说道，然后转过头去。

在这里，奥列宁第一次看见了这位美女的整个面庞，先前他只看见用头巾遮到眼睛的脸。无怪乎她被认为是村中第一美人。乌斯坚卡是一个俊俏的姑娘，她娇小、丰满，红润，有一对愉快的深棕色的眼睛，红嘴唇永远含着微笑，她永远是有说有笑的。玛丽亚娜却相反，她丝毫不俊俏，然而是美人。她的脸型可能使人觉得太刚毅，甚至近乎粗野，但是她身材高大挺拔，胸脯和两肩强壮，主要的，她那双黑眉下被阴影遮着的长长的乌黑的眼睛含着既严厉又温柔的表情，还有她那嘴的表情和微笑非常甜蜜。她轻易不笑，但是她一笑总是妩媚动人。她身上洋溢着处女的魅力和健康的气息。在座的姑娘都很美，但是她们，以及别列茨基，拿甜饼进来的勤务兵，——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看玛丽亚娜，对她说话也就是对姑娘们说话。她在姑娘中间是一个高傲而快乐的皇后。

别列茨基竭力保持晚会的体面，不停地瞎扯，逼着姑娘们敬酒，跟她们胡闹，不断地用法语向奥列宁说几句有关玛丽亚娜的美貌的不体面的评语，把她称作“您的”*la vôtre*^①，请他也照着他那样做。奥列宁越来越觉得难堪。他想出一个脱身逃走的借口，这时别列茨基宣布乌斯坚卡过命名日应当敬酒献吻。她同意了，但有个附带条件，就是象在婚礼上那样，要向她的盘子里

① 法语：您的。

放钱。“鬼把我带到这个讨厌的宴会上来的！”奥列宁自言自语地说，他站起来想走。

“您到哪儿去？”

“我去把烟拿来，”他嘴里这样说，心里想溜走，但是别列茨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我有钱，”他用法语对他说。

“不能走，到了这儿就得破费点，”奥列宁想道，他又对自己的窘态感到恼火。“难道我就不能象别列茨基那样举动吗？不应当走，既然来了，就不该破坏他们的兴致。要象哥萨克似的喝酒。”于是他拿起木碗（能盛七八杯酒）斟满酒，然后几乎一饮而尽。姑娘们都莫名其妙而且惊慌失色地望着他喝酒。她们觉得他的举动奇怪而且不礼貌。乌斯坚卡又敬他们每人一杯，并且吻了吻他们俩。

“姑娘们，咱们狂欢吧，”她说，把他们俩放在盘子里的四个卢布抖搂得哗哗地响。

奥列宁已经不拘束了。他的话多起来。

“玛丽亚娜，现在轮到你来敬酒献吻了，”别列茨基捉住她的手说道。

“我就这个样亲你！”她开玩笑地拍打着他说。

“可以免费亲老爷爷，”另一个姑娘接过去说。

“这才是聪明的姑娘！”别列茨基说着就去吻那个挣扎的姑娘。“不行，你得敬酒，”别列茨基对玛丽亚娜坚持说。“你来给房客敬酒。”

他捉住她的手，把她领到长凳跟前，让她坐在奥列宁身旁。

“多么漂亮的姑娘！”他一边说，一边把她的头转成侧面的姿势。

玛丽亚娜不挣扎，她骄傲地微笑着，用她那细长的眼睛打量奥列宁。

“漂亮的姑娘，”别列茨基重复说。

“你瞧我多么漂亮！”玛丽亚娜的眼神仿佛这样重复说。奥列宁没有弄清他做的什么事，就抱起玛丽亚娜要接吻。她忽然挣脱了身子，撞了一下别列茨基的腿和桌子，跳到炉子跟前。响起一阵叫喊声和笑声。别列茨基对姑娘们低语了几句，他们忽然从屋子跑到过厅里，随手把门锁上。

“你为什么亲别列茨基而不愿意亲我？”奥列宁问。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没有什么，”她把上唇往上一撇，眉毛往上一挑，答道。“他是爷爷，”她微笑着补充一句。她走到门前，开始敲门。“干吗把门锁上，鬼东西？”

“就让他们在那儿好了，咱们在这儿，”奥列宁挨近她，说道。

她紧皱着眉头，严厉地用手推开了他。奥列宁又觉得她是如此庄严美丽，他忽然醒悟过来，开始为自己的举动感到羞耻。他走向前去拉门。

“别列茨基，开门！开些什么愚蠢的玩笑？”

玛丽亚娜又笑起来，她的笑声是这么快乐而幸福。

“你怕我了吧？”她说。

“你象你母亲一样地凶，怎么不怕。”

“你和叶罗什卡再多混一混，姑娘们就会爱你了。”她微笑着，目光又直又近地逼视着他的眼睛。

他不知道应当说什么。

“要是我常到你们那儿去坐坐……”他突然说出这句话。

“那就不同了，”她震了震头说道。

这时，别列茨基推了一下，把门推开了，玛丽亚娜一闪，跳到

奥列宁身上，她的胯股碰到他的腿。

“我以前所想的：什么爱情啦，什么自我牺牲啦，什么卢卡什卡啦，全是扯淡。幸福才是唯一的；谁是幸福的，谁就是对的，”奥列宁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他自己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力量，他把美丽的玛丽亚娜抓过来就亲她的太阳穴和腮帮。玛丽亚娜没有生气，只是放声大笑，向其他的姑娘们跑过去。

晚会就这样结束了。老太婆——乌斯坚卡的母亲，干完活儿回来，大骂一场，把所有的姑娘都赶跑了。

二十六

“是啊，”奥列宁回家的时候想道，“只要我放松一点缰绳，我就会疯狂地爱上这个哥萨克姑娘的。”他躺下睡觉，这些思绪还在心头萦绕着，但是他以为这一切会过去的，他会回到先前的生活上去的。

但是先前的生活没有回来。他对玛丽亚娜的态度变了。先前把他们隔开的墙毁坏了。奥列宁每次碰见她，都跟她问好。

男主人回来收房钱，听说奥列宁有钱而且慷慨，就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老太婆和蔼地接待他。从晚会那天起，奥列宁晚上常到房东家里去，在他们那里一直坐到夜里。他觉得他在村子里的生活依然如故，但是他心中的一切都翻转了。他在森林中消磨一天，一到八点钟，天刚黑，他就独自一人或者和叶罗什卡大叔一起到房东家里。房东对他已经习以为常，他不去反倒使他们觉得奇怪。他付酒钱很痛快，人也老实。瓦纽沙给他送茶；他靠近炉子坐在墙角里；老太婆一点不拘束地做自己的事，他们一面喝茶或者喝奇希尔，一面谈些哥萨克人的生活，谈邻

居，谈俄罗斯的事情（关于俄罗斯的事情，由奥列宁来讲，别人来问）。有时他捧着书在那里默读。玛丽亚娜象只野山羊，跪坐在炉炕上或者黑暗的角落里。她不参加谈话，但是奥列宁看见她的眼睛、脸，听见她的动作、嗑葵瓜子的声音，感觉她用全副精神听他说话，并且当他默默地看书时，他感到她就在跟前。有时他觉得，她的眼睛注视着他，跟她那神采奕奕的目光相遇时，他不由得停止了说话，端详着她。她于是马上藏起来，他假装忙着跟老太婆谈话，而其实是在静听她的呼吸，静听她的一举一动，并且又在等待她的目光。在别人面前，她对他多半是快乐而且和蔼，可是单独和他在一起时，她是生硬而且粗暴。有时他到他们那里去，玛丽亚娜还没有从外面回来：忽然听见她的有力的脚步声，她的蓝色印花布的长衫在打开的门里闪了一下。她走到屋子中间，看见他，她的眼睛露出一丝甜蜜的笑意，于是他就觉得快乐而且可怕。

他对她无所求，也不希望什么，可是，能有她在跟前，对于他一天比一天变得更为必要了。

奥列宁对哥萨克村子的生活是如此习惯，过去对于他仿佛完全成为陌生的了；未来，特别是在他现在生活的环境以外的未来，简直使他不感兴趣。接到家里或者亲戚朋友的信，他感到受了侮辱，因为他们把他当作一个似乎毁灭的人而为他悲伤，可是，他在这村子里却认为那些不愿象他这样过生活的人才是毁灭了的。他深信，他脱离了从前的生活，并且这样离群索居和与众不同地在这村子安顿下来，他永远不会后悔的。在出征时，在要塞驻扎时，他觉得很好；但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叶罗什卡大叔的庇荫下，在这森林里，在这所村头的茅屋里，特别是在想起玛丽亚娜和卢卡什卡的时候，他对他从前所过的生活的全部的虚

伪才看得清楚,那种虚伪当时已经使他愤怒,而现在简直使他觉得难以形容地厌恶和可笑。他一天比一天感到自己在这里更自由,更是一个人。他觉得高加索跟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在这里,他找不到任何与他的一切幻想和与他所听到和读到的关于高加索的一切描写相象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毡斗篷、悬崖、阿马拉特-别克、英雄和强盗,”他想道,“人们象大自然一样地生活着:死,生,结合,再生,战斗,喝酒,吃饭,欢乐,然后又死,除了受自然加之于太阳、青草、野兽、树木的那些条件限制之外,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其他的法则……”因此,这里的人跟他本人比较起来,他觉得是美好的,强健的,自由的,看见他们,他就为自己羞愧而且难过。他常常真的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扔掉一切,入哥萨克籍,买一所小茅屋和牲口,娶一个哥萨克姑娘——就是不娶玛丽亚娜,他把她让给卢卡什卡了,和叶罗什卡住在一起,同他去打猎,捕鱼,跟哥萨克一同出征。“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我还等什么呢?”他这样问自己。他怂恿自己,羞辱自己:“难道我怕做那自己认为合理而且正确的事吗?难道愿意做一个普通的哥萨克,接近大自然,不损害任何人,而且还给人们做好事,难道幻想这一些比我从前所幻想的更愚蠢吗?比方说,从前曾幻想做部长,做团长。”但是有一种声音对他说,叫他等一等,先别忙决定。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使他踌躇不决,他仿佛觉得他不能完全过叶罗什卡和卢卡什卡的生活,因为他有另一种幸福,他老是在想,幸福在于自我牺牲。他对卢卡什卡的慷慨行为仍然不断使他快乐,他经常寻找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机会,但这种机会没有出现。有时他忘记了这个重新被他发现的获得幸福的单方,认为自己可以同叶罗什卡大叔的生活交融起来;但是后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抓住这个思想——自觉的自我牺牲,并且凭

借这个思想，他心安理得地、骄傲地看待所有的人和别人的幸福。

二十七

快要收获葡萄之前，卢卡什卡骑着马来找奥列宁。他看去比平时更显得英俊了。

“怎么样，要结婚吗？”奥列宁快乐地迎着他问道。

卢卡什卡没有直接回答。

“我在河对岸把您的马换了！这才是一匹好马！是洛夫—塔夫罗养马场的卡尔巴达种^①。我最爱好马。”

他们细细地观察了新马，在院子里骑了几趟。果然是一匹非常好的马：这匹枣红的骗马身量又宽又长，皮毛发亮，尾巴蓬蓬松松，马鬃就象纯种的马那样细长而且柔软。它的膘水是这样好，正象卢卡什卡所说的，在它背上简直可以睡觉。蹄子、眼睛、牙齿，无一不优美，精致，只有最纯种的马才能这样。奥列宁不禁欣赏着这匹马。他在高加索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骏马。

“骑起来才好呢！”卢卡什卡抚摩着马颈，说。“多么好的跑相！而且聪明！它老是跟着主人。”

“要找补不少的钱吧？”奥列宁问。

“没有算钱，”卢卡什卡笑着回答。“是从一个朋友那里牵来的。”

“好极了，一匹美丽的马！给多少钱你肯脱手？”奥列宁问道。

^① 该养马场被认为是高加索最好的养马场之一。——作者注。

“有人出过一百五十卢布，我一个钱不要就可以给你，”卢卡什卡快乐地说。“只要你说句话，就给你。我把鞍子卸下，你就牵了去。你只要随便给我一匹服役的马就行了。”

“不，这可不行。”

“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说着，卢卡什卡就解开腰带，从挂在皮带上的两个短剑中解下一个。“从河对岸得来的。”

“那就谢谢你了。”

“母亲答应亲自把葡萄送来。”

“不需要，咱们的帐会算清的。这把剑我就不给钱了。”

“怎么能给钱呢，朋友嘛！吉列伊汗把我领到河对岸他家里，说：拣你喜欢的拿吧。于是我就拿了这把刀。这是我们的规矩。”

他们走进屋里，饮起酒来。

“怎么，你在这里要住些日子吗？”奥列宁问道。

“不，我是来告辞的。现在我从哨所调到捷列河对岸中队里了。今天就要跟一个同伴纳扎尔卡一起去。”

“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不久就回来订婚，办完事还要回队里去，”卢卡不乐意回答。

“不看看未婚妻就走怎么行呢？”

“就是这样嘛！她有什么看头，您将来出征路过我们那里，请到中队问卢卡什卡·什罗基，就找到我了。那里野猪可多啦！我打死了两只。我送给您。”

“再见！基督保佑你。”

卢卡什卡骑上马，没有去找玛丽亚娜，就施展着高超的骑技，直向街上驰去，纳扎尔卡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他。

“怎么？咱们不去吗？”纳扎尔卡向亚姆卡住的地方挤了挤眼，问道。

“去！”卢卡什卡说。“拿住，把马牵到她那里，要是总见不到我的话，你给马一点干草。反正早晨我要到中队的。”

“怎么，士官生又送了点什么吗？”

“没有！幸亏我回送他一把剑，不然他会要这匹马的，”卢卡什卡说着，下了马，把马交给纳扎尔卡。

就在奥列宁窗户下面，他溜进了院子，向主人的房屋窗户走去。天已经完全黑了。玛丽亚娜穿着一件衬衣在梳辫子，准备睡觉。

“是我，”哥萨克低声说。

玛丽亚娜的表情本来是严峻冷漠的，但是一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就忽然容光焕发。她掀起窗户，又惊又喜地把头伸到窗外。

“什么？你要干什么？”她说。

“打开，”卢卡什卡说。“放我进去一会儿。我闷极了！闷得要命！”

他从窗口搂着她的头，吻她。

“真的，打开。”

“说什么废话！我已经说过不放你进来。要住几天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吻她。她也不再多问。

“你瞧，在窗口连好好地抱抱你都不行，”卢卡什卡说。

“玛丽亚奴什卡！”传来老太婆的声音。“你跟谁说话来着？”

卢卡什卡脱掉帽子，为了不叫人看见帽子就认出他来，他在窗下蹲下身来。

“快走吧，”玛丽亚娜低声说。

“卢卡什卡来了，”她回答母亲，“找爸爸来着。”

“那就让他进来吧。”

“他走了，说是没有工夫。”

果然，卢卡什卡加快了脚步，弯着身子，在窗户下跑进院子，然后向亚姆卡家里跑去；只有奥列宁一个人看见他。他和纳扎尔卡喝了两大杯奇希尔，就出了村子。夜是温暖的，黑暗的、寂静的。他们骑着马默默地走着，只能听见马蹄声。卢卡什卡开始唱一支赞扬哥萨克明加尔的歌儿，但是第一段还没唱完就停住了，他对纳扎尔卡转过身去。

“她不让进去，”他说。

“哦！”纳扎尔卡应道。“我就知道她不让进去。亚姆卡对我说，士官生常到他们那里去。叶罗什卡大叔吹嘘说，因为他给士官生撮合玛丽亚娜，士官生送他一支枪。”

“他吹牛，鬼东西！”卢卡什卡气愤地说，“她不是那种姑娘。老鬼，小心我打断他的腰杆。”于是他唱起他心爱的歌儿：

从伊斯梅洛沃村庄里，
从主人心爱的花园里，
逃走一只英武的雄鹰，
年轻的猎人紧紧去追赶，
他举起右手向雄鹰召唤。
英武的雄鹰答道：
“你不会把我养在金笼里，
你不会把我架在右手上，
现在我飞向碧青的海洋；
我要啄死一只雪白的天鹅，

把那甜美的天鹅肉，
饱餐一场。

二十八

房东家里举行订婚礼。卢卡什卡回来了，但是没有到奥列宁那儿去。奥列宁接到少尉的邀请，也没有去参加订婚礼。自从他在这个村子住下，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愁闷过。傍晚，他看见卢卡什卡穿着新衣裳同母亲一起到房东家里去了；有一个念头使他苦恼：为什么卢卡什卡对他这样冷淡？奥列宁锁在自己屋里。开始写日记。

“近来我反复地思索，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奥列宁写道，“于是我懂得了在识字课本里就讲到的道理。为了做一个幸福的人，要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要爱，自我牺牲地爱，爱一切人和一切物，爱的网要伸展到四面八方：谁落进网里，就捉住谁。所以我捉住了瓦纽沙、叶罗什卡大叔、卢卡什卡、玛丽亚娜。”

奥列宁刚写到这里，叶罗什卡大叔进来了。

叶罗什卡兴高采烈。奥列宁前几天晚上去找他，在院子里正碰见他对着一只野猪，带着幸福而骄傲的表情熟练地用小刀剥它的皮。周围卧着几条狗，他的爱犬良姆也在里面，这些狗轻轻摇动尾巴，望着他干活儿。孩子们怀着敬意隔着篱笆围墙看他，甚至不象平时那样戏弄他。邻居的女人们一向对他不大亲热，也向他问好，送他东西——有的送一罐奇希尔，有的送熟奶油，有的送面粉。第二天早晨，叶罗什卡坐在自己牲口圈里，浑身血痕斑斑，论斤出售鲜肉——有的人用钱买，有的人用酒换。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上帝赐福让我打死一只野猪，现在大

叔有用了。”在这以后，自然，他不出村子拚命地喝起酒来，一连喝了四天。这还不算，在订婚礼上他又喝了一顿。

叶罗什卡大叔从房东家来到奥列宁这里，他喝得烂醉，脸通红，胡子乱糟糟的，但是穿一件镶金边的红色新上衣，携带一个从河对岸取来的葫芦做的三弦琴。他早就答应弹三弦琴给奥列宁取乐，现在他正在兴头上。看见奥列宁在写东西，他烦恼起来。

“写吧，写吧，老弟，”他低声说，仿佛觉得写字的人和纸之间有个神灵，他生怕惊动它，所以不出声地、悄悄地坐在地板上。叶罗什卡大叔喝醉的时候，地板是他爱坐的地方。奥列宁回头看看，吩咐人拿酒，一面继续在写。叶罗什卡觉得一个人喝酒怪无聊的，他想谈谈话。

“我赴房东家订婚筵席来的。去他的吧，一群猪猡！我不高兴他们！所以到你这儿来了。”

“哪儿弄来的三弦琴？”奥列宁问，继续写下去。

“我到河对岸去了，老弟，弄到一个三弦琴，”他也轻轻地说。“我是个弹琴的能手：不论什么曲子——鞑靼的、哥萨克的、老爷们的、士兵的，都行，要什么就弹什么。”

奥列宁又向他看了一眼，咧嘴笑了笑，继续写日记。

微笑鼓起了老汉的勇气。

“别写了，我的老弟！别写了！”他忽然坚决地说。“人家得罪了你，去他们的，唾弃他们！干吗老是写呀，写呀！有什么用？”

于是他挖苦地学奥列宁写字，用他那粗壮的手指头咚咚地在地板上乱划，扭歪了自己的肥胖面孔，做了一个鄙夷的鬼脸。

“干吗要写状子？你要是个好样的，就痛痛快快地玩玩！”

在他的头脑中，写东西就是意味着写损人利己的状子，此外再没别的理解。

奥列宁哈哈大笑起来。叶罗什卡也跟着笑了。他从地板上一跃而起，开始显示他弹三弦琴的本领，并且唱起鞑靼歌曲。

“干吗老是写，好人儿！你最好听一听我唱的歌儿。你死了，就听不见歌儿了。痛快地玩吧！”

他先唱一支自己编的歌儿，一面唱一面舞：

阿狄一狄一狄里，
在哪儿见过他？
在市场的铺子里，
他在那儿卖别针。

然后他唱一支他从前的朋友——司务长教他的歌儿：

星期一我爱上了她
星期二我痛苦了一整天，
星期三我表白了爱情，
星期四我等待回答，
星期五答复终于来到，
叫我从此死了这份心。
在那快快乐乐的星期六，
就决心结果自己的生命，
可是为了拯救我的灵魂，
星期日我又变了卦。

接着又唱：

阿狄一狄一狄里，
在哪儿看见了他？

然后，他挤挤眼，耸耸肩，一面跳一面唱：

亲吻你，拥抱你，
鲜红的缎带编在你的辫子里，
我叫你娜杰仁卡^①，
你是我的娜杰仁卡，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他玩得劲头儿上来了，他急速地低声弹奏着，忽然做了一个漂亮的动作，一个人在屋里跳开了。

“狄一狄里”歌儿及其他类似的歌儿是老爷们的歌，是他专为唱给奥列宁听的；但是接着他又喝了三杯奇希尔，回忆起往事，于是唱起真正哥萨克的和鞑靼的歌儿。在唱一支他心爱的歌儿唱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颤抖起来，他停住不唱了，三弦琴的弦还弹得锵锵地响。

“唉，我的朋友啊！”他说。

奥列宁听见他的声音有点怪，回头一看：老汉哭了。泪水盈眶，有一滴顺着腮帮滚下来。

“我的好时光啊，你一去不回头了，”他抽抽搭搭地说，接着就沉默了。“喝啊，你干吗不喝！”他忽然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喊了一声，也不把眼泪擦掉。

有一支达格斯坦山民的歌儿特别使他感动。歌词很短，但

① 娜杰仁卡在俄语中是“希望”的意思。

是它最动人的地方是它那“唻哟！达哟！达拉拉哟！”悲怆的重唱。叶罗什卡把歌词译了出来：“小伙子赶着羊群从村子里上山去了，俄罗斯人来到把村庄烧光，杀死了所有的男人，掳走了所有的女人。小伙子从山上回来：村庄成了瓦砾场；没有了母亲，没有了兄弟，没有了家园；只剩下一棵树。小伙子坐在树下哭起来。就象你一样，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了，小伙子唱道，‘唻哟，达哟！达拉拉哟！’”这一声如诉如怨、扣人心弦的重唱，被老汉重复了好几次。

唱完最后一次重唱的时候，叶罗什卡忽然从墙上抓起一支枪，急急忙忙跑出院子，朝天举起双筒枪射开了。然后更哀伤地又唱起：“唻哟！达哟！达拉拉哟！啊！啊！”忽然沉默了。

奥列宁跟着他跑到台阶上，默默地朝着弹光划过的方向眺望繁星闪烁的黑暗天空。主人的房屋里灯火明亮，人声嘈杂。院子里姑娘们聚在台阶和窗户旁边，从藏奶室往过厅跑来跑去。有几个哥萨克从过厅里闯出来，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叶罗什卡大叔的歌儿的尾声和枪声喊叫起来。

“你干吗不待在订婚酒席上了？”奥列宁问。

“去他们的，去他们的吧！”老汉说，显然那里有人得罪了他。“我不爱，我不爱！嘿，这种人！我们回屋里去吧！他们玩他们的，我们玩我们的。”

奥列宁回到屋里。

“卢卡什卡怎么样？他高兴吗？他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他问道。

“问卢卡什卡干吗！有人向他造谣，说我替你撮合那个丫头，”老汉低声说。“那个丫头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咱们愿意，姑娘就是咱们的，多出点钱——咱们就弄到手！我来替你办，

真的。”

“不，大叔，如果她不爱，钱也帮不了忙。最好别谈这个吧。”

“咱们俩没有人疼，一对孤儿！”叶罗什卡忽然说道，又哭起来。

奥列宁听着老汉讲故事，喝了比平时更多的酒。“是啊，现在我的卢卡什卡幸福了，”他想道；但是他心中难过。这天晚上老汉喝得躺在地板上起不来，瓦纽沙不得不叫士兵来帮他的忙，一边啐着唾沫，一边拖他出去。他对老汉这个德行如此恼火，以致连一句法国话也说不出来了。

二十九

已经是八月了。一连好几天，晴得万里无云；太阳下热得令人难耐，一早就刮起热风，从草原的沙地和大路上掀起云雾般的热沙，在空中飞扬着掠过苇丛、树木和村庄。草和树叶都蒙上一层尘土；大路和盐沼地都裸露着，干得当当的响。捷列克河水位早已下降，并且还在很快地降下去，沟渠也干了。村子附近池塘，被牲口践踏的泥岸也是光秃秃的，整天可以听见男孩子和女孩子玩水的声音和喊叫声。在草原上，浅滩干涸了，芦苇枯萎了，牲口白天吼叫着跑进庄稼地里。野兽迁到遥远的芦苇里和捷列克河对岸的山地里。蚊子和蠓虫象乌云般的在洼地和村庄上空飞舞。雪山笼罩着一层灰色的雾。空气稀薄而且难闻。听说阿布列克涉过变浅了的河，到这岸伺机抢劫。每晚太阳落山的时候，都烧成一片炽热的红光。这时正是农忙季节。村子里所有的居民都聚在西瓜地和葡萄园里。满园子交错盘绕的青枝绿叶和清凉的浓荫，遮得密密实实。透过宽大、透亮的叶子，到

处露着黑紫色的、熟透了的、沉甸甸的葡萄嘟噜。一辆辆咿咿呀呀的大车，在通往园子的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行走着，车上满载着发黑的葡萄。满是尘埃的大路上，到处可以看见被大车压过的成嘟噜的葡萄。男孩和女孩跟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他们满身涂染着葡萄汁，手里拿的，嘴里吃的，都是葡萄。路上不断碰见身穿破衣的雇工，他们用强壮的肩膀扛着成筐的葡萄。头巾遮到眼皮底下的姑娘们赶着满载葡萄的牛车。士兵碰见牛车，就向哥萨克姑娘们要葡萄，车子一边走着，姑娘一边爬到车上，抱起成抱的葡萄丢到士兵的衣襟里。有些院子已经在榨葡萄。空气中充满了葡萄汁的味道。在屋檐下可以看见血红的猪槽；院子里还可以看见卷着裤腿、小腿染得紫红的当雇工的诺盖人。猪哧哧哼哼地吃葡萄皮，在葡萄皮里打滚。平顶屋上摆满了晒软了的黑琥珀色的葡萄。乌鸦和喜鹊在屋顶附近飞来飞去啄葡萄籽。

人们欢欢乐乐地收获一年的劳动果实，而今年果实特别丰富而且良好。

在园子的绿荫里，在海洋般的葡萄园之间，四面八方都洋溢着笑声、歌声、欢乐声、女人的说话声，到处闪动着女人们鲜艳的花衣服。

正晌午，玛丽亚娜坐在园子里桃树荫下，从卸了套的大车下拿出全家的午餐。她对面，在铺开的马衣上，坐着从学校回来的少尉，他正从罐子里倒水洗手。刚从池塘里跑回来的小男孩——她的弟弟，正用袖子擦脸，不安地望着姐姐和母亲，等待着吃午饭，喘着粗气。年老的母亲卷着袖子，露出强壮的晒黑的胳膊，往低矮的小圆桌上摆葡萄、干鱼、熟奶油和面包。少尉擦干了手，脱掉帽子，画个十字，向桌子凑过去。小孩抓起罐子就贪婪

地喝起来。母亲和女儿在桌旁盘腿坐下。树荫下也热得难耐。园子里的空气有种难闻的味道。吹过树枝的强烈的热风没有带来一点凉意，只是一个劲地吹弯了散布在园子里的梨树、桃树和桑树的树梢。少尉又祈祷一次，从背后拿起用葡萄叶盖着的奇希尔酒罐子，从长颈的罐口喝了一气，然后交给老太婆。少尉上身只穿一件衬衫，脖颈前的扣子解开，露出肌肉强健的毛茸茸的胸脯。他那细长而狡猾的面孔流露着喜悦。不论是从他的姿态和言谈中都看不出他平时那种诡计多端的气味；他的神情怡然自得。

“到晚上我们能收完棚子后面那块地吗？”他擦着沾湿了的胡子，说道。

“收得完，”老太婆回答，“只要天帮忙就行。焦姆全家连一半还没收完呢，”她加添了一句。“乌斯坚卡一个人干活儿，累死了。”

“他们也只能那样！”老头骄傲地说。

“玛丽亚奴什卡，拿去喝吧！”老太婆把罐子递给姑娘，说道。“上帝保佑，这样收成，办喜事不犯愁了，”老太婆又说。

“办喜事还有些日子呢，”少尉微微皱起肩头，说道。

姑娘低下了头。

“干吗不说呢？”老太婆说。“葡萄一收完，办喜事的日子就近了。”

“先别胡猜乱想，”少尉又说。“现在收葡萄要紧。”

“你看见卢卡什卡的那匹新马吗？”老太婆问道。“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送的那匹没了：他换了一匹新的。”

“没有看见。今天我和房客的仆人谈了谈，”少尉说，“他说家里又给他寄来一千卢布。”

“是个财主，没得说的，”老太婆肯定说。

全家都快乐而且满足。

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葡萄比他们所期望的还多还好。

玛丽亚娜吃过午饭，把青草堆到牛跟前，折起上衣当枕头，就在大车下踩软了的多汁青草上躺下来，她头上扎着红绸子头巾，身上穿一件褪了色的天蓝印花布衬衫；但是她热得受不了。她的脸滚烫，两只脚不知放哪儿是好，眼睛蒙上一层睡梦和疲倦的湿润；嘴唇不自觉地张开，胸脯一起一伏粗重地呼吸着。

农忙已经开始两个星期了，沉重的、不停歇的工作占据了年轻姑娘的全部生活。天刚亮她就一跃而起，用凉水洗了脸，用头巾包了头，赤着脚跑去喂牲口。急急忙忙穿上鞋袜，穿上上衣，拿起一包面包，套好牛，就到葡萄园里去，一去就是一整天。那里只有一小时的休息，其余时间都是摘葡萄，搬运筐子，直到傍晚，她又快乐又疲倦，牵着牛，用长树枝子赶着，走回村子。黄昏的时候，收拾好牲口，抓些葵瓜子放在长衫的宽大袖筒里，走出门来，躲在角落里和姑娘们说笑。晚霞一熄灭，她就回家，在黑暗的藏奶室里和父亲、母亲、弟弟吃饱饭，她无忧无虑，身体健康，走进屋里，坐到炕炉上，睡意朦胧地听着房客的谈话。等他一走，她就往床上一躺，香甜地酣睡到天亮。第二天又是这样。订婚后她再没有见到卢卡什卡，安心地等待结婚的日子。她对房客已经习惯了，并且对他那凝神的注视自己感到高兴。

三十

虽然热得无处可躲，成群的蚊子在大车的阴凉地方飞舞，小弟弟老是翻来覆去地推撞她，玛丽亚娜用头巾盖上脸，已经入睡

了，这时她的邻居乌斯坚卡忽然跑来，爬到大车底下，在她身旁睡下。

“睡吧，姑娘们！睡吧！”乌斯坚卡说着就在大车底下躺好。“等一下，”她又爬起来，说道，“这样不行。”

她一跃而起，折了些绿枝子，挂到两边的轮子上，然后把上衣搭在上面。

“让我进去，”当她又往车底下爬的时候，她对小男孩喊道。“难道这是哥萨克爷儿们和姑娘们在一起的地方吗？走开！”

车底下只剩下她和女友的时候，乌斯坚卡双手抱起玛丽亚娜，把她搂到胸前，开始亲吻她的腮帮和脖颈。

“我的亲爱的！小兄弟，”她一边尖声地、清晰地笑着，一边说。

“你瞧，都是跟老爷爷学来的，”玛丽亚娜躲闪着，答道。“得了，得了！”

她们俩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母亲呵斥了她们。

“你羡慕吗？”乌斯坚卡低声说。

“胡扯什么！睡觉吧。你干吗来了？”

但是乌斯坚卡不肯安静：

“我告诉你一件事，真的！”

玛丽亚娜支着肘子欠起身来，整理好歪到一边的头巾。

“你告诉我什么？”

“我知道你的房客的事。”

“没有什么可让你知道的，”玛丽亚娜答道。

“咳，你这个狡猾的丫头！”乌斯坚卡说，一边笑着用胳膊肘捣捣她。“什么话都不肯说。他常到你们那里去，是吧？”

“常去。那又怎么样呢！”玛丽亚娜说，脸忽然红了。

“我是个直心肠的姑娘，对什么人我都可以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乌斯坚卡说，她那快乐的绯红的面庞显出沉思的表情。“难道我对谁做了坏事吗？我爱他，就是这么回事！”

“爱老爷爷，是不是？”

“就是的。”

“罪过！”玛丽亚娜反对道。

“我说，玛申卡！做姑娘的时候，自由自在，不好好地玩玩更待何时？我嫁给一个哥萨克，我就得生儿养女，受苦受穷。就比方你吧，要是嫁给卢卡什卡，那你连想也甬想什么欢乐，除了生孩子，再就是干活儿。”

“那有什么，别人出了嫁，生活也满好的。反正都是一样！”
玛丽亚娜静静地回答。

“你就告诉我这一回，你和卢卡什卡有过啥吗？”

“能有个啥？订了婚。爸爸把出嫁的日子推迟了一年；可是今天他们又商量，说是秋后就办。”

“他对你说过什么？”

玛丽亚娜微笑了一下。

“说什么，那还不是明摆着的。说他爱我。总是要求我跟他到园子里去。”

“你瞧，多么坏！你大概没有去。如今他变得可能干了！第一名骑手。在连队里也老是寻欢作乐。前些日子我们的基尔卡来了，他说：他换了一匹好马！大概他总是想你。他还说过什么？”乌斯坚卡问玛丽亚娜。

“你什么都要知道，”玛丽亚娜笑了。“有天夜里他骑着马回来，走到我的窗户下，醉醺醺的。他央求我。”

“你没有让他进去吗？”

“怎么能让他进来！我说了就算数，刚强得象石头，”玛丽亚娜严肃地说。

“真是好样的！只要他愿意，随便哪个姑娘都不会嫌弃他。”

“让他找别的姑娘去吧，”玛丽亚娜骄傲地回答。

“你不可怜他吗？”

“可怜，可是我不做蠢事。这样不好。”

乌斯坚卡忽然把头贴到女友胸脯上，两手抱住她，笑得喘不过气来，浑身直打颤。

“你真是个傻丫头！”她喘息着说，“你不想要幸福，”说着，她又膈肢起玛丽亚娜来。

“咳，得了！”玛丽亚娜透过笑声尖声地叫道。“把拉祖特卡^①压坏了。”

“瞧你们，鬼东西，玩疯了，不知道累，”从大车上又传来老太婆睡意朦胧的声音。

“你不要幸福，”乌斯坚卡低声重复说，微微欠起身来。“你真幸运！人家都爱你！你长得粗里粗气的，可是都爱你。咳，要是我是你的话，我要好好地追你们的房客，你看他的眼睛恨不得把你吃掉。我的老爷爷——他什么不送给我啊！你们那位，听说是俄国人里面头号大财主。他的勤务兵说，他们还有农奴呢。”

玛丽亚娜欠起身来，沉思地微微一笑。

“有一次，他，就是那个房客，对我说，”她咬着一根小草，说。“他说：‘我真希望我是哥萨克卢卡什卡或者是你弟弟拉祖特卡。’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胡扯呗，想到哪儿就扯到哪儿，”乌斯坚卡回答。“我的那位

① 拉祖特卡是玛丽亚娜的弟弟。上文说他被赶走，但没有交待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什么话不说！就象着了魔似的！”

玛丽亚娜枕着叠起的上衣，把一只手甩到乌斯坚卡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今天他想到园子来干活儿；爸爸叫他来的，”她说，停了一会儿不说话，就睡着了。

三十一

太阳已经升高了，梨树向大车投来阴影。斜射的阳光，甚至透过乌斯坚卡编的树枝子，灼烧着睡在大车下的姑娘们的脸。玛丽亚娜醒来，把头巾扎好。向周围环顾一下，她在梨树后面看见了房客，他挎着枪正站在那里跟父亲谈话。她推了推乌斯坚卡，默默地微笑着指了指他让她看。

“昨天我走了一趟，一只也没找到，”奥列宁说，不安地东张西望，隔着树枝子看不见玛丽亚娜。

“您到那边去，正好走一个圆规形，在那废弃的园子里，就是我们称之为荒地的地方，常有兔子出现，”少尉说，立刻改变了语言，转起文来。

“在农忙的时候打什么兔子！最好来帮帮我们的忙。和姑娘们一块儿干干活儿，”老太婆快乐地说。“喂，姑娘们，起来吧！”她喊了一声。

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在大车下窃窃低语，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

自从人人都知道奥列宁送给卢卡什卡一匹价值五十卢布的马以后，房东们开始对他亲热一些；特别是少尉，好象很高兴看见他和女儿接近。

“可是我不会干这种活儿，”奥列宁说，努力不朝大车底下绿枝后面望，在那里他已经觉察到玛丽亚娜的蓝衫和红头巾。

“来帮忙吧，我给你杏干，”老太婆说。

“这是哥萨克待客的古老风俗，是妇道人家一点愚诚，”少尉解释说，仿佛是在更正老婆子的话，“在俄罗斯，我想，想吃多少有多少的，与其说是杏干，不如说是菠萝酱和蜜饯果子。”

“这么说来，在荒废的园子里有？”奥列宁问道。“我去一趟，”他向绿色的树枝后面迅速地投了一瞥，举了举皮帽子，就在葡萄园里整齐的绿色行列中消失了。

当奥列宁回园子来找房东的时候，太阳已经沉到园子篱笆后面了，细碎的光线穿过透亮的叶子闪耀着。风停了，葡萄园里开始散发着清新的凉气。奥列宁凭着本能，透过成行的葡萄藤，老远就认出玛丽亚娜的蓝长衫，他一边摘着葡萄，一边向她走去。过于兴奋的狗，有时也用垂涎欲滴的嘴啣一啣低垂的葡萄。玛丽亚娜脸通红，卷着袖子，把头巾放到下巴颏，很快地割掉沉甸甸的葡萄嘟噜，然后放到筐子里。她停住了手，但是没有放开葡萄蔓，亲切地微笑一下，又开始工作起来。奥列宁走近了，为了腾出手来把枪挎到肩上。“你家里的人呢？上帝保佑！只你一个人吗？”他想这样说，但是没有说出口，只是举了举帽子。他和玛丽亚娜单独在一起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但是他仿佛有意折磨自己，走到她跟前。

“你这样放枪会把女人打死的，”玛丽亚娜说。

“不会的，我不会射着的。”

他们俩沉默起来。

“你最好来帮一帮。”

他拿出一把小刀，就不声不响地割起来。从丛丛的叶子底

下割掉一嘟噜沉重的、足有三俄斤的、密密实实的葡萄，上面的葡萄挤得一点空隙都没有，他把它拿给玛丽亚娜看。

“全都割掉吗？这嘟噜不太青吗？”

“拿来吧。”

他们的手互相接触了。奥列宁握着她的手，她微笑着望着他。

“怎么，你快要出嫁了吗？”他说。

她没有回答，转过身去，用严厉的目光扫了他一眼。

“怎么，你爱卢卡什卡吗？”

“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很羡慕。”

“你真会说！”

“真的，你是这么美！”

他忽然对他这句话羞愧得无地自容：他觉得他的话很可鄙。他恼火了，不知如何是好，他握住她的两只手。

“无论怎么说，也配不上你！干吗要开玩笑！”她回答，但是她的视线却在表示，她确切地知道他不是开玩笑。

“怎么是开玩笑啊！你不知道我是多么……”

这话说得更可鄙了，与他所感觉的更不符合，可是他继续说：

“我不知道我要为你做些什么……”

“走开，讨厌！”

但是她的面孔，她的亮晶晶的眼睛，她的高耸的胸脯和匀称的两腿，都在表示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思。他仿佛觉得，她懂得他说的一切是多么可鄙，但是她比这些看法站得更高，他好象又觉得，她早就知道他对她想说的和不善于说的一切，但是她想

听一听他是怎么说法。“她怎会不知道呢？”他想到，“他想对她说的，只不过是她本身所具有的。但是她不想理解，也不想回答。”他想到。

“啊呜！”忽然从葡萄园后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乌斯坚卡娇柔的声音和尖细的笑声。“来吧，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来帮帮我。我只有一个人！”她从叶丛里露出天真的小圆脸，向奥列宁喊道。

奥列宁一句也没回答，在原地一动不动。

玛丽亚娜继续割葡萄，但是不断地向房客望过去。他本想说些什么来的，但是停了一下，耸了耸肩，挎上枪，快步走出了园子。

三十二

他两次停下来，倾听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响亮的笑声，她们聚到一起，正在大声说什么话。整个下午奥列宁都在森林里打猎。他没有打到什么，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薄暮了。他走过院子，看见房东的藏奶室的门开着，门里现出蓝色的衣衫。他特别提高了嗓子喊瓦纽沙，好让人知道他回来了，然后在台阶上常坐的地方坐下。房东已经从葡萄园回来，他们从藏奶室出来，走进自己的屋里，也没有请他进去坐坐。玛丽亚娜走出大门两次。有一次，在半明半暗中，他仿佛觉得她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贪婪地盯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但是他下不了决心向她跟前走去。当她走进屋子里的时候，他从台阶上下来，开始在院子里漫步。但是玛丽亚娜没有再出来。奥列宁整夜不睡觉地呆在院子里，细听主人屋里每一个响动。他听见他们从晚上起就在谈话，吃晚饭，

把褥垫拖出来，躺下睡觉，还听见玛丽亚娜不知为什么大笑；接着一切都沉寂下去。少尉和老婆子低声谈了一会，不知是谁发出呼吸的声音。他走进自己的屋子。瓦纽沙没有脱衣服就睡了。奥列宁很羡慕他，又到院子里去散步，不断地在等待什么；但是没有人走出来，也没有人动弹；只听见三个人均匀的呼吸声。他听得出玛丽亚娜的呼吸，他老是听她的呼吸，听自己心脏的跳动。村中寂静无声，月亮迟迟地升上来，躺下去又慢慢地站起来的牲口看得更清楚了，它们的喘息声充满了院子。奥列宁气愤地问自己：“我需要什么呢？”但是他仍然舍不得离开今天的夜晚。他忽然清楚地听见主人屋里有脚步声和地板的轧轧声。他向房门冲过去；但是，除了均匀的呼吸声，又是什么都听不见，又是院子里的水牛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翻了翻身，先用前膝跪着，然后用四肢站起来，挥了挥尾巴，在院子里干燥的土地上有节奏地拍打着什么，又是它在朦胧的月光中躺下去……他问自己：“我怎么办呢？”于是他下决心准备回去睡觉；但是又听见了声音，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了在夜雾弥漫的月光下玛丽亚娜走出来的身影，于是他又冲到窗前，又听见脚步声。天已经快亮了，他走到窗前，敲敲窗门，然后跑到门口，这次的确听见了玛丽亚娜的叹息声和脚步声。他握住门栓鼻，敲了敲。赤脚的小心的脚步声，在地板微微作响中，向门口移近了。门栓鼻晃动了，门吱扭一声，涌出一股丽山花和南瓜的味道，在门槛上现出玛丽亚娜的整个身影。他在月光下只看见她一瞬间。她把门一关，咕哝了几句，撒开轻盈的步子跑回去了。奥列宁轻轻地敲门，没有一点反应。他又走回窗前，开始倾听。忽然一声尖利的男人声音吓他一跳。

“干得好事！”一个戴着白羊皮帽的矮个哥萨克从院子里向

奥列宁走近来，说道。“我见过的，干得好事！”

奥列宁认出是纳扎尔卡，没有说话，不知道怎么办和说什么。

“干得好事！我要到村公所去告状，我还要告诉她父亲。好一个少尉的女儿！一个男人她还嫌不够。”

“你想要我怎么样，你想要什么？”奥列宁说。

“什么都不要，我有话到村公所去说。”

纳扎尔卡把声音提得很高，显然是有意的。

“你瞧，好一个机灵的士官生！”

奥列宁浑身打战，脸发白。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他用力抓住他的手，牵着他向自己的屋子走去。“什么事都没有，她不让我进去，我也没做什么……她是个规矩的女孩子……”

“到那儿咱们再讲清楚……”纳扎尔卡说。

“可是我还是要给你一点东西……你等一等！……”

纳扎尔卡不说话了。奥列宁跑进自己的屋里，给这个哥萨克拿出十个卢布。

“什么事也没发生。然而我还是有错的，这是我给你的！不过，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给人知道。什么事也没有……”

“祝你幸福，”纳扎尔卡笑着说，就走开了。

纳扎尔卡那天夜里回村子，是受卢卡什卡的嘱托来找一个收藏偷来的马的地方，他在回家的路上听见了脚步声。第二天早晨他回到连队里，向同伴夸耀他巧妙地弄到十个卢布。次日清晨奥列宁碰见了主人们，他们对昨夜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他跟玛丽亚娜没有说话，她只是瞅着他笑了笑。他又是整夜没有睡觉，徒然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第二天他故意晚上也去打猎，为了逃

避，他到别列茨基那里去。他害怕自己，对自己立誓不再到房东家去。第二天夜里司务长唤醒了奥列宁。连队立刻出发进行袭击。奥列宁对这个机会感到高兴，他想他再不回这个村子来了。

袭击延续了四天。长官和奥列宁是亲戚，他希望见一见奥列宁，并且建议他留在司令部里。奥列宁拒绝了。他离开他那村子活不下去，请求仍然返回原来的连队。为了这次袭击他得了一枚士兵十字勋章，这是他以前非常希望得到的，而现在对它却十分冷淡，对于提升为军官的委任状尚未到来一事，就更冷淡了。他和瓦纽沙没有遇见什么意外就驰过了防线，他比连队先到几个小时。奥列宁在台阶上欣赏着玛丽亚娜消磨了整个晚上。他又是整夜无目的无思想地在院子里闲逛。

三十三

第二天早晨，奥列宁醒得很晚。房东们已经出去了。他没有去打猎，他时而拿起书，时而走到台阶上，接着又走进屋子，躺在床上。瓦纽沙以为他病了。在薄暮前，奥列宁毅然决然地起来，开始写信，一直写到深夜。他写好了信，但没有寄出去，因为反正不会有人懂得他想要说的话，而且除了奥列宁本人之外，任何人没有必要去听懂他的话。他是这样写的：

人们从俄国寄给我慰问信；他们怕我在这荒凉的地方埋没自己，毁掉自己。人们谈到我的时候，都说：他变得粗野了，对于一切都落伍了，开始喝酒，说不定还会娶一个哥萨克老婆。怪不得叶尔莫洛夫说：谁在高加索服务十年，那他不是酗酒，就是娶一个放荡的女人。多可怕！的确，如果我三生有幸做了B公爵小姐的丈夫，当了高级侍从或者贵族长，我就不会毁灭自己了。然而，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是多么

可憎而又可怜啊！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不知道什么是生活！需要体验一次毫无矫揉做作的自然美的生活。需要看一看和理解一下我每天在面前所看见的一切：永远不可接近的雪山和庄严的女人——她那朴素的美，只有出自造物手中的第一个女人才具有这种美，然后就会明了，是谁毁灭自己，是谁生活在真实中，是谁生活在虚伪里——是你们还是我。可惜你们不知道，在我看来，你们那醉生梦死的生活是多么可厌而且可怜！只要我丢开不想我的小屋、我的森林和我的爱情，而一想到那些客厅、那些掺有假发的抹油的头发，那些不自然地翕动着的嘴唇，那些遮掩起来的、奇形怪状的瘦弱的四肢，以及客厅里那些本来不配称作谈话而勉强充作谈话的喁喁私语，我就感到难以忍受的厌恶。我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些迟钝的面孔，那些富有的小姐们——她们脸上的神气仿佛在说：‘没关系，可以的，来吧，别看我是一个有钱的小姐；’出现了那些就座和让座的烦琐客套，那厚颜无耻的情伴的撮合和那永远听不完的流言蜚语，永远看不尽的装模作样，那些繁文缛节——跟谁握手、对谁点头、和谁谈话；还出现了那世代相传的与生俱来的永远无法消除的苦闷（这一切都出于自觉，认为非如此不可）。只请你们理解这个道理或者相信这个道理吧。应当看见和了解什么是真和美，你们所说所想的一切、你们希望我和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幸福的那些愿望，都将化为乌有而烟消云散。幸福就是生活在大自然中、观赏自然和同它谈话。‘上帝饶恕他吧，他还要娶一个普通的哥萨克姑娘呢，他将要完全从上流社会销声匿迹，’我想象他们是怀着真诚的同情这样谈论我的。可是，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希望完全照你们所说的那样销声匿迹，我希望娶一个普通的哥萨克姑娘，但我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是幸福的顶点，我不配享受它。

自从我第一次看见哥萨克姑娘玛丽亚娜以后，已经三个月过去了。我所走出的那个世界的观点和成见在我身上还是鲜明的。我当时不相信我能爱上这个女人。我欣赏她，象欣赏山峰和天空的美一

样，我不能不欣赏她，因为她象山峰和天空一样美丽。后来我感觉到，对于这种美的观察，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开始问自己：我是不是爱上了她？但是，在我心中我没有找到丝毫与我所想象的感情相似的东西。这是一种那样的感情，它既不象孤独的痛苦和结为夫妻的愿望，也不象柏拉图式的恋爱，更不象我曾体验过的肉欲的爱情。我需要看见她，听见她，知道她在附近，而我与其说是感到幸福，不如说是感到宁静。在一次晚会上我和她在一起，而且挨近了她，我感觉我和这女人之间存在着虽未明言而无法分离的关系，挣脱这种关系是无能为力的。可是我还是挣脱；我对自己说：爱一个永远不了解我内心生活的兴趣的女人是可能的吗？难道可以仅仅为了美就爱一个女人，把她作为人像来爱吗？——我这样问自己，可是我已经爱上她了，虽然我还不相信我的感情。

在我和她初次谈话的那个晚会之后，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先前我觉得她是外界大自然中一个陌生而庄严的物象；在晚会后，我觉得她变成了人。我开始会见她，跟她谈话，有时跟着她父亲去干活儿，每天都到她家里，一坐就是整个晚上。在多次的接近以后，她在我眼中依然是那样纯洁，难以接近，庄严美丽。她不论回答什么，总是那么从容，骄傲，快乐中带着冷淡。有时她和蔼可亲，然而更多的场合，她那每一顾盼，每一言语，每一动作，都表现着冷淡——并非带有轻蔑，而是带有压力、令人倾倒的冷淡。每天，我唇边堆出笑容，努力装个样子，而内心却怀着痛苦的热情和欲望跟她说笑。她看出我是在装相；但是她却目光笔直、神情快乐、心地单纯地注视着我。这种情况使我难以忍受。我想对她说谎，又想对她说出我所想所感的一切。特别使我激怒的是在花园里发生的事。在那里我用那使我一回忆就感到羞耻的语言向她讲起我的爱情。我羞于回忆是因为我竟胆敢对她说出这种话，还因为她比我所要表达的言语和感情站得要高得多。我哑口无言了，从那天起我的处境变得难堪了。我不愿失掉体面，仍然保持原先开玩笑的态度，我感到我对她的态度做不到直率而单纯。

我怀着绝望的心情问自己：我究竟怎么办呢？在荒谬的幻想中，我时而想象她是我的情人，时而想象她是我的妻子，然后又厌恶地放弃了前一种与后一种想法。使她成为一个放荡的姑娘，这是可怕的。这无疑等于谋杀。使她成为一位贵夫人，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的太太，就象有一个本地哥萨克姑娘嫁给我们的军官那样，那就更糟了。如果我能够成为哥萨克卢卡什卡，象他那样偷马、喝酒、唱歌、杀人、喝醉了酒爬进她的窗户去过夜，全然不去想我是谁和我为什么这样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样我们就可以互相了解，我就会幸福了。我曾尝试投身于这种生活，然而更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弱点和做作。我不能忘掉自己，忘掉我的复杂的、不协调的和畸形的过去。我感到我的未来更无希望。每天出现在我面前的，总是远方的雪山和这个健美的、幸福的女人。这世上唯一可能的幸福不是为我准备的，这个女人也不是为我准备的！在我的处境中最可怕和最甜蜜的是：我觉得我了解她，而她永远不了解我。她不了解我并不是因为她低于我，相反，她不应当了解我。她是幸福的；她象大自然一样平稳宁静，不外露她的内心生活。我这个学坏了的渺小的人，竟然希望她了解我的丑恶和痛苦。我整夜不睡觉，毫无目的地在她窗前游逛，我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十八号那天我们的连队出外袭击。一连三天我不在村里。我又感伤又淡漠。连队里唱歌、打牌、狂饮、谈论奖赏，这一切比平时更加引起我的反感。我现在回来了，看见了她，看见了我的房屋和叶罗什卡大叔，从台阶上眺望雪山，我被这样强烈的新的喜悦感情所包围，于是我全明白了。我爱这个姑娘，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爱情。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不怕这种感情会降低我的身份，我不会觉得我这种爱情是耻辱，我为这种爱情感到骄傲。我爱上了她并不是我的过错。爱情违反我的意志而袭来。我用自我牺牲的方法逃避我的爱情，我妄想从哥萨克卢卡什卡和玛丽亚娜的爱情中给自己寻找欢乐，但这只能激起我的爱情和嫉妒。这不是我从前体验过的那种理想的、所谓崇

高的爱情；也不是那种迷恋的心情，这种心情使你欣赏自己的爱情，使你感到内心感情的泉源，使你自己去作一切。这也是我以前体验过的。这更不是那种享乐的愿望，这是另一种不同的感情。也许我爱她是爱自然，爱自然界一切美的化身；但是我没有自己的意志，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通过我来爱她；整个上帝的世界，整个自然界把这种爱情嵌入我的灵魂，而且说：爱她吧。我不是用智力和想象爱她，而是用我整个存在爱她。爱她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是整个上帝的幸福世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先前曾把那从我的孤独的生活产生的新的信念写出来；但是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这些信念在我内心形成时是多么艰辛，我认清了它们时又是怎样喜悦，我看见了一条新发现的生活道路。在我内心里再没有比这些信念更珍贵的了……可是……爱情来了，现在这些信念没有了，连可惜它们的念头也没有。我甚至难于了解我当初为什么这样珍视这种片面的、冷酷的、理智的情绪。美到来了，我的艰苦的重要的内心活动于是化为乌有。对于已经消失的连惋惜也不惋惜！自我牺牲——这都是胡扯和荒谬。这一切都是骄傲，是逃脱应得的不幸的避难所，是对他人幸福的嫉妒的逃避。为他人而生活，做善事！为了什么呢？在我的心灵里只有对自己的爱和只有一个愿望——爱她，和她住在一起，以她的生活为生活。我现在不为别人，不为卢卡什卡祈求幸福。我现在不爱这些别的人。要是在先前，我会对自己说，这是恶劣的。我会为这些问题而苦恼：她会怎样？我会怎样？卢卡什卡会怎样？现在我是无所谓了。我在生活中失去了主宰，仿佛有一种比我更强的东西引导着我。我很痛苦，但以前我是死的，只有现在我才活着。今天我就到他们那儿去，把一切都告诉她。

三十四

写完了信，奥列宁在很晚的时候走进房东家里。老太婆坐

在炉后长凳子上缫丝。玛丽亚娜没有包头布在烛火旁边缝东西。她看见奥列宁，就一跃而起，拿起头巾，向炉子走去。

“怎么啦，同我们坐一会儿，玛丽亚奴什卡，”母亲说。

“不，我光着头呢。”她跳上了灶炕。

奥列宁只能看见她的膝盖和垂下来的匀称的小腿。他请老太婆喝茶。老太婆叫玛丽亚娜去把熟奶油拿来待客。玛丽亚娜把一碟奶油放在桌上，又跳上了炕炉，奥列宁只能感觉到她的一双眼睛。他和老太婆谈家务事。老婆子乌莉特卡兴头上来了，欢欢喜喜地招待客人。她给奥列宁拿来糖渍的葡萄，葡萄烙饼，最好的葡萄酒，她在让奥列宁吃东西时，那种为普通老百姓所特有的粗鲁而骄傲的殷勤好客劲儿，只有用自己的体力挣面包的人才会有。老太婆先前曾以其粗暴使奥列宁吃惊，现在则以她对女儿的纯真的温柔使他感动。

“对上帝没有什么可埋怨的！谢天谢地，我们啥都有，榨了许多奇希尔，腌了很多咸菜，卖了三桶葡萄酒，剩下的够喝的了。你慢一点离开这儿。咱们在办喜事的日子好好地乐一乐。”

“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奥列宁问道，他忽然感觉血液涌到脸上，心也不平稳地、痛苦地跳动起来。

灶炕后面有人在动弹，可以听见嗑葵瓜子的声音。

“婚礼就在下礼拜举行。我们正在准备，”老太婆回答得那么随便而平静，就仿佛奥列宁不在跟前而且世上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似的。“我给玛丽亚奴什卡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要排排场场地把她嫁出去。只有一样怪不顺心的：听说我们的卢卡什卡玩野了。简直玩野了！胡闹！前些日子从队上来了一个哥萨克，说是他到诺盖去过。”

“当心别给人捉住，”奥列宁说。

“我也说过：卢卡什卡啊，不要胡闹！当然啰，年轻人喜欢胡作非为。但是什么事都得有个尽头。你得了一些东西，偷了马，打死了阿布列克，是好样的！那就老老实实在地生活吧。不然就会弄得糟透了。”

“是啊，我在队上看见过他两次，他总是在玩乐。还卖了一匹马，”奥列宁说着，就扭头向灶炕上望了望。

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向他闪着严厉的、不友好的光芒。他开始为他说的话感到羞耻。

“那有什么！他并没对任何人做过坏事，”玛丽亚娜忽然说。“他用自己的钱玩乐，”她把腿放下，从炕炉上跳下来，就走了出去，用力把门带上。

当她在屋子里的时候，奥列宁一双眼睛始终盯视着她。现在他望着门，等待着，老太婆乌莉特卡对他说的话，他一点也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客人：老人（老太婆乌莉特卡的哥哥）和叶罗什卡大叔，后面跟着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

“你们好啊？”乌斯坚卡尖声尖气地说。“你总是在玩？”乌斯坚卡转身对奥列宁说。

“是啊，我总是在玩，”他回答，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感到害羞和不好意思。

他想走，但是走不了。不说话，他也觉得不可能。老人帮了他的忙：他要来了酒，于是他们喝起来。然后奥列宁和叶罗什卡干杯。然后他跟另一个哥萨克干杯。然后他又跟叶罗什卡干杯。奥列宁喝得越多，他的心头越沉重。可是老人们兴致越来越高。两个姑娘坐在灶炕上望着他们，唧唧咕咕地低语，他们一直喝到天色很晚。奥列宁一句话没说，喝得比谁都多。老人们在嚷嚷什么。老太婆把他们赶了出去，不再给他们奇希尔。姑娘们嘲

笑叶罗什卡大叔，当他们走出门廊的时候，已经十点左右了。老人们自动到奥列宁那里玩了个通宵。乌斯坚卡跑回家去。叶罗什卡领着哥萨克老人到瓦纽沙那里。老太婆去收拾藏奶室。玛丽亚娜一个人留在屋里。奥列宁感到精神爽朗而旺盛，就仿佛刚睡醒似的。他留意地观察了一切，让老人们先走，他又回到屋里：玛丽亚娜正准备睡觉。他走到她跟前，想对她说话，但是他的声音断了。她把腿压在身下坐在床上，向角落里躲避他，用吃惊的怯生生的目光默默地望着他。她显然是怕他。奥列宁感觉到这一点。怜悯和羞耻之情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同时他又感到骄傲的满足，因为他在她心中总算激起了这点感情。

“玛丽亚娜！”他说。“难道你永远不可怜我吗？我说不出我是多么爱你。”

她躲得更远。

“你听你说的什么醉话。你从我身上什么都得不到！”

“不，不是醉话。不要嫁给卢卡什卡。我娶你。”他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心中想道：“我说的是什么话啊？明天我还会说同样的话吗？会说的，一定会说，现在我要重复地说，”内心的声音回答他。“嫁给我吧？”

她严肃地看着他，她的畏惧好象已经过去了。

“玛丽亚娜！我要发疯了。我管不住自己了。你命令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疯疯癫癫的温柔的话脱口而出。

“你胡说什么，”她打断了他的话，忽然抓住他向她伸过来的手。但是她没有把他的手推开，而是用自己的有力的粗硬的手指紧紧地握住它。“难道老爷们能娶乡下姑娘吗？你走吧！”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啊？反正我……”

“那把卢卡什卡放到哪儿去啊？”她笑着说。

他挣脱了她握住的那只手，用力地抱住了她那年轻的身体。可是她象一只小鹿似的一纵身，赤着脚跳下了床，就向台阶上跑去。奥列宁清醒过来，对自己的行为吃了一惊。比起她来，他又显得难以形容地丑恶。但是他丝毫不后悔他所说的话，他走回家去，对那些正在他那里喝酒的老人们一眼不看就躺下睡了，他睡得这么香甜，好久以来他就没有睡过这样的觉了。

三十五

第二天是个节日。傍晚，所有的居民都穿着在夕阳的光照中闪闪发光的节日服装走到街上。葡萄酒比往年酿得多。农忙过去了，居民们清闲下来。一个月后，哥萨克就要出征，很多人家正在准备婚礼。

在广场上，在村公所前和两家铺子附近站的人最多，——一家铺子卖小吃和葵花子，另一家卖头巾和印花布。村公所墙根土台上坐着和站着一些老年人，他们穿着没有金边和装饰的灰色或黑色的庄重的粗呢上衣。老人们庄严而淡漠地望着青年一代，用平静的、不紧不慢的声音谈论着年景和年轻的孩子们，谈论着公共事业和陈年往事。女人们和姑娘们从他们面前走过时，都停下来低了低头。年轻的哥萨克们恭恭敬敬地放慢脚步，举了举帽子。老人们停止谈话。他们有的严厉地，有的和蔼地注视着走过的人，慢慢地举了一下帽子又戴上。

姑娘们还没有开始跳环舞，她们穿着鲜亮的上衣，扎着遮到眼边的白色头巾，在夕阳的斜辉射不到的阴凉地里，团团地围坐在地上和墙根的土台上，高声地谈笑着。男孩子和女孩子正在玩棒球戏，把球高高地扔到晴朗的空中，呼啸着在广场上跑来跑

去。小姑娘们在广场的另一个角落已经跳起环舞，用尖细的嗓子小声地唱着歌。司书们、免役的和回家过节的青年们，穿着漂亮的白色的和簇新的滚金边的红色束腰无领长袍，带着节日的、快乐的面容，三三两两挽着手，从这个女人和姑娘堆里走到另一堆里，停下来跟哥萨克少女们说笑，调情。一个亚美尼亚人小店铺的主人穿着滚金边的细呢束腰无领长袍站在可以望见货架上一落折叠着的花头巾的敞开的大门旁，他露出东方商人的高傲和对自己重要作用的自觉等待着顾客。从捷列克河对岸来观赏节日的两个红胡子赤脚车臣人蹲在熟人的家旁边，漫不经心地吸着小烟袋，吐着唾沫，望着过节的人们，用粗重的喉音交谈着。有时，不过节的士兵穿着旧大衣急忙地从五光十色的人群中穿过广场。有些地方已经可以听见酩酊大醉的哥萨克扯起醉腔唱歌。所有的房屋都上了锁，门廊台阶从傍晚时分就刷洗干净了。甚至老太婆也来到了街上。在干燥的大街上，在脚下的尘土里到处都是西瓜子和南瓜子的皮壳。空气温暖而平静，晴朗的天空蔚蓝而明净。越过屋顶可以看见灰白色的山峰，在夕阳的斜晖中涂上一层玫瑰色，它好象就在眼前。在河对岸有时传来远方的大炮射击的隆隆声。但是村镇的上空，却响彻着一片节日的欢乐声。

奥列宁在院子里逛了整个早晨，等着看玛丽亚娜。可是她打扮好了以后，就到教堂去做礼拜；然后她和姑娘们坐在土台上嗑瓜子，有时和女伴们跑回家去，快乐地、和蔼地打量着房客。奥列宁怕当着别人跟她说玩笑话。他想把昨天的话对她说完，想从她嘴里得到肯定的答复。他又在等待昨天晚上那样的时刻；但是这样的时刻没有到来，而他感到自己再没有力量在这样不确定的关系中生活下去。她又走到街上，他等了一会儿，自己也

不知道向哪里去，就跟着她去了。他经过街角，她正在那里坐着，她那蓝绸子上衣闪闪发光，他听到背后女孩子们哈哈大笑，他感到心口一阵疼痛。

别列茨基的屋子就在广场旁边。奥列宁从那里经过，听见别列茨基的声音：“请进来，”他于是就走了进去。

他们俩谈了一会儿，就在窗前坐下来。接着叶罗什卡穿着新上衣，也参加他们一伙儿，靠近他们坐在地板上。

“这是‘贵族集团’，”别列茨基用烟卷指了指街角上花花绿绿的一群，微笑着说。“我的也在那儿，你瞧，就是那个穿红衣裳的。那是一套新装。为什么还不跳环舞？”别列茨基望着窗外，喊道。“等一会儿天黑了，我们也去参加。然后把她们请到乌斯坚卡那儿。应当给她们安排一次舞会。”

“我也到乌斯坚卡那儿去，”奥列宁坚决地说。“玛丽亚娜去吗？”

“她去，您来吧！”别列茨基丝毫不感到惊讶，说道。“真是美极了，”他指着那群花花绿绿的姑娘，补充了一句。

“是啊，美极了！”奥列宁努力露出无所谓的样子，肯定了一句。“一到这样的节日，”他补充说，“我就感到奇怪，为什么，比方说，正好在今天十五号，忽然所有的人都心满意足，兴高采烈起来？一切都象过节的样子。眼睛、面孔、声音、动作、衣裳、空气、太阳，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可是我们已经没有节日了。”

“是的，”不喜欢这种议论的别列茨基说。“老汉，你为什么不喝酒？”他对叶罗什卡说。

叶罗什卡瞅着别列茨基向奥列宁挤了挤眼，说：

“嗨，他多么高傲，你的朋友！”

别列茨基举起了杯子。

“阿拉 比尔德，”他说，接着干了一杯。（“阿拉 比尔德”意思是“上帝保佑”，是高加索人一同饮酒时的祝词。）

“萨乌 布尔（祝你健康），”叶罗什卡微笑着说，也干了自己的一杯。“你说：过节！”他站起来，望着窗外，对奥列宁说。“这算什么过节！可惜你没有看见从前人们是怎样玩乐！女人们走出来，总是穿着滚金边的萨拉凡^①。胸前挂着两串金币。头戴绣花金冠。走起路来窸窣窸窣。每个女人都是公主。往往走出来一大群，唱起歌来，连空气都被震响了；人们通宵玩乐。哥萨克们把一桶桶酒滚到院子里，坐下来一喝就喝到天亮。有人手挽手走遍全村去网罗人，碰到谁，就把谁网罗进来，从这里走到那里，到处走。有时一连玩三天。我还记得，我父亲回到家里，满脸通红，浑身发肿，帽子也没了，啥都丢了，回来就躺下不动。母亲知道是怎么回事：给他吃点新鲜鱼仔，喝点奇希尔醒醒酒，亲自跑遍村子去找他的帽子。他就这样睡了两天两夜！你瞧那时候的人！如今算什么？”

“那些穿萨拉凡的姑娘们怎么玩？光是自己玩吗？”别列茨基问道。

“光是自己玩可好！哥萨克们走来或者骑马来，说道：‘咱们冲散她们的环舞圈子，’于是行动起来，姑娘们抄起棍子就打。每次过谢肉节，总有年轻小伙子闯进来，她们就打，打马，也打人。冲破了圈子，抓住心爱的姑娘，就把她带走。姑娘，相好的，要她怎么爱你，她就怎么爱你。那时的姑娘们啊！个个都是皇后！”

① 从前俄罗斯民间妇女穿的无袖长裙衣。

三十六

这时，从旁边的街道上驰来两个骑马的人。其中一个纳扎尔卡，另一个是卢卡什卡。卢卡什卡微微歪斜着骑一匹肥壮的枣红色卡巴尔达马，这匹马在坚硬的道路上轻巧地迈起步子，昂着马鬃光滑细柔的美丽的头。利利落落装在套子里的枪，挎在背后的手枪，放在马鞍后面卷好的斗篷，都证明卢卡什卡不是来自附近归顺的地区。从他那侧身骑马的漂亮的姿势，从他那轻声扬鞭打马肚皮的漫不经心的动作，特别是从他那高傲地环视四周、眯缝着的又黑又亮的眼睛，都表现出青春的力量和自信。“见过这样的好汉子吗？”他那双眼睛往两旁望望，仿佛这样说。体格匀称的马，配上全套的银质马具，和那支枪以及英俊的哥萨克本人，引得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对他注意。纳扎尔卡个子又瘦又小，穿得比卢卡什卡坏得多。走过老人面前，卢卡什卡稍停一下，把卷毛的白皮帽子在剪短了的黑头发上举了举。

“怎么样，赶来了很多的诺盖人的马吧？”一个瘦瘦的老头紧锁着眉头，眼神阴沉地说。

“你这样问，老爷爷，你大概是数过了，”卢卡什卡扭过脸去答道。

“你不该把我的孩子也带了去，”老头更阴沉地说。

“看样子，这个老鬼什么都知道了！”卢卡什卡自言自语地说，他脸上立刻现出忧虑的表情；但是他往街角一望，那里站着一群姑娘，他勒转了马向她们驰去。

“你们好啊，姑娘们！”他忽然勒住马，用省力的响亮的声音喊了一声。“我不在的时候把你们都想老了吧，鬼婆子们。”他笑

起来。

“你好，卢卡什卡！你好，小爷子！”响起了快乐的声音。“带回来很多的钱吗？给姑娘们买了好吃的吧！这次回来要过些日子吧？好久没见到你了。”

“和纳扎尔卡一起飞来乐它一夜，”卢卡什卡说着就挥鞭纵马向姑娘们驰来。

“玛丽亚娜把你完全忘掉了，”乌斯坚卡娇声娇气地说，用臂肘推了推玛丽亚娜，尖声地笑起来。

玛丽亚娜躲开了马，仰着头，用闪亮的大眼睛静静地望着哥萨克。

“你很久没来了！干吗老让马踩人？”她淡淡地说，转过身去。

卢卡什卡特别高兴。他的脸焕发着勇敢和喜悦的光芒。看来，玛丽亚娜的冷淡的回答使他吃惊。他忽然皱紧了眉头。

“上马吧，我把你带到山里去，好姑娘！”他忽然喊了一声，仿佛要驱散不好的想法，在姑娘们中间显示一下骑技。他向玛丽亚娜弯下身来。“亲亲你，让我这样亲亲，快点！”

玛丽亚娜的眼睛和他的眼睛遇到一起，她忽然脸红了。她退了几步。

“去你的吧！踩着人家的脚了，”她说，低头看了看她那双穿着带羽状花纹的蓝袜子和窄窄的滚银边的红色新鞋的匀称的脚。

卢卡什卡转过脸去跟乌斯坚卡说话，玛丽亚娜在一个抱小孩的女人身边坐下。小孩向姑娘探着身子，用胖胖的小手抓住挂在她的蓝上衣上的项链。玛丽亚娜弯身凑近他，一面斜视着卢卡什卡。卢卡什卡这时正从束腰无领长袍下面黑色上衣口袋

里掏出一包点心和瓜子。

“分给大家吃，”他说，把包包递给乌斯坚卡。微笑着看了玛丽亚娜一眼。

姑娘的脸上又现出惶惑不安的神情。美丽的眼睛蒙上一层雾。她把头巾放到嘴唇下面，忽然把头贴着那个抓住她的项链的小孩的白胖的脸，开始贪婪地吻他。小孩用两只手扶着姑娘高耸的胸脯，张开没长牙的小嘴呀呀地喊叫。

“干吗把小娃娃亲得透不过气来？”小孩的母亲说，把小孩抱过去，解开上衣给他吃奶。“最好去跟小伙子亲热亲热。”

“我去把马安顿好，就和纳扎尔卡一起回来，我们要玩一整夜，”卢卡什卡说，他把马抽了一鞭，就离开姑娘驰走了。

他和纳扎尔卡转进旁边的街上，就往两所并排的房子走去。

“可回到家了，老弟！你快去快回！”卢卡什卡对同伴喊了一声，就在隔壁院子前面下了马，小心地牵着马走进自家院子的篱笆大门。“你好，斯乔普卡！”他对哑巴姐姐说。她也穿起过节的衣裳，从街上走来把马接过去。他向她打手势，叫她拿干草喂马，暂且不要卸鞍子。

哑巴呜呜地叫，指着马咂咂嘴，吻它的鼻子。这表示她爱这匹马，说它是一匹好马。

“妈妈，你好！怎么，你还没有到街上看看？”卢卡什卡扶着枪走上台阶的时候，喊道。

老太婆给他打开门。

“真是没想到没料到的，”老太婆说，“基尔卡说你不回来了。”

“妈妈，去拿些奇希尔来。等会儿纳扎尔卡要来，我们要祝贺节日。”

“我就拿，卢卡什卡，就拿，”老太婆回答。“咱村的女人们都去玩乐。大概咱家的哑巴也去了。”

她拿起钥匙，急忙向藏奶室走去。

纳扎尔卡安顿了自己的马，除下枪，就进来找卢卡什卡。

三十七

“祝你健康，”卢卡什卡说，他从母亲手里接过满满一杯奇希尔，小心地把它端到低下的头前。

“事情有点不妙，”纳扎尔卡说，“你听老爷爷布尔拉克说什么来着：‘你偷了很多的马吧？’看来，他知道了。”

“妖魔！”卢卡什卡简短地回答。“这有什么大不了？”他摇了摇头，补充说。“反正马在河那边。让他们找去吧。”

“还是不妥当。”

“有什么不妥当！明天送给他一点奇希尔。应当送点东西，就行了。现在玩吧。喝酒！”他喊了一声，象叶罗什卡老汉说这句话的声音一样。“咱们到街上去玩，到姑娘们那儿去。你去拿蜜来，或者我叫哑巴去拿。咱们要玩到明天早晨。”

纳扎尔卡微笑着。

“怎么，咱们要多玩一会儿吗？”他说。

“咱们多玩一会儿！快跑去拿酒来！给你钱！”

纳扎尔卡顺从地向亚姆卡家跑去。

叶罗什卡大叔和叶尔古绍夫象两只猛禽，闻到哪家吃酒作乐，两个醉汉就一前一后跌跌撞撞地闯进哪家屋子里。

“再来半维德罗！”当他们问好时，卢卡什卡对母亲喊道。

“鬼东西，你讲讲你在哪儿偷了马？”叶罗什卡大叔喊道。“真

能干！我就爱这样的！”

“爱吗！”卢卡什卡笑着回答。“你从士官生那儿给姑娘们带来好吃的了。唉，你这个老头子！”

“不对，你说的不对！唉，我说马尔卡啊！”老汉大笑起来。“这个鬼东西再三央求我！他说：‘你去给张罗张罗。我送你一支枪。’不，去他的吧！我本来可以照办的，可是我可怜你。你讲一讲，你到哪里去了？”老汉用鞑靼话讲起来。

卢卡什卡流利地回答他。

叶尔古绍夫不大懂得鞑靼话，只是偶尔插进一两句俄语。

“我说，他赶走了马。这个我太知道了。”他附和着说。

“我和吉列伊卡一起去的，”卢卡什卡讲道。他把吉列伊汗叫作吉列伊卡，哥萨克一听见这样称呼，就感到一种英勇气概。“过了河，他老是吹牛，说整个草原他都熟悉，可以一直领到地方，我们一起走了，漆黑的夜，我的吉列伊卡迷了路，来回兜圈子，总也兜不出去。摸不到车臣人的村庄，完蛋了。看来，我们走得太偏右了。大约找了半夜。谢天谢地，听见狗叫了。”

“傻瓜，”叶罗什卡大叔说。“从前我们在草原走黑路也迷过路。鬼才认得清楚！我就爬到土岗上，学狼叫喊，就这样！”他把两手做成筒状放在嘴边，发出好似一群狼齐声嗥叫的声音。“一嗥叫，狗就响应。好，你讲完吧。怎么样，找到了吗？”

“找到了，我们赶快给马套上笼头。纳扎尔卡险些儿给诺盖女人抓住了，好险啊！”

“是啊，给抓住了，”刚从外边回来的纳扎尔卡委屈地说。

“我们向回走了；吉列伊卡又迷了路，他简直把我们带到流沙里去了。我们老觉得是朝捷列克河走，其实是背着它走。”

“你不会看星星吗，”叶罗什卡大叔说。

“我也是说嘛，”叶尔古绍夫接过去说。

“是啊，你不知天有多黑。我左找右找，左找右找！我抓过一匹母马，给它套上笼头，让我的马随便地走；我想它会把我们带回去的。你猜怎么样？它喷着鼻子叫了两声，闻闻土地……就向前走开了，一直领到哥萨克村子。总算幸运，天已经大亮了；我们刚刚来得及把马藏到树林里。纳吉姆骑着马过河来了，他把马买了去。”

叶尔古绍夫摇摇头。

“我也是说嘛：干得利索！卖了很多钱吗？”

“都在这儿，”卢卡什卡拍了拍口袋，说。

这时老太婆走进来。卢卡什卡没有把话说完。

“喝酒！”他喊了一声。

“有一次，我和吉尔奇克一起夜里骑马出去……”叶罗什卡开始说。

“得了，永远听你讲不完！”卢卡什卡说。“我要走了。”卢卡什卡干了一杯，束紧腰带，就走了出去……

三十八

卢卡什卡走到街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秋夜凉爽而且无风。从耸立在广场一边的黑糊糊的杨树后面，金黄色的满月升上来。厨房烟囱冒着烟，它和雾融合在一起，在村子上空弥漫着。有些窗户亮着灯光。空气中充满了牛粪炊烟、葡萄皮和雾的气味。谈话声、笑声、歌声和嗑瓜子声还是那样嘈杂，但是听起来比白天更清晰。在墙边屋旁黑影中可以看见一堆堆的白头巾和皮帽子。

广场上，对着敞开的、被照亮了的铺子的门的地方，有一群哥萨克青年和姑娘现出黑色的身影和白色的头饰，可以听见他们在高声歌唱、大声说笑和谈话。姑娘们手挽手在跳环舞，在满是尘土的广场上徐徐缓缓地转圈子。一个瘦瘦的、最不漂亮的姑娘唱道：

从森林里，从黑色的森林里

哎哟一达一留里！

从花园里，从绿色的花园里，

走出来两个好样的小伙子，

两个小伙子，一对光棍汉，

走了一会儿，就停下来，

停下来就面对面地骂起来。

一个美丽的姑娘走向前，

走向前就对他们开了言：

我要嫁给你们中间一个人。

结果嫁给白脸膛的小伙子，

白脸膛、黄头发的小伙子。

他挽起、挽起她的右手，

挽起右手四邻八舍都走遍。

他见了朋友就夸奖：

“好弟兄，你看我的老婆多好看！”

老太婆站在旁边听年轻人唱歌。小男孩和小姑娘在黑暗中互相追逐，绕着圈子奔跑。哥萨克们团团地围着姑娘们站着，不住地碰一碰走过来的姑娘，有时冲进环舞的圈子。别列茨基和奥列宁穿着束腰无领长袍、戴着皮帽站在铺子门的暗影里，他们

谈话的声音不高，但是听得见，而且不是哥萨克口音，他们感到他们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穿着红色上衣的胖胖的乌斯坚卡，穿着新衣衫外套短上衣、身材魁伟的玛丽亚娜，两个人正在并排地跳环舞。奥列宁和别列茨基在谈论怎样从环舞圈子里把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拖出来。别列茨基以为奥列宁不过是想寻开心，而奥列宁是在等待自己命运的决定。他无论如何想在今天晚上单独地会见玛丽亚娜，向她说明一切，问她能不能和愿不愿意做他的妻子。虽然这个问题对于他早已作了否定的答复，但是他希望尽力向她诉说他所感到的一切，希望她了解他。

“您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别列茨基说，“要不我托乌斯坚卡早给您安排好了。您这人真怪！”

“怎么办？等些时候我全告诉您，很快就会告诉您的。看在上帝份上，现在只请您安排安排，让她到乌斯坚卡家去。”

“好的。这个容易……怎么样，你要嫁给一个白脸膛的小伙子吗？玛丽亚娜，是吗？是不是嫁给卢卡什卡？”别列茨基为了顾全礼貌，先转身对玛丽亚娜说；没有等她回答，他走到乌斯坚卡面前，求她把玛丽亚娜一块儿带走。没等他把话说完，领唱者又开始唱另一支歌儿，姑娘们手拉手走开了。她们唱道：

年轻小伙子闲溜达，
他走大街串小巷
到花园去，到花园去。
他第一次走过时，
挥了挥右手，
他第二次走过时，
挥了挥毛茸茸的皮帽子，

第三次走过时，
他就停着不想走。
停下来，整整衣衫。
“我想来找你，
亲爱的，别怪我说你：
亲爱的，你为什么
不到花园去玩玩？
亲爱的，难道说
你是瞧不起我？
亲爱的，你一旦想通了，
就会心满意足了。
我就请媒人来求婚，
我一定向你求婚，
一定娶你做老婆，
那时你就会尝到我的苦头了。”
我知道我应当怎样说，
可是我不敢回答他。
我不敢回答他，
可是到花园里去玩耍。
我走到葱绿的花园里，
见了我那朋友就鞠躬。
“姑娘，我还您一鞠躬，
赠送你头巾一条。
亲爱的，请你接受礼物，
用雪白的手指拿起它，
用雪白的手指收起它，

姑娘请你爱我吧。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该用什么赠给我的爱，
我送给我的爱
一件宽大的披肩。
为了这件大披肩，
我亲她三次又找补两下。”

卢卡什卡和纳扎尔卡冲破了环舞圈子，就夹在姑娘们中间走起来。卢卡什卡扯起尖利的声音附和着唱歌，他一面挥着手，一面在圈子中间走着。

“喂，哪一位出场啊！”他说。

姑娘们都推玛丽亚娜；她不愿意出去。透过歌声可以听见尖细的笑声、击打声、接吻声、低语声。

卢卡什卡在奥列宁面前走过时，亲热地向他点了点头。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你也来看看吗？”他说。

“是的，”奥列宁生硬坚决地回答。

别列茨基凑过身去对着乌斯坚卡的耳朵说了几句话。她想回答，但是没来得及，等着再转过来时，她说：

“好，我们来。”

“玛丽亚娜也来吗？”

奥列宁弯着身对玛丽亚娜说：

“你来吗？来吧，求求你，哪怕来一分钟。我需要和你谈谈。”

“姑娘们都去，我也去。”

“我对你的请求，你答复我吗？”他又俯下身去问她。“你今

天很快乐。”

她已经从他身边走开了。他跟着她走去。

“你答复吗？”

“答复什么？”

“就是前天我问你的那件事，”奥列宁低身凑近她的耳朵说。

“你愿意嫁给我吗？”

玛丽亚娜思索了一下。

“我答复，”她说，“今天晚上就答复。”

在黑暗中，她的眼睛快乐地、亲热地向年轻人闪了闪。

他还是跟着她走。俯身凑近她对于他是一种喜悦。

卢卡什卡继续唱歌，用力拉了一下她的手，把她从环舞中拉到圈子中间。奥列宁只来得及说了一句“一定到乌斯坚卡家里去，”就向他的朋友跟前走去。歌儿唱完了。卢卡什卡擦擦嘴唇，玛丽亚娜也擦擦，他们接吻了。“不行。得亲五次，”卢卡什卡说。谈话声、笑声、奔跑声代替了平稳的动作和平稳的声音。卢卡什卡已经醉得很厉害，开始把糖果分给姑娘们。

“所有的人都有份儿，”他说，他那高傲的得意洋洋的神情，令人又好笑又感动。“谁找大兵玩，谁就从环舞圈子里滚出去，”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狠狠地向奥列宁看了一眼。

姑娘们从他手里抢糖果，笑着互相打闹。别列茨基和奥列宁走到一旁。

卢卡什卡好象对自己的慷慨大量感到害羞似的，脱掉皮帽，用袖子擦擦额头，走到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跟前。

“亲爱的，难道说你瞧不起我？”他重复着刚才唱过的歌儿。又转过身去对玛丽亚娜生气地重复说：“你出嫁的时候，就会尝到我的苦头了，”他说着就把乌斯坚卡和玛丽亚娜一起拥抱

起来。

乌斯坚卡挣脱出去，扬起手来捶打他的背脊，把她的手都打痛了。

“怎么样，还要玩两圈吗？”他问。

“姑娘们愿意玩就玩，”乌斯坚卡回答，“我要回家了，玛丽亚娜也想到我们那儿去。”

哥萨克继续拥抱着玛丽亚娜，他把她领出人群，向黑暗的房屋拐角走去。

“不要去，玛申卡，”他说，“咱们最后一次玩玩。回家去吧，我到你那儿去。”

“我回家干什么？过节就是要玩嘛。我到乌斯坚卡家去。”玛丽亚娜说。

“反正我是要娶你的。”

“好吧，”玛丽亚娜说，“到时候看吧。”

“怎么样，嫁给我吗？”卢卡什卡严厉地问，把她抱到怀里，吻了吻她的腮帮。

“算了！干吗老缠着我？”玛丽亚娜挣脱身子，离开他。

“唉，你这个姑娘啊！……要吃亏的，”卢卡什卡站在那里摇着头，责备地说。“你要吃我的苦头的，”于是转过身去，对姑娘们喊了一声：“玩吧，干吗不玩啊！”

玛丽亚娜对他说的话仿佛感到又惊又气。她站住了。

“为什么要吃亏？”

“为那个。”

“为哪个？”

“为你和房客大兵玩，不再爱我了。”

“我高兴不爱就不爱。你又不是我的老子，不是我的娘。你

要怎么样？我愿意爱谁就爱谁。”

“那好吧！”卢卡什卡说。“你记住好了！”他向铺子走去。“姑娘们！”他喊道。“干吗停住不动？再跳一圈环舞啊。纳扎尔卡！快去拿些奇希尔来。”

“怎么样，她们来吗？”奥列宁问别列茨基。

“她们马上就来，”别列茨基回答。“咱们走吧，得准备一下舞会。”

三十九

已经是深夜了，奥列宁跟着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从别列茨基的屋子走出来。两个姑娘的白头巾在黑暗的街道上闪着白光。金黄的月亮向着草原落下去。村子上空弥漫着银灰色的雾。周围寂静无声，没有一点灯亮，只听见渐渐走远的两个姑娘的脚步声。奥列宁的心跳得厉害。灼热的脸在潮湿的空气中感到凉爽。他望了望天空，望了望他走出来的那间屋子：屋里蜡烛熄灭了，他又仔细看了看渐渐走远了的姑娘们的身影。白色的头巾在雾中消失了。剩下他独自一个人，他觉得可怕；他多么幸福！他跳下台阶，向姑娘们追去。

“是你啊！人家会看见的！”乌斯坚卡说。

“不要紧！”

奥列宁跑到玛丽亚娜跟前，拥抱她。玛丽亚娜并不拒绝。

“你们还没亲够，”乌斯坚卡说。“娶了她，再亲吧，现在忍住点儿。”

“再见，玛丽亚娜，明天我就去找你父亲，我亲自说。你先别说。”

“我干吗要说！”玛丽亚娜回答。

两个姑娘跑开了。奥列宁一个人走着，回忆着所发生的一切。他和她在靠近炉子的角落里消磨了整个晚上。乌斯坚卡一分钟也没有走出屋子，她跟别的姑娘们和别列茨基在嬉戏。奥列宁和玛丽亚娜在低声细语。

“你嫁给我吗？”他问她。

“你哄我，你不会娶我的，”她快活而平静地回答。

“你爱我吗？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

“为什么不爱你呢，你又不瞎又不聋的！”玛丽亚娜笑着回答，用她那双粗硬的手捏紧他的手。“你的手多么白，又白又软和，象熟奶油似的，”她说。

“我不是开玩笑。你说你嫁给我吗？”

“只要父亲答应，为什么不嫁给你呢？”

“你要记住，如果你哄我，我会发疯的。明天我就对你的父母说，我去求婚。”

玛丽亚娜忽然大笑起来。

“你怎么啦？”

“觉得可笑。”

“真的！我要买一座园子、买一处房子，我申请入哥萨克籍……”

“那时你可要当心，可不要爱别的女人！我是个醋坛子。”

奥列宁在想象中复述着这些甜蜜的语句。回忆起刚才的情景，他时而觉得心头疼痛，时而又觉得心里充满了幸福。他感到疼痛，是因为她仍然那么平静，仍象平时一样跟他说话。她似乎丝毫没有被这新的情况所激动。她仿佛不相信他，不去思索将来。他觉得她爱他只是在眼前这一刻，而将来和他一起生活的

想法，在她心目中是没有的。但是他是幸福的，因为他觉得她说的是实话，她同意她属于他。“是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只有当她属于我的时候，我们才能互相了解。这种爱情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只有用生活、用整个生活来表达它。明天一切都会弄明白的。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明天我要把一切都告诉她的父亲，告诉别列茨基，告诉全村……”

卢卡什卡两夜没有睡觉，过节时又喝得这么多，他生平第一次醉倒了，睡在亚姆卡家里。

四 十

第二天，奥列宁醒得比平时早，一醒来他就想到要做的事。他满怀喜悦地回忆着她的亲吻、她那粗硬的手指的握力和她的话：“你的手多么白！”他跳下床来，想马上就去见房东，向玛丽亚娜求婚。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忽然奥列宁觉得街上异乎寻常地骚乱：骑马的和步行的人们来来往往，说着话。他披上长袍，就跑到台阶上。房东一家还没有起来。来了五个骑马的哥萨克，吵吵嚷嚷地在谈论着什么事情。走在最前头的是骑着宽背的卡巴尔达马的卢卡什卡。哥萨克们一个劲儿地说话，喊叫，使人听不清他们在嚷什么。

“到上游那个哨所去！”一个喊道。

“备上马鞍，快点赶上，”另一个说。

“出那座大门近些。”

“废话，”卢卡什卡喊道，“当然走中间那座门啦。”

“对了，从那儿走近些，”说话的哥萨克满身尘土，骑着一匹汗淋淋的马。

卢卡什卡的脸通红，由于昨天狂饮而浮肿；皮顶帽子推到脑后。他用命令的口气喊叫，仿佛他是官长似的。

“怎么回事？到哪儿去？”奥列宁问道，他挺费劲才引起哥萨克对他注意。

“我们去捉阿布列克，他们在草原流沙里埋伏着。现在我们就去，可是人还不够。”

哥萨克们继续喊着，集合着，顺着大街往前驰去。奥列宁忽然想到，他不去怪不好的；同时他又想到可以提前回来。他穿上衣服，把枪上好子弹，跳上瓦纽沙匆忙之间备好的马，就驰出村外赶上了哥萨克。哥萨克下了马站成圆圈，从他们带来的小桶里斟满了一大木碗奇希尔，互相传递着饮酒，预祝出征胜利。他们之中有一个花花公子模样的青年少尉，他是偶然来到这个村子的，现在由他指挥这九个哥萨克。集合来的哥萨克都是士兵，虽然少尉摆出官长的样子，可是大家都听卢卡什卡的话。哥萨克对奥列宁一点也不注意。当大家都骑上马出发的时候，奥列宁策马走到少尉跟前，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平时和蔼可亲的少尉，这时也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奥列宁费了很大的劲才向他打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派出侦察阿布列克的巡逻队在村外八俄里的沙地遇见了山民；这些阿布列克埋伏在沙坑里向哥萨克射击，并且威吓说誓死不投降。同两个哥萨克出来巡逻的班长留在那里守着他们，派一个哥萨克到村里求援。

太阳渐渐升上来。出了村子三俄里，四外就是开阔的草原，这里除了单调的、荒凉的、干燥的平原，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沙土的平原上，到处是牲口的脚印，有些地方生长着枯黄的草，洼地里生长着低矮的芦苇，有几条勉强看得出的小路，遥远遥远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诺盖人的游牧帐篷。令人惊讶的是，这里看不

见一点阴影，有一种严峻的情调。日出和日落，总是照得草原通红。一刮大风，整座沙山都能移走。无风的时候，就象这天早晨，寂静得简直令人吃惊，无论动作或声音都破坏不了这种寂静。这天早晨草原悄然无声，虽然太阳已经升起，可是阴沉沉的；这里仿佛特别荒凉，温和。空气纹丝不动，只听见马蹄声和马喷鼻声；连这个声音也是微弱的，即刻就消失了。

哥萨克多半时候都是默默地骑着马。他们的武器总是佩带得不发出声响。把武器碰得叮叮当当，对于哥萨克是最大的耻辱。村里又来了两个哥萨克在路上赶上他们，彼此交谈了两三句话。卢卡什卡骑的那匹马不知是颠蹶还是被草绊了一下，它惊跳起来。这在哥萨克是不好的预兆。哥萨克们回头看了看，赶快转过脸去，极力不去注意这件在此刻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情。卢卡什卡拉了拉缰绳，严厉地皱着眉头，咬紧牙关，在头上挥了一下鞭子。这匹卡巴尔达骏马忽然踏着细碎步子，仿佛不知用哪只蹄子迈步，又好象要展翅腾空飞起似的；可是卢卡什卡用鞭子抽了一下它那肥壮的肋部，又抽一下，抽第三下——这匹卡巴尔达马呲着牙，松开尾巴，打着喷嚏，用后腿一蹬，就窜到其余的哥萨克前面好几步远。

“好一匹坐骑！”少尉说。

他不说马，而说坐骑，是表示他对这匹马特别的赞扬。

“赛蛟龙，”一位年长的哥萨克表示赞同。

哥萨克们默默地骑着马有时慢行，有时小跑，只有这种情况才打破一会儿沉寂和他们的行动的严肃的气氛。

在草原走了八俄里光景，他们只遇见一辆诺盖人的支着帐篷的大车，大车在离他们一俄里的地方缓缓地行走。这是诺盖人带着家眷从一个游牧区向另一个游牧区迁移。他们在一处洼

地上还遇见两个衣衫褴褛的高颧骨的诺盖妇人，她们在草原上拾牲口遗下的粪作燃料。少尉向她们探问什么事情，她们不懂他那说得不好的库梅克话，面面相觑，显出胆怯的样子。

卢卡什卡走到跟前，勒住马，口齿伶俐地向她们问好，诺盖妇人显然高兴起来，就象跟自己的弟兄一样随便地跟他谈起来。

“哎依，哎依，抗 阿布列克！”她们指着哥萨克要去的方向诉怨似的说。奥列宁懂得他们是说：“有很多的阿布列克。”

奥列宁从来没有见过这类事情，仅仅从叶罗什卡大叔的讲述中得到一点有关的概念。奥列宁打算紧跟着哥萨克，好看见全部的经过。他欣赏哥萨克，仔细看和细心听一切，并且把自己的观察记在心里。虽然他也带着马刀和实弹的枪，但是看到哥萨克疏远他，他决定不参加战斗，特别是他认为他在连队里已经显示了他的勇敢，主要的，还因为他现在感到非常幸福。

忽然从远方传来一声枪响。

少尉激动起来，开始命令哥萨克散开和从哪个方向逼近敌人。但是哥萨克对他的命令显然一点不去注意，只听卢卡什卡的，也只看着卢卡什卡。卢卡的脸和身姿表现着镇静和庄严。他策马驰骋了一阵，把其他慢行的马撇到后面；眯缝着眼向前瞭望。

“来了一个骑马的，”他勒住马，和别的马并排时说。

奥列宁极目望去，什么也没看见。哥萨克们很快就认出两个骑马的人，于是从容不迫地直向他们驰去。

“这是阿布列克吗？”奥列宁问道。

哥萨克们没有回答这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的问题。如果阿布列克这样骑着马斜刺里冲来，那未免太傻了。

“好象是罗吉卡老叔向我们招手，”卢卡什卡指着两个已经

看得清楚的骑马的人说道。“他向我们这边来了。”

果然不错，几分钟后就清楚地看出，骑马的人是巡逻的哥萨克，班长向卢卡驰来。

四十一

“还有多远？”卢卡什卡只问了这一句。

正当这时，三十步开外的地方响起了短促而脆裂的枪声。班长脸上挂着一丝笑意。

“这是我们的古尔卡朝他们放枪，”他朝着枪响的方向摆了摆头说道。

他们骑马走了几步，就看见坐在沙丘后面给枪装火药的古尔卡。为了解闷，古尔卡和伏在另一个沙丘后面的阿布列克互相射击。子弹从那里呼啸而过。少尉脸色苍白，手忙脚乱。卢卡什卡下了马，把马交给一个哥萨克，就向古尔卡走去。奥列宁也照样做了，弯着腰在他后面跟着。他们刚走到刚才射击的哥萨克身边，就有两颗子弹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卢卡什卡笑着看了看奥列宁，也稍微弯下身子。

“他们会打死你的，安德烈耶维奇，”他说。“你最好躲到一边。这儿没有你做的事。”

但是奥列宁一定要看看阿布列克。

离沙丘二百来步的地方，他看见了帽子和枪。从那里忽然冒起一股烟，又有一颗子弹呼啸而过。阿布列克躲在沙丘脚下的沼泽里。奥列宁对他们占据的地势感到惊奇。那地方本来同草原其他地方一样，可是因为阿布列克占据那里，忽然就显得跟其他地方不同，仿佛别具一番意味似的。他甚至觉得，正是那个

地方是阿布列克应当占据的。卢卡什卡回头向他的马走去，奥列宁跟在他的后面。

“要找一辆装干草的大车，”卢卡说，“不然会被他们打死的。那边沙丘后面，有一辆诺盖人的干草车。”

少尉听从他的话，班长也同意。干草车推来了，于是哥萨克们躲在车后，把干草堆得离自己近点。奥列宁骑马跑到可以看清楚一切的沙丘上。干草车移动了；哥萨克都挤在车后面。哥萨克移动着；车臣人一共九个，膝盖并着膝盖坐成一排，也不射击。

周围寂静无声。忽然从车臣人那边响起了奇怪的歌声，好似叶罗什卡大叔唱的“哀一达一拉一拉依”的凄凉的曲调。车臣人知道他们已经逃不脱了，为了不致受逃跑的引诱，他们用皮带把膝盖并在一起捆起来，把枪准备好，唱着临死前的挽歌。

哥萨克推着车子越来越近，奥列宁时刻都在等待着射击；但是只有凄厉的歌声冲破寂静。歌声忽然停止了，响起了猝然的枪声，子弹碰击着车边的横梁，可以听见车臣人的骂声和尖叫声。枪声接连地响起来，子弹一颗颗的碰到车上。哥萨克不放枪，已经走到五步以内的地方了。

又过了一瞬间，哥萨克尖叫着从车两边跳将出来。卢卡什卡在最前面。奥列宁只听见几声枪响和喊叫声以及呻吟声。他仿佛看见了烟和血。他扔开马，忘掉一切地向哥萨克们跑去。恐怖遮住了他的眼睛。他什么也分辨不清，只知道一切都完了。卢卡什卡脸色苍白得象块白布，抓住受伤的车臣人的两手喊道：“不要打死他！我要捉活的！”这个车臣人就是那个去取尸体的红胡子，他是被打死的车臣人的兄弟。卢卡什卡扭转他的双手。车臣人忽然挣脱开，用手枪对着卢卡什卡放了一枪。卢卡什卡

应声倒下。他的腹部涌出鲜血。他纵身站起来，又倒下了，嘴里用俄语和鞑靼话咒骂着。他身上和身底下的血越来越多。哥萨克们走到他跟前动手给他解腰带。其中纳扎尔卡在要动手的时候，半天没有把马刀插进刀鞘里，因为马刀上反了。刀刃上全是血。

短胡子、火红色的车臣人，有的被打死，有的打得浑身是伤，横七竖八地躺着。只有一个大家所认识的，就是朝卢卡什卡开枪的那个，虽然遍体鳞伤，但是还活着。他象一只被打伤的鹞鹰，浑身是血（从右眼流着血），咬紧牙关，脸色苍白而且阴沉，愤怒的大眼睛向四下张望，蹲在那里，手握着短剑还准备自卫。少尉走到他跟前，仿佛要绕过他似的，从他身旁用手枪对着他的耳朵迅速地放了一枪。车臣人想冲过去，但是没等冲上去就倒下了。

哥萨克们喘吁吁地把尸体拖开，解下他们身上的武器。这些红胡子车臣人每一个都曾经是人，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有的表情。人们把卢卡什卡抬到大车上。他老是用俄语和鞑靼话骂个不休。

“扯淡，我掐死你！你逃不出我的手！阿那 塞尼！”他断断续续地喊道。不一会儿工夫，他就没有力气说话了。

奥列宁回到家里。晚上他听说卢卡什卡快要断气了，又听说从河对岸来了一个鞑靼人，正用草药给他医治。

那些尸体运到村公所前面。女人们和孩子们都围上去观看。

奥列宁回来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他很久不能从所见的一切中醒悟过来；但是在入夜的时候，昨晚的回忆又涌上心头；他向窗外望了望：玛丽亚娜从房里走到贮藏室料理家务。她母亲到

葡萄园去了，父亲在村公所里。奥列宁等不及她完全收拾好，就向她走过去。她背过脸去在屋里站着。奥列宁以为她是害羞。

“玛丽亚娜！”他说，“我说玛丽亚娜！可以进来吗？”

她忽然转过身来，眼睛里微微含着泪花。脸上蒙着一层美丽的忧伤。她默默地、庄严地望着。

奥列宁又说：

“玛丽亚娜！我来……”

“不要这样，”她说。她的脸色没有变，但是眼泪流了出来。

“哭什么？你怎么啦？”

“怎么啦？”她用粗暴生硬的声音重复了一句。“哥萨克给人打死了，就为了这个。”

“是卢卡什卡吗？”奥列宁说。

“走开，你要干什么！”

“玛丽亚娜！”奥列宁说着就向她走去。

“你永远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

“玛丽亚娜，不要说这话吧，”奥列宁恳求她。

“走开，讨厌的东西！”姑娘大喊一声，一跺脚，威吓地向他走过去。她脸上显露着如此的厌恶、蔑视和愤恨，奥列宁忽然明白他是毫无希望的，他先前关于这个姑娘是难以接近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

奥列宁再没有对她说什么，就从屋里跑了出去。

四十二

他回到屋里，在床上动也不动地躺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去找

连长，请准了调到团部，他和任何人都没有告别，叫瓦纽沙跟房东算清房钱，就准备到团部驻扎的要塞去了。只有叶罗什卡大叔一个人送他。他们俩干了一杯，又干一杯，又干一杯。就象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一样，一辆三套马的驿车停在门口。但是奥列宁已经不象当时那样对自己抱有希望，也不对自己说，在这里所想所做的一切都不对头。他已经不再给自己设想什么新的生活。他比先前更爱玛丽亚娜，而且现在知道，她永远不会爱他。

“我的老弟，再见啦，”叶罗什卡大叔说。“出征的时候，要学聪明点，要听我老头子的话。当你袭击或者干什么的时候（我是一只老狼，啥都见过），遭到射击，你千万不要向人堆里跑，不要哪儿人多就往哪儿跑。你们弟兄一害怕，总是向人堆里挤：以为在人堆里快乐点。岂不知这最糟：人们总是朝人多的地方射击。我从来都是远远地离开人堆，单独一个人：所以我一次伤也没受过。我这一辈子什么没见过？”

“你背上不是有一颗子弹，”正在收拾房子的瓦纽沙说。

“这是哥萨克闹着玩的，”叶罗什卡回答。

“哥萨克怎样闹着玩？”奥列宁问道。

“还不是那回事！我们喝酒来着。有一个叫万卡·西特金的哥萨克，兴头上来了，噼哧一下，他用手枪对着我这里就来一家伙。”

“怎么样，痛吗？”奥列宁问道。“瓦纽沙，快收拾好了吗？”他又加添一句。

“咳！忙什么！听我讲下去……他噼哧给我一家伙，没有打伤骨头，子弹就留在这里了。我对他说：老弟，你把我打死了。是吧？你对我做了什么事啊？我跟你不能这样就算拉倒。你得给

我一维德罗酒。”

“怎么样，痛吗？”奥列宁又问，几乎没有听见老汉讲的故事。

“让我讲完。他出了一个维德罗。我们全喝光了。血还是流。满屋子流的都是血。布尔拉克爷爷说：‘看样子小伙子要完蛋。再来一大瓶甜的，不然我们要叫你吃官司。’又拿来一些酒。我们喝了又喝……”

“怎么样，你究竟痛不痛？”奥列宁又问。

“什么痛不痛！不要打断我的话，我不高兴这样。让我说完。喝啊，喝啊，一直玩到早上，喝醉了，就在灶炕上睡着了。上午醒来，身子怎么也伸不直。”

“痛得厉害吗？”奥列宁重复着问，以为这一次可要得到回答了。

“我又没对你说痛得慌。不痛，就是直不了身子，也不能走路。”

“后来就长好了？”奥列宁说，甚至连笑也不笑，因为他的心头感到沉重。

“长好了，就是子弹永远留在这儿。你摸摸看。”他卷起衬衫，露出他那健壮的背脊，在靠近肩胛骨的地方滚动着一枚子弹。

“你瞧，就这样滚来滚去的。”他说，显然他把这颗子弹当作小玩意儿。“可以滚到背后面。”

“你看卢卡什卡能活吗？”奥列宁问道。

“上帝才知道！这儿没有大夫。他们去请去了。”

“到哪儿去请，到格罗兹尼吗？”奥列宁问道。

“不是，老弟，要是我是沙皇，我早就把你们俄罗斯大夫全都绞死。他们光知道开刀。我们有个哥萨克巴克拉舍夫就被他们

弄得不成人样子，锯掉一条腿。全是些混蛋。现在巴克拉舍夫还中什么用？老弟，在山里有真正的大夫。我有个好朋友吉尔奇克，出征时在这儿，在胸口受了伤，你们的大夫拒绝医治，可是从山里来了一个赛义卜，他给治好了。老弟，他们懂得草药。”

“得了，别胡扯了，”奥列宁说。“我最好是从团部里派一个医官来。”

“胡说！”老汉有意逗他。“傻瓜，傻瓜！胡说！派医官来！如果你们的医官能把人治好，哥萨克和车臣人都找你们医治了，可是你们的军官和团长反倒从山里请大夫。你们那儿全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

奥列宁不再回答。他非常同意老汉的话，他所生活过的和他现在要回去的那个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假的。

“卢卡什卡怎么样？你去看过他吗？”他问。

“象个死人似的躺在那儿。不吃也不喝，光喝伏特加。能喝伏特加就不要紧。真要是有个好歹，我真可怜这个小伙子。是个好样的，跟我一样，是一个骑手。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快要断气；老太太们已经号啕大哭，哭得哗哗的。我的脑袋滚烫。人们把我移到圣像下面。我仿佛觉得，在我上面的灶炕上，都是这么大的小鼓手，全都是，他们拚命地擂鼓。我向他们大喝一声，他们反倒擂得更厉害了（老汉笑了）。女人们把唱圣诗的请来了，他们想葬掉我；他们说：他在世间太不守教规了，他找女人寻乐，残害生灵，破坏斋戒，弹三弦琴。忏悔吧，他们说。于是我就忏悔了。我说，我有罪。不管神父说什么，我总是说：我有罪。他问起三弦琴来。对于这我也说我有罪。他说：‘你那件该死的东西放在哪儿？你交出来，把它打碎。’我说我没有这个玩意儿。其实我把它藏在厨房里的鱼网里；我知道他们找不到。他们

就这样撇下了我。我也就好了。好了就去弹我的三弦琴……我刚才说什么来的，”他继续说下去，“你得听我的话，你要离人堆远一点，不然就会糊里糊涂地被人打死。我可怜你，真的。你是个酒鬼，我喜欢你。你们弟兄总爱骑马上土岗。从前我们这儿有一个俄罗斯人，他老是骑着马往土岗上爬，他给土岗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丘陵。一看见土岗就爬上去。有一次又往上爬，爬到顶上，很高兴。车臣人给他一枪，就打死了。咳，车臣人在枪架子上射击可准啦！比我都打得准。我不喜欢这样糊里糊涂被人打死。有时我看一看你们当兵的，我就觉得奇怪。真是愚蠢啊！可怜的人们，总是挤成堆儿，并且领子是红的。那怎么不被打中呢？打倒一个，人们把可怜的家伙拖开，再上去一个。真是蠢得可以！”他摇着头重复说。“要向旁边散开，而且要单调单的。以后你就照这样办。他们不会向你瞄准的。你一定这样做。”

“好，谢谢！再见，大叔！上帝保佑，我们还会见面的，”奥列宁说，他站起来往雪橇走去。

老汉坐在地板上，没有站起来。

“就这样就分手了吗？傻瓜！傻瓜！”他说。“咳，如今人都成了什么了！咱们在一起作伴，整整作了一年的伴：说声再见就走了。要知道我爱你，我非常可怜你！你的命好苦，总是孤单单的，孤单单的。没人疼也没人爱！有时候我睡不着，心里老想你，可怜你。就象歌里唱的：

背井离乡远走他方，

亲爱的弟兄，日子难过啊！

你就是这样。”

“好，再见了，”奥列宁又说。

老汉站起来，把手递给他；他握了握手，就准备走。

“把脸蛋凑过来，脸蛋。”

老汉用两只厚厚实实的手夹着他的头，用湿漉漉的胡子和嘴唇亲吻了三次，接着哭了起来。

“我爱你，再见！”

奥列宁坐到车上。

“怎么，就这样走了吗？送点东西做纪念也好啊，老弟。送一支枪吧。你要两支有啥用，”老汉说，他真心诚意地抽抽搭搭地哭着。

奥列宁拿出一支枪递给他。

“什么都给了这个老家伙！”瓦纽沙咕咕噜噜地说。“老没有个够！老乞丐。不懂道理的人，”他说着就裹紧了大衣，坐到前座上。

“住嘴，猪猡！”老汉笑着嚷了一声。“看你这个吝啬鬼！”

玛丽亚娜从贮藏室走出来，冷漠地望了望三套马车，鞠了个躬，就到屋里去了。

“拉非利^①！”瓦纽沙挤了挤眼，傻笑着说。

“走了！”奥列宁气愤地喊了一声。

“别了，老弟！别了！永远记住你！”叶罗什卡喊道。

奥列宁回头望了一眼。叶罗什卡大叔和玛丽亚娜在谈话，好象是谈自己的事，不论是老头或者姑娘都没有看他。

（1863年）

刘辽逸译

① 法语：姑娘。

波利库什卡

—

“太太，就凭您吩咐了！不过杜特洛夫家也怪可怜的。他们家个个都是好样的；要是有一个家奴也不派，那他们就非得有个人去不可了，”管家说，“本来现在大家就指着要他们去。不过，就看您的意思了。”

于是他把右手倒换过来搭在左手上，两手放在肚子前面，把脑袋侧向另一边，两片薄嘴唇往里一吸，差点儿噁出声来，眼睛翻了翻，就不言语了。显然他是想保持长久的沉默，不表示异议地静听女主人一定要对他说的关于这事的种种废话。

这是一个家奴出身的管家，脸刮得光光的，穿着一件长长的常礼服（一种特制的管家式样），在这个秋天的晚上，站在他女主人面前回话。照女主人的理解，这类回禀就在于听取有关过去的事务总结，并对未来的事务作出指示。照管家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理解，这类回话不过是一种仪式罢了：他要站在背晃里，面对着沙发，两脚向外分开，端端正正地站着，听取各式各样的与正事无关的废话，并且要想方设法使女主人听了他的一切建议立刻不耐烦地说声：“好吧，好吧。”

现在正在谈征兵的事。波克罗夫斯科耶应当出三名壮丁。有两名由于家庭、道德品质和经济情况都符合，毫无疑问，已经

由命运本身选定了。关于他们，无论从村社方面，无论从女主人方面、无论从公众舆论方面，都不会有犹疑和争论。可是对于第三名却有不同意见。管家想庇护杜特洛夫家的三兄弟，而把已经成家的家奴波利库什卡派去，这个家奴的名声很坏，他曾因偷窃麻袋、缰绳和干草被人逮住过不止一次；可是太太却一直很疼爱波利库什卡的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想用《福音书》上的教诲来改正他的道德品质，所以她不愿意把他送去当兵。同时，她又不愿意加害于她不认识的、从来也没见过面的杜特洛夫一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怎么也想不明白，管家又不敢对她明说：如果波利库什卡不去，那么杜特洛夫家就非去一个人不可。“可我不愿意杜特洛夫家遭到不幸，”她带着感情说。“如果您不愿意，那您就出三百卢布买个新兵得了，”——管家本想这样来回禀她。可是策略不允许他这样做。

于是，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安安稳稳地站好了，甚至悄悄地把背靠在门框上，可是脸上却保持着毕恭毕敬的神态，他开始看女主人的嘴唇怎样动，看她帽子上的荷叶边，以及荷叶边映在墙上一幅画儿下面的影子在怎样跳动。他认为大可不必去注意她说话的意思。女主人的话又多又长。他想打呵欠，因而感到耳朵后面直发麻；可是他却巧妙地把这种发麻变成了咳嗽，用手捂着嘴，假咳了两声。我不久以前就曾看见帕默斯顿^①勋爵用帽子遮着脸坐着，那时反对党的一个成员正在猛烈地抨击内阁，后来，这位勋爵猛地站起来，发表了三个钟头的演说，以回击对方的所有论点；我看到这种情景，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曾经

① 帕默斯顿(1784—1865)，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作者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底去英国时曾参加一次下议院的会议，听到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给海军增加拨款的演讲。

上千次地在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女主人之间看见过类似的情形。他是怕自己睡着了呢，还是他觉得女主人的谈话令人神往呢，总之，他把自己身体的重量从左脚移到了右脚，然后，象惯常那样，开始了漂亮动听的开场白：

“就看您的意思了，太太，不过……不过这会儿正在我的帐房前面开会，所以非得有个结果不可。命令上说，圣母节^①前必须把新兵送进城去。在农民里面，大家都指着非要杜特洛夫家出人不可。村社并不关心您的利益，我们把杜特洛夫家毁了，他们才不在乎呢。我可知道这一家子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从我管事的那天起，他们就一直过着穷日子。老头好不容易才等到最小的侄儿长大，现在又要把他们毁了。我呢，您老人家是知道的，我关心您的财产就跟关心自己的一样。照您的主意去办，太太，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和他们非亲非故，我也没有拿过他们一文钱……”

“我也没有这样想呀，叶戈尔，”太太打断了他的话，可是她马上想到他准受了杜特洛夫家的好处。

“……不过，全波克罗夫斯科耶就数他们家最好。都是一些敬畏上帝的勤劳的庄稼汉。老头当教堂的管事当了三十年；他既不喝酒，也不爱用脏话骂人，还经常上教堂。（管家知道用什么方法讨好女主人。）最重要的，我要禀告您老人家的是他只有两个儿子，其余的是侄子。村社指名要他出人，其实他应该抽两次签。另外还有些有三个儿子的人，冒冒失失地分了家，可是现在他们倒做对了，而那些老实本分的人却要遭罪。”

听到这里，太太简直什么也不明白了——她不明白这儿所

^① 圣母节在俄历十月一日。

说的“抽两次签”和“老实本分”是什么意思；她听见的只是管家说话的声音。她端详着他那常礼服上的黄色土布钮扣：上面的那一颗，大概他不常扣，钉得还很结实，可是中间那一颗却完全松动了，耷拉着，早就应该钉一钉了。不过大家都知道：谈话，尤其是在谈事务时，根本用不着了解别人对你说什么，只要记住你自己想说什么就成了。太太就是这样做的。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你怎么会不明白呢，”她说，“我丝毫无意让杜特洛夫家的人去当兵。我觉得你多少是知道我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我的农民们不让他们遭到不幸。你知道，为了避免这种叫人难受的迫不得已的事，我情愿牺牲我的一切，既不让杜特洛夫家去人，也不让霍留什金^①去。（我不知道管家是否会想到，为了避免这种叫人难受的迫不得已的事，用不着牺牲一切，只要三百卢布就够了；不过，这种想法是很容易在他脑子里出现的。）不过有一点我得告诉你：我无论如何也不让波利凯去。偷钟的事发生以后，他亲口对我认错，他哭着发誓说，他一定痛改前非，我跟他谈了很久，我看出他是受了感动，而且是真心悔过。（“嘿，她又唠叨开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想道，于是他开始端详放在她那杯水里的果子酱：是桔子的呢，还是柠檬的？“大概有点苦，”他想道。）从那时候起已经有七个月了，他一次也没喝醉过，而且表现很好。他老婆告诉我，他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他既然已经改过自新了，你怎么倒要我現在去惩罚他呢？他有五个孩子，全家靠他一个人养活，把他送去当兵，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不，这事你最好别说了，叶戈尔……”

^① 即波利库什卡。他的全名是波利凯·伊利奇·霍留什金。

太太说罢，端起杯子来呷了一口。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注视着水经过她的喉咙流了下去，然后便简短生涩地反驳道：

“那么您是决定让杜特洛夫家的人去了？”

太太把两手一拍。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呢？难道我希望杜特洛夫家遭殃吗？难道我跟他们有什么事过不去吗？上帝给我作证，为了他们，我情愿尽一切力量。（她看了一眼屋角上的那幅画，可是她想起了那并不是圣像：“反正一样，问题不在这儿，”她想道。然而奇怪的是，她竟没有往三百卢布上想。）可是我有什么法子呢？难道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种事我可没法知道。好吧，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你知道我的心意。你要依法办事，还得让大家都满意。有什么法子呢？不光是他们，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过决不能把波利凯送去。你要明白，在我说来，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她还要接着往下说，——她太激动了；但这时有一个使女走进了房间。

“杜尼亚莎，你有什么事？”

“有一个庄稼人来问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要不要等他去开会？”杜尼亚莎说着忿忿地看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眼。（“瞧这个管家！”她想，“他又把太太弄得心神不宁了；今儿个不到一点多钟她又不会让我睡觉了……”）

“那你去吧，叶戈尔，”太太说，“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是，太太。（他已经只字不提杜特洛夫的事了。）那么派谁到花匠那儿去取钱呢？”

“难道彼得鲁沙还没从城里回来吗？”

“没有，太太。”

“那么尼古拉不能去吗？”

“我爹腰疼，躺着哪，”杜尼亚莎说。

“明天我自己去好吗？”管家问道。

“不，叶戈尔，你这儿还有事。（太太沉吟了片刻。）取多少钱？”

“四百六十二卢布，太太。”

“派波利凯去吧，”太太说时用果断的目光向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脸上瞥了一眼。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张开牙齿，好象微笑似地咧了咧嘴，脸上依旧不动声色。

“是，太太。”

“叫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是，太太，”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罢便回帐房去了。

二

波利凯是个微不足道的、名声狼藉的人，而且又是从别的村子里迁来的，他没有靠山，无论是女管家也好，侍候开饭的也好，男管家也好，女仆也好，他都靠不上；他住的小屋是最糟糕的，虽然他和老婆孩子共有七口人之多。这些小屋还是老爷生前盖的：在一个十俄尺见方的石头房子的正中间，有座俄国式的火炕，四周是走廊（家奴们都这样称呼），而在每个屋犄角上用木板隔出一间小屋，所以地方都不大，尤其是波利凯的那间紧挨着门的小屋。一张结婚时用的床，床上放着绗过的棉被和印花布枕头；摇篮里睡着一个娃娃；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用来

做饭、洗刷、放置各种家用什物，而且波利凯自己（他是个马医）也在那上面干活；几只小木桶，几件衣服，几只母鸡，一头牛犊以及大小七口人，把这整个小屋塞得满满的，假如他们没有四分之一公用的火炕，在那上面放东西和睡人，假如他们不能到台阶上去，那他们简直就转不开身了。这似乎是办不到的：十月里天气很冷，全家七口人只有一件羊皮袄御寒；不过，孩子们可以用奔跑来取暖，大人可以干活，而且他们都可以爬到温度高达四十度的火炕上去。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是很可怕的，可是他们倒不在乎：日子总还过得下去。阿库林娜给孩子们和丈夫缝缝洗洗，纺纱织布，漂白自己织的粗麻布，在公用的火坑上做饭，跟邻居们吵嘴、说长道短。每月的口粮不但够孩子们吃，而且还能喂头奶牛。劈柴随便拿，给牲口的饲料也是如此。有时候还可以从马厩里弄到点干草。他们有一小块菜园子。母牛还下了头牛犊；他们还养了些母鸡。波利凯在马厩里干活，照管两匹种马；给马和别的牲口放血，清理马蹄，消除马口盖肿，敷上他自己发明的药膏，因此得到点儿钱和食品。主人家的燕麦也可以留点儿下来。村里有个农民按月拿二十俄磅羊肉来换两俄斗^①燕麦。如果没有精神上的痛苦，日子还是可以过得去的。可是这一家子有件极其不幸的事。波利凯打年轻时候起曾在另一个村子的养马场里干活。碰巧他遇见的那个马夫，是附近一带最大的贼：这人遭到了流放。波利凯最初就是在这个马夫手下当学徒，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习惯于小偷小摸，以至于到了后来想洗手不干，也戒不掉了。他是个意志薄弱的年轻人；没有爹妈，也没人去开导他。波利凯喜欢喝酒，可是他不喜欢东西

① 1 俄斗约合 16.38 公斤。

放得不是地方。无论是皮环，无论是辕枕，无论是锁，无论是轮轴，或者是更值钱的东西，——在波利凯·伊利奇那儿都能找到放的地方。到处都有人接受这些东西，讲好以后就用钱买或者用酒来换。这种钱最容易挣，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既不要学艺，也不用费力气，什么都不要，而且只要你试过一次，别的活儿就不想干了。不过挣这钱也有一点不好：虽然什么东西都来得容易，不费劲，日子也过得满自在，可是万一碰上了厉害人，这买卖就不灵了，甚至得一下子把什么都赔出去，生活也不那么自在了。

波利凯的情形就是这样。后来波利凯娶了亲，上帝赐给了他幸福：他的老婆，一个喂牲口人的女儿，碰巧是个健康、聪明而又勤劳的娘儿们；给他生了好几个孩子，而且一个比一个好。可是波利凯却始终没有放弃那行当，而且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忽然间有一次他倒了霉，叫人逮住了。而且是为了一件小事儿叫人给逮住的：他把一个农民的几条皮缰绳给藏了起来。人家发现了，揍了他一顿，并且报告了女主人，从此就对他留了神。他接连叫人家逮住了两三次。人们开始责骂他，管家威胁他，要送他去当兵，女主人申斥他，他老婆也痛哭流涕，非常伤心；于是一切事情都翻了个过儿。他本是个好人，并不坏，只是意志薄弱，爱喝酒，深深地染上了这种坏习惯，怎么也戒不掉。通常，他喝醉了酒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妻子就骂他，甚至打他，他便哭着说：“我是个不幸的人，我怎么办呢？我戒酒，不喝了，要不就让我的眼睛瞎掉。”可是过了一个月，他又出去喝酒了，甚至两三天都见不着他。“他准是在哪儿弄到了钱，又去大吃大喝了，”人们都这么议论他。他最近的一件事是偷了帐房的一座挂钟。帐房里有座旧挂钟，早就不走了。有一次他独自走进门开着的帐房，看上了这座钟，就把它拿进城去卖了。真是无巧不成

书，买他钟的那个小铺老板碰巧是一个女仆的亲家，他到村子里来过节，提起了这座钟的事，大家便正经八百地追问起来。尤其是那位管家不喜欢波利凯。后来终于找到了，禀报了女主人。女主人就把波利凯叫了去。他立刻跪在她的脚下，象他妻子教给他的那样，真切感人地招认了一切。这一切他做得非常好。女主人开始规劝他，痛心地说又说，数落了又数落，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为人的品德，谈到了将来的生活，又谈到了他的老婆孩子，终于把他说得流下了眼泪。女主人说：

“我可以原谅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从今以后永远不干这种事。”

“这辈子我不干了！不然就叫我下地狱，不得好死！”波利凯一边说，一边令人感动地哭着。

波利凯回到家后，躺在炕上，象头牛犊似的在家里嚎了一整天。从那时候起，一次也没发现波利凯出过什么事儿。只是他的日子过得不愉快了；人们把他看作小偷，而且，一到征兵的时候，大家就指着要他去。

前面已经说过，波利凯是个马医。他是怎样突然成为马医的呢，这事谁也说不清，他自己更是莫名其妙。在养马场，当他给那个被流放的马夫当下手时，他除了打扫马棚里的马粪，有时候刷刷马和运运水以外，再没有干过别的活儿。在那儿他不可能学会给马治病。后来他当了织布工；以后又在一个花园里干活，清扫花径；后来又被罚去砸砖头；以后为了偿付代役租，又雇给一个商人扫院子。可见，这里他也没有实践的机会。然而，在他最后一次待在家里的时候，不知怎么他那不平常的、甚至有点神奇的医马术的名声便开始逐渐传播开了。他给马放一两次血，然后把它放倒，从它的大腿上剔出一点什么东西来，然后让

人把马捆在马架子上，接着就切开它的蹄叉，直到流血为止，不管马怎么挣扎，甚至尖声嘶叫，他却说这就是“放蹄下血”。然后，他对庄稼人说明，“为了让马更松快起见”，必须从两处血管里放血，接着他就用木槌往里敲那把钝柳叶刀；然后，他在马肚子下面拿一块从他老婆的头巾上扯下来的布边给那个管院子的人的马绑扎上。最后他把矾洒在所有的伤口上，从玻璃瓶里倒出点药水洒在伤口上，有时候他还灵机一动给马吃点什么药。总之，他越使马痛苦，弄死的马越多，人们就越相信他，牵来找他治病的马也就越多。

我觉得，我们这些老爷先生们嘲笑波利凯，是不十分恰当的。他为了博得信任而使用的方法，就象过去影响我们的父辈、现在影响我们、将来影响我们的孩子的方法是一样的。一个庄稼人把肚子紧贴在他那匹仅有的母马头上（这匹母马不仅是他的财产，而且差不多是他家庭里的一员），怀着信仰和恐惧瞧着波利凯的俨乎其然的、紧皱双眉的脸和他那卷起袖子的细胳膊，这时波利凯故意按着那马的痛处，勇敢地给它那活生生的躯体开刀，一面心里暗自想道：“也许鬼使神差就好了呢”，他还用牙咬着一块包治百病的破布或是一个装着矾的小玻璃瓶，装模作样地做出一副他知道哪儿是血，哪儿是脓，哪儿是腱，哪儿有毛病的样子——那个庄稼人不可能想象，波利凯会什么也不懂就动手开刀。他自己是象不出来的。可是一经很快地开了刀，他就决不会因为让他平白无故地开刀而责备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就经历过同样的情形：一个医生，应我的请求，让几个我心爱的人遭受了痛苦。那柳叶刀、装着升汞的神秘的乳白色瓶子，以及马晕症、痔疮、放血、排脓之类的话，难道不是和神经、风湿病、机体之类的话一样的吗？Wage du zu

irren und zu täuschen! ①——这与其说是指诗人，还不如说是指医生和马医。

三

就在那天晚上，为了选派新兵，人们在十月之夜的寒冷的黑暗中，聚集在帐房前乱哄哄地开会的时候，波利凯正坐在桌旁的床沿上，用一只瓶子在桌上碾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给马治病的药。这里面有升汞、硫磺、芒硝和波利凯采来的一种草药，——他有一次忽然灵机一动，想到用这种草药来治马的气肿病一定非常有效，并且认为也不妨用来治其他的病。孩子们已经躺下了：两个在炕上，两个在床上，一个在阿库林娜坐在旁边纺线的摇篮里。插在木烛台上的蜡烛头（这是女主人家没有放好的、点剩下的蜡烛）放在窗台上；为了不打断丈夫的重要工作，阿库林娜还时时站起来用手指弹掉烛花。有些自由思想者认为波利凯是个毫不足道的马医和毫不足道的人。其他大多数人则认为他为人虽不好，但却是一个医道高明的行家。阿库林娜呢，她虽然常常骂自己的丈夫，甚至打他，却认为他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马医和首屈一指的人物。波利凯把一种什么药倒在手心上。（他是不用天平的，甚至还讥讽地评论使用天平的德国人说：“这又不是药铺！”）波利凯掂了掂手上的药，估了估分量；但他觉得太少，便又倒出了十倍的药。“我都搁上，劲儿就更大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阿库林娜一听见当家的声音，连忙回过头来，听候吩咐；可是她看到这事与她无关，便耸了耸肩膀心里想道：“瞧，他还真行！他打哪儿学来的呢？”接着她又纺

① 德语：敢于误解和敢于梦想。引自席勒的诗《台克拉》（一个幽灵的声音）。

起线来。刚才倒出药来的那纸片掉到了桌子底下。阿库林娜没有忽略过这件事。

“安纽特卡，”她喊道，“瞧，你爹掉了东西，捡起来。”

安纽特卡把两只瘦小的光脚从盖在她身上的大褂下面伸出来，象小猫似的钻到桌子底下，捡起了纸。

“给，爹，”她说完又把那两只冻坏了的小脚一下伸进了被窝。

“挤我干斯么^①，”她妹妹咬字不清、睡意朦胧地尖声喊道。

“我打死你们！”阿库林娜说道；于是两个脑袋就钻到大褂下面不见了。

“他给我三个卢布，”波利凯在塞瓶口时说道，“我就把马治好。这还便宜了他，”他又加了一句。“费点脑筋，试试吧！阿库林娜，去问尼基塔借点烟叶来。我明儿个还他。”

波利凯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根菩提木做的小烟袋，烟杆上的漆已经剥落，顶上涂了一块火漆做烟嘴，接着他开始收拾烟锅。

阿库林娜搁下了纺锤，没有被什么绊着就走了出去，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波利凯打开小柜子，放好了药瓶，把一只空酒瓶对着嘴倒了倒；但是瓶里没有酒。他皱了皱眉头，可是，他老婆拿来了烟叶，他就装好烟锅坐在床上抽了起来，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个人做完了自己一天的工作时那种得意和骄傲的神态。他是在想明天怎样揪住马的舌头，往马嘴里去灌那灵丹妙药呢，还是在思索一个有用处的人决不会遭到任何人的拒绝，因而尼基塔居然把烟叶给送了来呢？总之，他心情很好。忽然，那扇只有一个合页连着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上房的使女走进了他们的

^① 孩子咬字不清，把“什么”说成“斯么”。

小屋，这不是那个二等使女，而是那个三等的粗使丫头。大家都知道，所谓上房就是主人家的宅子，虽然它坐落在下面。阿克休特卡——这个丫头的名字——老是象颗子弹似的飞来飞去，她飞的时候，胳膊并不弯曲，而是按照她行走的速度象钟摆似的左右摇摆，但不是在两旁摆，而是在身前摆；她的腮帮子永远比她的粉红色衣服还红；她的舌头动起来也象她的两条腿那样，一向很快。她飞进了屋子，不知干什么抓住了炕沿，身子就开始摆动起来，她好象打定主意一口气就说两三个字，决不多说，她蓦地对着阿库林娜气喘吁吁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太太叫波利凯·伊利奇马上就到上房去，叫……（她停了停，喘了口粗气）。叶戈尔·米哈雷奇到太太那儿去过，他们谈了壮丁的事，提到了波利凯·伊利奇……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叫他马上去。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叫……（她又喘了口粗气）他马上去。”

阿克休特卡瞧了瞧波利凯，瞧了瞧阿库林娜，瞧了瞧从被子下面探出头来的孩子们，瞧了大约有半分钟，顺手捡起炕上的一块胡桃壳，朝安纽特卡扔去，又说了一遍“马上去”，接着便象一阵旋风似的飞出了房间，钟摆便以通常的速度在她的奔跑线上开始横着摆动起来。

阿库林娜又站了起来，把皮靴拿给丈夫。这是一双又脏又破的军用皮靴。然后，她从炕上取下了上衣，看也没看就递给了他。

“伊利奇，你不要换件衬衫吗？”

“不要，”波利凯说。

在波利凯默不作声地穿皮靴和穿上衣的时候，阿库林娜一次也没去看他的脸，不看倒好。因为波利凯的脸色苍白，下颚

哆嗦，眼睛里现出一种快要哭出来的听天由命和深深不幸的神情，一种只有善良的、软弱的和有罪的人的眼睛里才会有的神情。他梳了梳头，便想走出去，可是他老婆拦住了他，把耷拉在外衣上面的衬衫带子给他往里掖了掖，又给他戴上帽子。

“怎么，波利凯·伊利奇，难道太太叫您去吗？”从隔板后面传出了木匠老婆的声音。

木匠老婆在今天早晨为着波利凯的孩子们打翻了她一瓦罐洗衣服用的灰水，刚跟阿库林娜大吵过一场，因此她一听见有人叫波利凯到太太那儿去，心里就感到高兴：准没好事儿。再说，她是个心眼儿多、手腕又灵活的尖酸刻薄的女人。谁都比不上她会拿话损人；至少她自己是这样想的。

“八成是派您进城买东西去，”她继续说。“我猜，准是要找个忠实可靠的人，所以太太才派您去。那就请您给我买四分之一俄磅茶叶吧，波利凯·伊利奇。”

阿库林娜忍住了眼泪，气得撅起了嘴。她真恨不得一把揪住这个木匠老婆，这个贱货的脏头发。可是，当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想到他们将成为孤儿，而她自己也将成为守活寡的大兵老婆时，她也就忘了那个尖嘴利舌的木匠老婆，她用手捂着脸，坐到床上，她的头落到了枕头上。

“妈，你要把我压扁了，”咬字不清的小女孩嘟哝说，一面从母亲的胳膊肘下面往外拉自己的破大衣。

“你们统统死了倒好！我生下你们活受罪！”阿库林娜叫道，接着便嚎啕大哭，整个小屋都充满了她的哭声，这可叫那个还没有忘记早晨打翻灰水这事的木匠老婆乐坏了。

四

半个钟头过去了。娃娃叫嚷起来。阿库林娜站起来，给他喂了奶。她已经不哭了，但是，她用手托着她那仍然美丽的消瘦的脸，凝视着残烛，想着她干吗要嫁人，干吗需要这么多的兵，还想着她该怎么去报复那个木匠老婆。

她听见了丈夫的脚步声；她擦干了泪痕，站起来，给他让路。波利凯得意洋洋地走进来，把帽子往床上一扔，喘了一口气，开始解腰带。

“什么事？她叫你去干吗？”

“哼，当然罗！波利库什卡是个最次的人，可是有了事儿，找谁呢？还得我波利库什卡。”

“什么事儿？”

波利凯没有急于回答；他抽起了烟袋，啐了一口唾沫。

“叫我到一个商人那儿去取钱。”

“取钱？”阿库林娜问道。

波利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她真会说话！她说：大家都对你有意见，说你这个人靠不住，可是跟别人比，我更相信你。（波利凯说话时声音很高，为的是让邻居们听见。）她说，你答应过我改过自新，这就是我相信你的第一个证明：到那个商人那儿去，她说，取了钱就拿回来。我就说，太太，我们都是您的奴仆，应该象侍候上帝那样来侍候您，所以我觉得，为了您老人家，我什么都能干，什么工作都不会推辞；您吩咐什么，我都照办，因为我是您的奴才。（他又露出了那种软弱、善良、负罪的人的特有的微笑。）那么你，她说，能忠实可

靠地把这件事办妥吗？她说，你明白你的命运就靠这个来决定吗？我怎么会不明白我能够做到的一切呢？倘若有人说我的闲话，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受到指责的，可是我好象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对您老人家有什么不满，这么一来我就把咱们太太的心给说软了。她说，你会成为一个我最信得过的人的。（他沉默了片刻，同样的微笑又出现在他的脸上。）我很知道怎么和他们这种人说话。从前，我雇给人家干活的时候，可有会找茬儿的人哩，不过，只要我跟他谈上两句，拍拍他的马屁，他就软下来了。”

“很多钱吗？”阿库林娜又问道。

“一千五百卢布，”波利凯不经意地答道。

她摇了摇头。

“什么时候走？”

“她叫我明儿走。挑一匹你中意的马，她说，再到帐房去一趟，你就可以走了，祝你一路平安。”

“主啊，感谢你！”阿库林娜说道，一面站起身来画十字。“愿上帝保佑你，伊利奇，”她拉着他的衬衫袖子说道；为了不让隔壁听见，她压低声音又说。“伊利奇，你听我说，我用基督和上帝的名义请求你，在你动身的时候，吻一吻十字架，发誓滴酒不沾。”

“一路上带着这么多钱，能喝酒吗！”他轻蔑地笑道。“喏，方才那儿还有人在弹钢琴，弹得真好，可好听啦！”他沉默了片刻，微笑着加了一句。“准是小姐。我就这样站在太太面前，站在一个玻璃柜旁边，那位小姐呢，就在隔壁弹琴。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弹得有板有眼，别提多好听了！说真格的，我要是会弹琴多好。我学得会的。一下就学会了。我干这些玩意儿巧着哩。明儿个你给我找一件干净衬衫。”

于是他们俩便幸福地入睡了。

五

这时，帐房门前的大会吵吵嚷嚷开得正热闹。这可不是件闹着玩儿的事。老乡们差不多都来了，在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女主人那儿去的时候，他们便戴上了帽子，这时，有更多的人讲起话来，声音也变得更大了。浓重的嗡嗡声充满了空中，这声音时而被喘吁吁的、嘎哑的、刺耳的说话声所打断，这种嗡嗡声就象喧嚣的大海的波涛传到女主人的窗子里，这时，她感到焦躁不安，就象猛烈的大雷雨引起的感觉一样。也不知道她是害怕呢，还是不痛快。她老觉得这声音立刻就会变得更大更急，并且要出事。她想：“似乎一切就不能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按照博爱与和平的精神，安安静静、心平气和、不争不吵地办妥似的。”

许多人都同时说话，可是嚷得最响的是木匠费奥多尔·列尊。他有两个儿子，他正在攻击杜特洛夫家。杜特洛夫老头则在自卫；他一开始是站在人群后面，现在走到前面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时而张开胳膊，时而扯着胡子，龇着鼻子连续不断地说些连他自己也听不懂的话。他的儿子们和侄子们，个个都是棒小伙子，缩着身子站在他后面，而杜特洛夫老头就象老鹰抓小鸡游戏中的老母鸡一样。老鹰是列尊，不仅是列尊一个人，凡是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子的，以及差不多攻击杜特洛夫的所有到会的人都是。原来，杜特洛夫的弟弟在三十年前就被送去当了兵，所以他不愿意跟有三个儿子的人家排在一起抽签，而希望把他弟弟的兵役也算上，那他就可以跟有两个儿子的人家一样，一总儿抽签了，然后再从这些人里面选派出第三名新兵。除了杜特洛夫这一户以外，还有四户有三个儿子的人家，但其中一户是村

长，太太把他豁免了；第二户，在上次征兵的时候，就被送去了一名新兵；其余的两户已被指定出两名壮丁；其中一户的户主甚至没有到会，只有他的老婆忧伤地站在大家后面，暗暗地盼望命运的车轮好歹能倒转过来，逢凶化吉，另一名被指定送儿子去当兵的父亲，是红头发的罗曼，他虽然不穷，却穿着一件破外衣，靠在台阶旁站着，低着头，一直默不作声，只是有时抬起头来注视一下那放大嗓门说话的人，然后又低下头去。他整个的姿态都流露出一种不幸的样子。谢苗·杜特洛夫老头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多少知道他的为人的人，都肯把几百或者几千卢布托付他保管。他是一个老成持重、敬畏上帝的富裕的人，同时又当过教堂管事。因此他现在的激愤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相反，木匠列尊是个又高又黑的人，脾气暴躁、酗酒、大胆，特别善于在集会和集市上跟工人、商人、农民或者老爷们争辩和谈判。此时他沉着而又刻薄，仗着他高大的身材、洪亮的嗓门和雄辩的才能把这位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完全越出了自己老成持重的常规的教堂管事压倒了。参加争论的人还有方头圆脸、髭毛胡子、身材粗短、相貌显得年轻的加拉西卡·科佩洛夫；他是继列尊之后比较年轻一代中的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说话一向以言词锋利著称，他的发言在大会上是举足轻重的。其次就是费奥多尔·梅利尼奇内；这是一个面黄肌瘦、细高个儿、有点儿驼背的人，年纪也很轻、稀稀拉拉的几根胡子，一双小眼睛，总是牢骚满腹，显得十分阴沉的样子；不管什么事情他总往坏处想，常常会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使大伙感到为难。这两个能说会道的人都站在列尊一边。除此以外，还有两个爱闲言闲语的人，有时候插进来打边鼓；一个叫赫拉普科夫，长相很忠厚，留着又大又密的淡褐色胡子，老爱说：

“亲爱的朋友，”另一个叫日德科夫，是个小矮个儿，尖嘴猴腮，也老爱说：“由此可见，乡亲们，”他爱对大伙说话，话也说得有条有理，就是文不对题。这两个人一会儿支持这边，一会儿又支持那边，可是谁也不去听他们唠叨。还有其他几个象他们一样的人，不过这两人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他们的嗓门比谁都高，使女主人听了都感到害怕，但他们的话听的人最少，他们被喧哗声和叫喊声弄糊涂了，纯粹以耍嘴皮子为乐事。这儿还有许多性格不同的村民：有阴沉的、有斯文的、有漠不关心的，有垂头丧气的；还有拄着拐棍站在男人后面的村妇们；但是关于所有这些人，容我另找机会再来叙述吧。人群中大都是庄稼人；他们站在会场上，就象站在教堂里一样，在后面低声谈家常，谈什么时候到树林子里去砍柴，或是一言不发地等着吵闹赶快结束。还有一些富裕农民，这个大会既不能给他们增加什么好处或减少什么好处。叶尔米尔就是这种人；他生得肥头大耳，满面红光，他因为有钱，所以老乡们都管他叫大肚子。象这样的庄稼人还有斯塔罗斯京；他脸上现出一副有权有势的洋洋自得的神气，似乎在说：“不管你们怎么说，谁也不敢碰我。我有四个儿子，可是一个也不让去。”有时候他们也会捎带受到象科佩洛夫和列尊之流的自由思想者们的攻击，他们便予以反击，但在反击的时候态度沉着，坚决，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不可侵犯的。假如说杜特洛夫象老鹰抓小鸡游戏中的老母鸡，他的那群小伙们却不大象小鸡：他们不乱跑，不唧唧乱叫，而是安安静静地站在他后面。老大伊格纳特已经三十岁了；老二瓦西里也娶了亲，但不适于去当兵；老三，他的侄子伊柳什卡，刚结了婚，是个白净的、脸色红润的青年；他穿着一件漂亮的羊皮袄（他是赶驿车的），站在那儿瞧着大伙，有时搔搔帽子下面的后脑勺，好象这事与他无关似的，可是

老鹰要抓的小鸡却正是他。

“照这么说，我爷爷也当过兵，”列尊说，“那我也可以不抽签罗。没有这样的法律，老伙计。上次征兵的时候，米海伊切夫被征了去，可是他叔叔当兵还没回家呢。”

“不管是你父亲也好，你叔叔也好，都没给沙皇服过务，”杜特洛夫抢着说道，“你甚至也没给太太或者村社当过差，就知道酗酒，怪不得你几个儿子都和你分开了。就因为你好找茬儿，没法跟你在一块儿过，你老是指指点点地瞅着别人，我可当过十年村警，当过教堂管事，家里两次失火，谁也没来帮过我的忙；可现在倒因为我们家和睦相处，安分守己，却要把我弄得家破人亡啊？把我兄弟给我送回来。他八成死在那儿了。正教的教友们，要按照真理，按照上帝的教义来说话，可别听这个醉鬼胡言乱语。”

与此同时，格拉西姆对杜特洛夫说：

“你老拿你兄弟做借口，可是他并不是村社给送去的，是老爷因为他胡作非为把他送去的；所以你不能拿他来做挡箭牌。”

格拉西姆还没把话说完，那黄脸高个的费奥多尔·梅利尼奇内就走上前去，阴阳怪气地说：

“可不是吗，老爷们爱送谁去就送谁去，然后村社再来考虑。村社已决定了你儿子去，你要是不乐意，你就去求太太好啦。我家里就我这么个壮丁，也许太太会叫我撇下孩子去当兵吧。这才合乎法律嘛！”他刻薄地说道。接着他又挥了挥手，站到原来的地方。

儿子已被选定了的红头发的罗曼，抬起头来说道：“说得对，对！”他甚至恼火地坐到了台阶上。

不过齐声说话的并不止这些人。除了站在后面谈自己私事

的人以外，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也没忘记自己的义务。

“是啊，正教的教友们，”矮小的日德科夫重复杜特洛夫的话说，“要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来说话。乡亲们，我是说，要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来说话。”

“亲爱的朋友，要凭良心说话嘛，”忠厚的赫拉普科夫一面重复着科佩洛夫的话，一面拉着杜特洛夫的羊皮袄说道，“这是主人家的意思，可不是村社的决定。”

“说的对！这话有理！”其他的人说道。

“是谁喝醉了在胡说八道？”列尊反驳道。“是你请我喝酒的呢，还是你那个在路上被人家抬回来的儿子^①想拿喝酒来挑我的眼儿呢？乡亲们，要赶快作出决定。如果你们想给杜特洛夫送人情，那么不但有两个儿子的，就是有独子的也得出人了，他准会笑话咱们的。”

“杜特洛夫家去！还用说吗！”

“明摆着嘛！有三个儿子的人应当先抽签，”一些人异口同声地说。

“还得听听太太怎么吩咐。叶戈尔·米哈雷奇说过，他们想派一名家奴去，”有人说道。

这个意见使争论停息了片刻，可是马上又热烈争论起来，并且转为人身攻击。

被列尊说是在路上被人家抬回来的伊格纳特开始揭发列尊，说他偷了一个过路木匠的锯，还说他喝醉了酒，差点儿没把老婆打死。

列尊回答说，不论他喝醉了还是没喝醉，都要打老婆，而且

^① 指醉倒在路上。

总也打不够，这话惹得大家都笑了。但关于锯的事，他却突然发了火，他向伊格纳特逼近几步，开口问道：

“谁偷了？”

“你偷了，”身强力壮的伊格纳特也逼近几步，挺身答道。

“谁偷了？不正是你吗？”列尊大声嚷道。

“不，是你！”伊格纳特也大声嚷嚷。

说完了锯，他们又扯到偷马、一袋燕麦、村里的一小块什么菜园子、一具什么尸体的事上去了。这两个农民就用这些可怕的事情来互相对骂；要是他们互相指责的事情哪怕有百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他们两人就应该依法马上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至少也得发配去定居。

但是，杜特洛夫老头选定了另一种自卫的方法。他不喜欢他儿子大叫大嚷，他拦住了他说：“我告诉你，别嚷了，真造孽！”而他自己却硬说，不但那些三个儿子住在一起的人算是有三个壮丁的人家，就是那些和自己的儿子们分开过的人也一样。于是他又指出了斯塔罗斯京。

斯塔罗斯京微微一笑，清了清嗓子，摸了摸胡子，摆出一副富裕农民的派头回答说，这就看主人家的意思了。如果吩咐把他儿子豁免，他儿子就理所当然地不去。

关于分家的问题，格拉西姆也驳倒了杜特洛夫的论据，他指出：照老爷在世时的规矩根本就不该允许分家，可是过去的事情就甭去提它了，反正现在总不能让独子去当兵。

“难道分家是闹着玩儿的吗？凭什么现在要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呢？”那些分了家的人说道；接着一些爱说话的人也加入了他们一伙起哄。

“你要是不乐意，你就出钱去买个替身得了。你买得起！”列

尊对杜特洛夫说。

杜特洛夫绝望地掩上衣襟，退到别的庄稼人后面。

“你好象数过我的钱似的，”他恶狠狠地说。“还得瞧叶戈尔·米哈雷奇从太太那儿回来后怎么说。”

六

果然，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时候从宅子里出来了。人们头顶上的帽子一个个地举了起来，管家愈是走近，那些中间秃了或是前面秃了的脑袋——全白的、花白的、红发的、黑发的和淡褐色头发的，都一个跟着一个露了出来，同时，说话声也逐渐逐渐地静了下来，终于鸦雀无声。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站到台阶上，摆出一副要说话的架势。他穿着那件长长的常礼服，两手很不自然地插在前面的衣袋里，一顶工厂里做的帽子盖在他的前额上，他两脚分开，稳稳地站在高处，俯视着那些向他抬起来的、多半是年老的和多半是漂亮的、蓄着胡子的脑袋。现在，他跟站在太太面前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他的模样十分威严。

“乡亲们，这是太太的决定：她不愿意把家奴送去当兵，你们中间谁去，由你们自己指定。今年我们需要三名壮丁。其实，只要两个半，那半个是预支的。反正一样：今年不去，下回去。”

“那可不！这话在理！”大家嚷道。

“依我看呀，”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说，“霍留什金和瓦西卡·米秋欣一定要去，——这是上帝的旨意。”

“是啊，对，”大家嚷道。

“第三个人要么让杜特洛夫家去，要么从有两个儿子的人中

间再选派一个。你们说呢？”

“杜特洛夫家去，”大家说，“杜特洛夫家有三个壮丁。”

于是叫喊声又慢慢慢慢地开始了。后来，不知怎的，问题又转到锯子上、转到那一小块菜园子以及从主人家的院子里偷麻袋等事情上去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经管庄园已经有二十年了，他是个聪明而有经验的人。他站在那儿听了大约一刻钟，突然吩咐大家都不要说话了，让杜特洛夫家的三个孩子抽签，看应该让谁去。大家把签准备好了，赫拉普科夫摇了摇帽子，从里面抽出一张签来，抽中的是伊柳什卡。大家都停止了说话。

“是我抽中了吗？让我瞧瞧，”伊柳什卡说道，他的声音都变了。

大家都一言不发。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吩咐明天每户送七戈比的征兵费来，然后宣布一切完毕，散会。人群走动开了；他们走过了拐角方才戴上帽子，发出一片嗡嗡的谈话声和脚步声。管家站在台阶上，望着散去的人。当杜特洛夫的小伙子们都拐过弯去走了，管家把老头叫到身边，杜特洛夫老头本来就没走，这时便跟他走进了帐房。

“老伙计，我很可怜你，”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一面在桌前一张安乐椅上坐下，“轮到你了。你想不想给你侄儿买个替身呢？”

老头没有回答，含有深意地瞧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眼。

“这是躲不过去的，”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他的目光说。

“叶戈尔·米哈雷奇，买，我倒愿意，就是没钱。两匹马在夏天给人家坑了，抢了。又给侄儿娶了亲。大概是因为我们太忠

厚老实了，所以才有这样的命运。他说得倒好。”（他想起了列尊。）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用手搓了搓脸，打了个呵欠。显然，他已经不耐烦了，而且也是该喝茶的时候了。

“哎，老伙计，别造孽了，”他说，“到地窖里去找找，说不定你会找到四百个卢布旧银币的。我给你买一个替身，可好啦。前些日子就有一个人愿意去。”

“在省里吗？”杜特洛夫问道，他说的省里就是城里。

“怎么样，你买吗？”

“我倒愿意买，可以对天起誓，不过……”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好啦，老伙计，你听我说：不要让伊柳什卡对自己干什么蠢事^①；等我一传下话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马上就把他带走。你送他去，你就得负责，万一他出了什么差错儿，我就拿你的大儿子顶替。听见了没有？”

“能不能叫有两个儿子的人家去呢，叶戈尔·米哈雷奇，这太气人了，”他沉默了片刻说道，“我兄弟已经当兵死了，现在又要把他的儿子弄走，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他说时差不多要哭了，恨不得屈膝跪下。

“好啦，走吧，走吧，”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毫无办法，这是规定。看着点伊柳什卡；你可要负责。”

杜特洛夫用菩提木手杖沉思地叩着高低不平的路面，走回家去了。

① 在旧俄，农民常把自己弄成残废，以逃避兵役。

七

第二天清早，一匹骨骼粗大的枣红色骗马——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叫做“大鼓”，——驾着一辆出门用的马车（管家就是乘这辆车出门的），停在家奴“下房”的台阶前。波利凯的大女儿安纽特卡不顾雨里夹着雪珠，寒风刺骨，还是光着两脚，站在马头前面，她站得远远的、带着明显的害怕的样子，一手抓着缰绳，另一只手按着披在她头上的那件黄绿色短上衣，这件上衣在家里既当被子、皮袄、帽子、毯子用，也当波利凯的外衣用，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用途。波利凯的小屋里正忙做一团。屋里还很黑；雨天的晨曦微微透过有的地方糊着纸的窗户。阿库林娜暂时撂下了炉子上的饭菜和孩子们（几个小的还没起来，正冻得发抖，因为他们的被子被拿去当了衣服，只给了他们一块母亲的头巾来代替被子），正忙着给丈夫收拾行装。一件衬衫是干净的，但那双靴子却象俗话所说“张开了大口”，这使她特别感到为难。首先，她从自己脚上脱下了那双唯一的厚毛袜给了丈夫；其次，她动脑筋用那块在马厩里没有放好、前天被伊利奇捡回家来的毡鞍垫做了一双鞋垫，做得既可以堵住靴子上的窟窿眼，又可以防止伊利奇脚受潮。伊利奇自己则盘腿坐在床上，正忙着把那条宽腰带拧来拧去，免得它看起来象根脏绳子。那咬字不清、爱闹别扭的小女孩穿着一件即使顶在头上还是要绊脚的羊皮袄，被打发去向尼基塔借帽子。前来托伊利奇在城里买东西的家奴们，更增加了忙乱。有的要买针，有的要买茶叶，有的要买低等橄榄油，有的要买烟叶，还有那个木匠老婆要买糖；她已经摆上了茶炊，为了讨好伊利奇，给他送来了一缸子她自己管它

叫茶的饮料。虽然尼基塔不肯借帽子，他必须修理自己那顶旧的，就是说，要把露出来、耷拉在外面的棉花塞进去，再用马医用的针把那个窟窿补好；虽然那双垫着用毡鞍垫做鞋垫的靴子起初穿不进去；虽然安纽特卡冻僵了，几乎松开了“大鼓”，穿着皮袄的玛什卡便上去接替了她，随后玛什卡又得把皮袄脱下来，而由阿库林娜亲自前去拉着“大鼓”，——虽然这样，到末了，伊利奇还是把家里差不多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自己身上，只留下了一件短上衣和一双便鞋，待一切安排就绪以后，他便坐上了马车，掩好了衣襟，拾掇了一下干草，又掩好了衣襟，拿起了缰绳，又把衣襟掩得更紧一些，就象那些非常有身份的人所做的那样，驱车动身了。

他的小男孩米什卡跑到台阶上，要求带他去坐车玩。咬字不清的玛什卡也央求带她去“坐契(车)玩，就是不穿皮佬(袄)她也不冷”，于是波利凯便勒住“大鼓”，微微露出那种软弱的笑，阿库林娜便把孩子们抱上了车，又俯身向他低声说，叫他要记住起的誓，一路上千万不要喝酒。波利凯把孩子们带到铁匠铺那儿，便让他们下了车，他又裹了裹衣裳，又正了正帽子，便独自赶着车，放马小跑，不紧不忙地向前驶去了。车子一颠，他的腮帮子就一哆嗦，他的脚就轻轻地碰在车板上。玛什卡和米什卡光着脚拚命地跑着、叫着，顺着溜滑的山坡向家里飞奔而去，吓得一条从村子里跑到家奴那儿去的狗瞧了瞧他们，突然夹着尾巴狂吠着，逃回家去了，这一来，使波利凯的这两个继承人的尖叫声更增大了十倍。

天气很坏，寒风刺骨，天空飘落着似雪非雪、似雨非雨、似雪珠非雪珠的东西，有时打在伊利奇的脸上，打在他那藏在厚呢上衣袖子里面握着冰冷的缰绳的不戴手套的手上，打在马车的皮

子面上，打在这匹贴着耳朵、眯着眼睛的老马“大鼓”的头上。

后来雨突然停了，霎时间天空放晴了；淡蓝色的雪云显得格外分明，太阳似乎已开始露面，但它现出一副犹豫不决和闷闷不乐的样子，就象波利凯本人的微笑一样。尽管如此，伊利奇还是沉浸在愉快的沉思中。他——这个要被送去流放和受到威胁要被送去当兵的人，这个只有懒人才不去打骂他的人，这个经常是哪儿坏就支使他到哪儿去的人，——现在居然坐着马车去取一笔款子，而且是一笔巨款，而且又是太太信托他，又是坐着“大鼓”拉的、管家坐的、有时候太太本人也乘坐的马车，他俨然象一位客店老板坐在一辆配备有皮轡索、皮缰绳的马车上。于是波利凯便把腰杆挺得更直地坐着，把帽子里露出来的棉花拾掇好了，把衣裳又裹紧了一点。不过，要是伊利奇以为他完全象一位有钱的客店老板，那他就错了。诚然，任何人都知道，手头有一万卢布的商人们乘坐的也是配备有皮马具的马车；话虽如此，但也未必尽然。要是有一个乘车而来，他蓄着胡子，穿着蓝色的或黑色的大褂，驾着一匹高头大马，独自一人坐在车厢里，你只消瞧一眼他那匹马的膘肥不肥，他本人是不是保养得很好，他的坐法怎样，马套得怎样，车轮上的轮箍怎样，他束的腰带怎样，那你就一目了然，此人到底在经营着几千卢布还是几百卢布的买卖。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人，只要走近一点瞧瞧波利凯，瞧瞧他的手和他的脸，瞧瞧他不久以前才蓄的胡子，瞧瞧他的腰带，瞧瞧那乱七八糟地扔在车厢里的干草，瞧瞧那匹干瘦的“大鼓”，瞧瞧那磨损了的轮箍，马上就会明白，坐在马车里的是个奴才，不是商人，也不是牲口贩子，也不是客店老板，他既不趁几千或几百，甚至连十个卢布也没有。但伊利奇并不这样想，他想错了，而且很惬意地想错了。他要把一千五百卢布揣在怀里带回家

去。假如他愿意，他就可以勒转马头不回家，而到敖德斯特^①去，而且他爱上哪儿就能上哪儿。不过他不这么做罢了；他要规规矩矩地把钱带给太太，这样，他以后就可以说，他带过的钱还远不止这些。当他来到一家酒馆门前时，“大鼓”就开始拉紧左边的缰绳，掉过头去，想停下来；这时波利凯，虽然身上带着人家托他买东西的钱，却抽了“大鼓”一鞭子，扬长而过。在另一家酒馆前，情形也是一样，快近中午时，他下了车，打开了一家客店的店门——太太家的仆人都在这家店里歇夜——他把车赶了进去，卸了马，给马喂了干草，跟客店的伙计们一块儿吃了饭，他当然不会忘记叙述，他是来办一件多么重要的事的；随后，他就带着放在帽子里的信到花匠那儿去了。花匠虽然认识波利凯，但他看信时却露出显然的怀疑神情，一再问他是不是真的吩咐他来取钱的。伊利奇想生气，但是他做不出来，他只是微微一笑，就象他惯常那样的笑法。花匠把信又看了一遍，才把钱给了他。波利凯收到钱以后，就把它揣在怀里，回住处去了。不论是啤酒店也好，各种酒店也好，什么都引诱不了他。他全身感到一种愉快的激动，他不止一次地停留在各种店铺门前，店铺里陈列着种种诱惑人的货色：长统靴子、厚呢外衣、帽子、印花布和食品。他站了不一会儿，就怀着愉快的心情走开了：我都买得起，就是不买。他走到市场上去买人家托他买的东西，东西买齐了，他就拿起了一件定价二十五卢布的熟皮大衣，问了问价钱。卖主瞅着波利凯，不知道为什么不相信他能买得起，可是波利凯指了指自己的怀里说，假如他愿意，他能把整个铺子都买下来，他要求试试那件皮大衣，他穿起来，揉揉，摸摸，把皮毛吹吹，弄

① 即敖德萨。

得浑身发出一股臭皮子味儿，最后才叹了一口气把它脱下来。“价钱不合适。你要是十五个卢布肯卖的话，我一定买，”他说。商人没好气地把那件皮大衣隔着桌子扔了回去，波利凯便走出来，心情愉快地回到了住处。晚饭后，他给“大鼓”饮了水，喂了燕麦，就爬到火炕上，掏出信封来端详了老半天，然后请那个识字的客店老板念了念地址和“内附一千六百十七卢布纸币”这句话。信封是用普通的纸做的，封口压着印有铁锚形的棕色火漆：大的一个在中间，四边还有四个；边上也滴了火漆。伊利奇把这一切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记熟了，甚至还摸了摸纸币的尖角。他一想到自己手里有这么一大笔钱时，就感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他把信封塞进帽子的窟窿里，又把帽子放在枕头底下躺了下来；但就是在夜里，他还醒了好几次，去摸摸那个信封。每次他发现信封还在原来的地方时，便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他想到，他，波利凯，这个受人欺侮、被人作践的人，居然能带着这么大一笔款子，而且要诚实无欺地把它送到，这样地诚实，恐怕连管家自己也做不到。

八

将近半夜，店家的伙计和波利凯都被敲门声和农民们的叫喊声吵醒了。这是从波克罗夫斯科耶送来的新兵。他们约莫有十来个人：霍留什金、米秋什金、伊利亚^①（杜特洛夫的侄子）、两个替身、村长、杜特洛夫老头和车夫们。屋里点着一盏通宵不灭的小灯，女厨子睡在神像下面的长凳上。她跳起身来，点着了蜡

^① 即伊柳什卡。

烛。波利凯也醒了，他从炕上探出身来望着进来的农民们。大家一边往里走一边画十字，他们在长凳上坐了下来。他们都十分平静，简直看不出到底谁送谁去当兵。他们向大伙问了好，聊着天，又要吃的。的确，有几个人很少说话，愁容满面；可是，另外几个人却显得特别高兴，看樣子是喝醉了。其中就有伊利亚，他过去从来不喝酒。

“喂，小伙子们，咱们是吃晚饭呢，还是睡觉？”村长问道。

“吃晚饭，”伊利亚回答道，他敞着皮袄坐在板凳上。“派人去买点伏特加来。”

“伏特加喝得不少了，”村长顺口答道，然后又问其他的人说：“小伙子们，吃点面包吧。干吗去把人家叫醒呢？”

“来点伏特加，”伊利亚对谁也不瞧地重复说，听他那声调，不给他酒喝他是不肯轻易罢休的。

农民们听从了村长的劝告，从大车上拿了些面包来吃了，又要了些克瓦斯喝了，便躺下了，有的躺在地板上，有的躺在火炕上。

伊利亚还不时重复说：“来点伏特加，我说，给我拿来，”猛然，他看见了波利凯。

“伊利奇，啊，伊利奇！亲爱的朋友，你在这儿？要知道，我要去当兵啦；我跟我妈和老婆永远分别了……她那个哭呀！他们押送我去当兵。你请我喝点伏特加吧。”

“我没钱，”波利凯答道。“上帝保佑，说不定会退回来的，”波利凯安慰他说。

“不，老伙计，我象一颗干干净净的白桦树，从来没生过病。我怎么会给退回来呢？象我这样的兵不要，沙皇还要什么兵呢？”

波利凯便开始给他讲一个故事，说，有个农民给了医生一张蓝票^①，于是就给退回来了。

伊利亚往炕前靠了靠，便谈起心来：

“不，伊利奇，现在完了，我自己也不想在家里待下去了。我伯伯把我押送来。我们家就买不起一个替身吗？不，他舍不得他儿子，也舍不得钱。他们把我送去……现在我自己也不想在家待下去了。（他说话声音很低，推心置腹地、带着一种淡淡的哀伤。）只有一点，我可怜我妈；亲爱的人哪，她是多么伤心啊！还有我老婆：他们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把那娘儿们断送了；现在她算完了；一句话，她做了大兵的老婆了。还是不娶亲的好。他们干吗要给我娶亲呢？她们明儿要来。”

“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把你们送来了呢？”波利凯问道。“原来一点也没听说呀，突然一下子……”

“哼，他们怕我把自己弄残废了，”伊柳什卡微笑着答道。“不用怕，这种事我不干。我就是当了兵，也不会完蛋，只是可怜我妈。他们干吗要给我娶亲呢？”他忧伤地低声说。

门开了，又砰地一声关上了，杜特洛夫老头走了进来。他抖搂着帽子，依然穿着那双总是那么老大老大的树皮鞋，脚上就象套了两只小船。

“阿法纳西，”他一面画十字，一面向看院子的说，“有灯笼没有？我要去装点燕麦。”

杜特洛夫没有抬起头来看伊利亚，他不慌不忙地点上了蜡烛头。他的手套和马鞭塞在腰里，厚呢外衣整整齐齐地用腰带束着；他那模样好象是押着车队来似的：他那劳苦的脸上显出跟

^① 旧俄时票面值五卢布的钞票。

平时一样的厚道、随和以及操心家务的神情。

伊利亚一看见伯伯，就不作声了，他又闷闷不乐地低下了眼睛，瞧着长凳上的什么地方，然后他对村长开口说道：

“叶尔米拉，来点伏特加，我要喝酒。”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懑和郁闷。

“这会儿还喝什么酒？”村长一面喝着茶，一面答道。“你瞧，别人都吃了，躺下了；你怎么还胡闹呢？”

显然，“胡闹”这个词儿使他产生了索性来胡闹一下的念头。

“村长，你要是不给我伏特加，那我就闹出点事来给你瞧瞧。”

“你最好去开导开导他呢，”村长对杜特洛夫说。杜特洛夫已经把灯笼点好了，但他还是站在那儿，显然想听听还有什么下文，他也斜着眼睛，十分同情地瞧着侄子，好象对他的孩子气感到诧异似的。

伊利亚低下了头，又说：

“拿酒来，要不然的话，我就闹事。”

“算啦，伊利亚！”村长温和地说，“真的，你还是别闹的好。”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句话说完，伊利亚就跳起身来，一拳打在玻璃窗上，一面使劲儿嚷嚷：

“你们要不听我的话，那你们就瞧着吧！”接着他就冲到另一个窗口，想把那块玻璃也给打碎。

伊利奇马上连翻了两个身，躲进了炕角落里，因而把所有的蟑螂都吓跑了。村长扔下了茶匙，跑到伊利亚跟前。杜特洛夫则慢慢地放下了灯笼，解下腰带，咂着舌头，摇了摇头，向伊利亚走去；伊利亚正在跟不让他到窗前去村长和看院子的拉扯在一起。他们抓住他的手，似乎攥得很紧；但伊利亚一看见伯伯拿

着宽腰带，力气就增加了十倍，他挣脱了身子，眼睛向上一翻，就握紧了拳头，冲到杜特洛夫跟前。

“你敢过来，畜生，我就打死你！你把我给害了，你跟你的两个强盗儿子把我给害了。干吗要给我娶亲？你敢过来，我就打死你！”

伊柳什卡的样子非常可怕。他的脸都发紫了，眼珠乱转；他那年轻力壮的身体象发疟子似的不住发抖。他似乎想要而且能够把这三个向他进攻的人统统打死。

“吸血鬼，你在喝你兄弟的血！”

有一种神情在杜特洛夫永远平静的脸上闪过。他向前迈了一步。

“你不要不识好歹，”他说，突然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他猛扑过去，一把抱住侄子，和他一同滚到地上，接着，由村长帮着，他开始把他的两手捆绑起来。他们扭打了约莫五分钟；最后杜特洛夫在农民们的帮助下站了起来，把伊利亚紧抓着他皮袄的手拽开了，——他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又把反绑着两手的伊利亚架了起来，让他坐在角落里的一条长凳上。

“我说过，这样对你更不利，”他说，他一面理着衬衫上的腰带，一面由于刚才的搏斗还在气喘吁吁。“为什么要造孽呢？我们大家都要死的。把外衣给他枕在头底下，”他对店家说，“不然，他的头会发麻的，”说完这句话，他就提着灯笼，腰上拴了根绳子，又去照料马去了。

伊利亚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衬衫也给扯了出来；他向屋子四周打量了一下，好象在极力回忆他是在什么地方似的。店家收拾起碎玻璃，用一件短皮袄堵住窗口，免得冷风吹进来。村长又坐下来喝茶。

“唉，伊柳哈，伊柳哈^①！我真可怜你。有什么法子呢！你瞧瞧留什金，他也娶了亲；明摆着，是逃不了的嘛。”

“我就毁在我这个恶棍伯伯手里，”伊利亚咬牙切齿地重复说。“他舍不得自己的儿子……我妈说，管家让他买个新兵替我。他就是不肯；他说：他买不起。难道我和我兄弟给家里挣的还少吗？……他就是恶棍！”

杜特洛夫回到屋里，对着神像做了祈祷，脱了衣服，便挨着村长坐下。女厨子仍把克瓦斯和杓子递给了他。伊利亚不作声，闭上了眼睛，躺在厚呢外衣上。村长默默地指了指他，摇了摇头。杜特洛夫挥了挥手。

“难道我舍得吗？他是我亲兄弟的儿子。不但舍不得，他们还使我在他面前成了恶棍。他老婆，别看这小娘儿们年轻，可坏啦，挑唆他，让他满脑子里都以为我们有钱，买得起替身，所以他怨我。不过这孩子也是怪可怜的……！”

“唉，这孩子是不错！”村长说。

“我拿他真没有办法。明几个我打发伊格纳特来，他老婆也想来。”

“好，让他们来吧，”村长说完，便站起来，上了炕。“钱算什么？金钱如粪土。”

“要是有钱的话，谁会舍不得钱呢？”客店的伙计抬起头来说。

“唉，钱呀，钱呀！许多罪恶都是它造成的，”杜特洛夫说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象钱那样造出那么多的罪恶。《圣经》上也这么说。”

^① 伊柳哈是伊利亚的小名。

“《圣经》上什么都说到了，”客店老板同意道。“有个人告诉过我一件事：从前有个商人，攒下了许多钱，但是连一个小钱也不愿意留下来；他太爱钱了，要把钱带进自己的棺材。他临死的时候，只吩咐把一个小枕头放进他的棺材里。可是谁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后来他的儿子们找起钱来了：什么也没有。有一个儿子猜到，这钱大概放在枕头里。这事叫沙皇知道了，便恩准他们掘坟。你猜怎么着？把棺材打开了，枕头里什么也没有，棺材里满是毒蛇；于是把棺材给埋了。瞧，这都是金钱在作怪。”

“可不是吗，造的孽可多啦，”杜特洛夫说罢就站起身来，开始祷告上帝。

他做完祷告，瞧了瞧侄子。那小伙子睡着了。杜特洛夫走过去给他松了绑，然后自己也躺了下来。另一个农民便去守着马睡觉了。

九

一切刚刚静下来，波利凯便象一个犯了过错的人似的悄悄地爬下了炕，开始收拾。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和新兵们一起过夜，他感到可怕。公鸡已经在频频报晓。“大鼓”已经吃完了它的全部燕麦，正往饮马槽里伸脖子。伊利奇把它套上车，牵着它从农民们的大车旁走了出来。他的帽子和放在那里面的东西都完整无缺，接着马车的车轮又在往波克罗夫斯科耶去的那条结着一层薄冰的大路上辘辘地响了起来。等到了城外，波利凯才感到轻松了些。要不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好象老是听见后面有人在追他，叫他站住，而且把他的两手反绑起来，让他顶替伊利亚，明天送他到新兵站去。不知道是由于冷，还是由于害

怕，他的脊梁骨一阵阵发冷，所以他老是不停地赶着“大鼓”往前走。他碰见的第一个人是个戴着高筒皮帽、随身带着一名独眼工人的牧师。波利凯越发害怕起来。可是出了城以后，这种恐怖便渐渐消失了。“大鼓”慢悠悠地走着，前面的路变得渐渐清晰起来；伊利奇摘下了帽子，摸了摸钱。“把钱藏在怀里吗？”他想到，“那还得解开腰带。还是等我下了坡，到那儿再下车重新收拾一下。帽顶缝得很结实，不会从里子里掉出来的。我不到家决不摘帽子。”“大鼓”走下了山坡，又乘兴跑上了另一座山，波利凯也和“大鼓”一样，想赶快回家，所以他并不制止它。一切都很顺当；至少他是这样想的，于是他便沉浸在幻想中，他想到女主人对他的夸奖，想到她会赏给他五个卢布，想到自己一家人的快乐。他摘下了帽子，又摸了摸那封信，然后把帽子紧紧地扣到前额上，微微一笑。帽子上的棉绒已经烂了，而且正因为头天晚上阿库林娜使劲把破的地方缝好了，它的另一头才开了线，而且正因为波利凯摘下了帽子，想在昏暗中把装着钱的信往棉絮里塞得更深些，——正因为这个动作他把帽子撑破了，并使信封的一角从棉绒下面露了出来。

天渐渐亮了，一宿没睡的波利凯打起了瞌睡。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因此那封信就更伸出来了，他在打瞌睡时，头不时碰在车侧的木杆上。快到家时他醒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抓帽子：帽子还紧紧地扣在头上；他没有把它摘下来，深信那个信封还在里面。他抽了“大鼓”一鞭子，把干草整了整，又摆出一副管院子的派头，大模大样地不时向周围瞧瞧，一颠一晃地往家里走去。

瞧，那儿是厨房，那儿是“下房”，那儿是木匠老婆在搬粗麻布，那儿是帐房，那儿是太太的宅子，波利凯马上就要在这个

宅子里证明他是个诚实可靠的人，证明“任何人都不会遭到别人说闲话”，于是太太就说：“好，谢谢你，波利凯；给，给你三个……”也许是五个，也许是十个卢布，而且她还会叫人端杯茶给他，说不定还会给他点伏特加。喝杯酒驱驱寒气，倒也无妨。有了十个卢布，咱们就可以在过节的时候痛痛快快地玩一阵，买双靴子，对啦，还可以还尼基塔四个半卢布，要不然，他老来纠缠不清……当他离家不到一百步的时候，波利凯又掩了掩衣襟，整了整腰带和领子，又摘下帽子，拢了拢头发，然后，不慌不忙地把手塞进帽子里面。这只手开始在帽子里动起来，越来越快，另一只手也伸了进去；他的脸发白了，发白了，一只手把帽子捅了个对穿……接着波利凯便跪起来，勒住了马，开始在车上、干草里和买来的东西里到处寻找，摸摸怀里和灯笼裤里：钱哪儿都没有。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这可怎么办呢！”他揪住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起来。

但是他立刻想起，人们会看见他的，他便掉转马头，把帽子往下一拉，赶着又是惊讶又是不满的“大鼓”沿着来路往回走去。

“跟波利凯一块儿出来真叫人受不了，”“大鼓”一定在这样想。“他一辈子只有一回把我及时喂饱，让我喝足了，而且只是为了这么可恶地欺骗我。我是怎样使劲往家里跑啊！我累了，可是等我刚一闻到家里的干草香味的时候，他又赶着我往回跑了。”

“哼，你这该死的老马！”波利凯含泪叫道；他站在车上，一边拽着“大鼓”的马嚼子，一边用鞭子抽它。

十

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在波克罗夫斯科耶看见过波利凯。午饭
后太太问了好几次。阿克休特卡也飞到阿库林娜那儿去过；可
是阿库林娜说，他没有回来，八成是商人把他留住了，要不就
是马出了什么事儿。“该不是马瘸了腿吧？”她说。“上回，马克
西姆也是这样去了整整一天一夜；一路上都是步行回来的！”于
是阿克休特卡摆动着她那钟摆又回到宅子里去了。阿库林娜左
思右想，想出了使她丈夫耽搁的种种理由，竭力让自己平静下
来，然而总是办不到！她心头很沉重，怎么也打不起精神去干明
天过节该干的活儿。她更感到苦恼的是，木匠老婆硬说，她亲眼
看见有个人，非常象伊利奇，驾着车子已经快到大街上了，后来
又趑了回去。孩子们也焦急不安地盼着爹爹回来，但是他们
是由于别的原因。阿纽特卡和玛什卡因为没有皮袄和外衣，即使
轮流到外面去也不可能，因此她们只得穿着单衣，绕着房子加快
速度跑圈子，这就少不了要使所有出入下房的居民感到不便。
有一回，玛什卡撞了提着水的木匠老婆的腿，虽然她一撞着木匠
老婆的膝盖，就抢先大哭起来，但还是被木匠老婆揪住头发揍了
一顿，于是她哭得更厉害了。要是她没有撞着人，她就一直跑进
房门，踏着小木桶爬到炕上去。只有太太和阿库林娜才真正对
波利凯放心不下；孩子们着急的只是爸爸把衣服穿走了。至于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他很得意他的预见被证实了，因
为他在回禀太太时，太太问他：“波利凯还没回来吗？他能到哪
儿去呢？”他就笑笑回答道：“我不知道。他本应该中午以前就
回来的，”他意味深长地说。这一整天，在波克罗夫斯科耶，谁

也不知道波利凯到底出了什么事；直到后来才听到邻村的农民说，他们曾看见他光着脑袋在大路上跑，而且逢人便问：“你捡到一封信没有？”还有一个人看见他睡在路边，身旁拴着马和车。“我还以为他喝醉了呢，”那个人说，“马也好象有两天没饮没喂了，肚子都瘪了下去。”阿库林娜一夜没睡，老是侧耳倾听，但是夜里波利凯也没有回来。假如她是孤身一人，或者还有个厨子和使女跟她在一起的话，那她就更加不幸了；可是公鸡刚叫过三遍，木匠老婆也起床了，阿库林娜也必须起来生炉子。这天过节：天亮以前得把面包从炉子里取出来，得做克瓦斯，做烙饼，挤牛奶，熨衣服和衬衫，给孩子们梳洗，提水，不让邻居们把整个炉灶都给占了。阿库林娜一面不停地侧耳倾听，一面干着这些家务活儿。天已经亮了，教堂的钟声也开始响了，孩子们也已经起床了，可是波利凯还是没有回家。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初雪，雪斑驳地覆盖着田野、道路和屋顶；今天好象为了过节，天气很好，晴朗而寒冷，因此老远就可以听见响声，可以看得老远。可是阿库林娜正站在炉旁，不时把头伸进炉口忙着做烙饼，所以她没听见波利凯驾着车子走来的声音，直到听到孩子们叫喊，她才知道丈夫回来了。老大安纽特卡，头上抹了油，自己穿好了衣服。她穿着一件崭新的、但是揉皱了的玫瑰色的印花布衣服，——这是太太送给她的，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就象树皮似的，使邻人们看了不顺眼；她的头发油亮油亮的，她把半瓶油都抹在头发上了；她的鞋子虽然不是新的，可是很精致。玛什卡还穿着那件短上衣，满身污垢，因此安纽特卡不让她挨近自己，免得弄脏了衣服。当父亲驾着车，拉着一只口袋回来时，玛什卡正在院子里。“爹回来了，”她尖声叫道，接着便从安纽特卡身边擦过，拚命冲进门去，把她的衣裳都给弄脏了。这时安纽特卡也不

怕弄脏衣服了，抬手就揍了玛什卡一顿，可是阿库林娜放不下手里的活儿。她仅仅对孩子们喝道：“你们都欠揍，看我不把你们都揍扁了！”她说完，回头看了一眼门口。伊利奇两手提着口袋走进了过道，立即悄悄地钻进了自己的小屋。阿库林娜觉得他脸色苍白，脸上的表情似乎既不象哭，又不象笑；但她没工夫来分辨这些。

“怎么样，伊利奇，一切都顺利吗？”她在炉灶旁问道。

伊利奇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什么话，她没听明白。

“怎么？”她叫道。“你上太太那儿去过了吗？”

伊利奇坐在自己小屋的床上，怯生生地瞧着自己周围，露出一一种负罪的和极端不幸的微笑。他老半天什么也没回答。

“怎么啦，伊利奇？怎么去了这么久呀？”他听到阿库林娜询问的声音。

“阿库林娜，我把钱交给太太了，她夸了我半天！”他突然说道，越发不安地向四下张望着，微笑着。有两样东西特别吸引住他那双惶遽不安、象发寒热病似地圆睁着的眼睛：拴摇篮的绳子和婴儿。他走到摇篮跟前，用他那枯瘦的手指急忙解开了绳扣。接着他的眼睛停留在婴儿身上；可就在这时候，阿库林娜端着一板烙饼进了屋。伊利奇连忙把绳子藏在怀里，在床上坐了下来。

“怎么啦，伊利奇，你好象不大舒服似的？”阿库林娜说。

“没睡觉，”他答道。

突然有什么东西从窗前闪过，不一会儿，上房里的使唤丫头阿克休特卡象一支箭似的飞跑了进来。

“太太叫波利凯·伊利奇这会儿就去，”她说。“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叫他这会儿就去……这就去。”

波利凯看了看阿库林娜，然后又看了看这个小姑娘。

“马上就来！还有什么事吗？”他说得很自然，阿库林娜这才放了心：说不定她想犒赏犒赏他。“你说，我马上就来。”

他站起来走了出去；阿库林娜端起洗衣盆放在长凳上，把门旁水桶里和炉灶上锅里的热水倒了进去，又挽起袖子，试了试水温。

“来，玛什卡，给你洗澡。”

这个爱闹别扭、咬字不清的小姑娘大哭起来。

“来呀，讨厌鬼，我给你换件干净衬衫。哎呀，别闹了！来呀，我还要给妹妹洗呢。”

其实，波利凯并没有跟着那个上房里的使唤丫头到太太那儿去，而是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了。在过道靠墙那边，有一个通到阁楼上去的、直上直下的梯子。波利凯走进过道后，回头看了看，见没有人，就弯下腰，几乎奔跑似的，灵巧而迅速地顺着这个梯子爬了上去。

“波利凯还不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太太向正在给她梳头的杜尼亚莎不耐烦地说，“波利凯上哪儿去了呢？他为什么还不来呢？”

阿克休特卡又往家奴们那儿跑去，又跑进了过道，又叫伊利奇到太太那儿去。

“他早就去啦，”阿库林娜答道；这时候，她已给玛什卡洗完澡，刚把她那个吃奶的小男孩放进洗衣盆里，不顾小孩的哭叫，正在洗他那稀稀拉拉的头发。这小男孩啼哭着，皱着眉头，用他那双无力的小手竭力想抓住什么。阿库林娜用一只大手扶着他那胖胖的、满是胖窝的柔软的小脊背，用另一只手在给他洗澡。

“你去瞧瞧，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睡着了，”她不安地向四下张望着说。

就在这时候，木匠老婆头也没梳，敞着怀，提着裙子，到阁楼上去拿晾干了的衣服。突然阁楼上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叫喊，木匠老婆象疯子似的闭着眼睛，四肢着地倒退着，与其说是跑，还不如说象猫似的从梯子上滚了下来。

“伊利奇！”她喊了一声。

阿库林娜松开手，放开了婴儿。

“上吊啦！”木匠老婆大哭大叫。

阿库林娜冲进了过道，她没注意到，她那孩子象个小线球似地仰脸翻倒了，翘着两条小腿，脑袋浸到了水里。

“在梁上……挂着哩，”木匠老婆说，可是她一看见阿库林娜，就停住了。

阿库林娜摸到梯子上去，人们还没来得及阻拦她，她就跑上去了，只听得一声可怕的叫喊，她便象死尸似的倒在梯子上，要不是人们从各个角落里跑来及时把她扶住，她非摔死不可。

十 一

大家乱哄哄的，有好几分钟什么也听不清。数不清的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嚷成一片，孩子们和老太婆们在哭，阿库林娜人事不省地躺着。最后，男人们、木匠和跑来的管家，爬到阁楼上去了，木匠老婆已经说了第二十遍，“她怎么也没想到，去拿一件短披肩，就这么往里一瞧：看见有个人站在那儿，又一瞧：旁边放着一顶帽子，里子朝外翻。再一瞧呀，两条腿在那儿直晃悠。我吓得浑身象浇了凉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吊死人了，我怎么就

偏偏碰上这种事儿呢！我自己都不记得我是怎样轰隆一声摔下来的。上帝救了我，这真是奇迹。真的，是上帝饶恕了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么陡，又那么高！我真会摔死的。”

上过阁楼的人下来也这么说。伊利奇只穿着一件衬衫和裤子吊在梁上，用的正是他从摇篮上解下来的那根绳子。他的帽子，里子朝外翻，也放在那儿，厚呢外衣和皮袄都脱了下来，叠得整整齐齐地搁在一边。他的脚虽然够着地，但是已经断气了。阿库林娜苏醒过来后，向梯子扑去，可是大家拦住了她。

“妈妈，肖姆卡呛死了，”那咬字不清的小姑娘突然在小屋里尖声叫道。

阿库林娜又挣脱开身子，向小屋跑去。那婴儿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洗衣盆里，他的小腿已经不动了。阿库林娜把他一把抱出来，但小孩已经咽气了，不动换了。阿库林娜把他扔到床上，两手叉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是那么高，那么响，那么可怕，使得起初也跟着笑的玛什卡捂住耳朵，哭着跑到过道里去了。人们又哭又号地拥进了小屋。人们把婴儿抱了出去，开始给他按摩；但一切都没有用了。阿库林娜一面在床上打滚，一面哈哈大笑，凡是听见这笑声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毛骨悚然。只有这时，在我们看到这些聚集在过道里的男女老少混杂在一起的人群以后，我们才懂得，住在家奴们的下房里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人数又是如此众多。大家都乱成一团，七嘴八舌，很多人在哭，可是没有一个人干正经事儿。木匠老婆还可以找到一些没有听过她的故事的人，于是她又从头说起，那意外的情景怎样刺激了她那脆弱的感情，以及上帝怎样拯救了她，没让她从梯子上摔下来摔死。一个穿着女人上衣的侍候主人开饭的老头，在叙述老爷在世的时候，有个女人怎样投到水池子里自尽的故

事。管家派人去找警察局长和教士，又指定了看守的人。上房的使唤丫头阿克休特卡一直瞪着两眼，望着阁楼的洞口，虽然她什么也没看见，可就是舍不得离开，回到太太那儿去。老太太从前的使女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一边要茶喝来安神，一边在哭。老奶奶安娜用她那两只熟练的、胖乎乎的、涂满橄榄油的手把婴儿的尸体抱到桌子上。女人们站在阿库林娜周围，默默地望着她。孩子们缩在角落里，瞧着母亲，号啕大哭起来，后来他们不哭了，又瞧着母亲，蜷缩得更紧了。男孩子们和男人们都拥挤在台阶跟前，脸色惊慌地向门里和窗子里张望，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明白，于是便互相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有个人说，木匠用斧子把他老婆的一条腿给砍断了。另一个说，洗衣服的女用人一胎生了三个孩子。第三个说，厨子的猫疯了，咬伤了人。可是事实真相渐渐地传开了，终于传到了太太的耳朵里。但人们好象不会把事情说得婉转点，使太太有个精神准备似的。鲁莽的叶戈尔竟然冒冒失失地禀告了她，这就使得太太的神经受到了很大刺激，以致事后很久她都恢复不过来。人群已经开始安静下来；木匠老婆生上了茶炊，煮上了茶，同时那些没得到邀请就来的局外人，也觉得再待下去就有失体统了。男孩子们开始在台阶旁边打架。大家也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便画着十字，开始各自散开。这时，忽然有人大声喊道：“太太来了，太太来了！”于是大家又聚拢来，并且靠得紧紧的，给她让路，但是大家也想看看她到底来干什么。太太脸色苍白，满面泪痕，跨过门槛，走进过道，进了阿库林娜的小屋。几十个脑袋挤在一块儿，在门旁张望。一个怀孕的女人被挤得尖叫起来，可是她马上就利用这个机会在前面占了一个位置。人们怎能不看看在阿库林娜家里的太太呢！对家奴们来说，这等于一出戏

收场时的五彩焰火。要是燃起了五彩焰火，那就值得一看，要是太太穿着丝绸花边衣裳来到阿库林娜家，那也值得一看。太太走到阿库林娜身边，拉住她的手；可是阿库林娜把手挣开了。年老的家奴们都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阿库林娜！”太太说。“你有孩子，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呀。”

阿库林娜哈哈大笑，站起身来。

“我的孩子都是银子的，都是银子的……我不趁钞票，”她象开连珠炮似地嘟囔道。“我常跟伊利奇说，别要钞票，瞧，你让人家给抹上，抹上焦油了，抹上麝肥皂的焦油了，太太。无论生什么癣，都会立刻好的。”她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更响了。

太太转过头去，叫医士拿着芥末快来。“给点儿凉水，”她说罢就亲自去找水；可是太太一看见死了的婴儿，在婴儿前面站着老奶奶安娜，她就转过脸去，大家都看见她用手帕捂住脸哭了。于是老奶奶安娜（可惜太太没有看见，要是看见了，一定会很赞赏的；这一切都是做给她看的。）用一块粗麻布给婴儿盖上，用她那两只胖乎乎的灵巧的手把婴儿的一只小胳膊弄直，然后摇摇头，撇撇嘴，伤感地眯缝起眼睛，深深地叹了口气，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出她的好心肠。可是太太没看见这个，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她失声痛哭起来，她的歇斯底里症发作了，于是人们挽着她的胳膊把她扶到过道里，又搀扶着把她送回了家。“她也不过如此罢了，”许多人这样想道，便又各自散开了。阿库林娜一直在哈哈大笑，胡言乱语。人们把她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给她放了血，敷上芥末膏，又把冰放在她头上；但她还是什么也不明白，她不哭，只是哈哈大笑和胡言乱语，并且做出种种举动，惹得那些看护她的善心的人们也忍不住笑了。

十二

在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庄子里，节日过得很不愉快。虽然天气很好，但人们没有出去玩，姑娘们也没有在一块儿唱歌；从城里回家过节的年轻工人们既没有拉手风琴和弹三弦琴，也没有和姑娘们在一起玩。大家都坐在角落里，倘若有人说话，也是悄悄地，好象有什么恶魔在那儿能听见他们说话似的。白天还没有什么，可是一到晚上，天一断黑，狗吠叫起来，更糟糕的是寒风骤起，并且在烟囱里发出呼啸，这时，所有的家奴都胆战心惊，有蜡烛的都在神像前点上了蜡烛；一个人住在小屋里的，便到人口较多的邻居家去请求借宿，而那些该到牲口棚里去的，也不出去了，硬着心肠这一夜不给牲口喂饲料。每家储藏在小瓶里的圣水也在这一夜用光了。许多人甚至听见这天夜里有人老是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阁楼上走来走去，铁匠还看见，一条蛇直飞到阁楼上去了。波利凯的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孩子们和那个疯女人被带到别处去了。只有那个死婴儿还躺在那儿，那儿还有两个老太婆和一个女香客；这个女香客不是为了超度婴儿，而是为了攘灾避邪，出于自己的热诚正在诵读圣诗。这是太太要求她这样做的。刚读完一章圣诗，这两个老太婆和那个女香客就亲耳听见上面的房梁颤动起来，并且有人开始呻吟。她们一念：“愿神兴起^①”，就寂静了。木匠老婆把教母请了来，一夜都没睡，跟她把留着喝一个礼拜的茶叶全喝光了。她们也听见上面的房梁喀嚓喀嚓地响，好象有麻袋从上面掉下来似的。要不是守夜的农民们给这些家奴壮胆，这一夜他们真会吓死的。这些

^① 见《圣经·旧约·诗篇》第六十八篇第一节。

农民躺在过道里的干草上，后来他们确凿有据地说，他们也听见阁楼上的怪事，虽然这一夜他们十分平静地相互谈论着征兵的事，啃着面包，搔着痒，主要的是，弄得过道里充满了庄稼人特有的那股怪味儿，以至木匠老婆走过他们身边时，啐一口唾沫，骂他们是乡下佬。不管怎样，反正那吊死的人还在阁楼上挂着，好象恶魔在这天夜里亲自用巨大的翅膀遮住了家奴的下房，显示出它的威势，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离这些人更近了。至少他们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我甚至认为这是完全虚幻的。我想，如果有个胆大的人在这个可怕的夜晚擎着蜡烛或是提着灯笼，画过十字或连十字也不画，便走上阁楼去，借着烛光慢慢地驱散他面前的夜的恐怖，照亮房梁、沙土、布满蜘蛛网的烟道，和木匠老婆忘在那儿的披肩，一直走到伊利奇跟前，假如他没有被恐怖压倒，而把灯笼举到齐脸那么高，那么他就可以看见那熟悉的干瘦的身躯，两脚站在地面上（绳子已经松了），身子僵硬地歪向一边，衬衫领子敞着，衬衫下面看不见十字架；还可以看见他那垂在胸前的头，眼睛睁着，但却视而不见，善良的面孔，温和而负罪的微笑、肃穆的宁静和笼罩着一切的寂静。说实在的，木匠老婆缩在自己的床角上，披头散发，瞪着惊慌的眼睛，在叙述她听见麻袋怎样掉下来的那副神情，倒是比伊利奇更加可怖，更加骇人得多，虽然伊利奇的十字架已被摘了下来，放在房梁上。

在上房，也就是说，在太太那儿，象在下房里一样，也笼罩着同样的恐怖。太太的房间里发出一股花露水的香味和药味。杜尼亚莎在化黄蜡，做药膏。药膏到底有什么用，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每逢太太生病的时候，总要做药膏。而现在，她心里难过得闹起病来了。为了给杜尼亚莎壮胆，她姑妈来这儿陪她过

夜。她们一共四个人，跟小丫头坐在女仆室里悄悄地说着话。

“谁去拿点油来？”杜尼亚莎说。

“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①，我说什么也不去，”那个二等使女坚决地答道。

“得啦；你跟阿克休特卡一块儿去吧。”

“我一个人跑去，我什么都不怕，”阿克休特卡说，但马上又胆怯起来。

“好吧，你去；乖孩子，向安娜老奶奶要，再放在杯子里端回来，可别洒了，”杜尼亚莎对她说。

阿克休特卡用一只手提着裙子，这样一来，她的两手就没法摆动了，可是她却加倍使劲地，与她的前进方向成直角，摆动起一条胳膊向前飞奔而去。她很害怕，她觉得，无论看见或是听见什么，哪怕是看见她那活着的母亲，她也会吓掉魂的。她半闭着眼睛，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飞也似地跑去。

十 三

“太太睡了没有？”突然有一个农民的低沉的声音在阿克休特卡身旁问道。她睁开原先半闭着的眼睛，看见了一个人影，她觉得这个人影比下房还要高；她尖叫了一声，扭头就往回跑，跑得连她的裙子也跟不上她了。她一步跳上台阶，再一跳就到了女仆室，她狂叫一声扑到床上。杜尼亚莎、她姑妈和另一个使女都吓傻了；但还没有等她们清醒过来，便听到门道里和房门旁传来了一阵沉重、缓慢和犹疑不定的脚步声。杜尼亚莎拔脚就向太太屋里跑去，把药膏都撞翻了；那个二等使女藏进了挂在墙上的裙子

^① 杜尼亚莎的本名和父名。

后面；那位姑妈比较果断，她刚想去堵门，可是门却开了，一个庄稼汉走进了房间。这人就是穿着象小船似的树皮鞋的杜特洛夫。他不理会使女们的恐惧，只顾用眼睛去找寻神像，他因为没有找到那个挂在左墙角的小神像，便对着搁茶碗的碗柜画了个十字，把帽子放在窗台上，然后一只手深深地探进皮袄里面，象要在腋下抓痒似地掏出了一封用五个印有铁锚的棕褐色火漆封着的信。杜尼亚莎的姑妈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她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

“你可吓死我了，纳乌梅奇！我连话……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真以为我没命了。”

“哪能这样呀？”那个二等使女从裙子后面伸出头来说。

“连太太也被惊动了，”从太太屋里走出来的杜尼亚莎说，“你怎么问也不问就闯到女仆室的台阶上来呢？真是大老粗！”

杜特洛夫没有道歉，只是一再说他要见太太。

“她不舒服，”杜尼亚莎说。

这时，阿克休特卡噗嗤一声大笑起来，笑得不象话，只好把脑袋藏进床上的枕头里，尽管杜尼亚莎和她姑妈吓唬她，但她在那儿足有一小时抬不起头来，一抬头就要哈哈大笑，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她那玫瑰色的衣服前襟和红红的双腮里爆炸了似的。她觉得，大家都害怕得不得了，简直太滑稽了，于是她又把脑袋藏起来，好象抽风似地用鞋底来回蹭地板，整个身子都在跳动。

杜特洛夫停住了脚步，注意地看了看她，好象要弄明白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似的，但是他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转过身去继续说自己的话。

“是这么回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你只消去说，有个庄稼汉找着了那封装着钱的信就行了。”

“什么钱？”

杜尼亚莎在去通报之前，先念了信封上的姓名地址，又问明了杜特洛夫，他是在哪儿和怎样找到伊利奇应该从城里取回来的这笔钱的。当她把一切细节都问明白了，并把那大笑不止的飞毛腿推进过道以后，她就去见太太，但使杜特洛夫感到诧异的是：太太还是不接见他，并且什么也没有对杜尼亚莎说清楚。

“什么庄稼汉、什么钱，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太太说。“我谁都不能见，也不想见。叫他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那叫我怎么办呢？”杜特洛夫摆弄着信封说。“钱可不少呀。这上面写的什么？”他问杜尼亚莎，杜尼亚莎又把信封上的姓名地址给他念了一遍。

杜特洛夫总象不大相信似的。他希望这笔钱也许不是太太的，人家给他念的姓名也许不对。可是杜尼亚莎又向他证实了这没有错。他叹了口气，把信封揣到怀里，准备走了。

“看来，得交给警察局长了，”他说。

“等等，我再去试试看，去说说，”杜尼亚莎注视着这个庄稼人把信封揣在怀里以后，又叫住了他说。“把信给我。”

杜特洛夫又掏出信来，可是并没有立刻把它交到杜尼亚莎伸出来的手里。

“你就说是谢苗·杜特洛夫在路上捡到的。”

“你就给我吧。”

“我本以为这就是一封信罢了；可是一个当兵的看了，说里面有钱。”

“你给我嘛。”

“为了这，我连家都没敢回……”杜特洛夫又说，仍舍不得和这封宝贵的信分手。“您就这样回禀太太吧。”

杜尼亚莎拿了信，又到太太屋里去了。

“唉呀，我的上帝，杜尼亚莎，”太太用责备的声音说，“别对我提这笔钱了。我只要一想到那个小孩……”

“太太，那个庄稼人不知道您究竟吩咐把钱交给谁，”杜尼亚莎又说道。

太太拆开信封，一看见钱，就打了个寒战，沉思起来。

“可怕的钱，它作了多少恶啊！”她说。

“太太，这人叫杜特洛夫。您是吩咐他走呢，还是出去见见他？钱不短吧？”杜尼亚莎问道。

“我不要这笔钱了。这是一笔可怕的钱。它惹出了多少事啊！告诉他，要是他要，就让他拿去吧，”太太突然说道，一面去找杜尼亚莎的手，“是的，是的，是的，”太太对惊讶的杜尼亚莎重复道，“让他统统拿去，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千五百卢布哪，”杜尼亚莎好象对小孩子似地微笑着提醒她说。

“让他都拿去，”太太不耐烦地重复道。“怎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笔钱不吉利；永远不要再对我提起它了。就让捡到它的这个庄稼人拿去吧。去吧，你快去呀！”

杜尼亚莎出来，走进了女仆室。

“没少吧？”杜特洛夫问道。

“你自己数去，”杜尼亚莎说，把信封递给了他，“太太吩咐还给你。”

杜特洛夫把帽子夹在腋下，弯下了腰，数起钱来。

“没有算盘吗？”

杜特洛夫明白了：太太因为笨，不会数，所以才吩咐他做这件事儿。

“回家去数吧！给你了！钱是你的！”杜尼亚莎气冲冲地说。“太太说：‘我不要看见这笔钱，谁拿来的，就还给谁。’”

杜特洛夫没有直起腰来，眼睛直盯着杜尼亚莎。

杜尼亚莎的姑妈把两手使劲一拍。

“哎哟，我的妈呀！上帝让你交了好运啦！哎哟，我的妈呀！”

那个二等使女不信：

“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您开什么玩笑呀？”

“怎么开玩笑！太太吩咐还给这个庄稼汉……喂，把钱拿着，快走吧，”杜尼亚莎说，并不掩饰她的恼怒。“有人倒霉，有人走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千五百卢布哪，”姑妈说。

“还不止呢，”杜尼亚莎肯定道。“喂，你去买支十个小钱的蜡烛供供米柯拉^①吧，”杜尼亚莎讥讽地说。“怎么，你还没有明白过来吗？这笔钱要是给一个穷人就好了！可他呀，有的是钱。”

杜特洛夫终于明白了这不是开玩笑，于是他便开始把打开来数的钱收了起来，装进信封；但是他的手不住哆嗦，他老是瞅着使女们，想证实这并不是跟他开玩笑。

“瞧，他都乐昏了，”杜尼亚莎露出她还是瞧不起这庄稼人、根本没把这些钱放在眼里的模样说道。“让我来给你装吧。”

说罢她就想伸手，但杜特洛夫不让她拿；他把钞票攥成一团，更往深处塞了塞，然后拿起了帽子。

“你高兴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真是……”

① 即圣尼古拉，俄国正教圣徒。

他没把话说完，只是挥了挥手，得意地笑了笑，差点哭出来，然后走了出去。

太太房间里的铃响了。

“怎么，还给他了吗？”

“还给他了。”

“怎么样，他很高兴吗？”

“乐得简直跟疯了似的。”

“咳，去叫他回来。我要问他：他是怎么捡到的。叫他到这儿来，我没力气去。”

杜尼亚莎跑出去，在过道碰见了那个庄稼人。他没有戴上帽子，正掏出钱包来，弯下腰，在解钱包上的扣子，钱叼在嘴里。他大概觉得，钱不装进钱包就不是他的。杜尼亚莎喊他时，他吓了一跳。

“什么事，阿夫多季娅……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莫非她想把钱要回去吗？求您替我说句好话吧，真的，我一定送些蜂蜜给您。”

“说得倒好听！你什么时候给过？”

门又开了，这个庄稼汉被带到太太跟前。他很不痛快。“唉，她准是想把钱要回去！”他想道；当他穿过一个个房间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就象迈过高高的草丛似的高抬着腿，竭力不让树皮鞋发出响声来。他既不明白，也看不见他周围的一切。他走过一面镜子的时候，看见一些花、一个穿着树皮鞋把腿抬起来的庄稼人、老爷的画像只画着一只眼睛、一只绿桶和一样白的东西……瞧，这个白的东西开始说话了：这就是太太。他什么也听不懂，只是瞪着两眼。他不知道他在哪儿，他觉得好象一切都在迷雾中似的。

“是你捡到的吗，杜特洛夫？”

“是我，太太。还是原来的样子，我动也没动过，”他说。“我说实话，上帝作证！马也让我赶得够呛……”

“好啊，是你的运气，”她带着轻蔑而又亲切的微笑说道。“拿去吧，你拿去吧。”

他只是瞪着两眼。

“我很高兴这笔钱落到了你手里。上帝保佑你，但愿能对你有点用处！怎么样，你高兴吗？”

“我怎能不高兴啊！我真是高兴极啦，太太！我要永远为您祷告上帝。我真高兴，谢谢上帝，保佑我们太太长命百岁。而一切罪孽都由我来承担。”

“你是怎么捡到的呢？”

“这就是说，我们一向能够诚实无欺地为太太出力，决不会有什么……”

“他简直都颠三倒四了，太太，”杜尼亚莎说。

“我送我侄子去当兵，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捡到的。准是波利凯无意中丢的。”

“好，你走吧，走吧，亲爱的。我很高兴。”

“我太高兴了，太太！……”庄稼汉说。

后来他想起了他还没有道谢，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太太和杜尼亚莎微笑着，于是他又迈开步子，象穿过深草丛似地走了出去，好容易才忍着没有拔腿飞跑起来。他老觉得，有人会突然叫住他，把钱抢走……

十四

杜特洛夫一到外面就离开大路向菩提树丛走去，为了更便于把钱包掏出来，他甚至解开了腰带，然后往里放钱。他虽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但他却翕动着嘴唇，一会儿撅着，一会儿咧开。他放好了钱，束好了腰带，画了个十字，就象喝醉了酒似的沿着小路踉踉跄跄地走去：种种想法一下子涌上他的心头，他正专心在想心事。他突然看见前面有个人影向他迎面走来。他喊了一声，原来这是叶菲姆拿着一根粗棍子在家奴下房周围来回巡逻。

“啊，谢苗大叔，”叶菲姆卡更走近了些，快活地说道。（叶菲姆卡正感到一个人怪害怕的。）“怎么，把新兵都送走了吗，大叔？”

“都送走了。你在干吗？”

“伊利奇上吊死了，叫我在这儿守夜。”

“他在哪儿？”

“据说，在那儿，在阁楼上挂着哩，”叶菲姆卡答道，他说时用那根粗棍子在黑暗中指着下房的屋顶。

杜特洛夫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虽然什么也没看见，但却皱了皱眉，眯缝起眼睛，摇了摇头。

“警察局长来了，”叶菲姆卡说，“马车夫说的。马上就要把他放下来了。大叔，夜里可真吓人！要是他们命令我上去，在夜里说什么我也不去。哪怕叶戈尔·米哈雷奇把我揍死，我也不去。”

“罪过，真罪过！”杜特洛夫反复说，显然这不过出于礼貌罢了，其实他根本没有去想他在说什么，他只想着走自己的路。然而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声音使他停住了脚步。

“喂，守夜的，到这儿来，”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台阶上喊道。

叶菲姆卡答应了一声。

“跟你站在一块儿的那个庄稼汉是谁？”

“杜特洛夫。”

“谢苗，你也来一下。”

杜特洛夫走上前去，借着马车夫手里的灯笼的亮光，看清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一位矮矮的官员；这位官员戴着缀有帽徽的制帽，穿着军大衣：这就是警察局长。

“老头也可以跟咱们一块儿去，”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看见了他，说道。

老头感到很恶心；但又毫无办法。

“叶菲姆卡，你是个年轻小伙子；快跑到他上吊的阁楼上去，把梯子摆正，让长官上去。”

叶菲姆卡刚才还说他无论如何不到下房跟前去，现在他那双好象两截圆木头似的树皮鞋却咚咚地响着跑去了。

警察局长打火点着了烟斗。他住在离此两俄里的地方，因为酗酒刚被县警察局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所以现在他劲头十足：他晚上十点钟一到这儿就要立刻去验尸。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问杜特洛夫，他到这儿来干什么。一路上，杜特洛夫把捡钱的事和太太处理这件事的经过都告诉了管家。杜特洛夫说，他是来请求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许可的。管家把信封要去看了看，这可把杜特洛夫吓坏了。警察局长也把信封拿在手里，简短而冷淡地问了问细节。

“得了，这钱算吹了，”杜特洛夫想道，接着便要为自己表白。可是警察局长却把钱还给了他。

“这个蠢货真走运！”他说。

“对他还正合适，”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刚把侄子送到征兵站去，现在就能赎回来了。”

“啊！”警察局长说罢便向前走去。

“怎么样，想把伊柳什卡赎回来吗？”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问道。

“怎么把他赎出来呢？钱够吗？再说，也许来不及了吧。”

“随你的便，”管家说，说罢，他们俩便跟在警察局长后面走去。

他们走到下房跟前，那些气味难闻的守夜人正打着灯笼在过道里等着。杜特洛夫跟在他们后面。守夜的人们都带着负疚的神情，这种神情只能是和他们发出的气味有关，因为他们什么坏事也没有干。大家都一言不发。

“在哪儿？”警察局长问道。

“在这儿，”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低声说。“叶菲姆卡，”他接着说，“你是个年轻小伙子，打着灯笼头里走吧！”

叶菲姆卡已经摆正了阁楼上的木板，好象他一点也不害怕了。他一步跨两三级，神色愉快地向上爬去，只是不时回过头来，用灯笼给警察局长照路。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跟在警察局长后面。当他们走上去看不见了的时候，杜特洛夫把一只脚登上了梯子，叹了口气，又站住了。过了一两分钟，他们的脚步声在阁楼上静了下来；想必，他们已走到了尸体跟前。

“大叔！叫你呐！”叶菲姆卡在阁楼的洞口喊道。

杜特洛夫爬了上去。灯笼的亮光只照见在房梁那边的警察局长和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上半身；在他们后面，还有一个人背着身子站着。这就是波利凯。杜特洛夫爬过房梁，画着

十字,站住了。

“伙计们,把他转过身来,”警察局长说。

谁也不动弹。

“叶菲姆卡,你是个年轻小伙子,”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

这年轻小伙子跨过房梁,把伊利奇的身子转过来,站在他旁边,用十分快活的眼神一会儿瞧瞧伊利奇,一会儿瞧瞧长官,就象一个要把天老儿^①或者尤利娅·巴斯特拉娜^②展览给人看的耍把戏的,时而看看观众,时而看看自己的展览品,以便满足观众提出的一切要求。

“把他再转过来点儿。”

伊利奇又被转过来一点,他的两条胳膊微微地晃动着,一只脚在沙土上拖了一下。

“扶住他,把他放下来。”

“要把绳子割断吗,瓦西里·鲍里索维奇?”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伙计们,拿把斧子来。”

对守夜人和杜特洛夫非得命令两次他们才肯动手,但是那个年轻小伙子,对待伊利奇就象对待一只宰好了的绵羊似的。他们终于割断了绳子,把尸体放下来,用东西盖上。警察局长说法医明天来,然后便让大家回去了。

① 天老儿是一种先天性发育异常的人,由于体内色素缺乏,全身毛发生来就呈白色或淡黄色,皮肤呈白色或淡红色,眼睛怕见较强的光。

② 尤利娅·巴斯特拉娜属于“长胡子的女人”这一类的畸形人,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俄国,作为“自然界的奇迹”公开展览。

十五

杜特洛夫微微动着嘴唇，向家里走去。起初他觉得很害怕，可是他越走近村子，这种感觉便逐渐消失了，一种快乐感越来越充满了他的心头。村子里传出了歌声和醉醺醺的说话声。杜特洛夫从来不喝酒，现在他也是直接走回家去。当他走进自己的木屋时，已经很晚了。他的老伴睡了。老大和孙子们睡在炕上，老二睡在堆东西的屋里。只有伊柳什卡的老婆没有睡，穿着一件平时穿的脏衬衫，没有包头巾，坐在长凳上恸哭。她没有出去给伯伯开门；等他一进屋，她就哭得更凶了，而且一边哭一边数落。照他老伴的说法，她哭诉得有板有眼，非常好听，虽然她年纪轻轻的，还不可能有实践经验。

老伴起来，去给丈夫做晚饭。杜特洛夫把伊柳什卡的老婆从桌旁赶走了。“够啦，够啦！”他说。阿克西尼娅站起来往长凳上一躺，还是不停地哭。老伴默默地把饭摆在桌子上，饭后，又默默地把桌子收拾干净。老头也是一句话不说。他祷告完上帝，打了个饱嗝，洗了手，便把挂在钉子上的算盘取下来，走进堆东西的屋里。他先在那儿跟老伴低声说了一会儿话，后来老伴出去了，他便劈劈拍拍打起算盘来，最后他把箱子盖砰地一声盖上，又钻进了地下室。他在堆东西的屋子里和地下室里磨蹭了老半天。当他回到正屋时，屋里已经变得漆黑，松明也灭了。在白天照例不声不响的老伴，已经躺在高铺上睡着了，满屋子都是她的鼾声。爱吵吵嚷嚷的伊柳什卡的老婆也睡着了，不出声地呼吸着。她衣服也不脱就睡在长凳上，也没把什么东西放在头底下做枕头。杜特洛夫开始祷告，然后又瞧了瞧伊柳什卡的老

婆，摇了摇头，他吹灭了松明，又打了个饱嗝，便爬上炕去挨着小孙子躺下。他在黑暗中把树皮鞋从炕上扔下去，仰面躺下，瞅着他头上依稀可辨的挂在炕上面的渔具，倾听着蟑螂在墙上爬动的沙沙声、人的叹息声、鼾声、两脚互相蹭痒的声音和外面牲口的响声。他好久都睡不着；月亮已经升起，屋里变得亮些了；他也能看清睡在角落里的阿克西尼娅了，还有一些东西他却分辨不清：是他儿子忘在那儿的厚呢外衣呢，还是女人们放在那儿的一只小木桶呢，还是有人站在那儿呢？他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还是没睡着，反正他又定睛注视起来……想必是那个恶魔，那个曾引诱伊利奇寻短见、在这天晚上家奴们都曾感觉到他降临的恶魔，展开了翅膀，也来到了村子，来到了杜特洛夫的木屋，这儿放着他用来毁了伊利奇的那笔钱。至少，杜特洛夫感到他在这儿，因此杜特洛夫觉得很不自在。睡也不是，起来也不是。他看见这个他分辨不清的东西以后，就想起了两手被捆绑起来的伊柳哈，想起了阿克西尼娅的脸和她那有板有眼的哭诉，想起了晃动着两手的伊利奇。突然，老头觉得有人从窗前走过。“这是谁呢，难道村长有什么事来通知我吗？”他想道。“他是怎么开门的呢？”老头听见过道里有脚步声，这样想道。“莫非是老伴到过道里去没有插上门吗？”狗在后院里叫起来，而他却在过道里走着，象后来老头所叙述的那样，他好象在找门，他擦着门走过了，又开始顺着墙摸，他的脚绊在小木桶上，木桶响了起来。接着他又开始摸了，好象在找门把手似的。他抓住了门把手。老头浑身打了个哆嗦。他把门把手一拉，接着有个人影走了进来。杜特洛夫心里明白，这就是他。他想画十字，可是画不成。他走到铺着台布的桌子跟前，把台布扯下来，扔到地板上，又往炕上爬去。老头认出了，他化成了伊利奇的模样。他呲牙咧嘴，两

手摆动着。他上了炕，使劲压在老头身上，想要掐死他。

“我的钱，”伊利奇说。

“你松手，我不啦，”谢苗想说，可是说不出来。

伊利奇用他那石山似的全部重量压在他胸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杜特洛夫知道，要是他一念祷告文，他就会放开他的，而且他也知道应该念什么祷告文，但他就是念不出来。他孙子睡在他的身旁。这男孩尖叫了一声，哭起来了：爷爷把他挤到墙边去了。孩子的喊声使老头张开了嘴。“愿神兴起，”杜特洛夫说。他放松了一点。“使他的仇敌四散……”杜特洛夫嘟嘟哝哝地说。他下了炕。杜特洛夫听见他的双脚碰着地响了一声。杜特洛夫一个劲儿念他所知道的祷告文，接连地念。他向门口走去，经过桌旁，又砰地一声关上门，使得整个木屋都震动起来。可是，除了爷爷和孙子以外，大家都睡着了。爷爷念着祷告文，浑身哆嗦，孙子则一边哭一边睡，把身子紧贴着爷爷。一切又沉寂了。爷爷一动不动地躺着。墙外一只公鸡在杜特洛夫的耳边打鸣。他听见母鸡动弹的声音，听见一只小公鸡想跟着老公鸡学打鸣，但又学不象。有什么东西在老头的脚边动起来。这是一只猫，它用柔软的爪子从炕上跳到地上，开始在门边喵喵地叫起来。爷爷起来，支起了窗子；外面漆黑一片，满是泥泞；大车的前轱辘和车辕就停在窗下。他光着脚，一边画着十字走到院子里，向马跟前走去。在这儿也看得出，那主儿^①曾来过这儿。那匹母马站在马棚下的马槽旁，它的腿被缰绳绊住了，谷糠也弄撒了；它抬着腿，扭着头，等着主人来。一匹马驹躺在一堆马粪里。爷爷把它扶了起来，给母马解开了绊住的腿，喂了料，然后又回到木屋里。老

^① 指恶魔。

伴起来了，点着了松明。“把孩子们叫醒，”他说，“我要进城去，”说完这句话，他就点着了神像前的一支蜡烛，擎着它到地下室去了。等杜特洛夫从那儿出来，不仅他一家点上了亮，所有邻居们的屋里也都点上亮了。年轻人已经起来了，正在收拾东西。妇女提着水桶和牛奶盆进进出出。伊格纳特在套车。老二在给另一辆车涂油。那个年轻媳妇已经不哭了，但是却打扮得齐齐整整，系上头巾，坐在屋里的长凳上，正等着到时候进城去跟丈夫告别。

老头显得特别严厉。他跟谁也不说一句话，他穿上新外衣，系上腰带，把伊利奇的钱统统揣在怀里，就去找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了。

“你尽管磨蹭吧，”他冲着伊格纳特喊道。伊格纳特正在转动架起来涂了油的车轴上的轮子。“我马上就回来。把一切都准备好！”

管家刚起床，正在喝茶。他自己也准备进城去办新兵移交。

“你有什么事？”他问道。

“叶戈尔·米哈雷奇，我想把我那小子赎回来。这事可要您费神了。前几天您说，您认识城里一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请您给指点指点。我们什么也不懂。”

“怎么，你想通了吗？”

“想通了，叶戈尔·米哈雷奇：怪可怜的，他总算是我兄弟的儿子。不管他怎么样，总有点舍不得。许多罪孽都是钱造成的，都是钱这东西造成的。劳您驾给指点指点吧，”他深深地鞠着躬说。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如他平常遇到这种情形时那样，沉思地、一言不发地一个劲儿咂嘴；直到把问题斟酌好了以后，

才写了两个便条，并且告诉他在城里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等杜特洛夫回到家里，那个年轻媳妇已经和伊格纳特动身走了；那匹灰色的大肚子母马已经完全套好了，正停在大门口。他从篱笆墙上折下一根长竿子，掩好了衣襟，就坐上马车，赶着马走了。杜特洛夫赶着马飞快地跑，以至马的肚子一会儿就瘪下去了；杜特洛夫连看也不去看它，免得看了心疼。他一想到他到征兵站去晚了，伊柳什卡要去当兵去了，这笔恶魔的钱仍然要留在他手里，他便感到痛苦。

我不想详细描写这天早上杜特洛夫的全部经历；我只想说说他特别走运的事。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便函给他的那个主儿，早有一个现成的自愿卖身当兵的人；这人已经花了二十三卢布，而且已经由局里批准了。他主人想把他卖四百卢布，但是城里有个买主磨蹭了三个礼拜，一再请求让到三百卢布。杜特洛夫只三言两语就把这事办妥了。“三百二十五，卖不卖？”他说时伸出手去，但脸上的表情使人一看就知道他还可以再添点。那卖主缩回手去，还是要四百。“三百二十五卖不卖？”杜特洛夫重说了一遍，用左手抓住卖主的右手，并且摆出架势准备用自己的右手拍下去。“不卖吗？好吧，上帝保佑你！”他突然说道，接着拍了一下那卖主的手掌，猛地把整个身子转了过去。“看来，非这样不可了！给你三百五。出张收据。把那小伙子领来。这是给你的定钱。两张红票^①够了吧？”

于是杜特洛夫便解开腰带，掏出钱来。

那卖主虽然没有缩回手去，但总好象还是不太乐意似的，他没有收定钱，一定要杜特洛夫摆一桌酒，请那个自愿卖身当兵

^① 旧俄票面值十卢布的钞票。

的人。

“别造孽了，”杜特洛夫把钱塞给他时反复说，“咱们都是要死的，”他用那种温和的、教训式的、自信的口吻重复着这句话，使得那卖主只好说道：

“没法子，”他又一次拍了杜特洛夫的手，然后开始祷告上帝。“祝你万事如意，”他说。

他们叫醒了因昨天喝酒过多还在睡觉的那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把他检查了一遍，然后便一同到官署去了。这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很高兴，他要求喝点罗木酒来解解醉，杜特洛夫便给了他点钱去买酒，直到他们走进征兵办事处的门厅时，他才胆怯起来。穿着蓝色西比尔卡^①的年老的卖主和穿着短皮袄、竖眉瞪眼的那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在门厅里站了老半天；他们在那儿窃窃私语了半天，请求到什么地方去，在找什么人，又不知干吗对每一个录事都脱帽鞠躬，庄重地倾听那卖主认识的一位录事把决议书拿出来念给他们听。想在今天把手续办妥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于是那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又变得高兴和放肆起来，杜特洛夫一看见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马上就一把抓住他不放，又是央求，又是鞠躬。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忙帮得非常见效，在两点多钟光景，这位志愿卖身当兵的人，在大为不满和诧异之中，被带进了办事处，送往征兵站，上自长官，下至守卫，不知为什么都很高兴，他就在这种气氛中被脱去衣服，剃了头，又穿上衣服，然后被带出门外，五分钟后，杜特洛夫点交了钱，拿了收据，告别了卖主和那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就回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新兵住的那家客店里。伊利亚和他

① 一种腰间打褶的上衣。

的年轻媳妇正坐在厨房的角落里，老头一进门，他们就停止了谈话，用顺从而怀有敌意的目光盯着他。老头照例先祷告了上帝，解下腰带，然后掏出了一张纸，把大儿子伊格纳特和在院子里待着的伊柳什卡的母亲叫进了屋。

“伊柳哈，你别造孽了，”他走到侄子跟前说。“昨儿晚上你跟我说那样的话……难道我就舍得让你走吗？我记得我兄弟是怎样把你托付给我的。要是我有力量的话，我会把你送去当兵吗？上帝让我交了好运，我并不是舍不得。瞧，这是字据！”他说完就把收据放在桌上，用他那弯曲的、伸不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抚平了它。

所有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民们、客店里的伙计们、甚至一些不相干的人都从院子里跑了进来。大家都在猜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谁也没有打断老头的庄严的演说。

“瞧，这是字据！我花了四百个卢布。别怨你的伯伯了。”

伊柳哈站了起来，但是一言不发，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嘴唇激动得抖起来；他的老母亲啜泣着走到他的身边，想要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可是老头用一只胳膊慢慢地、命令式地把她推到一边，继续说道：

“你昨天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头又重复道，“你那句话象刀子似的刺痛了我的心。你父亲半死不活的把你托付给我，你就跟我亲生的儿子一样，我要是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那我们一家子都有罪。诸位正教的教友们，我说的话可对？”他转身向站在四周的农民们说。“你亲生的母亲和你年轻的媳妇都在这儿，这是给你们仨的收据。钱算不了什么！看在基督的面上，请你们原谅我！”

于是他撩起厚呢外衣的前襟，慢慢地跪下去给伊柳什卡和

他的妻子叩头。这对年轻的夫妇想阻拦他没有拦住，直到他的头触到地面，他才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坐到长凳上。伊柳什卡的母亲和年轻媳妇高兴得失声痛哭起来；人群中发出了一片赞美声。一个人说：“照真理，照上帝的教义，就应该这样。”另一个人说：“钱算什么？拿钱买不到一个小伙子来。”“多高兴啊，”第三个人说，“一句话，他是个正直的人。”只有那些被派定去当兵的农民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不声不响地走到院子里去了。

两小时以后，杜特洛夫的两辆大车驶出了城郊。老头和伊格纳特坐在第一辆由灰色母马拉的车上，母马的肚子瘪了进去，脖子上流着汗。在大车的后部，有一串串的锅子和一些甜面包在摇晃着。婆媳俩系着头巾高高兴兴地端坐在第二辆车上（这辆车无人驾驭）。在媳妇围裙下放着一瓶酒。伊柳什卡满脸通红，蜷着身子，背朝着马，坐在马车的前部摇摇晃晃，一面吃面包，一面不停地说话。人语声、车轮走在路上的辘辘声、马打响鼻声——这一切汇合成了一片愉快的声响。马感到正在向回家的路上走去时，便不停地摇着尾巴，一步快似一步地向前奔驰。不论是步行的人还是坐车的人，都不由得回过头来瞧瞧这快乐的一家人。

一出城，杜特洛夫一家就赶上了一群新兵。这帮新兵正在一家酒铺门前围成一个圆圈站着。有个新兵因剃光了前额^①，看上去样子很不自然，他把灰色军帽推到后脑勺上，正在灵巧地弹着三弦琴；另一个新兵，没有戴帽子，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正在圈子中央跳舞。伊格纳特勒住了马，下车去绕紧挽绳。杜特洛夫一家都怀着好奇、赞赏和愉快的心情看着这跳舞的人。这个新兵好象谁也看不见，但他感觉到对他赞叹的人越来越多，这就

^① 在旧俄，新兵入伍，必须在脑门上剃去一块头发，以防逃跑。

使他跳得更欢、更帅了。他敏捷地跳着。他双眉紧锁，红润的脸庞一动不动；嘴上挂着早已失去了表情的微笑。好象他内心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如何能使两只脚更快地倒换着跳，一会儿用脚跟，一会儿用脚尖。有时候他突然站住，对弹三弦琴的人使个眼色，于是弹三弦琴的人就更加敏捷地拨动起所有的琴弦，甚至不时用指节敲打着琴板。这个新兵停住了，虽然他一动不动地站着，但他好象还在跳舞似的。骤然，他抖动着肩膀，慢慢地动起来，又猛地纵身一跃，在半空中蹲了下来，一声吆喝，跳起了矮步舞。男孩子们在笑，女人们在不断摇头，男人们赞许地微笑。一个年老的军士泰然地站在那个跳舞的人身旁，那副神气似乎在说：“你们真是少见多怪，可是我们却司空见惯了。”弹三弦琴的人大概弹累了，懒洋洋向周围看了一眼，弹错了一个和声，于是猛然用手指敲了一下琴板，跳舞就结束了。

“喂，阿廖哈！”弹三弦琴的人指着杜特洛夫对那个跳舞的人说。“你的教父来了！”

“在哪儿？我的亲爱的朋友！”阿廖哈（就是杜特洛夫买的那个新兵）叫道，他踉踉跄跄拖着两条疲乏的腿，把那瓶伏特加举到头上，向大车跟前走去。

“米什卡！来只杯子！”他叫道。“老伙计！我的亲爱的朋友！真是幸会，真的！……”他把醉醺醺的脑袋伸进大车，嚷道，接着就请爷儿们和娘儿们喝酒。爷儿们喝了，娘儿们不肯喝。“我的亲人们，我拿什么送给你们呢？”阿廖哈搂着老太婆们叫道。

一个卖吃食的女人站在人群中。阿廖哈一看见她，就抢过她的托盘，把上面所有的东西都倒进了大车。

“别害怕，我给一给你钱，见鬼去吧！”他带着哭声嚷道，接着就从马裤里掏出一个钱包，把它扔给了米什卡。

他站在那儿，用胳膊肘支在大车上，眼泪汪汪地瞧着坐在车上的人。

“哪位是母亲？”他问道。“你，是不是？我要送点东西给她。”

他沉思了片刻，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条叠好的新手绢和一条在军大衣底下用来束腰的毛巾，又匆匆忙忙从脖子上摘下红围巾，把它们揉成一团，塞到老太婆的膝盖上。

“给，我送给你，”他用越来越低的声音说。

“为了什么呢？谢谢你，亲爱的！瞧，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老太婆向走到她们这辆大车跟前的杜特洛夫老头说。

阿廖哈一声不响，没精打采的，就跟睡着了一样。他的头越垂越低了。

“我是替你们去的，替你们送命去的！”他说。“为了这，我才送给你们礼物。”

“我想，他也有母亲，”人群中有一个人说。“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多可怜！”

阿廖哈抬起头来。

“我有妈，”他说。“我也有亲爸。他们都不要我了。老大娘，你听我说，”他抓住伊柳什卡的母亲的手接着说道。“我送给了你礼物。看基督的面上，你听我说。请你到沃德诺耶村去一趟，到那儿找一下尼科诺娃大娘，她就是我的亲妈，你懂吧，你就跟这位大娘，跟这位尼科诺娃大娘说，她住在村头第三家，门口有眼新打的井……你就跟她说，阿廖哈，她的儿子……已经……弹琴的！弹起来呀！”他大声叫道。

于是他又跳起舞来，还一面念念有词，把装着剩酒的瓶子摔到在地上。

伊格纳特爬上大车，想要驱车动身。

“再见，愿上帝保佑你！……”老太婆一边掩上皮大衣的衣襟，一边说。

阿廖哈猛然站住了。

“你们都去见魔鬼吧，”他威胁地握紧拳头，大叫道。“让你的母亲……”

“哦，主啊！”伊柳什卡的母亲画着十字说。

伊格纳特给了母马一鞭，两辆大车又辘辘地前进了。那个新兵阿廖哈站在大路中间，紧握拳头，脸上现出狂怒的表情，用足力气大骂那些农民。

“你们停下来干什么？滚吧！魔鬼们，吃人的野兽们！”他大声嚷道。“你们逃不出我的手心的！魔鬼们！穿树皮鞋的乡巴佬们……！”

说着说着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他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不一会儿，杜特洛夫一家人走到了旷野里，他们回过头来张望，已经看不见那群新兵了。大车慢慢地走了将近五俄里，伊格纳特从父亲的大车上下来（这时他父亲已经在车上睡着了），挨着伊柳什卡的大车步行。

他们俩把那瓶从城里买来的酒喝光了。过了不多一会儿，伊利亚唱起歌来，娘儿们也跟着他唱起来。伊格纳特合着歌声的节拍不时愉快地吆喝着马。一辆快活的驿车迎面疾驰而来。当这辆驿车和那两辆愉快的大车擦肩而过时，驿车夫麻利地对马一声吆喝；邮差回过头来瞧了瞧，并向坐在车里东摇西晃、快乐地唱着歌、脸色红红的爷儿们和娘儿们挤了挤眼。

（1863年）

芳 信 译

题 解

卢塞恩——德·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记摘录

写于一八五七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国旅行期间，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七年第九期《现代人》杂志。

小说是托尔斯泰根据他在瑞士卢塞恩地方亲眼看到的一件事情写成的。作者揭露了西欧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也出现了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

阿尔贝特

写成于一八五八年二月，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八年第八期《现代人》杂志。

小说写一个已经堕落为酒鬼的有才华的音乐家和他的艺术的感染力。

三死

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九年第一期《读者文库》杂志。

小说叙述一个贵妇人、一个农民和一株白桦的死。作者揭露了统治阶级人物的虚伪和道德上的丑恶，表现老百姓不但在他们辛劳的生活方面，就是在对待死亡的态度方面也高于统治阶级。作品中充分发挥了作者的向往自然和归真反璞的思想。

家庭幸福

写于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五九年，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九年第七、八期（四月）《俄国导报》杂志。

小说带有自传性质，描述一个妇人对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丈夫所抱有的浪漫主义热情的破灭，后来这种感情转化为一种由对子女和子女的父亲的爱产生的安详持久的情谊。小说描述了上流社会社交生活对“家庭幸福”的致命性影响。女主人公原来纯洁的感情，在度过几个月上流社会的生活后就完全被玷污了。

哥萨克

写于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三年，初次发表于一八六三年第一期《俄国导报》杂志。

小说描述贵族青年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而来到高加索，在高加索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自我牺牲和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个理想以破灭告终。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第一次尖锐地提出从自己的阶级“出走”，跟贵族社会脱离关系的问题。

波利库什卡

写于一八六一年三、四月作者在布鲁塞尔旅行期间，初次发表于一八六三年第二期《俄国导报》杂志。

小说是六十年代初托尔斯泰以农民为主题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某些主题和形象是从《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继承过来的。作者表现了在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了波利库什卡的自杀。作者在这里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 第 一 卷 童年 少年 青年
- 第 二 卷 中短篇小说
- 第 三 卷 中短篇小说
- 第 四 卷 中短篇小说
- 第 五 卷 战争与和平 (一)
- 第 六 卷 战争与和平 (二)
- 第 七 卷 战争与和平 (三)
- 第 八 卷 战争与和平 (四)
- 第 九 卷 安娜·卡列宁娜 (上)
- 第 十 卷 安娜·卡列宁娜 (下)
- 第十一卷 复活
- 第十二卷 故事
- 第十三卷 戏剧
- 第十四卷 文论
- 第十五卷 政论
- 第十六卷 书信
- 第十七卷 日记